

曾慶豹 / 著

# 約瑟 和他的兄弟們

護教反共、黨國基督徒與臺灣基要派的形成



紀念 周聯華牧師（1920-2016）





……基督並不是要世俗政府的寶劍用來從她的王國中拔除任何東西，而是希望單憑著上帝的話語來戰鬥到世界的末了。就像先知以賽亞所聲稱的，基督會以口中的杖擊打世界、以嘴裡的氣殺戮惡人，而不是用世俗政府的寶劍。先知但以理同意這點，並說敵基督者（那些反對基督教信仰和教條的人）應該「不動手」來將之摧毀。任何需求世俗權力來捍衛信仰和教條的人，或者驅逐錯誤的信仰和教條的人，不過是在輕視和嘲笑新約和先知的話。與以賽亞和但以理所說的相反——基督會在他的王國以嘴裡的氣戰鬥和不動人類之手也能消滅敵基督者——他們錯誤地相信基督嘴裡的氣無法消滅敵基督者，而要使用人類的手才能完成。

——匿名的紐倫堡人，《世俗政府是否有權在信仰問題上揮動寶劍》

*(Whether Secular Government Has the Right to Wield the Sword  
in Matters of Faith, 1530/3/17)*

肉體的事是顯而易見的。就如姦淫、污穢、邪蕩、拜偶像、邪術、仇恨、爭競、忌恨、惱怒、結黨、紛爭、宗派、嫉妒、醉酒、荒宴等類。

—〈加拉太書〉五章 19 至 20 節





# 目錄

---

瞿	序	<i>i</i>
邢	序	<i>iii</i>
蘇	序	<i>vii</i>
鄭	序	<i>ix</i>
郭	序	<i>xiii</i>
自	序	<i>xv</i>
引	言	1
1.	十字架上的黨徽：蔣介石的護教反共論述	13
2.	奮起為耶穌：成文秀與張靜愚的反共神學	51
3.	祈禱、反共、必勝：護教反共聯合會的組織與活動	89
4.	1965：從合一到分裂	159



<b>5. 黨國基督徒與臺灣基要派的形成</b>	229
<b>5.1 黨國基督徒與教會政治資本</b>	231
<b>5.2 趙天恩與中華福音神學院</b>	255
<b>5.3 黨國化的基督教大學</b>	285
<b>5.4 黑名單上的「總統牧師」周聯華</b>	303
<b>5.5 牧師的政治與政治牧師</b>	329
附錄：臺灣基督教會政教關係史大事記（1949 年後）	347
徵引文獻	355



## 瞿序

---

在威權戒嚴時期，威權保守的黨政機構強力管制乃至壓制宗教，相對地，大部份宗教團體會順從，但也有少數宗教團體卻也會反抗甚至強烈地抗爭。當時政教間的衝突也不只發生在政府和宗教團體之間，政府更受到黨的控制和指領，也有宗教團體幫助乃至更強力壓制和迫害其他的宗教團體。我們在早期研究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和一貫道的政教關係和衝突時，就發現黨、政府、長老會與對立的基督教團體、一貫道和對立的佛教團體之間複雜的關係。

當黨政機構已經開始解除對一貫道管制時，佛教團體卻仍然激烈地攻擊一貫道，在黨政和長老教會和解時，基督教右翼仍舊不斷批判長老教會。宗教間勢力和信仰的衝突似乎是更深層更久遠的。所幸，宗教自由和宗教平等在民主化過程中獲得了充分的保障，政教衝突得以消失，宗教團體也不可能再去壓迫其他的宗教團體。

回顧威權戒嚴時期的政教關係，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被黨政壓制和迫害，基督教右翼組織看起來是幫兇。但是曾慶豹教授挖掘出很多深層的史料和紀錄指出護教反共的黨國基督徒是迫害基督長老教會和新派或自由派基督教的首謀。曾教授這本《約瑟和他的兄弟們——護教反共、黨國基督徒與臺灣基要派的形成》專書詳盡地敘說了蔣介石和眾多黨國基督徒自 1950 至 1980 年代中竭盡所能全力打擊基督教異己教會和基督教領袖。

1986 年 10 月 26 日「中華民國基督教」在國父紀念館舉行「紀念先總統蔣



公百年誕辰感恩禮拜」，在舞臺正中掛了一個巨大的十字架，十字中央釘了一個大大的國民黨黨徽，不是受難的耶穌。曾慶豹教授說他第一次看到這張照片時「非常地震驚」，我想這圖像本身固然令人萬分震驚，更讓人震駭的是黨國基督徒公然肆無忌憚地結合黨、政、軍與宗教統治勢力長期迫害宗教異己。

全書深入敘說蔣介石本人的護教反共論述、反共神學的形成、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數位反共基督教領袖諸如張靜愚、成文秀、趙天恩、王永信、吳勇、陳溪圳的言行，以及受迫害的基督教領袖，如黃彰輝、謝緯、李嘉嵩、金仲庵、周聯華等人的境遇。讀到數不清的基督徒結合政治威權欺壓基督徒的故事，直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竟然有自認信仰純正的基督徒造謠生事，毫不寬容地打擊加害其他的基督徒。這些好戰的基督教基要派領袖的神貌和行動和伊斯蘭聖戰士頗為相似，還好他們手上沒有殺人的武器！

**瞿海源**

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研究員

2015年3月17日於南港

# 邢序

---

政教關係在華人基督教歷史發展中，一直是迴避不了的課題。如果我們將之置於戰後東西方冷戰格局的脈絡中，便更突顯其關鍵位置。其中，東亞地區（中國大陸、臺灣、香港）華人教會的發展，冷戰因素更是異常重要的。

過去，基督教在中國大陸的黨國體制下的發展，普遍受到學者關注。相對而言，在海峽彼岸，隨著國民政府遷臺，原有黨國體制也移植成臺灣政治的主體（戒嚴與威權）。國共兩岸分治的政治現實，無疑呈現了意識形態上的分野，但在異質的背後，兩黨在權力管制、國家與社會關係方面，也無法否認存在著一定的同質性。畢竟，國共兩黨的政權模式，均承襲自蘇俄老大哥的黨國（Party-state）體制。

中共黨國體制在五十年代以降，對中國基督教的發展，影響尤深，其中標榜「反帝」、「獨立」與「愛國愛教」的三自體制，徹底改寫了中國基督教的思想與制度。筆者研究五十年代的中國基督教史多年，特別關注基督教領袖對黨國強權所作的回應與自處，其中當然涉及信仰與神學的考量，但更多的是政治的抉擇，甚至是人性與良知的歷練與掙扎。

研究強權時代的政教關係，往往陷入「政主教從」的單向模式，即政治因素是主導宗教發展的支配性因素，宗教界只能順著政治形勢的發展走。因此，研究者大多重視分析黨國對宗教的政策，如何主導了宗教的命運，即或在處理黨國與宗教團體的關係時，也呈現了黨國主導的思維。總之，宗教界在這場政教關係之



中，只是扮演著「被動」的角色。

誠然，黨國強權的政治主導性絕不能輕視，但宗教界內部的回應，難道都只是「被動」的嗎？除了探討不同的神學傳統如何理解政治（或教會的政治與社會角色）外，不同教會人士對權力的考量，對成為政權與權力建制的「合作者」（collaborator）及伴隨著有形與無形利益的欲求，事實上也需要作深入的研究。同時，也有教會人士無法擺脫自身的政治立場，將某種意識形態絕對化及神聖化，因而有意無意地將自己視作上帝的使者，把自己的政治立場等同了上帝的計劃，也成為政教互動時不可或缺的因素。除了政權利用宗教外，我們事實上也不能否認，宗教人士也在利用政治，或利用宗教來實現政治……。

曾慶豹教授的新著《約瑟和他的兄弟們——護教反共、黨國基督徒與臺灣基要派的形成》，可說是填補了臺灣基督教史的空白。自解嚴以降，臺灣基督教史成為顯學，不論是荷蘭統治，或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均開始有學者從事開墾的工作。同時，不同宗派的歷史發展也受到關注。然而，針對國府遷臺後揭開新一頁的歷史，過去受到較多關注的仍是七十年代後長老教會的國是宣言後的政教關係，對五十年代起的歷史，顯然仍是一片空白。

認識慶豹兄二十多年，一直佩服他在神哲學領域的研究卓見，後來才得悉他跟我竟是治史同行。近年，他從形而上回到歷史，讓我們看見他對史料的重視與敏感，並展現其駕御史料的能力，更令我感到慚愧。本書在政教關係的主線下，重構了國民黨政權、長老教會、黨國基督徒三者間的關係，並置於臺灣曾走過獨特的時代脈絡之中，為臺灣基督教的發展，特別是基要派與黨國的關係，提出解釋與評檢。無疑，本書的觀點，特別是對個別人士、組織的評價，定會引起爭議。不過，重新揭開一段被遺忘及具爭議性的歷史，本身就需要勇氣，慶豹兄掀開了這層神秘的面紗，有待更多人來回應，這樣才更能有助重構歷史。不少人或會懷疑慶豹兄撰寫本書的動機，是否別有所圖，甚至在拆毀教會。不過，正如他在書中指出，這段歷史是臺灣基督教史上的「彩衣事件」，他期望的是「真相」後的「和解」，讓約瑟與他的兄弟們回到歷史，並得以坦誠面對直面歷史，在新的基

礎上共構臺灣基督教的將來，建立教會。

讀畢本書，筆者想起了中國大陸的教會歷史，同時也想起我城香港的教會……面對「泛政治化」的時代，有人企圖改寫歷史，有人主張遺忘歷史，因此，我們都需要好好的讀歷史，好好的寫歷史。

是為序。

**邢福增**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院長

2016年7月13日於香港



## 蘇序

---

緣自近三十年前，我在臺大城鄉所的碩士論文「新國家教堂」（後因此題目過於敏感，指導教授夏鑄九提議改為「教堂空間的社會分析」），主題乃圍繞在濟南教會（原臺北幸町教會）的前世今生，最終成了反共護教大業的輓品。

濟南教會原為日本政府為強化其在臺統治地位，進而威懾臺民的目的，而由總督府營繕課長井手薰設計，專為日籍基督徒官員崇拜之用，坐落在總督府至臺北神社（現圓山飯店舊址）途中，於 1916 年興築完成的官式教堂。

到了 1937 年，皇民化運動大興，濟南教會轉為臺灣總督府轄下的「傳道師訓練所」，當時該教會牧師上與二郎權力之大，竟可任免全臺南北各宗派所有傳道師，儼如臺灣總督府附隨基督教支部的小總督。

1945 年，日本二戰敗撤離臺灣，國府入主，濟南教會空間由原在此聚會的林宗義（二二八家屬代表）等臺籍年輕醫師繼續使用，而上與二郎牧師卻將濟南教會產權交給臺北市政府接收，以致遭到當時難民背景的國府政要入侵，其中為首的都是黨政軍特要員的反共護教集團分子，頗有侵奪教產之勢。這些人於 1980 年間更企圖以「中正紀念教會」之名，發動國際募款五億元，並以委託警備總司令彭孟緝之子彭蔭宜建築師所提供的設計圖為藍本，欲將濟南教會拆掉再重新打造，以作為黨國另類新皇民運動再起的總司令部。

所幸，這個計畫在 1991 年輾轉被李登輝總統知悉，最後以市定古蹟之名，將所有房舍一磚一瓦全部凍結，才保住了濟南教會之現貌，也粉碎了反共護教集

團最後的翻身一搏。

如今，難得有曾慶豹教授竟能將反共護教集團之前後行狀耙梳整理齊全編定《約瑟和他的兄弟們》一書，將以春秋之筆化諸名山，足堪為亂世賊子懼，殊屬不易；更將以上諸節，載入其力作之中，誠有全臺灣基督教史料之功。

最近，臺灣教會界頗有再起「國家祭司」位份之浪勢，但盼此時本書之面世，應可引為史鑑，回歸「凱撒的歸凱撒，耶和華的歸耶和華」之宗教本義，實為臺灣教會之大幸。

**蘇南洲**

自由作家，臺灣曠野社創辦人



## 鄭序

---

認識曾慶豹老師，大約是十幾、二十年前的事情了，當時他還是臺大哲研所博士班的年輕學人，和我們幾個關心本土神學的朋友一起出國參加一個亞洲的神學會議，因此有了認識、對話的機會。當時僅知道他的專攻是哲學詮釋學，後來他完成博士學位，到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教書，也注意到他逐漸進入漢語神學及公共神學的領域。儘管平常各自忙碌，接觸並不頻繁，卻可以感受到他的興趣廣泛，治學相當認真且嚴謹，也積極參與國際性的學術活動（我們曾一起到海德堡參加「臺德神學研討會」），展現出相當廣闊的人文視野，是臺灣基督教思想研究領域裡一位令人期待的學者。

早期曾老師對基督教本土發展的興趣比較偏向中國基督教史的範圍，但後來在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主辦了一系列小型研討會，讓臺灣基督教界不同的神學傳統能夠提出自身論述且彼此對話（我也受邀發表「長老教會神學」的相關論文），相當有意思。那時，我開始認知到，他已經跨越領域且涉足臺灣基督教的研究。沒想到，近三年來，他竟然一頭栽進戰後臺灣基督教的書寫，而且還觸及所謂「政教關係」的重要議題。

作為一位長期關注臺灣基督教史的研究者，我當然知道臺灣的「政教關係」是一個具有高度敏感性和爭議性（特別對於所謂的「國語教會系統」來說）且容易引發分歧觀點的議題，往往需要回歸歷史脈絡加以解讀，再輔以深入完整的分



析，才能夠理清其間的複雜情勢。在這看似公開實則隱晦的「黨政教網絡」裡，因能「上達天聽」而享有極大政治影響力且能左右教會政治情勢的「反共護教組織」以及在當中悠遊鑽營的大批「黨國基督徒」是過去較不為人所知的情事。這群活在「反共至上」的白色法西斯時期，習慣於以封建思維及戒嚴威權心態作為思考模式的基督徒，不但欠缺信仰反思的能力，更將黨國意識型態等同為基督信仰且視為理所當然。這樣的思維方式，對現今的基督徒來說，或許多數人只會斥之為「荒謬可議」，然而，因為這群基要派基督徒實際援引了政治權力來欺壓、傷害其他有良知的基督徒，其行為舉止不但違反了基督信仰精神，更觸犯了民主人權及法治的規範。曾老師在本書中以溫和平實的筆觸將這些故事娓娓道來，輔以真實且引人注目的歷史文獻和檔案照片，應該是本書最為寶貴的地方。

同一時期，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因為在戰後不久即加入普世合一運動，因而漸漸受到啟蒙和衝擊，並有意識地投入社會關懷與重建的工作，也參與了臺灣民主運動的開展。在追求自由、民主和人權的起步階段，更有不少宣教師因勇敢為臺灣發聲而付出艱辛代價。<sup>1</sup> 這些基於信仰良知為臺灣犧牲奉獻的長老教會宣教師及本地基督徒，若和上述的黨國基督徒相對比，實在是極大的反差。曾老師採用《約瑟和他的兄弟們》作為本書的書名，的確有其深刻的意涵。

事實上，當曾老師決定「捲褲腳撩落去」做這個研究時，它已經是一個出於信仰良知的決定。我還清楚記得，當他到臺灣神學院的教會歷史資料中心收集相關資料且徵詢我意見時，在經過一段漫長的對談後，他突然對我所說的話：「這個敏感的議題你們自己不好寫，就讓我來替你們寫吧！」那時，我清楚感受到，像他這樣的勇氣與膽識，已經超越一般「蛋頭學者」所謂的客觀、中立（其實是有著既定立場、虛偽、甚至趨炎附勢）的立場，直指臺灣基督教界受到「意識形態束縛」和「權力腐化濫用」的核心事實，並且明確反映了「歷史良知的召喚」！

什麼是「歷史良知的召喚」？尼布爾 (Reinhold Niebuhr) 曾指出，所有宗教反省的根基，並不在於我們的社會存在，而是在於意識、良知，和罪惡感的深度。他引用猶太哲學家馬丁·布柏 (Martin Buber) 的話：「所有先知性信仰的基本前



提就是：我在信仰良知中所遇到的上帝就是整個世界的創造主！」因此，尼布爾指出，人的信仰一方面讓他具有一種因為知所反省所帶來的「超越性」：他活在自然中，但卻超越自然，他在群體中建構歷史和文化，但卻超越歷史和文化，在他的信仰良知中，他得以參透萬事，審斷歷史。不過，他自己也必須面對終極的審判。雅思培 (Karl Jaspers) 強調，在所有的特殊意義之上，有一個意義的根源和終極目的，這也接近齊克果所說的「信仰的跳躍」(leap of faith)。另一方面，這樣的個人宗教良心絕不會讓我們對歷史或社會絕望，或忽略社會和歷史的責任，它必然會繼續產生或激發社會的敏感度：對社會的不公義、對權力的腐化、對專制極權的思想、對基本人權的侵犯，發出先知性的抗議。<sup>2</sup>

當代政治神學家溫克 (Walter Wink) 在他的「權力三部曲」裡，藉助拉丁美洲解放神學家的幫助，將以弗所書三章 10 節；六章 12 節以及歌羅西書一章 15-20 節的「天界執政的、掌權的」理解為現實世界裡不同的「體制、結構、系統」，或者「意識形態」。他指出，在新約聖經中，惡魔或邪靈必須有具體的展現形式 (embodiment)，或成為人類 (馬可福音一章 21-28 節；馬太福音十二章 43-45 節；路加福音十一章 24-26 節)，或豬 (馬可福音五章 1-20 節)，或政治系統 (啟示錄十二~十三章)。那麼，一個權力體系是如何變成「偶像」(idolatrous) 或是「邪惡」(demonic) 的呢？簡單的說，只要任何權力「追求一個和他被上帝創造的使命相異，並以自我利益為最高目的時，它就變成邪惡的」。因此，溫克主張，在現代世界中，我們必須積極對付權力及其支配系統，這牽涉到如何辨認、指稱和抵抗各種權力及其支配系統，並撕破、揭露其假面具的課題。<sup>3</sup>

確實，權力使人腐化，權力也能讓無力者翻身；權力使人驕傲，權力也能造就謙卑。濫用權力，造成不公義與傷害；善用權力，使人被賦權 (empowerment) 並能伸張公義，且讓邊緣人出頭天。權力之行使，在乎價值與信念，也在乎動機和目的。這是人類歷史自古以來傳統智慧的教導，更是歷代神學思潮不斷反省、洗滌、沈澱後的主張和提醒。

個人深信，曾慶豹老師所勇敢撰述的這本書已經開啟了臺灣基督教界的「轉



型正義」工程，不但對過往的錯謬意識形態提出批判，更揭穿了假冒神聖者及操弄權力者的偽善面具。也因此，它必定能夠帶領讀者們一步步接近真相。我更確信，只要我們願意致力述說真實，我們就會越接近真相，也會越趨近真理，畢竟真實、真相都指向真理！

鄭仰恩

臺灣神學院教會歷史學教授

臺灣大學兼任教授

- 
- 1 《「感恩與巡禮」國際友人對臺灣民主與人權奮鬥的回顧》，Vol. I & II(臺北：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2003)；*A Borrowed Voice: Taiwan Human Rights through International Networks, 1960-1980*(《我的聲音借你：臺灣人權訴求及國際聯絡網 1960-1980》)，edited by Linda Gail Arrigo and Lynn Miles (Taipei: Hanyao Color Printing Co., 2008)。
  - 2 Reinhold Niebuhr, "The Burden of Conscience," in *Justice and Mercy*, edited by Ursula M. Niebuhr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74), pp. 105-111.
  - 3 見 Walter Wink, *The Powers That Be: Theology for a New Millennium* (New York: Doubleday, 1998)；亦參鄭仰恩，〈權力神學初探〉，《玉山神學院學報》(第16期，2009年6月)，頁25-46。



## 郭序

---

這本我充滿期待的書終於要出版了，因為我認為這本書將會為基督教在臺的歷史研究帶來巨大的貢獻和震撼。

和慶豹相知相交超過廿載，我雖比他年長，卻常常從他的研究和洞見得到啟發和幫助，我自己也教授基督教在臺史，有幸先閱讀此書的初稿，明白慶豹的許多研究勢必讓 1949 年以來的臺灣教會史改寫，對此我感到欣慰。

慶豹的研究相當的多面，神學、哲學、藝術、歷史，樣樣都有突出的表現，他理性感性兼備，能講能寫更長於帶領學術機構作研究計劃。我和他深交一段短暫時間之後，更深刻體會到他歷史研究的天賦和敏銳度，我相信這本書只是他跨出的第一步，將來還會有更豐碩的研究成果與讀者見面。

說來汗顏，到目前為止，我們尚未有一本完整全備的基督教在臺史，尤其是 1949 年以後直到現在這一段，我們往往只能分別講述國語教會、臺語教會（或長老教會）、原住民教會各自的發展，而無法作整合性的敘述，我一直都有負擔要寫一本能呈現基督教與臺灣時局互動關係以及臺灣各教會與普世教會相聯結的基督教在臺史，卻又充滿了無力感，並且不知如何入手動筆是好，所幸慶豹這本大作解決了我的困擾和困惑，也翻轉了我許多的看法，給我的研究和寫作指出了一條明確的道路。

戒嚴時期的臺灣和共黨獲權後的大陸一樣，政治的影響力無處不在，而對這種所謂的政治全權和全能主義，慶豹在全書中作了最佳的歷史分析和神學詮釋。



本書完整地且明確地點出了黨國基督徒在其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當慶豹在論述這些人物和事件時，宏觀微觀兼俱，而且將政教衝突的兩造，分別追溯到普世教會這個源頭，論述的手法鞭闢入理，引用的資料多是第一手的檔案、文件與報導，甚至當事人親身的經歷記述，言而有據，雖然不能說完全沒有主觀的成份，但是要反駁或質疑書中的種種事實和論述，幾乎是不可能的。可以想見，本書一定會引起各方的論戰，甚至使作者承受外來的壓力和詆毀。

我認為，其中最情何以堪的是，我們這一代所推崇甚至效法的許多教會領袖和長輩，原來在他們的服事生涯中也有這麼多的妥協和軟弱，國臺語許多的教會和機構、聚會原來並不是那麼的單純。如何面對這些政教關係鬥爭中的人和事，甚至恩怨情仇？基本上我贊成慶豹的做法：讓歷史的真相呈現，正如他在書中結尾所言的：「救恩史和創傷史並行，沒有認罪，不會有真正的合一」。我也想到正如來華宣教士捲入帝國主義侵華的歷史那樣，宣教士幾乎無法跳脫其國家認同、時代的侷限，同樣的，黨國基督徒也有其族群、政權、領袖，甚至是主義的認同和時局的眼界限制等等。

人會受限，上帝的旨意之成就，卻不受限。猶記得我於 1975 年 6 月參加完大學畢業典禮，回到團契弟兄之家，當時我大學四年最要好的弟兄和同工立刻向我承認一件事：「明璋，我是調查局派在團契監督契友們的信仰和政治思想的人，我畢業之後就可以進入國科會或調查局工作。」我沒有否定他是一位好弟兄，只是因為他父親是一位海軍高級將領，他也忠黨愛國，同時被賦予了這個任務。類似的例子肯定相當的多。

最後，我期待著這本書可以帶來各地華人教會的反省，尤其是臺灣教會界認真看待本書中的內容，也期待慶豹有更多更精闢的研究成果出版，為我們廓清問題和真相。

**郭明璋**

牧師、臺灣基督教史研究者



# 自序

---

2014年7月，我走進了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七樓檔案室，這是我第一次到這裡來，迎來的是此部門的負責人黃哲彥牧師。我印象中曾見過哲彥，但未有過交談的機會，然而當我與他握手時，他的第一句話竟然是說：「我知道你離開中原大學了，看來這是早已料到的事。」突然的來了這麼一句話，我真的不知該如何接得下去，我確實是在2月到輔仁大學去了，但一個未交往過的人何以見面打招呼的第一句話是如此的呢？接下來，他所說的事更令我吃驚。

我們坐了下來，我想繼續上述的話題，想知道他為何會關注到我離開一個工作十五年的地方，究竟外界對此事—儘管是我個人的私事—有何看法。哲彥向我透露了一段他的往事，這段故事才使我了解到我為何會不得不離開中原，這故事竟然與我正在撰寫這一段臺灣教會的悲痛歷史有關，那一代的事，竟像咒語般，還不時地發作，就在我身邊。

哲彥說到他在就讀神學院時，曾與一位同學來往甚密，此人與他一同參與一些社運的活動，派發美麗島雜誌社的傳單。有一天，一位老是想說服他加入國民黨並擔任線民的教官找他到辦公室曉以大義，並說明價碼報酬，幫他付學費再外加生活費每月一萬元。恰巧，此位教官轉身離開辦公室，哲彥所坐的辦公桌邊的傳真機正傳來一封給教官寫的「報告」，傳真紙慢慢的傳出來，到了末端出現了署名，當仔細看到了那個簽名，哲彥頭皮發麻並雙手顫抖，簡直無法相信，這個簽名正是那一位經常與他出入街頭發派傳單的同學，天啊，此人原來早已經被吸收成了「線人」。



哲彥回憶這一段後並告訴我，他對此人的人格了解甚深，也了解當時他之所以被吸收，確實也與其家庭的經濟狀況有關，那一筆錢對他而言太重要了，因為當時他的父親生意失敗，故去給國民黨充當「抓耙仔」也不意外。哲彥說了這麼一段，讓我所有的疑問頓時都得到化解，當然，使我更感同身受的是為那一代被政治毒害的人心感到心痛，我宛如感到可以理解那個活在白色恐怖時期並陷於苦難的人所遭遇的人和事。總之對我而言，能夠聽到這則故事，是我撰寫這本書最意外、也是最彌足珍寶的回饋。

事實上，這本書解釋了許許多多我們不明白的事，尤其是今天臺灣教會的意識形態分野和神學教育的分歧及走向，都在這本書中獲得了部份重要的解釋。正如許多人閱讀《周聯華回憶錄》或《黃武東回憶錄》時，大都讀不出其中的政治意味，因為我們缺乏了對那個時期發生這麼多事的背景有所了解，各種看似細微的或個人彼此的關係，包括哪一些人在一起或不在一起，都有其脈絡和政治原因，學界如此，教界亦然，一幫子人就因某種利益或意識形態而走在一起，相互反饋。

這本書嘗試給讀者看清楚，過去五十年來臺灣教會發生的那些事，其實都可以說是從 1965 年到 1971 年這一段關鍵的時期及關鍵的事件所造成的後繼效應，弄明白了這一點，我們才可能理解臺灣教會的權力系譜和神學立場殊異的原因。或者進一步說，認識這一段教會歷史，我們才可以說寬恕的福音，才能在創傷的陰影和痛苦中走出來。教會無疑的應該是第一個實踐「轉型正義」的群體，因為這個群體所宣講的上帝即是正義的上帝、也是寬恕的上帝，正如杜圖主教說：「沒有真相，也就沒有復和」，真相和復和是上帝正義的兩個條件，認識到這一點，臺灣教會才可能迎來真正的復興和合一，不然我們就是活在虛假和無知中，我們恐怕要迎來的是上帝的審判而非拯救。

大文豪托馬斯·曼 (Thomas Mann) 有一本巨大的文學著作，名字就叫著《約瑟和他的兄弟們》，該書不論篇幅和內容都非常的龐大，所以至今尚未見有中譯本，也許，漢語文學界對這樣的題目未必能領會，如果考慮到托馬斯·曼作為一



位德語背景和猶太後裔的這些元素，該書的意義正是說明了時代中人性的真實與苦痛，諸多的心靈都飽受此磨難。該書不如說是托馬斯·曼書寫他自己的遭遇和命運，這本書與我的關係也有這些元素。

從 1985 年 9 月 29 日踏上臺灣這塊土地，至今已過了三十個年頭，我歷經了蔣經國戒嚴時期、李登輝時期的野百合運動，再經臺灣各大小不同的政治改變，如今我教授的大學生在我到臺灣時都不知在哪呢。俗話說：「吃臺灣米，喝臺灣水」，終於還是交出了一張與臺灣有關的成績單，總算是對在這裡生活得那麼的久和交往得深的朋友有所交待了。

本書撰寫的源起純粹是偶然的。

2009 年 10 月，我舉辦了以「臺灣基督宗教經、史、論」為主旨的研討會，第一屆的主題為「臺灣長老會神學：回顧與展望」，並於會中發表了一篇〈上帝的宣教、自決與認同一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國族想像」〉之論文，在撰寫該文期間，意外地發現了「反長老會」的言論中與 WCC 之間的問題，特別是教內的矛盾，有種剪不斷理還亂之感。換句話說，外界對長老會的政教關係主要是根據三個宣言之後的種種發展來理解的，事實上，在此之前長老教會早已陷於複雜的政教關係和教派矛盾之中，不僅學者甚少談及，長老會的學者也不甚重視。

於是，我就跟著這個線索追下去，越往下挖、越讓我感到驚訝，怎麼發生了那麼多的事，這麼多血淋淋和恐怖的故事，教會史學者為何都避而不談，可見之間的矛盾應該是非常非常的深。事實上，教會在這一段時間內深涉政治白色恐怖的泥濘之中，教會間的互動和交往都是非常複雜的，甚至利用作內部的鬥爭工具。漸漸地，我了解到今天臺灣教會的現狀以及那些在教會歷史舞臺上的領袖（包括目前活著的），原來他們背後與政治的關係如此的深、如此的不堪。因此也明白了，我離開中原大學是對的，不論信仰和立場上，我的離開確實是上帝的帶領，因為中原大學的相關人士涉入此段歷史極深，如果我還在這所大學任教，我怎可能出版這一本被我視為人生中一本重要的書呢？又如何可能開口說出這段歷史的真相呢？



這本書不是因為我離開那所學校有所不快才寫的，絕對不是。這本書的部份內容早已在 2012 年我的一位研究生的論文中披露，2013 年的宗教研究所課程曾教授過這一段並已開始著手撰寫其中的內容。然而，也確實只有離開，出版此書才是心安理得，若不是他們刻意的為難我、扣以「路線有問題」之詞，我也不可能對他們在護教反共時期所施行的手段多有體會。

或許，離開了服務十五年的學校是意料之外。而本書有許多的關鍵篇幅都與中原大學有關，更是我意料之外。這本書的出版確實令我覺得尷尬，但不論如何願甘冒被外界誤解的風險將這一段真實的過去揭示出來。總之，我認為這是上帝的帶領，如歷史的撰寫一樣，回過頭去看時，一切都豁然開朗。

寫到此，我尤其要提及一位老先生，他是我這本書中最為關鍵的主角之一，此人即是周聯華牧師。

1985 年 9 月 29 日那一天是禮拜天，在我下機後，就拉著一位同鄉的學長要求他帶我去做禮拜，當時的他也很懊惱，他不是基督徒，也沒有上過教堂，而且是晚上，該到哪裡去呢？那天晚上，在興隆路巷子裡的校友會紅豆湯之夜尚未結束，就匆匆的離去，學長騎著野狼的機車把我帶到臺大附近一間長得有些像廟堂的建築物那裡，他說印象中那是一間教堂。

那的確是一間教堂，儘管外觀有些特別。我們進入了教堂，招待將我們引到地下室一個擺設了整齊小椅子的小禮堂，我們坐了下來，當風琴的音樂響起，我看到了一個我在書上看過的人走到了講臺那裡，我認出來了，他是周聯華牧師，我曾在教會圖書館的書架上那本《神學綱要》見過他的名字，教會牧師還曾告訴我周老是一名「新派」。這的確令我感到驚喜，第一次在臺灣的主日禮拜，竟遇上鼎鼎大名的牧者，那天晚上講道的內容已全忘了，但是我可以確定的是，儘管疲累，但我沒有打瞌睡，反倒是坐在一旁的學長早已傾斜著身體呼呼大睡了。那天晚上走出教堂，經過聯經書店、桂冠書店，我在桂冠買了一本《希臘哲學趣談》，開始了我在臺灣學習和成長的序曲。



我沒有想過會在臺灣住那麼久，正如沒有想過會寫這本書中的內容；我也沒有想過與周聯華有所互動，甚至在他的協助下去主編「漢語基督教經典文庫」的大型出版計劃。記得在就讀政治大學時，一開始我就在懷恩堂參加主日崇拜，短暫的接受過周牧師主日信息的教誨，但在三個月後，一位政大企管系的港仔基督徒把我介紹到當時暫時租借華神六樓聚會的靈糧堂那裡，從此也就暫時告別了周牧師。當時我確實感受到在懷恩堂的聚會非常地沈悶，周老的講道像是催眠一般，太軟、難挑起信仰的熱情，現在回想起來也比較能理解，周老的語調和內容之所以如此單調、平淡，實為政治白色恐怖下的一種後果。試問，周老面對政治和教會給他的罪名，怎可能有什麼激動或敢言的表達呢？

同樣是「臺灣基督宗教經、史、論」系列的研討會計劃，第二屆的主題是「周聯華與本色化神學」，2010年3月於中原舉行，我發表了一篇關於周對雅歌的翻譯和詮釋的論文。這是一次我與周聯華近距離的接觸，接下來2012年開始「漢語基督教經典文庫」出版計劃，與周老的互動更加的密切。事實上，關於他的政治遭遇，我從未追問過他，因為關於他在教內的命運以及所遭受到難以想像的對待，全是我循著他的回憶錄、基督教的報刊和政府的檔案中一片片地拼出來的，他沒有為他的過往向我說過什麼抱怨的話。我越是了解他的處境，越能感受到他的人格修養，也越認識到那個時代的險峻，如果不是神蹟，他是不可能活到這把歲數的。

說上這一段，主要想說明，不是周老爆了什麼料給我。正因為這樣，我了解到要是找他寫序肯定是為難他，面對他身在那個「不得已」的年代，恐怕連他自己也都難以說得清楚。所以，我就不勉強請求周老賜序，不給他帶來難堪，那些害過他的人以及那些幫助過他的人，他對他們肯定有非常多的感觸，這些事就容他老人家把冷暖之情放在心上吧。

周老看過了本書的書稿，我也曾在公開的場合上發表過他的政教關係，今年8月他突然離世，我感到是一個時代的結束，這本書竟拖在他身後才出版，就順理成章地提獻給他，以告慰他在天之靈。



為本書寫序的諸位前輩友人和學者，在此我一併向你們致意，這是鼓勵、也是友誼。在此，我要特別為所有那些在教會中成長卻又受到傷害的人們獻上祈禱，不論是因為政治或是權力下受傷，唯願上帝安慰你們，你們的受苦參與了上帝在十字架上的受苦，相信上帝的公義最終必獲得伸張，若不在今世，也肯定可以在天國那裡。阿們。

三十年前的一個早上，我離開了家鄉，開始了我在臺灣的學習行旅。我原於長老教會領洗並設有會籍，但到臺灣之前，牧師就已叮嚀切勿到長老教會去，他們被說成是「新派」，更要小心他們的「神學」。其實，我真的不了解臺灣長老教會，大學時校園團契裡與幾位長老教會的基督徒互動都相當良好，沒有什麼不好的印象，但我來到了臺灣以後，確實沒有參加過長老教會。這本書解釋了我當時被告誡小心長老教會的緣由，事實上這並非是特例，因為絕大部份海外的華人教會都有此印象，我認為，全與當時島內護教反共時期的政治氛圍有關。

本書部分內容曾以會議及期刊或專書論文方式發表，現收入此書，更顯整體面貌。計劃出版本書，我屬意一定要找長老會教界的出版社出版，這可算作是我向他們一次的正面回應，謝謝公報社接受了我為臺灣教會做的一點回饋，我也可謂無愧於在臺灣所受到的友善對待。三十年在臺灣的生活，我沒有太多了解臺灣教會，而今透過本書我卻想告訴教會：我了解你們所受的創傷，希望這本書可以給所有海內外包括對岸的基督徒了解，教會在兩岸都是受苦的，尤其教會內在「政教關係」下的鬥爭應正面面對，應該回到誠實的教會史書寫，尋找真相，並走向和解，這才是天國子民和祂的國度該有的信仰實踐。

2015/10/31

2016/6/23 修訂

2016/11/2 再修訂



# 引言

中國反共抗俄戰爭，不僅為了爭取民族的生存，恢復國家的領土，保障四億五千萬同胞的生命和自由而戰，並且是為了亞洲安全、世界和平，與全人類文化進步而戰。

—蔣介石，《反共抗俄基本論》\*

本乎聖經的反共，是有其屬靈性的。請教會的一些領袖們，打破「反共不屬靈」的成見，和「反共就是談政治，就不屬靈」的成見。屬靈人是應該反共的！

—趙君影，〈反共的屬靈性〉\*\*

有不少基督徒過份主觀的反共，以致被人誤認站在資本主義的一邊。假如我們不分皂白的痛罵共產主義政權為「魔鬼的化身」，我們是否在暗示實行資本主義的「自由」國家就是「神的使者」呢？在基督教的宣教運動中，最不幸的就是被認同為資本主義的工具這件事了。所產生的破壞要比共產政權的迫害大得多了。

—蘇恩佩，〈我們應有的政治意識〉\*\*\*

## ■ 反共不是政治，護教卻是百分百的政治

讓人正視他們過去的經歷，說出他們的傷害與恐懼；教會若能與人分享自己受傷和得醫治的經驗，這種對話就能產生正面的果效。

——楊牧谷

不安與複雜的焦慮感，隱藏在獨裁政治底下。

有一次在一位老牧師的書架上翻看到一本書《共黨能和宗教和平共存嗎》，此書極為神秘，沒有署名作者，出版社是「光陸出版社」（似有「光復大陸」之意），時間是「民國75年8月」，標價為二十元臺幣，除此之外，沒有出版社的地址和聯絡方式。<sup>1</sup>然而，令我感到興趣的莫過於是牧師在扉頁註記了一段話：

### 反共不是政治

這段話無疑地刻劃了在兩岸意識形態強烈對立的時期，基督教在蔣介石的反共思想前提下所做出來的自我辯護（自圓其說）。

「反共不是政治」絕不是一句簡單的話，它基本上反映了兩種情況：一方面是暗示著基督教最好不要涉入政治，堅持政教分離的原則，另一方面則是把反共產黨、反無神論提高到比政治更高的層次，即它的宗教性或基督徒口中所說的「屬靈戰爭」。在我看來，「反共不是政治」可以充份地總結了蔣介石及其代表的黨國基督徒的反共神學是如何滲透基督教，卻又必須小心翼翼地避免引狼入

\* 蔣介石，《反共抗俄基本論》，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68，10。

\*\* 趙君影，《漫談五十年來中國的教會與政治》，臺北：中華歸主協會，1981，248。

\*\*\* 蘇恩佩，〈我們應有的政治意識〉（1973），收入於《這一代先知在哪裡？》，香港：突破出版社，2013，150。

1 《共黨能和宗教和平共存嗎》有另一公開版本，才知悉作者是郝志偉（牧師孩子），胡鴻文提序，後者時任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秘書長一職。



室，避免基督教干預政治，當然，它還給當時的基督教一方面合理化自身不涉及政治的立場之同時，卻又可以使其（不得不）參與一次全面配合黨國的政治意識形態的行動。

在蔣介石的精神指揮之下，從「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的成立到擴大成「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的組織，幾乎臺灣所有基督教的派別都被牽連入這一股「反共、護教」的政治動員行列中。這一段護教反共的歷史，對於我們理解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坎坷命運及其走向政治一途有著極為關鍵的意義；幾乎可以這麼說，不理解這一段黨國基督徒如何以護教之名來進行反共的宣傳，以及利用反共之名來達到打擊不同教派立場之實，也就不能理解何以臺灣長老教會日後走上與政治對抗的道路，以及與之相對的黨國基督徒這一方如何形成了日後臺灣島內的基要派勢力。護教反共時期，基督教被逼全面地被捲入「護教與反共」（defending Christianity & opposing communism）的意識形態漩渦之中，這一段歷史是理解臺灣基督教政教關係史最為關鍵的事件。<sup>2</sup>

在反共壓倒一切的年代，這種意識形態即同時可以用作打擊異己的最佳工具。蔣介石即是經由對共產黨的「無神論」和「宗教迫害」的指控，來達到把基督教全面納入對他的領導和統治的認同中，進一步的即是劃清任何可能威脅到他的領導的力量，特別是與外國勢力始終難以分割的基督教團體。所以可以這麼說，正是通過把基督教團結起來，避免基督教內部存在著不同的聲音，進一步則可以割斷與外國任何可能同情或支持共產黨勢力的聯繫。

---

2 董顯光的臺灣基督教史論述，也同樣明確地以反共為主軸。《基督教在臺灣的發展》一書寫得非常地早，算是一本相當有份量的著作，至少其資料的應用和論述層面相當的廣，從荷蘭統治時期一直寫到1950年，至今尚未有人超越他。但是，董顯光在該書的開篇和結尾處，都是以「反共的論述」為旨，重申基督教在臺灣的發展與作為堅實的反共態度是息息相關的，因為對比於大陸教會所受的壓迫而言，臺灣在這個意義上成了一個見證，以力證在這個自由的國家中所擔負的使命，其中又想通過基督教向美國人民表示這種基於反對共產暴政的態度和立場上是一致。董顯光這本書原是寫給美國人看的，一方面突出基督教在臺發展的成果，一方面又展現反共的立場，希望藉此取得美國對臺灣的支持，無疑的，就本書以反共作為主旨而言，這是一本「基督教反共史觀」的代表作。見《基督教在臺灣的發展》，臺北：出版社不詳，1970。







## ■ 教會內的「保密防諜」

如果視他人為敵，我們很有可能會變成自己所恨惡的那種人；在欺壓他人時，我們最終往往是欺壓了自己。我們之所以成為人，就在於肯定他人也同樣具有人性。

——杜圖主教

在兩岸意識形態高度對立的年代，「保密防諜、人人有責」成了所有信封背面最為醒目的標語，接下來的一句話即是：「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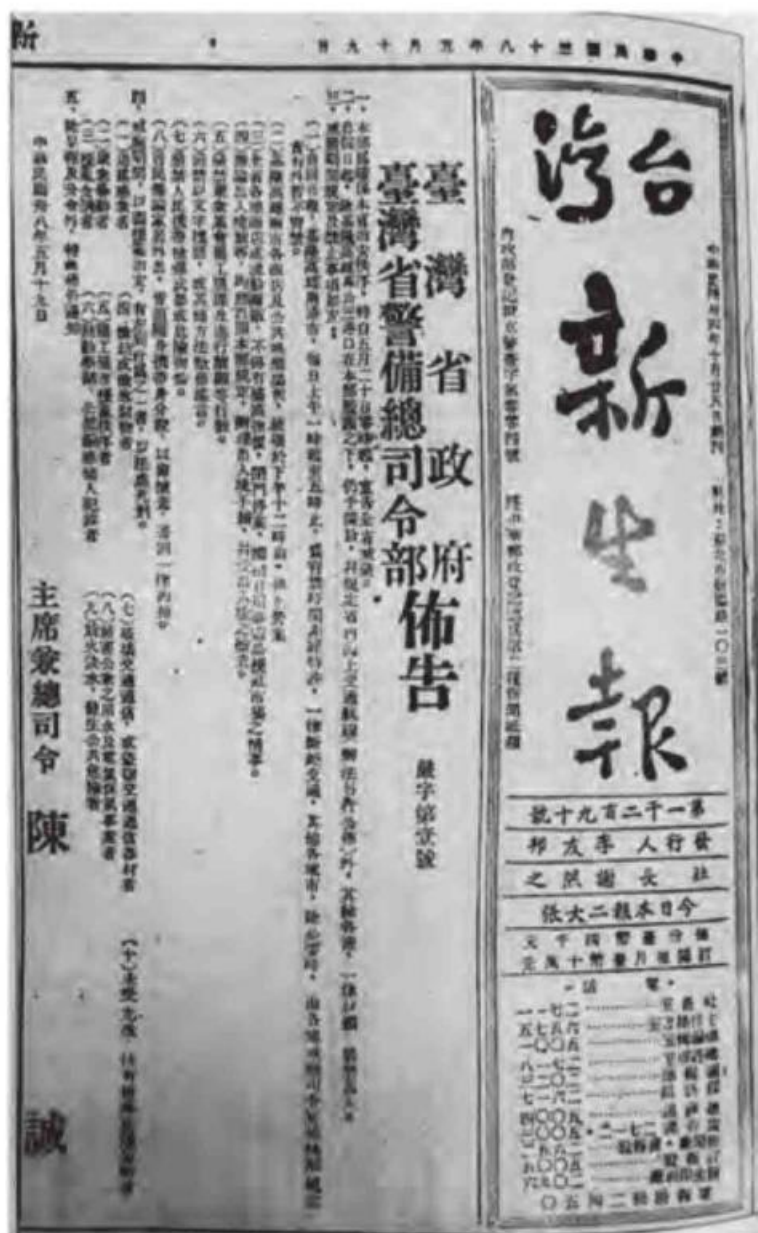
1949年後退守臺灣的蔣介石及其國民黨政權，不斷地強化對「萬惡共匪」邪惡和恐怖的印象。在黨國機器的大力宣導之下，臺灣上下草木皆兵，除了人人自危，還要小心共產黨可能在島內形成了一種滲透的力量，所以一般人民被塑造成念茲在茲的即是要反攻大陸、消滅共匪、解救同胞，凡是與共產黨相關的，一律主張「絕不談判、絕不接觸、絕不妥協」，各種組織都打著「復國」、「反共」、「中興」等與共產黨勢不兩立的思想戰爭，基督教也無以倖免。<sup>3</sup>

諸多對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都暗含著這樣一種「政治議程」，趙天恩和林治平兩人都分享了這樣一種意識形態的好處。趙天恩以維護宗教自由和關心中國大陸地下教會，林治平則是從歷史來應付共產黨的反基督教言論；前者是關心中國大陸教會與宗教政策問題，後者是力證基督教有力於中國現代化，但他們的敵人和蔣介石或黨國基督徒的敵人是同一個，他們把維護正統信仰或為基督教辯護成了政治統戰的工具，也就是強調以反擊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對待基督教的方式來認同國民黨統治的正當性。<sup>4</sup>

3 參見蕭淑惠，《遷臺後蔣介石的反共論述（1949-197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6。

4 對臺灣基督教史研究的政治背景說明，可另參見曾慶豹，〈漢語「中國基督（新）教史」之書寫及其問題意識——以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一書展開之論域〉，發表於輔仁大學歷史系主辦「第10屆文化交流史：理論、回顧與趨勢國際學術研討會」（新莊，2014），





▲戒嚴時期臺灣街道小巷弄內的標語：「保密防諜，人人有責」；有些公文信封外也寫著：「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作者攝於臺中霧峰光復新村)

◀宣佈臺灣進入戒嚴時期。(作者翻攝)

臺灣基督教會史要從 1965 年說起，這一年發生的事件，是臺灣基督教的神學系譜，也是屬靈的系譜，兩者都是一種權力論述。了解這一段歷史，可以了解在兩岸意識形態對立的時期，究竟基督教在此之所發生的悲慘命運，以及如何造就成今天臺灣基督教會的神學系譜 (theological genealogy)。

在護教反共時期，黨國基督徒究竟如何通過基督教與反共的思想立場結合起來？也許更為重要的則是，在這一波以反共壓倒一切的前提下，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為何除了必須附和這種意識形態的運動，也必須和國外任何可能與「親共、容共的勢力」(普世基督教協會，WCC) 或與「形形色色的馬克思主義相關的神學」(東正教、美國民權運動、拉美解放運動) 劃清界限，以作為解釋長老教會何以因為與普世教協的關係而「被迫」走向與國民黨對立的道路，甚至流亡於海外而

此文已收入於曾慶豹著《什麼是漢語神學？》一書中，新北市：臺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5。



萌生「臺灣自決」（不同於爾後的「臺獨」主張）的思想。這些都與蔣介石所掀起的護教反共運動有關。臺灣基督教今天的神學思想傾向和性格，差不多都是那個時期所塑造或定型的，去宗派、本色化、地方教會、成功神學、泛靈恩運動等，都與護教反共所造就而成的基要主義傾向有關，因此護教反共對臺灣基督教界的影響可謂非常深遠，這也是作為理解臺灣近五十年來基督教發展的一個重大且關鍵的歷史事件。臺灣基督教發展到今時今日，無論是就世俗的或是屬靈的意義而論，護教反共運動的影響比任何思想都來得深遠。<sup>5</sup>

長老教會背景的學者習慣於將長老教會與政治的關係一開始就定義為「政教關係」，而且，他們主要是直接訴諸於 1971 年以後的三個宣言來論述長老教會政治參與或社會行動，或將之直接的說成是「本土化運動」的努力，把「教會與政治的關係」理解為認同與宣教等相關神學問題等等。<sup>6</sup> 陳南州的《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社會、政治倫理》（1991）和鄭仰恩的《定根本土的臺灣基督教》（2005）都做如上的解釋，此後在此一相同主題下對長老教會的研究論著，基本上都沒有

5 關於這一段歷史，許多有關臺灣基督教史的書都很少提及。按理，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應該會對這一段歷史特別有感受，實際上，他們也是一筆略過，甚至連當事人黃武東、黃彰輝的回憶錄也提得不多。後來長老教會的學者為了強化其為臺灣受苦的記憶（悲情），主要提及他們是如何勇敢的對抗國民黨獨裁統治，以標榜長老教會與臺灣主體意識的關係，但這些都是後來論述的人對這一段歷史的「詮釋」，甘於被「誤解」、也甘於被塑造成「分離主義分子」，如此來加強其「被壓迫者」的形象。總之，長老教會與臺獨沒有必然的關係，長老教會走上臺獨是被迫出來的，或是黨國基督徒不斷加諸其親共形象而將之分離出去或孤立化他們的結果。大陸學者方面的認識，基本上也是沿著國民黨對長老教會的定調，以及長老教會也樂於接受此種交織著悲情與英雄的本土派形象，事實上，這些都與這段歷史的演進有出入，也許大家都忘記或根本不知道，長老教會是被說成是「親共」或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的團體而被扣上罪名的。另請參閱拙作〈上帝的宣教、自決與認同——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國族想像」〉，香港《建道學刊》第 35 期，2011，該文已收入於曾慶豹著《什麼是漢語神學？》。

6 一般而言，將長老教會的政治參與理解為「政教衝突」是不錯的，但不了解其背景「神學衝突」的起因，也就不容易看到其中所涉及到的複雜的教派鬥爭。林本炫不無誇張地以為長老教會與政治的關係源於他們的信仰精神或傳統，這與歷史現實不太相符，事實上長老教會對社會政治的關懷主要是被動的，林本炫看到只能是前者（政教關係的理論），至於後者的問題（歷史發生的教派內部的衝突）就沒有辦法說清楚了。見林氏著，《臺灣的政教衝突》，新北：稻鄉出版社，1990，第四、五章。



超過上述兩位學者的見解，或者是更多受到從宋泉盛到黃伯和的解釋而一再地被強化作「自決的神學」。<sup>7</sup>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社會、政治倫理》這本代表長老教會「準官方版」的立場之作，主要是從神學或義理上來梳理長老教會的社會參與過程，儘管不能不涉及對退出普世教協事件的著墨，但在梳理此一問題之時並沒有太願意去談論教會內部的矛盾，以及在護教反共的壓迫前提下如何一步步地被迫走向社會參與的路線。陳南州的書像是一部「失憶之作」，一方面缺乏關注到來自非長老教會陣營種種的攻擊行動對長老教會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在歷史文獻的歷史背景和（政治）思想史的梳理方面皆嚴重地缺乏。至於鄭仰恩的論述，作為一位歷史學背景的學者，竟也同樣疏於歷史資料與文獻的應用，未見其從不同的文獻來源中整理這段臺灣教會史的慘痛際遇，似乎並不太願意去碰觸到這一場錯綜複雜的教內矛盾，與陳南州一樣，他一開始就將之提高到神學的層面做討論，把傷痛的記憶壓抑到歷史的集體潛意識中。

事實上，長老教會與政治的關係遠比我們所想像的還要複雜得多。1970年之前的長老教會與政治的關係，並不是像1971年發表〈國是聲明〉之後那樣具有明顯或直接的社會關懷。長老教會在被迫退出普世教協之前，他們對社會的政治參與並不熱衷，他們單純地把教會看作宣教團體（倍加運動），並不想涉入與任何政治動員相關的活動。所以，當黨國基督徒不斷地把他們與普世教協的關係說成是造成與政府和教內護教反共人士關係緊張的原委，他們更多地是感到無可

---

7 陳南州，《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社會、政治倫理》，臺北：永望文化事業，1991；鄭仰恩，《定根本土的臺灣基督教》，臺南：人光出版社，2005。鄭仰恩提到了反共時代與退出普世教協的關係，但對於這一段關鍵時刻教會內的種種矛盾提得非常少，僅僅只有兩頁不到的文字描述，參見241-242，而且將之視為是臺灣教會本土化的歷史經驗。事實上，即便是本土化的歷史經驗，也是「被政治所迫」，非自覺的，也非情願的。關於這點，陳南州和鄭仰恩都著墨不深。豐富的史料和詳盡的論述還是難得一見的，另可參見侯坤宏〈青天白日旗下的十字架——戰後初期臺灣的一種政教關係〉，此文已收入即將出版之許文堂教授主編《1945-1952年軍事占領下的臺灣——張炎憲教授逝世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將由臺灣教授協會出版。



奈何。簡單地說：他們並不想涉足政治，只是政治找上了他們。

反觀非長老教會的論述，相對而言是比較尷尬和曖昧的，但他們也同樣是失憶。他們的基本心態即是不願意涉入這場教會矛盾，盡可能地像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似的。不要忘記的是，非長老教會的學者正是與迫使長老教會做出改變或加諸於他們痛苦的幫兇。<sup>8</sup> 過去，這些非長老教會背景的黨國基督徒比長老教會更積極參與政治動員，以反共來標榜自己護教，以護教來突顯自己反共，但現在他們反過來指控長老教會搞太多政治。他們不斷地指控長老教會過份參與政治，一方面似乎想藉此來顯示自己的清白，一方面則是用來掩飾他們骨子裡的「黨國至上主義」，看看他們的出版物以及形形色色的「國家祈禱早餐會」就可以得知。

## ■ 五十年前那件血跡斑斑的「彩衣」

不釐清過去的真相，不能進入新時代，惟有這樣才能建立新的社會，  
閉口不談過去的罪過，不能達成真正的和解。

——杜圖主教

8 這種對立仍然延續到今天，鄭仰恩的「臺灣教會人物」不包括吳勇、張靜愚、周聯華等，林治平的「辛亥百年基督徒」也不包括李春生、楊士養、黃武東、黃彰輝等，可見長老教會與非長老教會仍然在一種「政治考慮」的「正統論」之下來理解教會史，一方是臺灣「本土基督教史」，另一方是「中華民國教會史」（注意，林的編輯也不含有1949年後「三自教會」基督徒如吳耀宗、陳崇桂、賈玉銘等人）。參見鄭仰恩主編，《臺灣教會人物檔案（一）》，臺南：人光出版社，2001；林治平，《風雨中的彩虹—基督徒百年足跡》（五冊），臺北：宇宙光出版社，2011。值得注意的是，林治平在該書序言裡仍以馬禮遜為「第一位來華的傳教士」，完全不理會這個已經輕易被推翻的「說法」，仍然「將錯就錯」，實在令人不解。兩者代表了長老教會與非長老教會的「史觀」矛盾，可謂昭然若揭。與林治平關係密切且屬於國語禮拜堂系統的魏外揚，其著《牆上的名字：宣教士與臺灣》（中國信徒佈道會出版，2000）同樣未提及長老會重要的宣教士，馬雅各、馬偕等人不在他的書寫中，而且所提及的傳教士都屬於與國語教會關係良好的。2015年正逢「馬雅各來臺一百五十年」，以林治平為首的基要派史觀，還刻意地在臺灣慶祝「內地會一百五十年」，別苗頭的意味極濃。



很難想像有哪一個地區的基督教牧師或教會像臺灣那樣地對歷史無知。殊不知，這一段護教反共的歷史決定著今天教會的現況，對這一段歷史的無知，奢望談論基督教的本土宣教或是宣講種種寬恕和接納的信息，尤其是那些對「屬靈的醫治」高談闊論的，不是欺騙自己就是欺騙上帝。

今日泛靈恩運動的主張中不是倡議要從祖先所犯的罪中斷開嗎？雙方歷史論述嚴重的失憶（失職），沒有給「教會面向歷史的悔改」一個名副其實的指引，揭露教會應該坦誠地面對過去並具體地追憶悔改的內容，結果只是造成教會抽象地說一些漂亮並欺騙自己的屬靈口號，講一些虛妄的「假悔改」道理，完全忽略了聖經的信仰是如何具體要求信仰者誠實地面對過去。這些都應該是那些詆毀神學教育的基要派分子需要負責的，因為他們認為知識是不造就人的，結果他們所帶領的教會只造就自己虛幻的屬靈王國，任由謊言和欺騙存留在破碎的屬靈生命裡，這種情況又怎麼可能使人經歷到救恩與赦罪的大能呢？大談教會合一和復興又有何意義呢？

加害者需要尋求受害者的寬恕，受害者要從仇恨中釋放出來。也許將來中國大陸教會要面對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歷史恩怨進行一場「復和禮拜」，臺灣的教會也一樣，不應該只有二二八平安禮拜（事實上這還不是主要涉及教會內部的衝突和痛苦），我們應該要為 1965 年的分裂來一次「復和禮拜」，沒有復和，奢談合一，更別說教會復興。換言之，雖然護教反共的運動隨著解嚴和冷戰已結束且基本上不再出現於基督教的論述之中，但是，這場影響深遠的思想劃分早已深入臺灣教會的思想血液中，這種黨國教化的意識形態已塑造成今天臺灣教會的局面，從而也塑造了其神學思想的性格。今天臺灣的基要派，即是那個時代政治的產物；是神學的系譜，也是屬靈的系譜。

臺灣教會有兩種神學，一是長老教會的「出頭天神學」，一是非長老教會的「偽裝神學」，前者不斷想走出痛苦以豐盛來掩飾傷痛，後者一次又一次地將自己裝扮成無知的假屬靈來反控教會不應涉入政治。偽裝神學不肯面對過去，以泛靈恩語言來表現其自以為純潔和天真，暗地裡卻向執政者靠攏，同樣熱衷於國家



祈禱早餐會，國民黨執政時高呼愛國主義、和平主義的「中華民國萬歲」，民進黨執政時則高唱和解、醫治、包容的「愛臺灣」。這是臺灣教會的靈性的分裂和錯亂。

臺灣基要派的神學系譜必須從 1965 年開始認識起，「沒有歷史的神學是空洞的，沒有神學的歷史是雜亂的」，這是一本關於臺灣基要派的神學系譜學的論述。從反共抗俄的宏大論述底下發展出反共神學和黨國基督徒的控訴運動，「消滅朱毛漢奸，打倒萬惡共匪」是臺灣基督教一個重大的神學問題，再從這個黨國的思想臉譜才能認清今天臺灣教會何以是臺灣教會的「政治臉譜」，也因此造就成這樣的一種屬靈生態。五十年過去了，是該做出神學批判和檢討的時候了，屬靈生態的死結，教會間的貌合神離是到了應該好好清理的時刻了。

到現在為止，雙方並未對過去種種「兄弟鬩牆」之事做過坦誠和寬恕之舉，受害者與加害者雙方尚未走出 1965 年以來的矛盾。所以，徒具形式的國家祈禱早餐會可以完全違背耶穌對追隨者的教誨和叮嚀，是法利賽人的義。雅各的兒子們尚未相認，尚未尋求彼此的寬恕和接納，任何奢望合一，不是虛偽就是弄權，臺灣基督教走不出這項內心的矛盾，就不可能有復興。

我們必須面對政治對我們靈性方面的扭曲和迫害，要談教會復興，就得要面對教會中的「彩衣事件」。1965 年，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過生日，父親給了他一件彩衣（百周年慶）作禮物，這一位被自己兄弟出賣的「約瑟」，自 1970 年退出普世基督教協會後，不斷想把痛苦給「遺忘」（瑪拿西），同時也盡可能地使自身可以「出頭天」（以法蓮），「約瑟」尚未與「哥哥們」相認，還談不上寬恕。另一邊，那些「哥哥們」還未向「約瑟」尋求寬恕，這些「雅各的兒子們」何時能面對真相而復和呢？





▲百年大會出席全體照。(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收藏)



The Second Convention of The World Christian Anti-Communist Association

▲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第二屆代表大會全體合影。(作者翻攝自護教反共聯合會手冊)

2015年慶祝福音來臺一百五十週年，雖然許多人都不知道五十年前發生了什麼事，但它存在基督教靈魂深處的傷痕是不容否認的。但願這本書是他們之間的「便雅憫」，而不是「便俄尼」。臺灣教會領袖們，來一場「認罪悔改」的「復和禮拜」吧！



# 1. 十字架上的黨徽： 蔣介石的護教反共論述

自余束髮以來，即追隨總理革命，  
無時不以耶穌基督與總理自居。

—〈蔣公遺囑〉(1975)

蔣介石是七拼八湊的將軍。當他由大陸溜走時，聲望跌到最低點。可是，在今天的臺灣，他已被神化為幾乎全知全能的上帝。

—般海光，〈剖析國民黨〉(1969)



## ■ 基督精兵前進



▲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中華民國分會，於1966年8月18日晚間在臺北市國語禮拜堂（濟南教會）舉行「護教反共特別崇拜大會」，圖中右起盧祺沃、陳溪圳、張靜愚，中央獻唱者為救世傳播協會「天韻詩班」。（中央社）

1966年（民國五十五年）8月18日下午八時，由「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中華民國分會主辦，於臺北市中山南路國語禮拜堂舉行的「護教反共特別崇拜大會」上，佩戴聖經會主席盧祺沃牧師於開場的致詞中就辯明：

反共是為信仰，不是因為政治，假如政府不反共，我還是要反共。

盧祺沃解釋說，那些以宗教不要干預政治為由而不加入反共行列的，可以一概視作是「中了魔鬼的詭計」，反被共產黨所利用。所以，對於那些認為反共就是參加政治的說法，盧堅決地表示：

基督教的反共不是因為政治而是為信仰，我們現在不但反共而且更要護教。<sup>1</sup>

1 〈為什麼基督徒要反共？〉，《護教反共特別崇拜大會專刊》，1-3。



共產黨是敵基督者、魔鬼撒旦，因此基督徒要為基督起來爭辯、為真道而戰。

在諸多的場合和文宣品上，不論是之前的「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或是之後的「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他們的會徽下標列了「為真道打美好的仗」這句話，並標示出自聖經「提摩太前書六章十二節」。在反共的思想立場上，主要援用的聖經經文則是以弗所書六章十節至十七節，把反共視為護教，以聖經或信仰的理由，全面無條件地支持反共：

我還有末了的話：你們要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穩了，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此外，又拿著信德當作籐牌，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並戴上救恩的頭盔，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

反共是一場屬靈戰爭，黨國基督徒在護教反共的聚會禮拜中，最喜愛吟唱的聖詩是〈基督精兵前進〉曲（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

1. 基督精兵前進，齊向戰場走，十架旌旗高舉，引領在前頭；  
主基督是元帥，領我攻仇敵，齊看我主旗號，進入戰陣地。
2. 見主得勝旗號，撒旦軍逃避，基督精兵前進，勝利在前頭；  
地獄根基震動，又因歡呼聲，主內弟兄高唱，向主獻頌揚。
3. 基督教會前進，浩蕩如大軍，弟兄努力奔走，步先賢腳蹤；  
我們一心一意，團結攻敵軍，信仰盼望相同，愛心亦一致。
4. 蒙恩聖徒前進，歡欣齊前往，大眾異口同聲，凱歌高聲唱；  
榮耀尊貴頌讚，歸基督我王，世人天使同唱，頌揚永無疆。

副歌：基督精兵前進，齊向戰場走，十架旌旗高舉，引領在前頭。



為打倒共匪，〈興起為耶穌〉(Stand up, Stand up for Jesus，又題作〈奮起歌〉、〈起來，進攻為耶穌〉)也是一首契合並傳接著黨國基督徒護教反共的奮興詩歌：

1. 奮起，奮起，為耶穌！十架忠勇精兵！高舉尊嚴的旗號！要顯揚主威名：一陣一陣的戰勝，主自統率全軍，直到敵人都消滅，基督確實為君。
2. 奮起，奮起，為耶穌！號角傳來軍令！今天是主光榮日，快向前方猛進！大家同歸主麾下，抵抗無數敵人！臨險之時見膽量，勇氣百倍加增。
3. 奮起，奮起，為耶穌！但憑救主大能！血氣之勇難持久，不敢依賴自身：披上福音的盔甲，警醒祈禱虔誠，責任臨時當萬險，有備自操必勝。

副歌：奮起，奮起，為耶穌！鬥爭不會久長；今朝戰聲連天響，明日凱歌悠揚。立功之人蒙賞戴生命冠冕輝煌；追隨榮耀的君王，統治悠久無疆。

從上述聖經經文的引用和聖詩的選材來看，黨國基督徒用一種「戰爭的語言」來表現出基督教與共產主義敵我分明、勢不兩立的態勢，把大陸的內戰戰火提高到信仰的層面。它是一場宗教或信仰的戰爭，即有神與無神的對抗，所以同時亦是護教的，因此，在反共的立場上，基督徒與共產黨可謂勢不兩立，所以應毫無條件地加入或參與這場「末世」的反共大戰中，不容妥協和放棄。這場護教反共運動實為一場「聖戰」，誰要是袖手旁觀或不熱心加入此一行列，就是違反信仰、出賣基督。

在這次「護教反共特別崇拜大會」的聲明中強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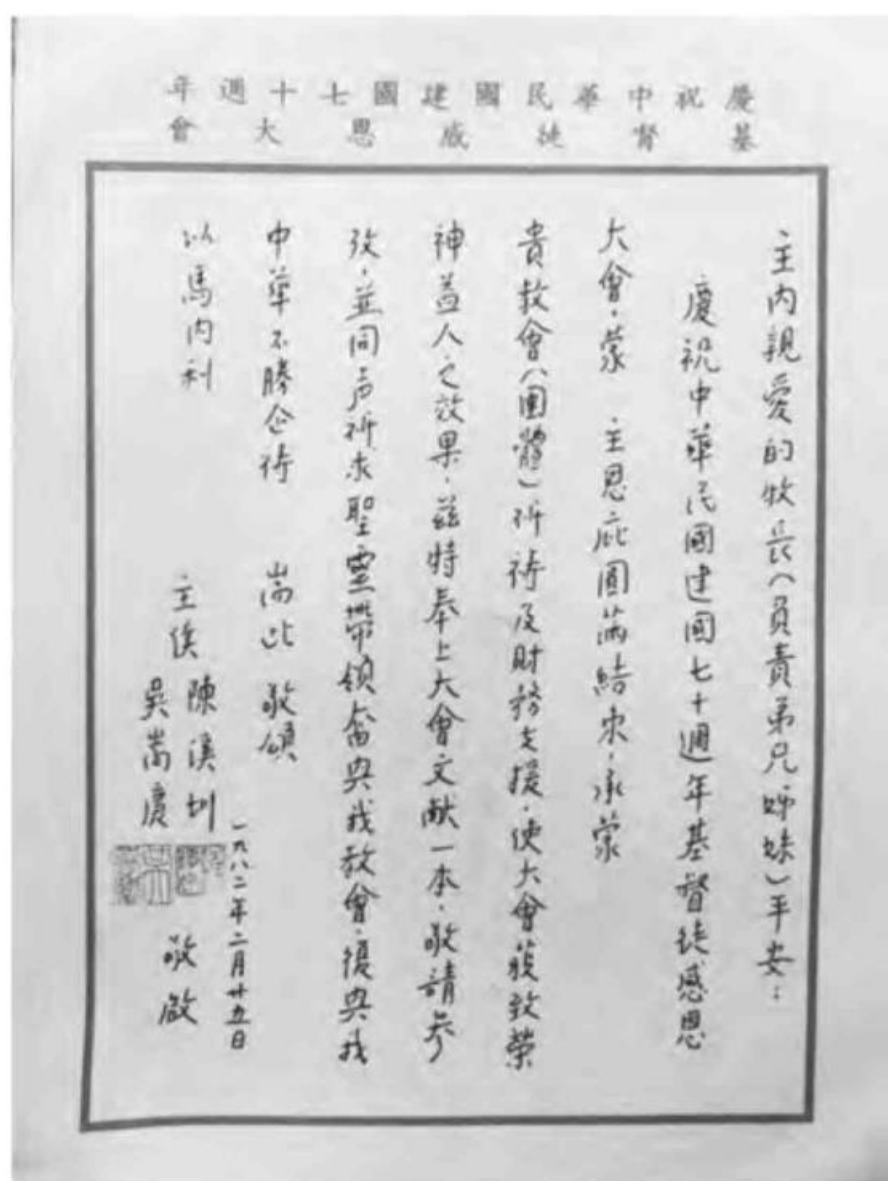
本會有以下兩點聲明：(一) 我們以誠懇熱烈的心情和無條件的代價，竭力支援大陸同胞反共反毛的抗暴運動，我們更希望匪首核心的權力鬥爭急速促使共匪偽政權瓦解。(二) 我們有一貫的態度和立場，即是始終堅決反對共匪加入聯合國。我們深信，上帝的教會是最後戰垮共產邪說的勝利



者，阿門。<sup>2</sup>

國民黨丟掉了大陸政權，一群灰頭土臉的失意基督徒軍人和政要到了臺灣，他們還想著要打回大陸、收復失土，因此，期望於護教反共的思想運動，把信仰與反共的鬥爭看作是同一件事。或者說，他們在維護信仰的做法上與他們軍人背景和個性是並行不悖的。面對退守至臺灣，他們一方面在信仰裡找到慰藉，另一方面把反共當作宛如為信仰而奮戰一樣地偉大。這一切所做所為有時像在療傷，有時又像在復仇，面對共匪或無神論的思想可能會滲透入基督教會，因而內部需要思想性和政治性的正邪之爭和清理。這一切影響他們最深的就是帶領著他們

「逃」到臺灣的蔣介石，黨國基督徒認為蔣介石的反共神學是護教的基本教義，據稱是一個在聖經的信仰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實踐指引，他們狂熱地吶喊著，右一句「維護純正信仰」（護教），左一句「反對共黨滲透教會」（反共）。



◀以護教反共為班底，召開「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七十週年基督徒感恩大會」，之後出版並致贈《奮興我教會，復興我中華》之書籍。（作者收藏）

2 此護教反共特別崇拜大會由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中華民國分會主辦，時間於1966年8月18日下午八時，地點在臺北市濟南教會國語禮拜堂。該會特別為此崇拜印製了精美的小冊《護教反共特別崇拜大會專刊》，專刊的第一頁是大會的程序，內中則是有21頁不同專題的文章，出席的人包括了張靜愚、盧祺沃、曾約農、陳溪圳等人，「天韻詩班」負責詩班獻唱。



## ■ 祈禱、反共、必勝

從蔣介石的主要言論中可以明顯地看出，反共即是思想戰，當然，它更無疑地是一場信仰之決戰：有神或無神、正統或異端、精神或唯物，這樣的詮釋在黨國基督徒耳裡聽來，就像是要與「魔鬼 = 共匪」打一場末日之戰一般，為基督而戰。而且，根據「以聖經之旨」這是一場必勝之戰，黨國基督徒視蔣介石是先知、基督的使徒，他們的「愛教」行動表現在對蔣的無條件擁護，表現為追隨基督即是追隨蔣。

國民黨從大陸敗退遷臺，黨府一致加強反共復國作為黨的中心思想和國民政府的基本國策。除了宣稱中華民國才具有正統地位外，身為總統兼國民黨總裁的蔣介石，也一再強調反共復國是國民黨責無旁貸的使命、復國必成是國民必要有的信念。蔣介石對黨員說，假如沒有中國國民黨，就不會有中華民國，更不可能有今天這個屹立不搖、日新月盛、復國建國的基地。因此他一再地反覆強調，必須在國民黨領導之下共同實現反共復國必勝、必成的光明前途。

黨國意識形態宣稱，中華民國的存在與國民黨統治密不可分，蔣介石本人則是以中華民國為國民黨所創為由共同承擔起反共復國使命的領袖，所以蔣介石的最高領導地位也就是無庸置疑的。為實現上述的理想，蔣介石鄭重地宣示國民黨的改造計劃和黨務工作：

我們誓死達成這個神聖的任務，贖回以前的罪行，所以我們痛下決心，作這一次黨的改造。我們決心革新黨的組織，整肅黨的紀律，改變黨的作風，先把本黨改造為實施三民主義的一個堅強戰鬥體。<sup>3</sup>

3 蔣介石，〈本黨現階段制度主張〉（1950/9/1），收入張其昀主編，《先總統蔣公全集》第二冊，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年，2053。所有關於蔣介石反共言論編輯出版之作，以秦孝儀主編的《先知自導—先總統蔣公駁斥共匪統戰陰謀之指示》（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0年初版，1987年再版）一書最為簡要，全書整理了蔣自1946年始所有重要場



面對臺海對峙的局勢，蔣介石把三民主義的實踐與其反共的思想結合起來，正如他在 1950 年 10 月以〈革命實踐運動綱要〉為題向黨政軍要員演講中指出，反共抗俄戰爭是反侵略的民族戰爭、是反極權的民主戰爭、是為了人民的自由生活方式的社會戰爭。據此，蔣介石以遵奉「國父遺教」為號召，突顯三民主義的神聖性，除了對共產主義大肆批判，也界定了反共戰爭就是為民族、民權、民生而戰，為的是要實現三民主義的事業。因此，在各種場合及文告中，蔣介石一再地重申當前的反共抗俄戰爭就是為著堅持三民主義而戰，為著實現三民主義而戰。<sup>4</sup>

在較早之前，即 1952 年 2 月 1 日的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289 次會議就已通過〈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綱領〉，其中項目「丁：文化改造運動」第九條提到：

揭露共匪對思想之暴虐極權統治。

並之後於同年 3 月 12 日，經行政院第 229 次會議通過的〈國家總動員計劃綱領〉<sup>5</sup>，內中項目「乙：文化動員」第八條說明了：

聯繫各宗教團體，俾其傳教工作與反侵略鬥爭之反共抗俄工作相配合。

作為黨國成員的基督徒，對於此政治動員當然予以配合且強化表現之。

由於蔣介石的基督徒身份，加上其身邊的基督徒黨員，如何表現反共思想並爭取國內外基督教界的認同，成了一個相當重要的工作。蔣本身對此相當地重視，所以他對基督教的發言總離不開以基督教的信仰內容來闡釋或結合到他的反共論述上，逐漸地，思想改造與政治動員成功地將反共與基督教的相關信仰內容聯繫了起來，甚至也將之推向具有強烈的維護基督教之基要主義色彩的反共論

---

合反共的重要言論，並以不同主題分類列出，可以說是了解蔣的反共言論最佳的一本代表作。

4 蕭淑惠，《遷臺後蔣介石的反共論述（1949-1975）》，48、63-64。

5 總統 41 年 4 月 4 日臺統（一）字第 1398 號代電檢準，國史館檔案。



述，這種情況在其受難節或復活節的證道詞中處處可見：反共即是維護信仰，維護信仰目的即是反共。

## ■ 傳教與反共抗俄工作相配合

1950年（民國三十九年）的受難節，也就是蔣介石及其國民黨府軍到臺灣後的第一個受難節，在其證道詞中把耶穌的受難和當時共產黨統治下的大陸聯繫起來，藉此形容耶穌所處的羅馬時代與大陸同胞生活在「俄寇共匪」之下的情況是一樣的，受到壓迫、沒有自由。蔣不無感性、屬靈地說，他時常想念大陸同胞，為在暴力蹂躪下的信徒們祈禱：

我今日雖然形體上離開了大陸，我每日朝夕都為你們祈禱，求上帝堅定你們的信心，加強你們的耐心，使你們雖然經過現在極短時間黑暗的死蔭幽谷，也不怕遭害，深信不久的將來，黑暗就要過去，光明就會到來。有信心的人才希望，有信心的人才能得到天父的慈愛和祝福。<sup>6</sup>

隔年的受難節，同樣對大陸同胞的受苦受難感同身受，蔣介石還特別呼籲要基督徒「禁食祈禱」，並將禁食和捐獻所得送到「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或附近禮拜堂，以便設法投送給大陸同胞，使他們今年仍能得著耶穌基督的慈愛，和表達我們懷念大陸受難同胞的心意」。

事實上，從1950年開始，每一年的受難節蔣介石都會發表證道詞，其內容不外乎將耶穌的受難與千千萬萬在「水深火熱」下受苦受難的大陸同胞連結起

6 〈耶穌為救人救世救國救民而犧牲的精神—先總統蔣公於耶穌受難節證道詞〉（1950/4/7），收入中華民國基督教紀念先總統蔣公百年誕辰籌備會編印，《蔣公的信仰與見證》，臺北市：天生行印刷，民75年，30-33。此書的扉頁中有曾擔任總統府秘書長的張群提字：操持基督信愛望三德，迎接光明勝利之來臨。《先總統蔣公全集》第三冊，3329。



來，這種以大陸同胞受苦而必須反共為前提的證道詞，一直要到 1960 年代之後，才轉而以復活節為題發表證道詞，內容一方面仍強調以打倒共產主義為目標，另一方面則強調要以信仰的力量來解救大陸同胞。因此，蔣介石將永生、克服死亡等聖經的信息說成是中華民國重獲「統一」、「復興」，基督徒即是以十字架為其救世的標誌戰勝共產無神的惡魔，同時更是以三民主義為革命的信仰，如此才能順利完成反攻復國的大業。<sup>7</sup>

蔣介石以挑起基督教的受難精神及強調為大陸同胞活在共產暴政的統治之下喚起基督徒反共的正當性。反共同時亦是護教，因為反共即是保衛真理，是基督對抗魔鬼、正義對抗邪惡、精神對抗唯物，因此反共與基督徒的信仰立場是一致的。同時，蔣也極力地表示這是一場精神戰爭，亦是信仰戰爭，所依靠的正是基督徒所共有的信念：就像耶穌基督面對苦難的挑戰一樣，在維護真理的前提下永不妥協；同樣的，即便面對艱辛的環境與現實，勝利也終將來臨，正像是基督戰勝死亡、基督徒擁有天國的盼望一般。

蔣介石對基督教教義的解釋經常地將之與三民主義相提並論，有基督教義精神的三民主義，必能克制魔鬼共產的罪惡勢力，也因為有耶穌復活的啟示，使反共得以化身為人類的希望。這裡最為關鍵之處即是將共產黨形容為撒旦，基督徒在維護信仰的前提下，一定與撒旦對抗到底，因此，一方面是基督教的受苦與救世精神，另一方面則是與魔鬼對抗的奮鬥精神。所以，反共形同聖戰，為了維護信仰而與魔鬼爭戰是所有基督徒的天職，蔣將帶領全人類取得這場最後的勝利。

在 1963 年（民國五十二年）的復活節證道中，蔣介石特別提及一位駕駛戰機飛過海峽中線，最後於南昌「殉職」的陳懷中校。<sup>8</sup> 在此篇證道詞中，蔣提到

7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耶穌復活節證道詞〉（1963/4/14），收入《蔣公的信仰與見證》，108。《先總統蔣公全集》第三冊，2533-2536。

8 國防部曾特立陳懷生（本名陳懷）銅像於臺北空軍學校，該銅像之揭幕是由當時擔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的蔣經國親臨主持，並發表演說，題目為：「神不會永久把我們分開，雖看不見可是依舊存在」，表揚其為「殉道」精神，見《福音報》第 159 期，1963/9/8。



陳懷是一位「信道最篤、愛國至誠的基督徒」，他還特別引述並表揚了這位中校的日記所記載的殉道精神，目的是要知道：「國民革命軍中竟有這樣為國家、為革命、亦是為了基督而殉道殉職，足以驕傲自豪和難能可貴的基督徒！」蔣用了極大的篇幅述及他與陳懷的互動，他在一張與陳的合照中，特別提到他是如何給陳取了一個別號名叫「懷生」。蔣與陳的交談主要即是環繞著基督徒信仰與殉道精神，其中這種行動即是表現在實現「重返大陸，解救同胞」的使命上。無疑的，蔣把陳懷形塑為一位殉道者，他的「義舉」是為主受難，基督徒都應效法他的人格和精神，奉守「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的殉道精神。<sup>9</sup>

蔣介石在 1964 年復活節的證道中又提到了壯烈殉國的事例，重申了革命與犧牲的關係，並且把這種關係追溯到辛亥革命前一年 3 月 29 日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尤其是強調他們之中與基督徒相關的部份：

國父革命建國的種子，經過了黃花崗上碧血的甘霖，終於在辛亥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的時候，結出了鮮豔無比、燦爛奪目的花朵；他們的為國捐軀，使中華民國得了新的生命。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我們有了耶穌為救人救世，流血犧牲而復活的史實，有了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殉國犧牲，而揭開了中華民國誕生的序幕，更可以證明正義必然戰勝罪惡，光明必能戰勝黑暗。<sup>10</sup>

蔣介石想把耶穌的受難精神聯繫到其復活的意義上，以此喚起反共革命，認為此

9 關於陳懷的故事，作家張鳳歧曾撰寫過一篇散文〈藍天騎士〉紀念這位蔣介石口中極力讚許的「殉道者」，見《張鳳歧自選集》，臺北：黎明文化事業，1979，265 以下。另基督徒圈子的出版，可參見洪善繼，《馨香之氣—當代傑出中國基督徒素描》，臺北：中國主日學協會，1966 年初版，1969 年再版，頁 222 以下。本書除了陳懷，作者所列舉的「當代傑出中國基督徒」還包括國父、蔣總統、蔣夫人、陳維屏、董顯光、林歡邦、張靜愚、高天成、謝明山、王藍、樓鎧。

10 《先總統蔣公全集》第三冊，3557。



舉即是繼承了七十二烈士救國、救民的遺志，犧牲奮鬥的精神，就是七十二烈士的化身，亦是耶穌救世的表現。

無疑的，我們可以理解蔣介石如何將反共和護教以及耶穌的人格模範都等同了起來，正如蔣宋美齡在〈總統的信仰〉一文中提到蔣介石的「宗教信仰」即是：

與共產罪惡作戰永不妥協之精神。<sup>11</sup>

蔣介石在基督教兩大節日—受難節和復活節中的證道，把其反共的思想理念全都強制融入在其中，使用聖經的典故以便藉此強化基督徒的反共意識。他不斷地提及基督徒信仰與共產黨的無神論兩者之間勢不兩立，兩者絕對是不相融的。因此，反共的基督徒就是護教，同時也是愛國，也就是愛耶穌基督的表現，正如聖經所提到的仇敵、魔鬼也都理所當然化身為現實生活的無神論和共產主義，所以基督教毫無理由支持任何與共產黨或無神論的政治主張相關的團體或國家。這一點作為貫徹基督教信仰的立場是毫無異議的。

對外的言論也是如此。1957年（民國四十六年）5月30日，蔣介石特別為美國一個名為《基督十字軍》的雜誌寫了一篇短文，在讚揚這個組織的精神之同時，特別提到了把現代的十字軍理解為與邪惡的共產主義作戰，以精神來作戰、組成心靈的十字軍。<sup>12</sup> 該文恐怕是最早一篇在受難節或聖誕節之外的機會或場合中闡述基督教和與「共匪」作戰有關的文章，蔣介石把反共和護教聯結起來，並

11 宋美齡，〈總統的信仰〉，收入《蔣公的信仰與見證》，2。近期出版了一本《補上一頁欠缺的歷史：蔣介石夫婦的基督教信仰》，王成勉主編，臺北市：宇宙光，2013。論及蔣介石的信仰部份，完全沒有把握到重點，主要的論者根本就沒有好好認真理解過蔣介石的宗教思想究竟為何，證實了「沒有神學的歷史是雜亂的」，沒辦法揭露出蔣介石如何利用政治意識形態改造或扭曲基督教信仰的本質。乍聽書名，以為發現了什麼驚人的事務，而有所謂「補上一頁欠缺的歷史」之舉，全書看了不免令人大失所望，內容是如此地淺薄和了無新意。這本書源於一次小型研討會，是一次黨國基督徒的相互取暖，基督教界的學者顯然還是沒有誠實地看待歷史，這對福音信仰的傳播是一種絆腳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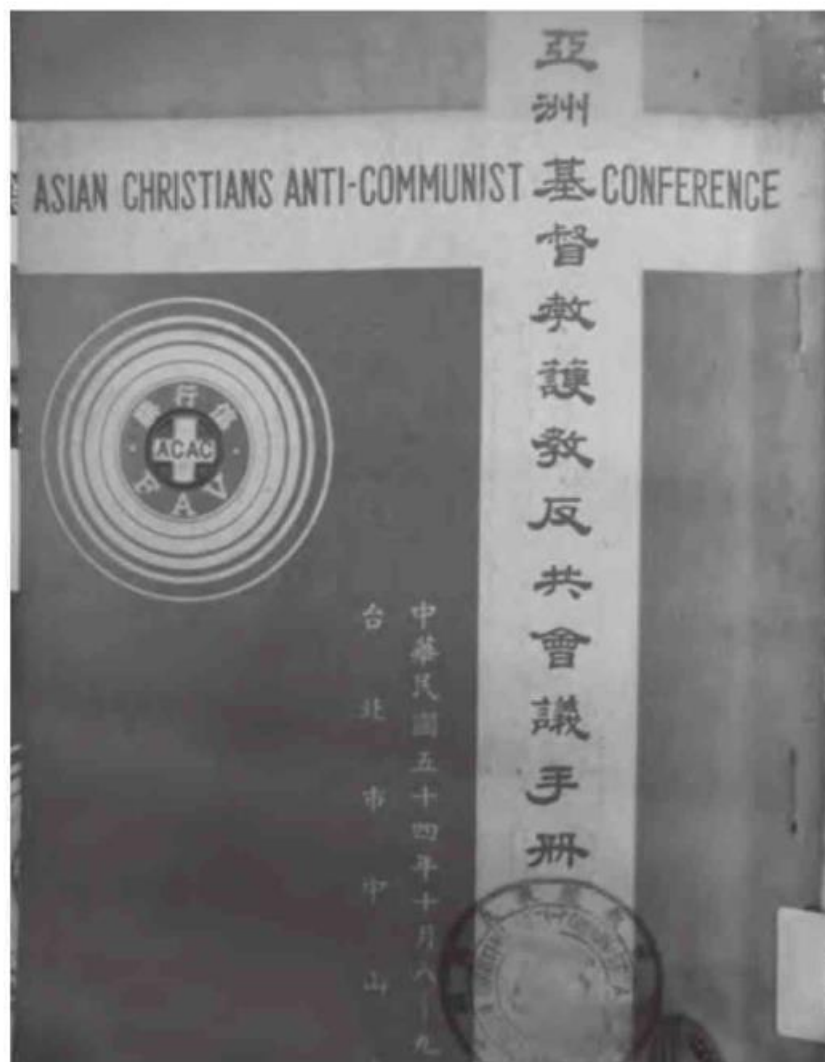
12 〈二十世紀的十字軍—為美國基督十字軍雜誌特頒短文〉(1957/5/30)，《先總統蔣公全集》第三冊，3427-3428。



以「十字軍的精神作戰」為旨要，將收復大陸視為等同於當年為耶路撒冷而戰那樣。

1965年10月8日，蔣介石在「第一屆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成立大會所給予的書面賀詞中說到：

國際共產黨為無神論者，不信上帝，不容許宗教存在。共匪於竊據大陸之初，摧毀教堂，沒收教產，迫害教士，斷絕與外國教會關係，外籍牧師神父被繫獄及被驅逐者，不知凡幾。跡其用心，非欲宗教根本被消滅而不止。哥林多後書上說：「你們與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轡，義與不義能有什麼相交呢？光明與黑暗能有什麼相通呢？基督和彼列（魔鬼）能有什麼相和呢？」故今日世界任何個人或團體，任何國家或民族，苦想與今日魔鬼集團—共產政權同負一轡，「和平共存」，其結果祇有一條路，就是被共產主義的魔鬼整個吞噬下去。<sup>13</sup>



◀第一屆(1965)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手冊及其會章。(作者翻攝)

13 〈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開幕致詞〉(1965/10/7)，《先總統蔣公全集》第三冊，2878。亦見於《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手冊》(1965/10/8-9)。



蔣在這一簡短的賀詞中提到他曾於 1961 年 12 月接受過美國《基督教前鋒》(Christian Herald) 月刊編輯書面訪問所說的一段話：

我當時曾呼籲：「凡信奉耶穌基督的人，都應該在耶穌的十字架下，與那些反共產、反侵略、反奴役和愛自由、愛和平的人們，攜手合作，本著耶穌復活的精神，組成一條反共陣線，向共產主義發動一次信仰上的十字軍戰爭，以掃除共產主義處處滲透的邪惡力量。」<sup>14</sup>

可見在反共的思想，蔣介石要基督教將之視為一場信仰上的十字軍戰爭，敵人即是共產主義，任何信仰耶穌基督的人都應該站在同一立場上向共產主義宣戰。

## ■ 反共十字軍

早在蔣介石為中華民國護教反共的基督教團體致詞表示支持的前一年，就已在美國基督教反共標誌最為清楚的「萬國基督教聯合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Christian Churches, 簡稱「萬國教聯」[ICCC], 關於此一組織詳見本書第 109 頁) 舉辦的會議場合中致過詞。在〈對遠東基督教大會揭幕致詞〉(1964 年 7 月 24 日, 此會議在臺北舉辦) 中, 蔣如此地說：

高舉十字架，崇尚耶穌基督救人救世之博愛犧牲精神，堅決反對擾亂世界，滅視人道，破壞信仰，摧殘宗教之無神主義的惡魔，深信其聲光之所致，對於亞洲與世界侵略與戰爭禍亂根源之共匪，必能給予以重大打擊，贏得輝煌的勝利。<sup>15</sup>

14 〈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開幕致詞〉(1965/10/8), 《先總統蔣公全集》第三冊, 2879。亦見《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手冊》(1965/10/8-9)。

15 〈對遠東基督教大會揭幕致詞〉(1964/7/24), 《先總統蔣公全集》第三冊, 2858。



萬國基督教聯合會會長麥堅泰 (Carl McIntire) 與蔣介石的互動，最早可以追溯到 1961 年。當時麥堅泰一行人到臺灣欲求謁見蔣，說明了萬國教聯這個組織的特性，明確地表示堅定地反對共產主義和無神論，還特別表明反對親共的教會團體支持中共加入聯合國，蔣非常爽快地批示「接見」。

麥堅泰在 1961 年 4 月 5 日來臺，期間曾在臺北、臺中、高雄、花蓮和金門等地佈道，主題不外乎是揭發共產黨侵略的陰謀。4 月 13 日，蔣介石在總統府內親自接見麥堅泰和他所率領的代表，以及以成文秀為首的萬國基督教聯合會中華民國訪問團。麥堅泰向蔣表示，他回到美國後計劃在一百五十個廣播電臺向美國和加拿大人民報導此次訪華觀感，同時也將在雜誌上撰文向六十幾個國家的讀者介紹中華民國，更重要的是，他表示將全力協助中華民國阻止中共進入聯合國。這些話聽在蔣的耳裡，肯定是深得其心。<sup>16</sup>

在對〈第一屆全球中國基督徒大會頌詞〉(1972 年 10 月 5 日) 中，蔣介石仍然重申：

我們的反共革命，乃是為全世界人類反奴役，爭自由，正與耶穌基督維護真理，發揚博愛精神的意旨相吻合，對全世界真正和平，與人類永久福祉，必能做偉大的貢獻。

盼望海內外基督教，在此黎明前一刻，能深體上帝的愛心，認識自己的使命，團結一切反共的力量，以真理為寶劍，以自由為盔甲，以博愛為盾牌，匯合為討毛救國的反共十字軍，消滅匪禍，解救魔掌下的億萬同胞，共同建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sup>17</sup>

16 公文號「臺(50)央秘字第 058 號唐縱、張寶樹呈」(民國 50 年 4 月 5 日)，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檔案編號 ntul-kmt-zp50-0044。另見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編輯《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中華民國五十年(一月至四月)》，臺北：國史館，1980，902。

17 〈第一屆全球中國基督徒大會頌詞〉(1972/10/5)，《先總統蔣公全集》第三冊，3779。



蔣介石最後一次公開在基督教的會議上發表言論反共的內容已無新意，仍是重覆上述類似的說法。<sup>18</sup> 總之，蔣要全世界都起來反共，同時也意味著全世界要站到中華民國這一邊，如果全世界都反共，即等於全世界協助國民黨收復失土。可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不是中華民國政府或是蔣的想法而已，應該是全世界的中國基督徒應該協力完成的，因為基督教一切的前提都在護教的立場上一致，所以反共的立場當然也是一致的。

基於共同的信仰前提，反共成為中國與基督教世界的共同目標，反共大業旨在維護信仰、保障人類和平，亦即發揚基督之公義與真理。蔣介石努力透過其宣傳動員基督教界加入反共陣營，並藉助於基督教的國際聯繫，企圖使中華民國成為全球基督教的反共基地以擴大其影響力。換言之，藉助基督教團體及其思想教義，蔣介石企圖正當化其反共的護教學立場，並試圖使國際社會理解中華民國的反共即是為上帝討伐惡魔的正義行為，一起通力合作反對無神論共產主義。

從「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到「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的先後成立，蔣介石都特別以電文致賀並發表重要講話，宣示反共這場戰爭是一場基督徒的聖戰，亦是為了維護基督教精神、為了全人類的幸福、為了中國的戰爭，期望這支「討毛救國」的反共十字軍可以發揮其最大的力量。

從組織到出版，臺灣的黨國基督徒都做出了極大的努力，其中又以宣傳蔣介石基督教信仰的文集最為顯眼，包括《總統 蔣公證道詞專輯》（中國信徒佈道會，1975，初版一萬冊）、《一代巨人》（王正中編，1976）、《蔣公的信仰與見證》（中華民國基督教紀念先總統蔣公百年誕辰籌備會，1986）等。韓偉特別為「中國信徒佈道會」所出版的《總統 蔣公證道詞專輯》寫序，他在序言中引述蔣介石的話：「有一件工作值得我們去做，便是向共產主義發動一次全世界的宗教性反攻」，再一次證實了，反共論述把絕大部份的基督徒都捲入此集體的政治

---

18 不知何故，民國六十三年在〈第三屆全球中國基督徒大會頌詞〉（1974/10/5）的內容竟與第一屆是一樣的，是否是編輯上的錯誤或有其他的原因（蔣病重？）就不得而知了，見《先總統蔣公全集》第三冊，3828。



與信仰的著魔式對抗中，突出蔣的基督教信仰即是突出他的反共思想，因而無條件的反共與無條件的擁蔣竟也巧妙地結合了起來。<sup>19</sup>



▲蔣介石於 1975 年逝世一個月內，中國信徒佈道會出版了《先總統 蔣公證道詞專輯》。（作者收藏）

附錄（一）：麥堅泰致電蔣介石 [《角聲週刊》第 154 期，1967/2/15]。

發電人：萬國基督教聯合會會長麥堅泰博士

蔣總統閣下鈞鑒：

本人今願全力支持 閣下反攻大陸。 閣下對中國人民所負之神聖使命，

19 收錄蔣介石證道詞方面，「中國信徒佈道會」所出版的《總統 蔣公證道詞專輯》一書可以算是最為完整的。相較而言，1986 年出版的《蔣公的信仰與見證》作為蔣介石百年誕辰的特刊，竟還遜於前者。這本書是以佈道或傳福音為目的，發行於 1975 年，篇幅上多了幾篇關於護教反共最具代表的講詞，分別是〈民國五十年十二月三十日向美國人證道〉、〈民國五十四年對亞洲基督教反共會議開幕致詞〉和〈民國五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賀詞〉，只是缺了民國六十一年十月三日第二屆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代表大會的賀詞。《總統 蔣公證道詞專輯》一書於隔年又成為「中華民國基督教紀念總統蔣公安息週年禮拜籌備會」出版之作，編輯工作略微馬虎，沒有前言，沒有目錄，可見「中國信徒佈道會」在這類宣傳小書的編輯出版方面還是比較在行的。



遠非任何其它力量所能阻擾約束者。中國人民之長期痛苦與目前共匪之內部鬭爭，均為一致渴望反攻大陸之良好時機。閣下負有全中國之正統權威及道義職責之任務。與此義師乃屬公理正義之舉。中國人民乃英勇無敵之師。此種精神實為當今全世界所需者。誠然，天助自助者，全世界愛好自由人民，將必皆響應並支持閣下反攻大陸。閣下領導此舉，乃適應拯救全世界人民之迫切需要而發出光芒。把握時機。你們一人必追趕千人，因耶和華你們的神照他所應許的為你們爭戰。你們要分外謹慎，愛耶和華你們的神。約書亞二十三章十至十一節。全亞洲人民需要閣下。自由世界必須採取行動。吾人將以禱告支持鈞安

萬國教聯 ICCC 會長麥堅泰敬上

## ■ 黨國基督徒的反共先知和使徒

在《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成立大會會議記錄》與《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第二屆代表大會記錄》的內頁開頭，同樣是：右邊經文（以弗所書六章十至十七節），左邊為蔣介石的巨大肖像，下面附上一行文字：

蔣總統，中華民國的領袖，特向本會成立大會致電，祝賀成功。本會同仁深信追隨蔣總統在基督的啟示下，必能達成護教反共的神聖任務。

對於同是基督徒的忠實追隨者而言，對蔣介石在反共與護教的立場上當然是全力支持，因為追隨蔣即是追隨在基督啟示下的蔣。正如蔣介石在遺囑上也同樣有一段「追隨者的信仰告白」，對信仰的忠誠與對黨國領袖的忠誠並無二致：

自余束髮以來，即追隨總理革命，無時不以耶穌基督與總理信徒自居。

蔣介石強調追隨革命在先，且又以孫中山和基督的追隨者來看待自己，政治決定信仰這種前後關係從未改變過；同樣的，在追隨蔣的黨國基督徒那裡，也不會改



變這種先後秩序。

第四屆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在臺召開，該次的主題是「奮興基督教會，消除共黨罪行」，會議代表手冊上宣示了此一會議的使命和任務，也表示了反共神學的基本主張：

今天人類面臨著最大的問題，乃是人性與神性受到嚴重的挑戰，共產黨徒極端的反宗教，他們否認上帝的存在，他們所建立的共產國家，實際上是充滿了恐怖、壓迫、奴役、飢餓，他們謊話說盡，壞事做絕，是人類的罪魁禍首，是「敵基督」的惡魔，基督徒護教反共，就是求公理、正義、自由、仁愛之宏揚於世界。

在復興基地的臺灣，奉行 國父孫中山先生遺教，實施民主憲政，致力經濟建設，厚植國力，繁榮社會，建設為民有、民治、民享的中國，成為太平洋反共堡壘與自由燈塔。基督福音在這自由國度，更為宏揚廣傳，實是蒙上帝賜福，正如聖經上說：「以耶和華為上帝的，那國是有福的，神所揀選為自己產業的，那民是有福的。」（詩篇第卅三篇第十二節）但處在今日險惡的國際情勢中，面對著共產惡魔的威脅，我們不能不深自警惕，我們應該要堅強自立自信，更加虔誠，仰望上帝，「依賴祂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要穿戴上帝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以弗所書第六章第十至十一節）

黨國基督徒不僅把蔣介石看作是民族救星，也是世界的偉人，反共的偉大任務是由於蔣對基督的篤信而成為可能，1978 年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第四屆代表大會的手冊上印有孫中山和蔣介石的肖像，尊孫中山是「上帝選召的聖徒」，尊蔣是：

中華民國偉大的領袖，曾對本會成立積極支持，本會同仁深信效法蔣公對基督的忠誠摯愛，努力奮鬥，必能達成護教反共的神聖任務。



儘管不能說蔣介石是救世主，但他肯定是先知，亦是使徒，對那些忠實的黨國基督徒而言，蔣在他們的心中就是上帝特選的偉大領袖，所以我們都應服從於他的領導，正如服從上帝一樣。我們可以從蔣介石第一篇見證信仰的文章（1938年4月16日）看出端倪，他把「為什麼要信耶穌」說成與實現三民主義的真理和正義有關，把耶穌說成是民族革命的導師、社會革命的導師和宗教革命的導師，這樣一位耶穌是與他的革命實踐理想有關的，所以他說：

他〔耶穌〕對於主義與職務之忠誠，和對他親友與同志之寬恕，更是不勝枚舉；這種忠恕的德行，尤為難能可貴！你看他的博愛精神是何等偉大，耶穌倡導革命的精神，實基於此——就是「博愛」的精神。

凡我同道，應更感受「重生」的意義，抱定「犧牲」的決心，更要以耶穌為我們人生的目標，要以耶穌之精神為精神，以耶穌之生命為生命，共同一致，向著十字架勇往邁進，以求人類永久的和平，與中華民族的復興，而促進三民主義獨立、自由的新中國實現，亦就是實現耶穌理想中的天國。這樣，方足紀念耶穌復活的聖節，方不愧為總理的信徒。<sup>20</sup>

蔣介石在1944年的聖誕節證道詞中再次地強調上述的想法，耶穌基督是民族革命、社會革命和宗教革命的導師，更是三民主義的基本精神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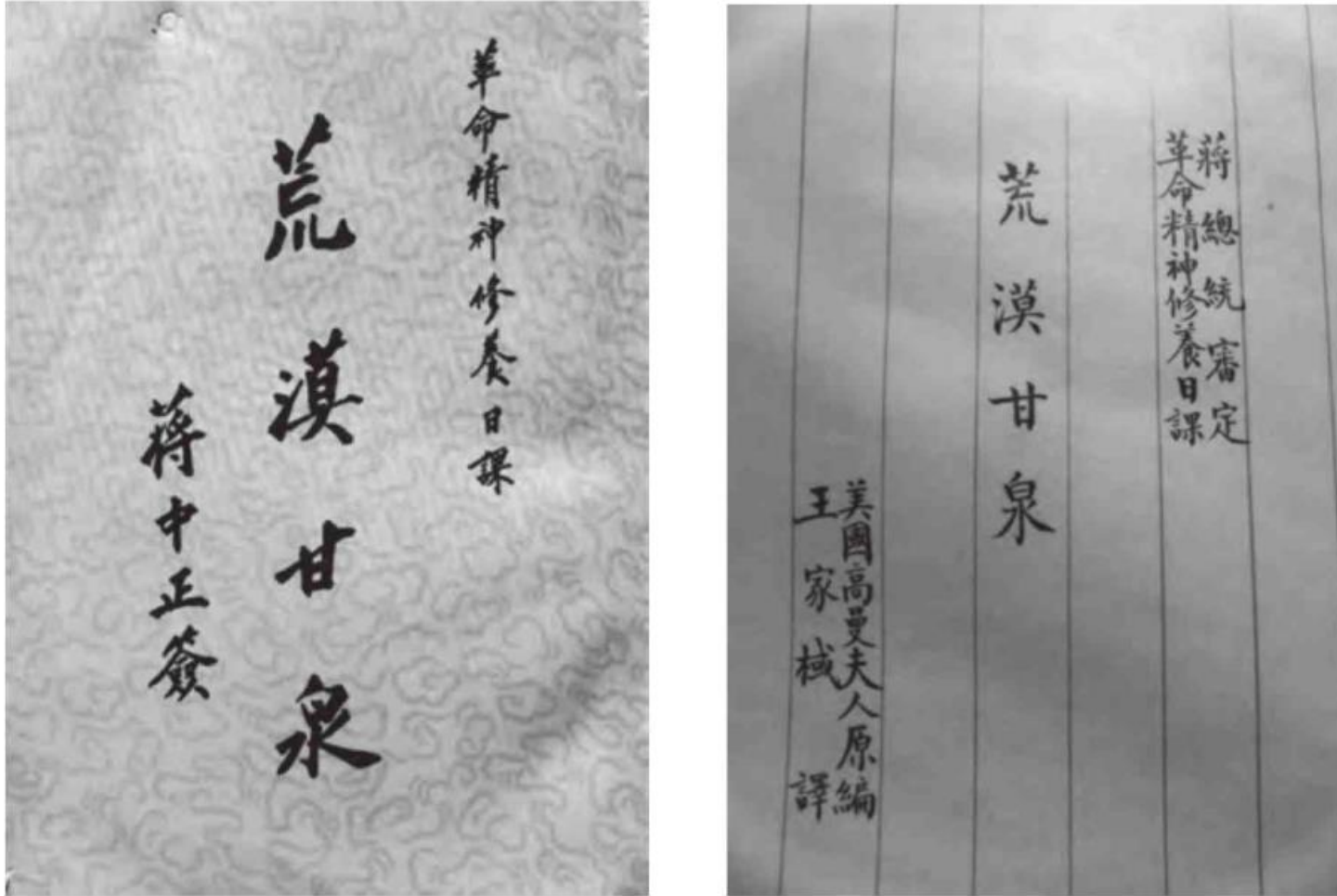
蔣介石經常強調，今日共產極權與自由世界的鬥爭不僅僅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鬥爭，或「極權主義」與「民主主義」的鬥爭。根據他對基督教的理解，今日世界的鬥爭，不論其戰爭的形式或戰爭的名稱為何，其實質與精神所在，必為「真理」與「罪惡」的鬥爭，就是「天理」與「人慾」的鬥爭；換言之，亦就是「有神」思想與「無神」思想兩者的戰爭，所以它是一場宗教戰爭，亦是屬靈的戰爭。因此，對蔣介石而言，基督教中的「善」與「惡」，「正」與「邪」之分，亦就是「真理」與「錯誤」的戰爭。

---

20 〈為什麼要信耶穌？〉，《先總統蔣公全集》第三冊，3164。



## ■ 作為反共神學靈修之作的《荒漠甘泉》



▲蔣介石審訂並增修了《荒漠甘泉》的內容，將之當作「革命精神日課」。（作者收藏）

外界經常提及蔣介石除了勤於讀經外，《荒漠甘泉》更是一本他愛不釋手的宗教書籍。蔣還特別親自審定《荒漠甘泉》，把它視作為「革命精神」的修養讀物，刊行目的不在於勸導讀者以世俗敬神的方式去崇拜上帝，而是要以信、望、愛來作為精神的武器和甲冑與共產惡魔作戰，不畏艱難、不惜犧牲，為愛世界安全與愛人類幸福，不屈不撓奮鬥到底。

這原是一本宏揚基督教義的書籍，如何能用於革命精神的鍛鍊呢？我們讀了本書每月編首所列 總統歷年的證道詞，即可瞭解其中的深長意義。

《荒漠甘泉》的「例言」說明了該書重譯並經蔣介石的修訂後的意義和目的。蔣介石對《荒漠甘泉》有獨特的喜好，重點恐怕不僅僅是宗教意義的部份，對蔣而言，反攻大陸、消滅共匪是他念茲在茲的事，而《荒漠甘泉》恰好提供了一種思



想改造的作用，以「日課」的方式提振革命的意識，所以他特別在審定的《荒漠甘泉》上，標誌作「革命精神修養日課」，正像當年馮玉祥於軍隊中人手一本《完人之範》一樣，其目的是為了軍事的思想改造或精神革命。<sup>21</sup>

所以閱讀本書的時候有一個前提，就是對於有神論與無神論的問題，必須首先要明確解決的，因為今日對這人類公敵「唯物」無神思想的共產主義之戰爭，其本質就是有神思想與無神思想兩者的戰爭。即使是過去的宗教戰爭，亦莫非如此。因為宗教亦有善與惡、正與邪之分，並不都是真理與神聖的宗教。故宗教的戰爭，實不能說就是神與神、真理與真理的戰爭。應知宇宙的真理只有一個，而主宰宇宙的神亦只有一個。所謂宗教戰爭，在一方面的宗教來講，亦就是正與邪、善與惡、光明與黑暗的戰爭。換言之，就是「上帝與魔鬼的戰爭」。而且今日的馬克斯主義，已成為一種邪惡的宗教了。<sup>22</sup>

蔣介石邀請王家楫重譯，理由是說不滿意之前種種的譯本，但是從其眉批和改動荒漠甘泉譯稿之筆跡，尤其從編排的結構和加諸的內容看來，其政治意識形態的意味更是顯露無遺。作為「革命精神修養日課」的《荒漠甘泉》，每月的開始都有一篇蔣的講道詞，從1月到12月都附上了標題。1月1日的首篇為蔣親自撰寫之作：「耶穌說：『我已戰勝了世界』」，1月2日的標題則是：「憑信前進，收復河山」並開頭的第一句話是：「親愛的同志，……」。《蔣中正先生手改荒漠甘泉譯稿》實為反共的靈修神學代表作：

總統特在「解決共產主義思想與方法的根本問題」中說：「我總以為人生在世，特別是在此反共抗俄與唯物主義戰爭期間，無論你有否宗教信仰，

21 《荒漠甘泉》印副本上列明「蔣總統審定·精神修養日課」，然而，根據《蔣中正先生手改荒漠甘泉譯稿》之原稿本上則是寫著「革命精神修養日課」。相較於臺灣《荒漠甘泉》「被利用」，在中國大陸則是成了「被批鬥」的對象，參見鄧肇明，《滄桑與窘境：四十多年來的三自愛國運動》，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與文化社，1997。

22 《荒漠甘泉》（上），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3，1-2。



亦無論你對於宗教的觀念如何？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宇宙之中，是有一位神在冥冥之中為之主宰的。」這就是 總統對於有神論與無神論的思想戰爭，所明白指示的一個答案。因之我們閱讀這本書的時候，必須正確認識且承認在宇宙中必有一位神為之主宰的。這樣不僅讀此更為有益，就是對我於我們人生觀的根本問題，從此亦能根本解決了。而且這個問題，乃是我們今日反共鬥爭中最迫切的當務之急。<sup>23</sup>

《荒漠甘泉》重譯（編）應該是在1958年之前，譯者王家楫將全譯本最後做了「例言」，標明為1959年2月。所以蔣的基督教與反共思想在此時已經聯繫起來了，後來藉由護教反共組織的方式推動其思想，當然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此譯作最先曾於1960年交由國民黨的文宣出版機構中央文物供應社出版，之後再轉交具軍方背景的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出版，精裝本分上下冊，第一版次為1973年，之後1975年再版，到1988年已是第八版次。這本書在軍中最高普及，上下兩冊由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印行，國軍軍官人手一冊，在「使用說明」中還特別標誌：<sup>24</sup>

一、本書為先總統 蔣公生前每日所必讀，本部曾先後多次印發軍官，作為革命精神修養日課，茲再印發各級軍官人手一套（上下二冊），希利用工作之餘，每日研讀一篇，並加圈點、眉註，此書內涵深遠，讀完後宜再讀，當另有一番進境，對一個革命工作者而言，可謂終身受用不盡。

二、本書因籌印不易，凡退伍由各單位政戰部門收回，轉發新進人員使用。

根據譯者於「例言」中所述：

23 《荒漠甘泉》（上），2。

24 國民黨老將領雷學明把這部著作在軍中流行說成是，蔣介石「要把福音傳到軍中去」。參見王成勉主編《補上一頁欠缺的歷史：蔣介石夫婦的基督教信仰》，臺北：宇宙光，2014，118。



原書各篇編次，在譯本中先後移動甚多，其目的在使課義相近者，彙編於一個月份之內，揭出重點，於每月另加總標題，俾讀者獲得較為集中的概念。惟書中多數篇章，其所闡發的意義涉及甚廣，歸納之時，可此可彼，並無釐然的客觀分野，故譯本排比之方法，雖遵照以類相從之原則，然分類並不嚴格，僅使一個月有一個月的中心課義而已。<sup>25</sup>

總統特於書中每篇之首，親撰標題，以明其篇中之重點所在。一月一日之篇，且為 總統親筆所專撰。<sup>26</sup>

仔細看蔣修改譯稿之眉批筆跡可以看出蔣的思想軌跡，主要即是顯出他確實把《荒漠甘泉》當作反攻大陸、收復河山的修養日課，把與共黨的鬥爭視為是有神與無神、正義與邪惡、真理與謊言、上帝與魔鬼之鬥爭；某些冗長的經文徵引也被特別指示刪去，每一個月的標題都與戰鬥的意識有關，患難、試煉、犧牲等關鍵用語，強調信心的重要性以及經由信心得到勝利的必然性：

本書之刊行，……；則我們反共抗俄的國民革命第三任務，必能勝利完成。<sup>27</sup>

蔣中正除了在遺囑中勸人讀習聖經，也在其他的地方讚揚《荒漠甘泉》的價值，其意甚明，目的無外乎是將基督教的思想遺產當作他統治思想的工具：反共抗俄。《荒漠甘泉》每月開始均加諸了一篇蔣在不同時期發表過的講道詞作為「中心思想」，以及每個月的主題都清楚地標誌著「反攻大陸、收復河山」的精神修養意味，基督教的靈修學與政治作戰之精神思想教育結合起來，可謂精心編輯之作。以下抄錄全書重編後的目錄：

25 《荒漠甘泉》（上），6-7。

26 《荒漠甘泉》（上），1。

27 《荒漠甘泉》（上），4-5。



目錄

- 基督教的理想、行動與精神（民國四十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 一月 信心與勝利
- 耶穌受難與復活的意義（民國四十七年四月四日）
- 二月 患難與鍛鍊
- 科學與宗教（民國四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 三月 試煉與勇敢
- 精神不死與靈魂復活（民國四十四年四月八日）
- 四月 復活與犧牲
- 真理必戰勝邪惡（民國四十三年四月十六日）
- 五月 安靜與堅定
- 信仰與行動合一（民國四十二年四月三日）
- 六月 時間與信心
- 人生不可須臾無宗教的信仰（民國四十一年四月十一日）
- 七月 忍耐與服從
- 耶穌為救人救世、救國救民犧牲精神（民國三十九年四月七日）
- 八月 信心與樂觀
- 生命的意義（民國四十六年四月十九日）
- 九月 慈愛與同情
- 基督給我們信心與希望（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 十月 信心與希望
- 唯有堅定不移的信心、纔能打破凶險的環境  
（民國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 十一月 信心與靈力
- 耶穌受難予余之教訓（民國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 十二月 信心與禱告

附錄（二）：《蔣中正先生手改荒漠甘泉譯稿》

一月一日 耶穌說：『我已戰勝了世界』—約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節

世界是一個大戰場，人生在世，就是在這戰場上，度著戰爭生活。

凡是戰爭都必先有其目標，故人生亦必須具有其信仰。這信仰亦就是人生



的目標。如果人生沒有一定的信仰，就如無舵之舟，既無目標，亦無方向，只有隨風逐浪，在茫茫大海中飄盪顛簸，若非傾覆，就是毀滅，這是過去戰爭給我們的實際經驗和教訓。



◀國防部、黎明文化事業出版社、中央文物供應社均印刷出版過蔣介石審訂的《荒漠甘泉》。（作者收藏）

因為信仰，乃是在一切戰爭中所不可衡量的力量，特別是革命的信仰和宗教的信仰，更是戰勝一切的惟一力量。

今天是中華民國開國的紀念日，亦是我們年華更新的第一天。我們大家都進入了一個新的歲首，我們國民革命的事業和未來一切戰爭，祇要依照其預定目標前進，自信其不必再有疑慮，凡是順乎天而應乎人的革命事業，決無不成之理。惟有我們整個人生應作新的檢討和新的決定，必要研究我們人生歸宿的道理，認識我們終極目標的所在，而後這革命戰爭的徹底勝利，纔有確切的保障。

我認為我們革命戰爭從前未能獲得徹底勝利，甚至大勝以後，仍要遭受悲慘的挫敗，這完全是為我們平時太不注意哲學與宗教精神的修養。因之中無主宰，內心空虛，易為外物所侵，而時生疑懼惶惑之象。如此精神力量既不能充實，革命信仰就不能堅定，所以對於革命戰爭的目標，亦就不能堅持到底，貫徹始終了。這樣下去，年復一年，就將要虛度一生而成為毫無意義的人生。能不及時反省警悟麼？我們今後如要達成我們革命目標，確保我們戰爭的徹底勝利，只有加強革命信仰，追求人生真理，以充實我們內心的空虛，求得新的精



神、新的生命、新的生活、和新的戰爭力量，以戰勝萬惡共產的魔鬼世界，達成我們新的人生目標，庶不愧為頂天立地的革命信徒。

《荒漠甘泉》每篇所引證的聖經（舊約與新約）章節中有關戰爭的事例，很多是「以色列」民族對其敵人的戰史摘要，其中最後勝利的戰例，往往是憑藉他們平生的信仰，奮鬥到底，卒能在戰爭中轉敗為勝，竟變不可能為可能，蔣介石認為這是提供革命鬥士心身修養的指針。他尤其指出，《荒漠甘泉》每月的篇首，總共為十二篇之數，證道詞的內涵意義：一則適合闡明《荒漠甘泉》每月所列經文的題旨、二則反映時代精神，成為革命歷史中之重要文獻、三則闡明真理，發揚革命精神，實踐救人救世的宏願。

換言之，不管是聖經或《荒漠甘泉》，這些作品之於蔣介石，就是革命或反共的精神指導書籍，對此，他毫不懷疑地以為基督教的信仰就是一種反共的信仰。這個時代最大的敵人即是共產主義，所以反共成了基督徒的任務，以此作為宣揚福音的一種根本手段。因此，基督教與共產惡魔之戰即為宗教戰爭，是「真神」與「假神」、「真理」與「謊言」的戰爭，基督徒的信仰即是認為這世界只有一個並主宰宇宙的「神」，所以此言的宗教戰爭，即在於「正」與「邪」、「善」與「惡」、「光明」與「黑暗」的戰爭。這是一場「上帝」與「惡魔」的戰爭，共產主義即是邪惡的宗教，毫無違言的，基督徒應予以全力地對抗。

蔣介石強調，人生所應該徹底研究明白的三個問題：第一、宇宙的真理；第二、生命的意義；第三、人生當行的道路。如果大家要解決這三個問題，就只有求之於宗教—基督教。人生真要獲得「自由」，必須追求上帝的「真理」，尤其是代表「真理」的基督。把這信仰傳播到整個自由世界和共產鐵幕裡頭，揭穿共產惡魔所假借的科學面具及其所冒充的自由邪說，破除「宗教」與「科學」不相並容的謬論，用上帝真理的盾牌，來武裝我們精神，充實我們這一時代人性的空虛，解除心靈上的束縛、思想上的迷惘，和生活上一切的煩惱痛苦；然後我們才能從「科學」得到福祉，從「真理」得到「自由」，並依從上帝的指引和基本的



信仰，向著共產惡魔作永不妥協的積極奮鬥。

所以，蔣介石認為，我們應該知道世界原是一個大戰場，其中充滿了各樣不同的戰爭……實際上卻都只是「真理」和「邪惡」，「光明」和「黑暗」的兩個勢力在搏鬥，也就是上帝對魔鬼在戰爭！我們今天反共抗俄的神聖戰爭，不只是救國救民，而且是救人救世的戰爭！也就是為著上帝真理的實現，為著人類靈魂的拯救而堅持到底的戰爭！

## ■ 十字架上的黨徽

蔣經國在《我的父親》一書問了一句話：

我常常思索研究，這種強大無比的革命力量，到底發源在那裏？

其意是說，究竟如何理解他的父親蔣介石的偉大，其中又與蔣自己對於認真批註過的《荒漠甘泉》有何關係？他說到了一段經驗：

去年過年的時候，家父給我一本《荒漠甘泉》，叮囑我將他老人家在此書中的批註，全部抄寫一遍。家父自民國三十三年七月起，直到如今，每日誦讀此書。這是一本基督教的書籍，其中每天有一篇勉勵讀者前進奮鬥的文章，涵義正確而深刻；家父在每一篇文章上，都作批註，也就是一種讀後的感想。我抄完了全書之後，認為家父之所以有那種不畏艱難的毅力和勇往直前的決心，乃是因為有一顆救人救國救世的至誠之心，而至誠所發揮的力量，才是無限無量，既不受空間的範圍，亦不受時間的局限的。<sup>28</sup>

蔣經國在《我的父親》一書開始之處，即提及《荒漠甘泉》一書，說明了蔣

---

28 蔣經國，《我的父親》，臺北：黎明文化事業，1975年4月，2。



介石非常的重視這本書，而且，更重要的是，蔣介石囑咐蔣經國好好閱讀他所「批改」或「加註」版的《荒漠甘泉》，其主要的內涵即是與革命思想有關；因此，重點不是要蔣經國認識基督教，而是要了解基督教與革命的關係。正如我們從蔣留下的眉批文字所看到的那樣，基督教之於他來說，即是與他的革命事業有關；更準確的說法是，蔣介石要蔣經國注意他的人生主要即是在於奮鬥，與其說《荒漠甘泉》給他力量，不如說是找到了支持並解釋自己一生的理由。



▲中華民國基督教紀念先總統蔣公百年誕辰感恩禮拜，1986年10月26日晚上在臺北市國父紀念館舉行，大會由吳嵩慶主持，副總統李登輝證道，三千多位教友參加。（中央社）

蔣經國說到：家父是忠實的革命者，亦是虔誠的基督徒，信仰基督教，最堅定，最徹底，亦是最赤誠。<sup>29</sup>無疑的，在蔣介石的身上可見，作為忠實的革命者和虔誠的基督徒這兩種身份，是如何奇蹟般的融合在一起的，信仰之於一位革命者，就如革命之於一位信仰者，似乎有著同樣的特質。蔣經國透過遵照指示，詳閱並抄錄父親的「心得」，並領悟到其中的道理；蔣經國的理解和詮釋無疑地也推進了蔣版《荒漠甘泉》對於軍中將領以及黨國基督徒的理解。

29 蔣經國，《我的父親》，3。



所以，不難理解何以周聯華獨具慧眼地提醒我們：「先總統 蔣公基督教信仰與軍中關係既大且深」。這句話完全說到了重點，《荒漠甘泉》就是黨國基督徒的《信仰手冊》，當然也是《革命手冊》。不要忘記，與蔣介石出身入死的黨國基督徒大都是軍人背景出身，黨國基督徒對基督教的理解以及實踐是受《荒漠甘泉》所影響的，當然，是指「蔣版」的《荒漠甘泉》，即是在每一月開始以其個人的證道詞來引導或規範了一個「靈修」內容的主旨，換言之，《荒漠甘泉》是經由蔣的批註，尤其是思想的指引來導引至他所期待的方向，以作為所有黨國基督徒的「革命精神修養日課」。著名的黨國基督徒李國鼎、查良鑑等，都標榜自己是如何被這部書所影響的，無時無刻地都將它帶在身邊，完全取代了對聖經的閱讀；或者，他們對於聖經的理解，也離不開由蔣所「規定」或總結出來在《荒漠甘泉》的每月的證道詞以及其眉批的註文中。

所以蔣經國說：

家父是一個革命者，以救苦救難的革命事業，來充實基督徒的生命，家父是一個基督徒，以背十字架的基督精神，更堅定了革命者的意志；因此，家父以極其超然而又非常自然的態度，來從事於革命大業。

家父喜讀《荒漠甘泉》，且於深心印證之餘，在各章的後面加以批註，我們讀過這些批註，就更可以體認家父的靈性修養。現在恭錄四章內容並批註於后：……<sup>30</sup>

蔣介石對兒子的指引，也是用這種方式，蔣經國也約略地領悟其中的道理，所以還特別認真地將蔣特別批註的《荒漠甘泉》文字「抄錄」一遍，共計四段，主旨都是在表現如何藉此體會革命精神與基督教精神在蔣的身上融為一體。蔣經國抄錄了蔣在民國三十四年1月3日，於《荒漠甘泉》上批文：

30 蔣經國，《我的父親》，4-5。



「去年下半年飽經艱危，而能堅忍不拔，安然度過者，實得力於此書不少也。」

蔣經國總結地說：「由此可知精神力量，是如何的偉大了。亦只有精神的力量，才能戰敗敵人，爭得最後的革命勝利。」<sup>31</sup>

時任財政部長的李國鼎為蔣介石的逝世寫了一篇悼文，尤其提及那一本傳閱於軍中人手一冊的《荒漠甘泉》，是他出差時經常相伴的靈修作品，比聖經還更為重要的精神靈糧。<sup>32</sup>

我希望我們作基督徒的，都能閱讀 總統 蔣公審定本的《荒漠甘泉》和蔣院長經國親撰的《我的父親》，就可以了解一個偉大基督徒的生活，因為信仰，一定可以增加你工作時的勇氣和力量，也一定更可以充實你的靈性，因為從 總統 蔣公一生的經歷和他的作為，會將聖經上的話給你真實感，更能使你篤信不移。

慕道的朋友們，我更希望並為你們祈禱，也讀一讀這兩本書，最好是和聖經對照著讀，由此所謂恪遵 總統 蔣公的遺訓才能作到，因為以 總統 蔣公的信仰為信仰，會給你恪遵遺訓的昭示「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所需要的精神力量。

此文完全暴露出黨國基督徒的基本思維，說明了他們對蔣的崇拜，以及將蔣對基督教的理解視為與黨國主義是一體的，而毫不感到有何差異。查良鑑還特別說：

總統為拯救中華民族而犧牲自己，為愛護人民而背上十字架。他生前最喜

31 蔣經國，《我的父親》，9。

32 李國鼎，〈讀《荒漠甘泉》悼念總統蔣公〉，《宇宙光》第13期，1975年5月。同時也刊載於《中央日報》，並收入於重提編《飛向慈湖的心》，臺北：中國主日學協會，1976。



歡讀《荒漠甘泉》。現在讓我唸該書四月十五日、十六日的兩段：……。<sup>33</sup>

可見黨國基督徒的基督教信仰是以蔣介石的政治信仰為核心的，他們心靈思想中真正偉大牧者即是蔣介石，蔣是他們的牧師、軍師、統帥，「唯蔣是從」。李國鼎如此表示：

荒漠甘泉上五日和六日兩天的日課好似在敘述總統 蔣公 一生成為偉人的過程，他的生命無疑是不朽。他老早在告訴我們怎樣作一個基督徒？怎樣作一革命的信徒？

作為一個基督徒和國民黨黨員的國鼎，祇有加倍的「服膺本黨與政府領導」，發揮基督徒以「信」「望」「愛」為精神的武器和甲冑，繼續反共復國的工作。

黨國基督徒不僅把蔣介石當作偉人，也對他的信仰人格無條件地崇拜，蔣的一舉一動都被當作他是為了信仰或為了傳福音之故做出種種的事，例如雷學明將軍就認為，蔣把《荒漠甘泉》致贈於軍中是為了傳福音：

蔣公此一賢明的舉措，把聖經的真理帶到軍中，成為活水江河，也真為荒漠中注入了無窮無盡的甘泉。<sup>34</sup>

1936年12月發生了著名的西安事變，蔣介石被俘虜，但後來平安脫困。隔年受難節，蔣做了一次證道，內容述說了這一段生死交加的日子，尤其將自身的遭遇比作耶穌受魔鬼試探，並以隨時作好犧牲來標榜自己的志節。證道詞中有一段文字說到：

33 查良鑑，〈敬悼總統 蔣公〉，《東海大學校刊》，1975年4月20日。

34 雷學明，〈蔣公向軍中傳福音〉，收入《補上一頁欠缺的歷史：蔣介石夫婦的基督教信仰》，118



惟念余自興學統軍以來，嘗以二語訓部屬：「一、余如有絲毫自私自利，而不為國家與民眾者，則無論何人，皆可視我為國家之罪人，即人人可得而殺我。二、如余之言行稍有不誠不實，虛偽欺妄，而不為革命與主義著想，則任何部下皆可視我為敵人，即無論何時，可以殺余。」此二語，余自信出於精誠，亦即余宗教式之自信心所致，故於毀法蕩紀惡氛之中，仍能撥亂反正，然此亦我耶穌博愛之精誠，與夫 總理寬大仁恕之教訓有以貫之也。<sup>35</sup>

據說蔣勤於讀聖經，這段文字可以說明到底蔣介石對基督教信仰的理解以及他的靈性狀態如何。蔣介石結識宋美齡，1927年兩人步入教堂，1930年10月在江長川牧師主持下接受洗禮，沒有提到他上過基本的信仰課程。1936年的受難節證道，卻是自認為自己無絲毫的自私自利，也無不誠實，哪裡像是悔改認罪的基督徒呢？看來，蔣連基本的道理班恐怕也沒有認真修習過，他憑自己的感受讀經，讀出來的都是國家民族、革命殺敵之類的，一切都是為了服務他的政治理想，結果他的追隨者都是以他為效法和學習的對象，跟錯老師，還自以為是。黨國基督徒的基要派立場，受蔣介石的信仰特質框限，並體現為一種黨國主義的基督教信仰。

無疑的，蔣介石把一切可以用作為他反共工具的都大肆發揮一番，基督教在他的手中也一樣。對他而言，共產黨好像什麼都反對、都否定，所以，凡要堅持某種東西或立場的，勢必要與共產黨來對抗。蔣解釋宗教或信仰時，尤其如此：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其有精神生活。精神得不到安定，人格便陷入破碎的境域。個人不能保持其人格的完整，社會也就不能保持其安定的秩序和良好的風氣。

現代的心理學家也嘗試以科學方法來治療人類的精神病。如果是神經系統

---

35 〈民國二十六年耶穌受難節證道詞〉。



有了病，在醫學上並不是沒有治療的方法，但是要使一個人收拾其破碎的心理，養成其完整的人格，科學還是無能為力的，唯有宗教信仰和人生哲學的基本思想，纔是人格的內在安定力。

共匪要瓦解我們的社會，滅亡我們的國家，首先就要摧殘宗教，箝制我們的信仰自由。一般教育家和科學家或許以為宗教是反科學的迷信，對共匪迫害宗教的暴行，不加重視。殊不知一個人沒有信仰，就失去了人生的歸宿。一個社會沒有宗教，就失去了精神的安定力。我們要看清了共匪為什麼要摧毀宗教，纔能達到他征服世界奴役人類的目的，我們就能夠了解宗教對於個人和社會的重要性了。<sup>36</sup>

對此，團結所有的宗教徒與共產黨對抗，是天經地義的事，黨國基督徒對此也視為理所當然。

蔣介石對基督教的種種解釋，不過就是要說明「目的使手段正當化」。反共是解釋所有事物的根據，所以對他而言，基督教無疑地即是充當作一種「手段」，只要符合目的，手段也就被認可，或者說，如果其目的不正確，手段也將被質疑。遷臺後的國民黨，既把反共復國當作所有黨政人員的人生最高目標，它就依循這個觀點觀察世間的一切事物。凡有利於它的政治權力都是好的，凡是不利於它的政治權力都是不好的。所以，當這些以忠黨愛國作為其信仰表現的基督徒出於上述的理由維護基督教信仰時，他們即是根據「反不反共」來判斷是否護教；只有在這個前提上，某種基督教才被認可。基督徒出於護教的理由或對不同的見解發出批判和質疑原純屬於自由的事，但是當「護教」是基於「反共」為前提時，所有的護教都將與嚴厲的政治權力和行動來表現，神召會的李廣業即是特別留意於兩次成立的大會，英文的名稱僅僅出現「反共」的意思，但只有中文名稱中有「護教反共」四個字，可謂義正辭嚴、名正言順。<sup>37</sup>

36 蔣中正，《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第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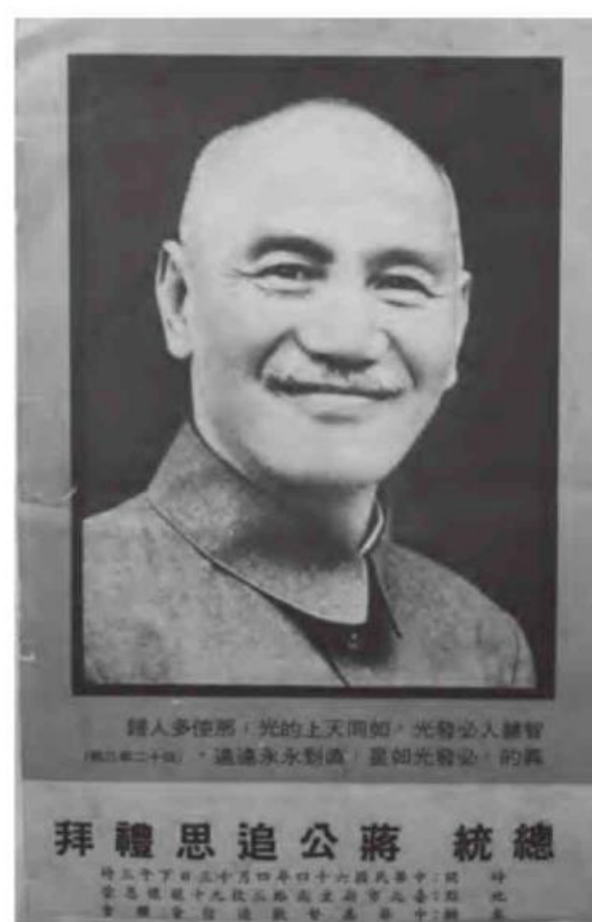
37 《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會訊》第8期，1972/2/20，10-12。



蔣介石被說成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他愛讀聖經、《荒漠甘泉》；同時在國民黨內他又大權緊握，頭腦裡想的和嘴巴說出來的，竟都是「打倒萬惡共匪」、「反共復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等類似殺得共匪血流成河的話，又反映出了什麼樣的精神狀態。<sup>38</sup> 將信仰基督教與追隨蔣介石革命的黨國基督徒，是如何地將這兩樣看來不太相干的關係緊緊地接合在一起，是一個極為特殊的現象：蔣介石即是護教反共的先知，在他那裡只有正義而沒有邪惡，他即代表了正義。當基督徒不斷地視他作為一種偉大的人格去崇拜的時候，就越來越反映出那些追隨或是崇拜他的人是擁有和他一樣的人格。



▲感恩禮拜出席證。(作者收藏)



▲教會內主辦的蔣介石逝世追思會。(作者翻攝)

38 蔣介石在大陸時期的基督教信仰狀況，可參見裴京漢〈蔣介石與基督教一日記裡的宗教生活〉，收入《民國人物與民國政治》，277-289。在臺期間的蔣更多的讀聖經和有穩定的宗教生活，但是，這樣的宗教生活與他總是想著「反共復國」的大業，以及在各種場合總是口中駁罵「共匪」，形成相當有趣的對照，試想想：這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的生活或表率？以此再看《補上一頁欠缺的歷史：蔣介石夫婦的基督教信仰》這本近作，它本身即是「缺頁之作」，基督教的宣傳在這本書中變成了一種不誠實之表現。





◀凱歌堂內蔣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齡的席位。（作者翻攝）

1986年，臺灣基督徒以「中華民國基督教紀念先總統蔣公百年誕辰感恩禮拜」之名追思這麼一位他們認為的「偉大基督徒」，於10月26日晚上在臺北市國父紀念館舉行了盛大的追思會，由吳嵩慶長老主持，參加信徒約三千人，禮拜內容包括祈禱、讀經、唱詩、證道、各教會聯合詩班兩百人大合唱、聖德基督學院獻唱〈總統蔣公紀念歌〉等。當時擔任副總統的李登輝還應邀蒞會證道，他特別呼籲全體基督徒「紀念蔣公百年誕辰」，應該努力發揚基督精神，實現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歷史使命，使基督的光輝，普照全中國。

此次追思會會場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大會的舞臺中間懸空掛著一個斗大的十字架，仔細地看會發現，這個基督徒熟悉的十字架中間卻繫上了國民黨黨徽，類似的圖像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中世紀的十字軍、法西斯時代的德國教會、皇民化的天皇制崇拜。<sup>39</sup> 黨國基督徒所說的「純正信仰」，實質上即是「反共的信仰」，十字架上繫上黨徽，是「政治正確」，也是追隨孫中山、蔣介石的「信仰正確」。第一次看到這張照片時非常地震驚，腦海裡頻頻的想起黨國基督徒所重申的「反共不是政治」，鍵盤上的手則顫抖地敲打出以下的幾行字：

39 關於日本天皇制神學的批判，可參見鈴木正三主編，《現代社會轉型中的天皇制和基督教》，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愛國愛教」與「護教反共」沒有本質上的差別，海外華人基督教學者對三自神學曾做過批判，但對反共神學，由於它的隱蔽以及與華人基要派領袖的關係，尚未有人關注過，對它的批判更談不上。



共產黨擺明要根除基督教  
國民黨滲透且利用基督教  
十架上掛黨徽而不見耶穌  
黨國基督徒追隨的是蔣公



▲中華民國基督教紀念先總統蔣公百年誕辰感恩禮拜，中壢聖德基督書院詩班獻唱。  
(中央社)





▲紀念蔣公誕辰感恩禮拜，由世界護教反共會議理事長吳嵩慶將軍（右）主持，其旁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雙連教會陳溪圳牧師。（中央社）<sup>40</sup>

40 收入於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先總統蔣公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編輯出版，《先總統蔣公百年誕辰紀念實錄》，臺北：1987/10/31。（原件藏於國史館，編號 130000000065P-198）



## 2. 奮起為耶穌： 成文秀與張靜愚的反共神學

漢奸必滅與反共必勝、侵略必敗與抗俄必成。

—蔣介石，《反共復國的理論與實踐》

「反攻」口號卻令國民黨黨員大大減輕內心的無助感和負罪感。他們自命正統，稱共黨為「叛逆」，於是，他們有藉口死握權力不放了。

—殷海光，〈剖析國民黨〉



## ■ 領袖萬歲

殷海光曾簡單地問過：敗軍之將怎樣搖身一變而成「偉大的舵手」？<sup>1</sup>

1973年，蔣介石八十七歲生日，全臺的基督教會擴大慶祝並主辦「恭祝總統華誕大會及基督徒反共大會」，活動遍及臺北、基隆、新竹、花蓮、臺南和高雄，主要的推動者為「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sup>2</sup>臺北市於10月30日主辦的華誕大會上，還有教會中學聖歌隊獻唱〈領袖萬歲歌〉，長老教會也參與了此次「領袖萬歲」的活動，例如同年的10月18日在臺南市社教館舉行的「臺南市基督徒慶祝總統華誕暨護教反共大會」中，臺南神學院詩班還特別獻唱了由黃武東作詞的詩歌〈上帝賜福中國各省〉；而另外在新竹市的反共大會上，長老教會聖經學院的詩班也參與獻唱。在反共的前提下，「擁蔣」與「護教」形成巧妙的結合，黨國基督徒將蔣打造為聖徒、基督信仰的捍衛者、打倒無神主義共產黨的民族及人類救星。

根據蔣介石在「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的致詞，信奉十字架的基督徒都是反共的，而且對共產黨宣戰也是一種信仰上的十字軍戰爭，也正如該會的發起人兼理事長張靜愚強烈地表示，反共護教是今天基督徒最大的責任，他說：

這不是政治問題，而是信仰和真理的問題。站在基督徒的立場來說，反共戰爭就是一場有神與無神的戰爭。<sup>3</sup>

護教反共是基督徒的首要任務，這個任務的執行是以蔣介石為基督教所做的解釋為行動的依據，反共神學的起點即在此。1975年蔣介石逝世，張靜愚以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理事長的身份弔唁，哀悼並宣示效忠：

1 殷海光，〈剖析國民黨〉，收入盧蒼主編，《殷海光書信集》，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88，310。

2 《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會訊》第19期，1973/12，12-23。

3 〈馨香之氣〉，收入《一束思念—張靜愚先生追思紀念集》，1987，家人自印，30-31。



本會所屬國內外各總分會誓以至誠盡心盡力反共，遵行故總統遺訓，撲滅邪惡毒氣，歸榮耀於上帝，慰故總統在天之靈。<sup>4</sup>

護教反共巨人隕歿，護教反共的將士們頓時失去了依靠，但仍堅持至誠盡心盡力反共，以告慰領袖在天之靈。

## ■ 成文秀：「護教反共」的「神學家」

反共神學的最主要發明和闡釋者，即是萬國基督教聯合會中國分會的分會會長成文秀，他可以說是對護教反共思想和理念最為徹底發揚和宣傳的一位牧師，他的思想包括解經、教會史觀、神學思想等方面，儼然成了一位「護教反共」的理論大將或「神學家」。成文秀有一句代表性的話，他說：

共產黨如能信神，他就不是共產黨，基督徒如信無神論共產主義，他也就絕不是基督徒。<sup>5</sup>

成文秀表示，「護教」顧名思義即是維護基督教純正信仰以及切合聖經的真理教義；「反共」則是堅決反對無神論、共產主義，排除其暴政極權，以及違反人性倫理等行為。<sup>6</sup>



▲宋美齡與成文秀。(國史館)

4 《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會訊》第23期，1965/5，5。

5 成文秀，《護教反共叢談》，臺北：協林印書館有限公司，1982，23。

6 成文秀，《護教反共叢談》，23。



成文秀表示「護教反共」不是亂無章法的空洞口號，應該成立組織並為之訂定了工作實施綱領，切實執行，他具體地指定了十項組織工作的要領：

- 一、訂定組織信條；
- 二、一切興替事宜依據聖經真理；
- 三、歡迎純正信仰教會暨個人參加；
- 四、揭發普世教協歪曲信仰及親共事實；
- 五、不與親共教會團體往來合作；
- 六、充實護教反共的國民外交工作；
- 七、聯合國際間純正信仰教會；
- 八、注重文字，宣傳工作；
- 九、每年召開大會一次，必要時召開臨時會；
- 十、參加國際間有關會議。<sup>7</sup>

從上述目標和工作的制定來看，這位《戰時民眾組織與訓練》的作者，在護教反共的工作上終可一展長才。

成文秀出生於1904年，1982年病逝於美國。據稱他曾就讀山東華北神學院，之後獲美國普林斯敦大學神學碩士，<sup>8</sup>美國曼赫司教育中心榮譽博士。他的軍職背景包括：革命實踐研究院第四期（1950年3月至4月）研究員、政治教官、政戰部主任等。1953年應聘作臺灣聖經學院副院長，曾與道雅伯共事一神學院，1956年成立基督教福音貴格會南港教會，之後又成立週美教會、中崙教會等。曾擔任萬國基督教聯合會（ICCC）總會副會長，1961年在臺成立萬國基督教聯合會中華民國分會並擔任分會會長一職，同時亦創辦了《角聲週刊》並翻譯了不少反共之作，其最主要的代表作為《護教反共叢談》。

我們從《馮玉祥日記》（1938/12/18）中發現，馮玉祥曾於銅梁見過成文秀及其夫人董素雲，成文秀當時任職於軍校政治部教務組第一課長，此次會面與邀

7 成文秀，《護教反共叢談》，25。

8 別號「立峰」，1937年2月入黨，黨證編號為「特字32055」。根據其黨員登記資料，成文秀填寫的是「品士敦大學經濟系」碩士，修業年間為1934年7月至1937年6月。



請馮到銅梁公誼會的福音堂講道有關。<sup>9</sup> 1939年曾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出版過一本《戰時民眾組織與訓練》，1947年擔任國防部新聞局少將副處長，也曾參與競選江蘇省六合縣國大代表但未成功，國民政府遷臺後，他則以遞補的身份當上了國大代表。

由於軍人的背景和身份，成文秀到了臺灣，曾擔任過國防醫學院政戰部主任，1969年以黨務顧問的身份出席了國民黨第十次黨員代表大會，正是這次會議，蔣介石指示了國民黨的三大任務：「革新與強固本黨，鞏固復興基地，充實臺灣三民主義模式建設，團結海內外反共力量，組成反共聯合戰線，摧毀中共政權，重建三民主義中國」。可見，成文秀之所以將反共聯合戰線帶入教會並在教會組織進行動員，可謂有跡可循。

## ■ 護教反共的機關報——《角聲週刊》



▲▶ 《角聲》週刊。（作者收藏）

9 《馮玉祥日記》第五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562-564。



作為一位堅定的護教反共理論家，成文秀一手創辦了《角聲週刊》，這份於1961年8月發行的週刊左右了護教反共時期所有意識形態的走向。《角聲週刊》主要是以萬國基督教聯合會中華民國分會的名義發行的，發行所就設在成文秀在臺北市內湖所設立的福音貴格會，週刊的內容主要都由他一手包辦。<sup>10</sup>



◀副參謀總長唐守治上將（左）於1964年7月30日在國防部代表參謀總長彭孟緝上將，以陸海空軍獎章贈給來華訪問的萬國基督教聯合會會長麥堅泰博士（右）。（中央社）

《角聲週刊》的文章主要是將萬國基督教聯合會機關報《基督徒燈塔週刊》（*Christian Beacon*）譯成中文之作，與普世教協（WCC）相關的資料都是由萬國教聯總會提供的，包括周聯華1963年在普世教協的發言稿全文，竟也能神通廣大

10 福音貴格會（The Gospelaires Missionary Association）是1955年10月由尚恩溥牧師（Rev. Herschel Thornburg）和成文秀博士（Rev. Samuel W. S. Cheng D. D.）傳入臺灣。據了解，美國貴格會傳道人尚恩溥牧師，偕同貴格會四部合唱聖詩班來臺灣佈道，成文秀牧師擔任翻譯工作，之後並決定在臺灣開闢聖工，建立教會。首先成立南港教會，其次接收臺北市松山福音會，二年後遷移內湖鄉週美村，旋於1959年7月在臺北成立中崙教會，同年10月22日，成文秀在中崙教會創立遠東神學院（Far East Bible College）。



地取得，並將之翻譯且逐條批駁。

成文秀應用其所屬的教會之力量，主編並出版超過 300 期的《角聲週刊》，先後也編印和翻譯護教反共單行本小冊二十餘種，迄 1970 年彙整於《角聲週刊》發表過的文章合訂出版，冠以《護教反共叢談》之名，是當時護教反共重要的思想書籍之一，影響甚鉅。<sup>11</sup> 成文秀多次以萬國教聯中華民國分會會長的身分出席國外的反共活動和遊行，每次回國都受到國民黨黨部代表到機場的歡迎，是他把麥堅泰引薦給蔣介石認識，麥堅泰成了臺灣護教反共活動上無以取代的座上賓。成文秀也參與了張靜愚主持的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 (ACACA) 和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 (WCACA) 的活動，並擔任相關的幹部職，儘管不是主要的領導者，但在眾多宣傳護教反共理念的工作者當中，成文秀無疑地是最為積極的一位。



麥堅泰博士在開幕典禮證道

Dr. Carl McIntire preaching at the Opening Service

▲麥堅泰博士在開幕典禮證道，左為成文秀、張靜愚。(作者翻攝自護教反共聯合會通訊)

11 《護教反共叢談》可謂是成文秀所有護教反共小冊集結而成之作。全書不完全是成文秀所寫，內中還收錄了其個人和他人之譯作，所以版權頁和封面都以「成文秀博士著」是不誠實的做法。成文秀其他的著作包括《共產國際與基督教》、《基督徒應否與共產主義爭戰》、《共產黨征服世界的藍圖》、《為基督受難》等。





▲▶護教反共會議手冊及出版。(作者收藏)



## ■ 啟示錄中的戰爭

成文秀在解釋聖經啟示錄的經文時，認為「哈米吉多頓大戰」（啟示錄十六章 14 至 16 節）是：

作為世界上最末後最慘酷之毀滅戰爭。或謂即將由無神主義集團掀起之第三次世界大戰是也。<sup>12</sup>

另外，他在《創世記釋義》中直接指控「普世教協」，認為任何打著「教會聯合運動」（Ecumenical Movement）或「教會合一」（Church Unity）名義的組織，都是上帝欲審判的對象，這些舉動都是建造巴別塔，他的經文根據即是創世記第十一章那段「巴別塔」的故事，最終上帝叫他們停工，就像上帝終結了巴比倫一樣。<sup>13</sup> 成文秀想藉此說明，基督徒如信無神論共產主義，他就絕對不是基督徒，而基督

12 成文秀，《聖經要旨》，臺北：基督教福音貴格會，1967，532-534。

13 成文秀，《創世記釋義》，臺北：基督教福音貴格會，1979，86-88。



徒應該一同對抗共產主義並堅定基督信仰貫徹「護教反共」的理念。

對於任何形式的包容主義，反共神學一概地拒絕並嚴厲地批判為妥協、姑息主義、自由派或新派神學，正如他在批判普世教協時說：

一九四八年 WCC 正式成立，此一包容主義，更加惡性膨脹，由包容新邪說派，進而至於包容天主教、希臘教，甚而至於其他各宗教，如倡建六大宗教了解堂，誠然是這末世的巴別塔。更甚而至於連無神主義共產黨，也在包容之列，如是則要達成世界統一教會 One World Church，進而至於達成世界統一政府 One World Government，以促成蘇俄共產國際征服世界之迷夢。<sup>14</sup>

成文秀為反共神學設計了一套對基督教史上「離道反教」的評判標準，他還苦心地繪製了一張圖，分別說明古代的「十大邪說」、中世紀「十大謬妄」，以及近代教會的「大背道」，護教反共即是近代教會目前所面對的挑戰。他一方面指出了離道反教的事例，另一方面又強調維護正統信仰的重要，尤其他指出當代面對的是「赤禍橫流，無神論之共產主義之猖獗」，這些都是「撒旦的差役，敵基督的化身」，為了迷惑基督徒，因此基督徒要起來共同打這場仗，毫無妥協的餘地。當然，一切的重點都關注於與共產主義鬥爭上，但事實上，更重要的莫過於指出共產主義滲透教會的情形，包括蘇俄共產國際與東正教的曖昧關係，以及普世教協接受共產國家教會組織為成員，都是「大背道」的例證。他甚至還預言 1978 年將會是世界末日，「1978 年」所指的，即是將召開的第四屆普世教協會議。

因此，真正說來，護教反共欲特別針對的對象，即是普世教協這個在成文秀、王永信等人形容為「大背道」的異端組織（見王永信之《真道手冊》）。成文秀繪製的「歷代基督教會中離道反教的事」中，一切的背道思想或組織最終發展到普世教協，所以普世教協是背道的集大成者，正像萬國教聯把自己視為是對

14 成文秀，《駁復「正告主內兄弟姊妹們教會合一性」書》，萬國基督教聯合會中華民國分會發行，1965，130。



抗普世教協並維護純正信仰的組織一樣，形成了正與邪、基督與惡魔之爭的兩個陣營。在成文秀看來，普世教協不僅有許多歪曲信仰的事實，重要的是他們親共的事例更是比比皆是，這使得他們罪加一等，成了共黨滲透教會的工具，所以一方面要提防他們，另一方面要打擊他們，因為「基督與彼列有什麼相和呢」，為了維護這純正信仰，也為了反對無神論的共產黨，「護教」與「反共」是一體的兩面，反對普世教協這項任務，基督徒當然是責無旁貸。<sup>15</sup>

## ■ 普世教協的雙重罪名：「背道」和「親共」

這是一場基督與撒旦、真理與假先知、正義與邪惡、有神與無神之爭。成文秀在《共產國際與基督教》一書中，以「基督與彼列有什麼相和呢」<sup>16</sup>來比作基督徒與共產黨的無妥協性，而且，他所言的「共產國際」即是直指被滲透的國際性基督教組織—普世教協，全書即是一一指出普世教協的「背道」和「親共」兩項罪狀。一方面說明普世教協已背離了基本信仰立場，包括表現在對其他宗教的接納和對天主教與東正教的承認上，都一概視為是喪失純正或正統信仰之舉，另一方面則是指控普世教協與共黨的頻頻接觸，甚而同情並支持它們的社會活動，特別是主張中共應加入聯合國之態度，都已明顯地失去了與無神論鬥爭的警覺，間接地傷害了與共產黨對抗的基督徒。<sup>17</sup>

反共神學的主張，其基本出發點即是「愛國」，此國為「中華民國」，所以任何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即是支持「共匪」、支持「無神論」、支持「消滅真正代表中國人的中華民國政府」。因此他們尤其關注的是，究竟國內外一切組

15 成文秀，《護教反共叢談》，31-50。

16 這句用語出現在1965年蔣介石給「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的致詞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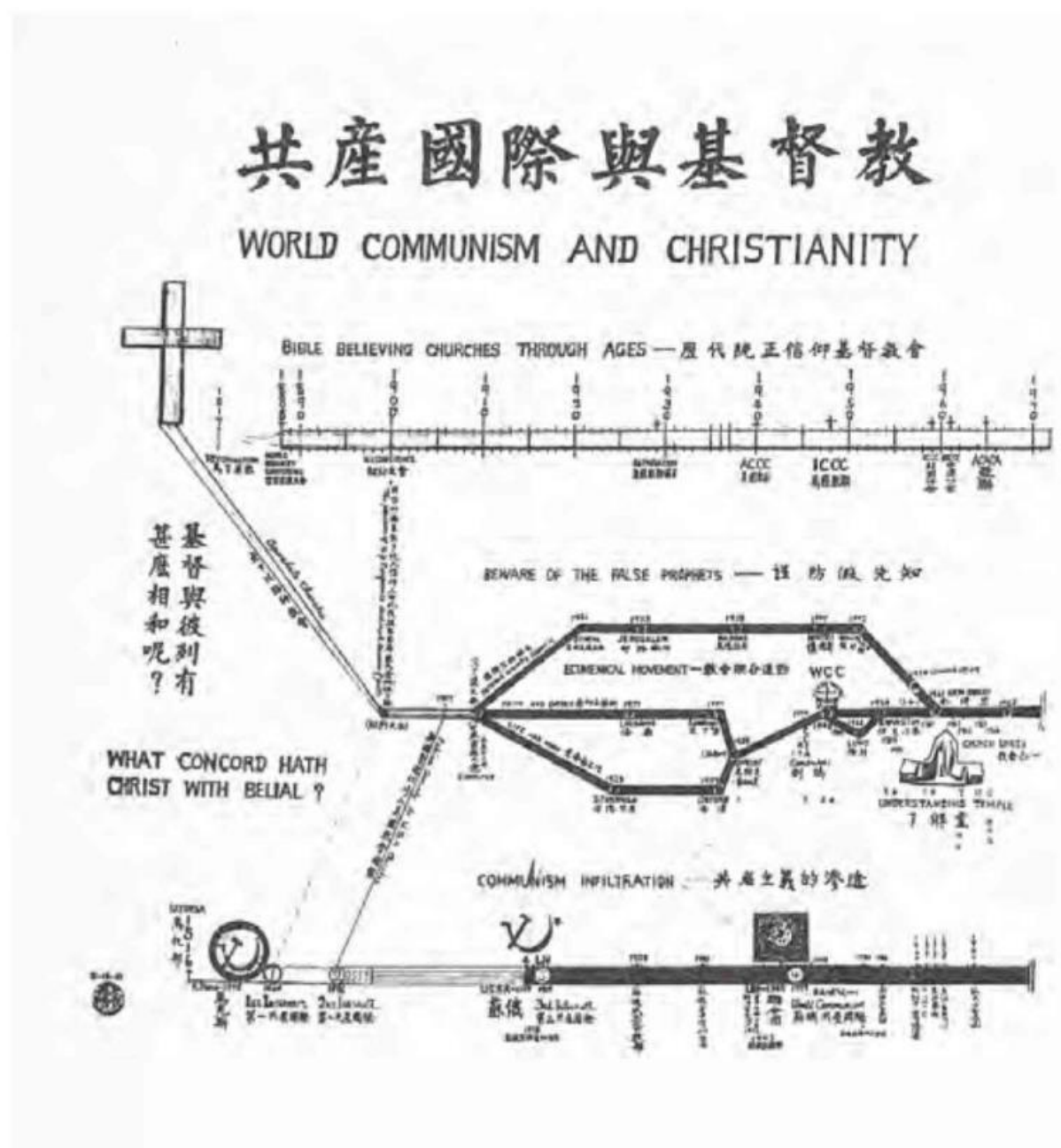
17 成文秀編著，《共產國際與基督教》，出版地不詳，1967，這本書許多的內容是1965年《駁復「正告主內兄弟姊妹們教會合一性」書》的改寫。



織如何看待「中共政權」，要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無疑地即是與中華民國為敵，與中華民國為敵也就是與在中華民國政權底下生活的所有人—包括基督徒為敵。當國際社會上的基督教組織在與對共黨的鬥爭削弱或退讓時，基督教就必然視這些組織是背離了基督教信仰的立場，因為他們已明顯地不再堅持自己有神論的信仰，也不再堅持自己信仰的獨特性，最終，也是最可怕的，莫過於是基督教失去了其真理性，同時亦淪落作無神論者的工具。總之，這是中華民國的災難，也是基督教的災難，在中華民國地區的基督徒更應該團結起來，護教反共，亦即是愛國，愛中華民國政府，並不惜一切與反對中華民國或支持共產黨的人士對抗。

成文秀在《共黨國際與基督教》一書中繪製了一張「反共神學」的地圖，用一種「正統的史觀」來分別歷史上誰是屬基督的（歷代純正信仰基督教會）、誰又是屬彼列的（共產主義滲透下的假先知），他把自馬丁路德改教以降視為一條正統的道路，其中繼承此路線的即是「萬國教聯」以及後來「亞聯會」和「世聯會」，而與其對立的則是第三共產國際滲透的「普世教協」。

成文秀把教會合一運動一概說成是假先知，他指稱這些走向歧路的教會包括從 1910 年愛丁堡的宣教大會開始等，直到形成「普世教協」，這是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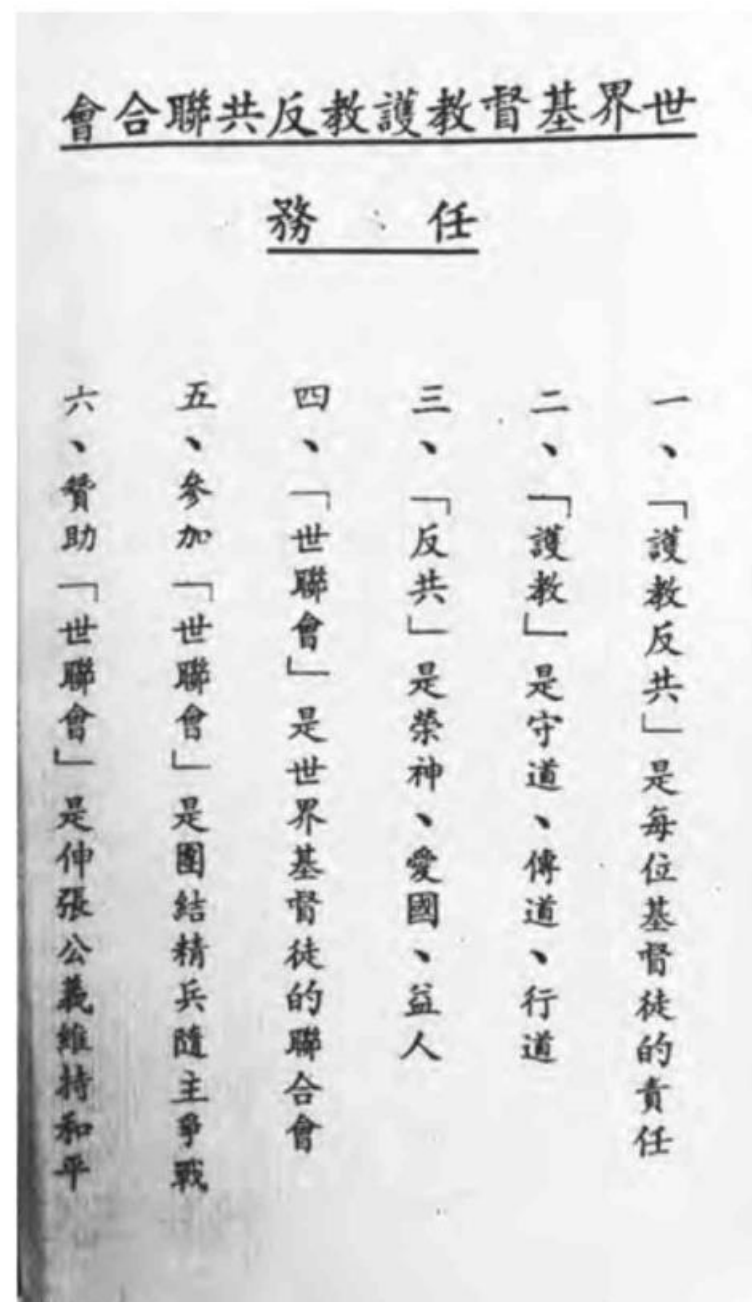
▲成文秀著有《共產國際與基督教》一書，圖示基督教正統路線圖，以說明普世教協的「離經背道」。(作者翻攝自成文秀著《共產國際與基督教》)



群「背離正統」的歧路。他另外還特別提到英國的費邊社，認為它是屬於第二共產國際的外圍組織，這個組織後來滲入美國多個教會組織，也同屬於背道的行列。但所有這些組織最終都走到「普世教協」那裡，所以「普世教協」成了基督教純正信仰最大的敵人，是假先知、是魔鬼，當然路德之前的天主教也屬於此行列。<sup>18</sup>

上述的說詞，最終即是要證明只有「萬國基督教聯合會」才是篤信聖經真理的正統教派，只有這個團體是維護純正信仰的，是護教反共的基督教團體，這個團體所要揭發的即是普世教協離經叛道的事。一方面與共產主義對抗，一方則是防阻教會被共產主義所滲透，這兩項工作正是萬國教聯成立至今堅守的任務和使命。萬國教聯對於護教反共的堅持成了所有護教反共團體最堅定的盟友，在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之時，萬國教聯的會長麥堅泰來臺出席第二屆世聯會主辦的代表大會，在大會中講道標題為「祂必不離棄祂的百姓」，以作為對所有與會者的安慰和鼓勵，表示站在一起，絕不妥協。

1969年，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正式成立，成文秀特別為這個組織寫了一篇文章：〈基督教為何要護教反共？（依據聖經的答案）〉。該文可以說是所有護教反共理論中的代表作，更是一本名副其實的反共神學思想之指導手冊。



▲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的宣言。  
（作者翻攝自護教反共聯合會手冊）

18 這張圖之後在《護教反共叢談》一書中再附上，但也做了不少增列，內容也變得複雜多了，見頁 50。



把異端與共產黨放在同一個問題上來處理，對成文秀而言，打擊異端與打擊共產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護教與反共兩事成了一事，即是當代基督教最為嚴肅的挑戰。這是一場末日之戰，基督徒必須站到真理的這一邊與魔鬼作戰，而且，為真理而戰的時候，其勝利一定屬於純正的基督教信仰這一邊，因為上帝代表著真理。所以成文秀把廿世紀的護教放置在是否成功地打擊共產黨這個惡魔，要成功地打擊此一惡魔，首先是要保護教會免受入侵，一旦被入侵，也就成了異端。根據成文秀的說法，普世教協已然成了一個大異端，它不僅歪曲信仰、立場含糊，而且現在還加入支持無神主義的共產黨，無疑的，在維護基督教信仰的立場上，普世教協已然成了一個必須嚴厲對付的對象。因此，反共與護教也就取得一致。

成文秀列舉了許多不願參加護教反共的理由並一一駁斥，並宣稱所有的反駁都是以聖經為根據。所有的辯解中，即是主要將共產主義說成是撒旦，從聖經找到支持對抗撒旦的理由。成文秀說，聖經已預言末日將看見一個大一統的教會與大一統的政府，前者即是普世教協，後者即是共產國際。從種種跡象顯示，這兩個力量結盟將是世界末日的到來。他解釋帖撒羅尼迦後書二章七至十四節時說：

保羅也告訴我們關於一個可怕的敵基督的權力將臨到地上，去欺騙那些不崇奉基督真理的人們。因此之故，神就使他們受迷惑而信從虛謊。任何研究共產主義的人都知道，這種魔鬼的陰謀，是嚴密地建築在謊言和詭計之上的。共產主義的真正本質就是欺騙。聖經說人民之所以相信謊言，僅基於他們遠離真神的緣故。<sup>19</sup>

因此，今日這個世界上，有兩大集團對立存在：一個是自由世界的集團，另一個便是共產主義統治下的集團。前者是站在神的愛的立場，信神、愛神、靠神；後者則是站在魔鬼撒旦的恨的立場，反對神、不要神、倡導無神論，一切行為都以恨為出發點，與上帝無所不包的愛是不可相容並存的，是勢不兩立的。所以說共

---

19 成文秀，《護教反共叢談》，18-19。



產黨的所作所為，無一不違反上帝的道理，公然與上帝為仇。「世界統一教會」（普世教協）和「世界統一政府」（共產國際）已準備聯手起來，它們已對世界和基督徒構成了重大的威脅，所以基督徒要起來「為主爭戰」、「為真道打美好的仗」。

在護教反共時期，沒有哪一位的反共神學思想可以說多過於成文秀的，畢竟他還是非常貼近麥堅泰以及熟悉美國基要派的一些末世論思想。至於其他那些未曾讀過或具備神學的黨國基督徒，他們的目標並不全然鎖定在普世教協的身上，他們更多關心的是與「共匪」有關的課題，尤其是關注哪些團體與大陸共黨有接觸，或發出支持的言論，都一概視作是違背反共的立場和原則的。黨國基督徒尤其緊釘著「共匪加入聯合國」的各種舉動上，他們的反共即是想力阻國際社會對「共匪」的支持或接觸。所以，普世教協支持共匪，普世教協當然是有問題的。黨國基督徒即是負責緊盯著國內外基督教團體或個人有無與共匪接觸的情況，把阻撓共匪與基督教接觸的理由提高到護教的層次上，將之視為一場聖戰，基督徒沒有選擇，要麼就是站到全面反共這裡，要麼就是出賣信仰、出賣基督。因此，只有「反共」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反共是基於護教，當然，如果不反共就是背道。

## 福音傳遍天下，大陸也就光復

關於「反共神學」，我們可以從以下的兩段文字來看看他們是怎麼說明的：

現代的共產黨，到底是什麼呢？一點都不必猶疑的說：牠就是魔鬼撒旦的化身的偽裝，牠利用唯物論、進化論等，在世界人類面前想要否認上帝，更不承認上帝是創造萬物及人類的主宰，牠以剩餘的價值，階級的鬭爭，來泯沒了人類的尊嚴和神性，牠把人整個當作無知覺的機械看待，牠無道義、無倫常、無家庭、無感情、無人性、無自由、看人不如牛馬禽獸，能



工作者存，不能工作者殺。除信牠唯物論進化論者外，其餘均以反革命論。

又說：

共產就是魔鬼的化身，所以牠摧殘教會迫害信徒，我們要護教反共，就是對魔鬼的，所以耶穌基督就是要打傷魔鬼的頭，牠是為善惡之爭而來，牠也是善惡之爭的精兵元帥與共魔戰鬥……這是我們今天護教反共的唯一任務。

這段話是收錄在張靜愚主編的《陽明山靈修集》一書中，講者是時任基督徒救世服務總會會長的侯天民。侯天民的演講題目非常有趣，叫著〈耶穌降世與我們護教反共〉，他亦是積極參與護教反共組織和活動的黨國基督徒，和成文秀一樣於1969年以黨務顧問的身份出席了國民黨第十次黨員代表大會。侯天民特別把基督教信仰的使命定義在「反共復國」的理想上，他說：

現在大陸上的反毛反共的組織，到處皆是，一旦我軍民反共，號角一響，大陸反毛的組織必揭竿而起，成為內應外合，強大反毛的聯合陣線擊敗毛匪，光復大陸，重建舊有的河山。基督徒們！我們起來；我們起來；起來護教反共，靠著神的大能追隨我們的蔣總統，早日收復大陸，阿們！<sup>20</sup>

另外，國語禮拜堂的大老吳勇曾講過一篇標題作〈光復大陸〉的證道，他的說法亦相當有趣：

關於光復大陸的問題，可以從許多角度看，有的從政治、軍事、經濟看，我們卻要從聖經看。從前神應許要領以色列民入他們列祖之地，神既然這

20 侯天民，〈耶穌降世與我們護教反共〉（1969/2/24），張靜愚主編的《陽明山靈修集》，出版地和出版社不詳，1969，55-62。侯天民（1900-1990），遼寧北鎮人，革命實踐研究院十五期結業，他具有牧師的身份，屬於基督復臨安息日會。不斷迫使長老教會退出普世教協的內政部民政司官員康峻壁即是他教會的長老。



樣應許，果然事情也就這樣成就。雖然從聖經找不出光復大陸的應許，但總可以找出許多理由，大陸的光復是必然的。……

既然福音要傳遍天下，大陸不光復，福音怎能算是傳遍天下，所以說福音傳遍天下是神的旨意，大陸的光復當然也是神的旨意。<sup>21</sup>

可見，護教反共在反對共產主義或唯物主義的思想或信仰鬥爭上，目的即是反攻大陸；無疑地，這也正是蔣介石念茲在茲的。所以反共神學絕不會是單純的信仰鬥爭，在反共的論述之下，它的具體目標即是為國民黨收復失土，信仰的動機與政治動機無法分離。

張靜愚也說得很清楚，基督教在一邊，共產黨在一邊，是真道與邪道之戰：

真道之對敵是邪道，共產主義就是邪道，共產黨就是惡魔，因為共產黨是無神主義派，就是敵基督，敵神的惡魔。共產黨嗜好戰爭，積極侵略，殘害民命，逼迫教會，破壞道德，毀滅文化，以及行各樣的惡事，凡屬神的人，都是基督的精兵，應以反對共產主義，消滅共產惡魔，保存真道的信仰，救護世人的靈命，為其唯一職責，如此擁戴我們和平之



▲護教反共時期的教會詩歌，以拯救大陸受苦同胞。（作者翻攝）

21 吳勇，〈光復大陸〉（1969/1/13），收入《陽明山靈修集》第四輯，11-16。



君，耶穌基督，以達成世界真正的永久和平。<sup>22</sup>

反共是不是政治，當然是政治；基督徒反共是不是政治，當然不是政治而是信仰。在此獨裁統治時期，這種想法或說法都是含糊或不准深究的，也許，還真的沒有人願意說得太明白。

## ■ 基督徒要向共產主義即魔鬼宣戰

在第一屆世聯會正式召開之前，作為籌備委員會委員長的張靜愚先生就於11月先在中國廣播公司向全國教會廣播此次會議的重大意義，他提及：

我們基督教會就是反共的大本營，基督徒就是基督耶穌的精兵，應當站在反共的最前線，與惡魔奮鬥。

張靜愚認為，反共的行動是在維護純正的信仰，理由是當時已有不少的基督教組織已被共產黨所滲透和利用，他們甚至披著宗教的外衣來協助共黨進行赤化和顛覆的工作，這些基督教組織在信仰的立場上已喪失其純正性，向無神論妥協，甚至協助無神論的共產黨加入國際組織，等於罔顧了信仰的堅持與責任。因此張特別呼籲，要全世界的基督徒團結起來，共同負起護教反共的任務，因為保守一種純正的信仰，即意味著必須站在與共產黨無神論的鬥爭對立面上，教會團體應無條件地加入反共的行列，將自己視為是為基督的真理作見證，如此才能真正實踐耶穌的教義，與共黨魔鬼爭戰。<sup>23</sup>

22 張靜愚，〈聖經是世界文化的源流〉（1968/12/21），收入《陽明山靈修集》第四輯，4。這個題為「陽明山靈修集」的集子出版了第五輯。這個集子的特別之處在於本書是由國防研究院出版的，依該書的序言說到，國防研究院定期每兩週就有靈修會，是由同學中的基督徒組成的，可見這些聚集在一起的「軍人基督徒」是如何成功地將黨國的信仰與基督教信仰融合在一起。

23 〈世聯會籌備委委員長張靜愚對全國教會廣播〉（1969/11），收入《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



在臺北中山堂的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開幕致詞中，理事長張靜愚也對啟示錄做了解釋，他說到：

大龍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啟示錄十二章九節，今日共產主義最後的目的在於消滅宗教，固要拯救無神論共產主義下的世界乃基督徒的神聖使命。<sup>24</sup>

他也指出，約翰福音十章耶穌所說的盜賊已經來了，它即是共產黨。而且，他亦引啟示錄十七章三節，說那「穿紅衣的女人」代表了共產黨，共產黨要喝基督徒的血，將要與羔羊作戰，但是萬主之主必勝過共產魔鬼。<sup>25</sup>

在世聯會於韓國漢城舉行世聯會第三屆代表大會的致詞中，張靜愚以〈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之任務〉為題演講時，又把啟示錄的魔鬼解釋為共產主義：

魔鬼是什麼呢？根據啟示錄的記載，魔鬼就是那條大紅龍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那麼吼叫的獅子是什麼呢？如在啟示錄所描寫的，可能就是那一個從海中上來的獸，就如今天的共產黨徒，他們具有魔鬼給予的大權柄。現在你們可以看見共產黨徒們滲透在世界各國各地尋找可以吞喫、毀滅與虐待的人。假如我們要避免共產黨滲透與顛覆的威脅，我們基督徒必須堅固地團結成為忠實的基督精兵，在吾主耶穌基督的統率之下與邪惡的共產主義戰鬥到底。<sup>26</sup>

神召會的李廣業在第七屆亞聯會年會在東京召開時，特別說明了不管是亞聯會或世聯會，其「中文」上有「護教」兩字是特別重要的，這個字並沒有翻譯成上述兩個組織的外文名稱上。他說護教和反共是一體的兩面，積極的意義是護

---

合會代表大會記錄》，10-12。

24 《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第二屆代表大會紀錄》，1972/10，29。

25 《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會訊》第8期，1972/2/20，4。

26 《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會訊》第24期，1975/9，11。



教，消極的意義是反共，共產黨徒者都是不信上帝的，他們甚至用其邪惡的力量來誘惑人心，所以必須深切地了解這是一場屬靈的爭戰，是與管轄幽暗世界的屬靈惡魔爭戰。李廣業特別強調了「信與不信的不要同負一轡」，因此在面對共產黨及其同路人上，基督徒沒有任何妥協或退讓的理由，他認為只要「高舉基督的真理和教訓」，就能攻破敵人的營壘，勝利最終是屬於基督的人的。<sup>27</sup>

胡鴻文在為《共產黨就是共產黨》一書寫序時說到：

基督徒為維護純正信仰，並保持教會的純潔，必須要反共，就歷史發展的軌跡說，反共首先是宗教上的事，以後方涉及政治，但仍以宗教的意義為先，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護教必須反共，反共有助護教。所以護教反共問題與每一教會有關，也與每一基督徒有關，這是非常清楚明白的。

我國為一堅強反共的國家，我們基督徒的反共是為了護教，亦是為了愛國。<sup>28</sup>

「愛國、反共、護教」三者聯繫在一起，無疑地，所有的判斷都具體地反映在反共與否的態度和行動上，因此，若不反共，也就是不護教（亦即信仰不純正），當然也是不愛國（亦即親共／容共）的表現，基督徒在這個意義上必須是無條件反共的，同時所表現出來的，當然也就必然是愛國的。

## ■ 總統指示防範國外教會滲透份子

基於護教的理由，所以對於任何因為以宗教不涉入政治之由而不加入反共之

27 《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會訊》第8期，1972/2/20，10-12。

28 胡鴻文，〈序〉，史華茲著《共產黨就是共產黨》，方清卿譯，臺北：（私人）方曾東湖出版發行，1983。



列的，都遭到批評。林治平在為《馬克思與撒旦主義》一書中譯本寫序時，即是附和了該書作者論述，認為馬克思是「撒旦會」的信徒，正是這個前提使得基督徒當然必須與馬克思共產主義宣戰，因為共產主義代表了一種無神、唯物、仇恨為根據的信仰，所以沒有理由不反共的。林治平表示：

……那麼多人對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心存幻想，甚至於有些基督教界的人士，竟然也會不察於此，以政教分離似是而非的天真想法，對反共大業保持冷漠的超然，這種態度對於世界人類、國家民族的未來發展亦大有傷害。<sup>29</sup>

儘管張靜愚特別強調亞聯會和世聯會都不是政治組織，可是卻在世聯會的通訊上不經意地透露出蔣對他推動的護教反共不僅知情，而且還是遵照蔣的指示來進行的：

籌劃世界基督教反共活動：總統對護教反共工作即對國外教會滲透份子處理辦法屢有指示。<sup>30</sup>

這個說法應該是可靠的，以下的事可以作為佐證。

萬國基督教聯合會會長麥堅泰與蔣中正的互動，最早可以追溯到 1961 年。當時麥堅泰一行人到臺灣欲求謁見蔣，說明了萬國教聯這個組織的特性，明確地表示堅定地反對共產主義和無神論，還特別表明反對親共的教會團體支持中共加

29 作者魏恩波 (Richard Wurmbrand) 是一位從當時共產國家逃亡到美國的，經常受邀講述其在共產國家所遭遇到的對待，曾在臺主辦超大型的「殉道者之聲：反共佈道大會」，他是在葛理翰來臺之前最為知名的外國佈道家。他另有一本反共書籍在臺翻譯出版：《為基督受難》(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會譯)。《馬克思與撒旦主義》此書為真理之聲於 1982 年出版，但沒有交待譯者是誰，出版社的地址和負責人都沒有詳列出來。比較特別的是，這本書徵得兩位著名的基督徒寫序，分別是阮大年和林治平，他們兩人都與中原大學關係密切，前者曾擔任校長，後者在該校任教超過三十五年，在當時基督教界都算得是相當著名的人物。阮大年還曾被護教反共聯合會邀請作護教反共方面的演講，見《聖經與信仰旬刊》第 100 期，1984/7/20。

30 《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第一屆代表大會紀錄》，1969/11，35。



入聯合國，蔣介石在總統府接見了他們。值得注意的是，由唐縱和張寶樹提呈的公文上，除了介紹該組織的性質與內容，尤其提及了曾經派遣曾約農、張靜愚、成文秀三人參加萬國教聯於 1960 年 9 月於漢城召開的第四屆大會。<sup>31</sup>

這三位當然是蔣可以相信並具外語能力的基督徒，成文秀作為麥堅泰在臺的代理人，出席了該次會議當然並不意外；曾約農曾擔任過東海大學校長，因其姐姐曾寶蓀的關係與蔣的互動也算良好，但他對護教反共並未很投入；其中值得注意的當然是張靜愚，從與萬國教聯接觸到於 1965 年成立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麥堅泰的基要派神學、政治和組織動員，應該是提供了很多的借鏡，兩人雖屬不同組織，但合作和往來甚密，主要是他們的意識形態路線是一致的。甚至可以這麼說，由於張靜愚沒有接受過任何神學教育，其種種的反共神學思想以及對聖經的解釋，事實上是從麥堅泰那裡吸收過來的；不同於麥堅泰所處的北美神學環境，其基要派立場是從與自由派的鬥爭而來的，維護的是教會的正統信仰，而張靜愚的基要派形成是以黨國意識形態為主導的，以反共為優先，所以與普世教協、長老教會形成對立，並非真正地是為了教會的正統信仰，其目的主要是使黨政可以更為有效地監控教會或分化教會。

所以，張靜愚上述的表示絕對不是空穴來風，他在別處也透露了 1969 年將亞聯會擴大為世聯會，同樣是遵照蔣介石的指示辦的。<sup>32</sup> 一切護教之詞，亦是配合政府反共復國大計為要，對黨國基督徒而言，是責無旁貸的天職。<sup>33</sup>

事實上，國民黨黨國系統對基督教的監控和不信任一直都存在，以一個例子來說明。1952 年 2 月 20 日由張其昀、谷正綱提呈給蔣的一封信報告，提到的

31 公文號「臺(50)央秘字第 058 號唐縱、張寶樹呈」(民國 50 年 4 月 5 日)，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檔案編號 ntul-kmt-zp50-0044。

32 《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會訊》第 17 期，1973/8，16。我們都留意到張靜愚也是國際基甸會中華民國地區的理事長，有趣的是，他對此組織的發揮應用到「空飄聖經到大陸」的工作上，此舉相當有創意，而非只是各大飯店住房放置聖經而已。參見《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會訊》第 21 期，1974 年 12 月，3-5。

33 《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會訊》第 20 期，1974/6，8。



內容是：

據報有基督教傳教士入部隊、學校佈道，有礙軍中保防工作與政治教育。為防止匪諜利用掩護非法活動起見，經職等擬具防止對策 10 項，提中改會第 295 次會議通過，並擬密飭各黨部注意執行時之技術運用外，謹將本案報請鑒核。<sup>34</sup>

目的以「防止匪諜利用宗教組織掩護在各學校發展組織」。文中提到幾項實例值得關注，例如說到一些敏感的事情：

有某些牧師提及「美國直接與臺灣人民發生關係，將來的金援要透過教會不經過政府」。

反對「青年團契」之組織，因為它們影響青年學生政治信仰，有為匪諜掩護之嫌。

某些外國教會組織提供獎學金赴國外就學，形成了對國家栽培人才的競爭。

要查明宗教團體經費來源有無政治背景。

這些例子說明了，阻擋國外基督教團體被共黨所利用之最為有效的策略即是反過來利用它，同時，也可以借助於國外反共的教會組織之力量（如萬國基督教聯合會），不是交付他們來領導，而是自己另起爐灶，張靜愚與護教反共組織的成行，恐怕與這些問題都有關。

總之，成文秀和張靜愚的反共神學確實與萬國基督教聯合會和麥堅泰有關，兩者都受到美國極端基要派組織和神學影響，把共產主義解釋為撒旦魔鬼、視普世教協是離經叛道、攻擊天主教為異端、對付種種與之不同調或相異的神學立

---

34 「臺(41)改秘室字第 0082 號張其昀、谷正綱呈」(民國 41 年 2 月 20 日)，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檔案編號 ntul-kmt-zp41-0067。



場、全都扣以新派或自由派之名，並在基督教的教義上尤其突出並主張「聖經無錯誤」，以標榜自身才是正統的。這些舉動正是為何蔣介石的生活總是刻劃他對聖經無上的崇敬：

我甚喜悅勸人讀習聖經，因為聖經就是聖靈的聲音，發揚上帝的公義和祂的慈愛愛人。救主耶穌基督捨身流血，拯救一切信祂的人，祂的公義使邦國高舉，基督是一切自由的磐石，祂的愛能遮掩一切過錯，凡信仰耶穌的必得永生。

無疑地，護教和反共的大軍需要元首，更需要「正統的思想（神學）」。「對蔣介石這麼一位基督徒的表率、每日讀的那本聖經之維護，就是維護蔣的信仰，當然，這樣的責任與義務也就成了忠黨愛國的黨國基督徒肩負起來的使命。

## ■ 反共—復國—擁蔣

反共神學除了把目標置於反攻大陸的問題上，仍必須有一位思想的導師和追隨的對象。無疑的，蔣介石即是護教反共的領袖和思想家，他是這一場與共產黨末世戰場的先知、領導人和救星。在《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代表大會紀錄》的內頁開頭，即以經文（以弗所書六章 10 至 17 節）加諸在蔣的歷史使命上，蔣被視作是基督教反共戰爭的偉大領袖，黨國基督徒對蔣的追隨既是政治的也是宗教的。這一段文字寫著：

蔣總統，中華民國的領袖，特向本會成立大會致電，祝賀成功。本會同人深信追隨 蔣總統在基督的啟示下，必能達成護教反共的神聖任務。

世聯會一方反共，一方表示對蔣的擁護。反共神學對於蔣的推崇，是將宗教與政治領導權等同起來的，蔣的反共領導性不容質疑，才可能突出其在護教中的地位



和作為。世聯會馬祖分會曾於會議臨時動議中一致起立通過「恭請總統蔣公競選連任」，類似這樣的「公開表態擁蔣」的言論非常地多。1972年5月，張靜愚以世聯會理事長身份致電賀蔣連任，字裡行間都詮釋出蔣的「類神格」之形象：<sup>35</sup>

總統鈞鑒：欣逢鈞座就任第五任總統，繼續領導反共復國大業，以世界反共之先知，掌東方審判之火炬，公義伸張。邪惡消亡。反共復國，更獲保障，兆民利賴，普世歡揚。謹掬赤誠，奉申賀忱，伏維睿察。

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理事長張靜愚及全體會員敬上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五月十五日

反共神學把蔣介石視為基督徒的精神領袖，把蔣所定調的復國大業作為基調，一切即聽命於他，任何質疑他的，無異於視作異端。反共神學把一切關於基督教的信仰和堅持都與反共劃上等號，無例外的，這也同時把蔣的反共復國言論視為是對聖經或基督教信仰解釋的唯一之權威。因此，自然地反共神學就與擁蔣聯繫起來了。

在擁蔣之活動中，以基督教名義舉辦祝壽晚會，場面最為盛大的是在1966年。時為慶祝總統蔣公八秩華誕，中華民國各基督教會及教會團體，於10月29日下午七時半起，假圓山兒童樂園的體育館舉行祝壽晚會。參與這個祝壽大會的基督教團體包括：中華民國基督教協會、美國佩帶聖經會、臺灣長老教會、基督徒救世服務總會、基督書院、亞聯會中國分會、萬國基督教聯合會、浸信會、衛理公會、衛理堂、聖公會、信義會臺北區會、臺北青年會、女青年會、聖經公會、臺灣神學院、東吳大學、基督復臨安息日會、芥菜種會、福音報、論壇報、協同會、宣聖會、宣道會、基甸會、便以利會、基督教歸主協會、福利會、聖教會、中國主日學協會、中國福音聯誼會、基督教救世傳播協會及信友堂等卅三個教會

35 《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中國總會會訊》第10期，1972/5/30，28。



及教會團體所籌辦的。

大會由陳維屏牧師及陳溪圳牧師擔任主席、譚畏民牧師司儀，張啟芳長老用閩南語翻譯。鄭錦榮牧師及卓忠信牧師負責聖樂指揮，並由基督教救世傳播協會及臺灣省警察學校的樂隊伴奏。陳維屏牧師在致詞時說：共產黨是最反對基督教的，因為基督教的信仰是他們最大的剋星，而且只有總統蔣介石的領導才能戰勝赤色妖魔，稱蔣是中國的拯救者。更有韓國代表白永燁致詞博得了滿場的喝采，因為他說：明年蔣華誕時，將要回到大陸去慶祝了；菲律賓代表吳景禧呼籲大家為蔣代禱，並引領與會眾人，高呼：「蔣總統萬歲，基督教信仰萬歲」。<sup>36</sup>

在歌曲方面，除了由淡江中學、滬江中學、金陵女中、育英中學等四個教會學校的學生在大合唱中高唱「領袖萬歲歌」外，最為特別的是全體與會者唱「我愛中華美地歌」，其中有一節的歌詞內容是：

領袖蒙主扶助，全國成主國度，眾民得主保護，普天同慶。

最後還放了基督教電影「聖袍千秋」，以頌揚蔣的「聖袍千秋」：英明和偉大。

為恭祝蔣八十七歲華誕，基督教界於 1973 年 10 月 30 日在臺北國父紀念館舉行慶祝，大會主席陳溪圳說：

基督徒應當愛主愛國，效忠領袖，擁護政府，抵擋共產邪說。

臺灣信義會張齊堂監督說了那麼一段：

神永遠不失敗，抵擋神的永遠不能成功，我們偉大的領袖已把握住這個真理，從他過去的經驗也得到這個答案。總統以基督服務犧牲的精神來領導我們，他像被選召的先知，預先知道世界的動向，他也像使徒，為上帝的

36 《基督教論壇報》，1966/11/06。



真理奮鬥，總統愛國愛神，他的信心及責任感並非任何人可及之。<sup>37</sup>

蔣介石於 1975 年逝世，無疑的，他的離世對護教反共的事業產生極大的打擊，張靜愚以代表世聯會的理事長身份向蔣夫人表達弔慰之意，原函分錄如下：<sup>38</sup>

夫人尊鑒：

總統蔣公蒙召歸天，國喪元首，世失明燈！漫漫長夜，哀哀羣黎，仰瞻遺容，五內俱焚！伏思

夫人翊贊護衛，伉儷情深，自更傷感逾恒，惟念信眾可慕啟迪，世人做醒晨鐘，務請夫人以救世為重，節哀順變。本會所屬國內外各總分會誓以至誠盡心盡力護教反共，遵行故總統遺訓，撲滅邪惡毒氛，歸榮耀於上帝，慰

故總統在天之靈，謹乞

垂察，無任企禱。專此奉唁敬頌

慈安

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理事長 張靜愚 敬上

六十四年四月十一日

中原大學校內於 1976 年所建成的「中正樓」，即是張靜愚囑咐命名，為紀念蔣介石的偉大之意。<sup>39</sup> 不僅如此，張於 1966 年在文化大學的中華學術院中成立基督教研究所時，曾規劃設立一個以基督教書籍為主的文庫，就將之命名作「中正文庫」，處處都想起護教反共領袖音容宛在，可謂用心之極。

在蔣介石的安厝大典上，基督教界傾巢而出，組了二千人的大詩班，中華福音神學院師生由張茂松及林治平帶領，時為 4 月 16 日。東海大學董事長查良鑑

37 《基督教論壇報》，1973/11/04。

38 《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會訊》第 23 期，1975/5，5。

39 〈張公靜愚先生行述〉，《一束思念—張靜愚先生追思紀念集》，4。



獻詞，同樣是一篇對蔣的歌頌，伴隨著詩歌歌詞中呼喚著「救主，救主，請聽我禱告，既有別人被主恩召，莫把我棄掉」，頓時不得不令人覺得好像被蔣遺棄那樣，成了孤兒，正如配合起查良鑑的獻詞內容更感到不能沒有蔣的感受：

對於失去這麼一位革命導師及真理鬥士，我們的悲傷不止於哭泣，我們的感恩不止於跪拜，我們所應該有的行動，更不止於聚會。我們今後所應做的，就是要時刻祈求上帝賜下智慧和毅力，來完成 蔣總統所未竟的志業。<sup>40</sup>

其意即是期待基督徒最終也實現蔣的遺志，助完成統一中國之大業。

1976年4月4日蔣介石逝世週年紀念日，中華民國基督教協會在國父紀念館安排了安息週年禮拜，大會主席陳溪圳致詞，表達了對蔣的懷念與崇敬，但最精彩的莫過於他對蔣的信仰與反攻大陸的關係做了極為巧妙的結合。陳溪圳說到：

第一、他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在信仰方面為我們豎起標竿，讓我們追隨他，效法他對基督的虔誠信仰。

第二、他對國家民族及國民革命偉業，有無比的貢獻，使我們永難忘懷，而且他為我們國家、民族、及教會奠定了復興的基礎，我們深信大陸教會，終有一天能夠獲得傳福音的自由。

第三、他反共堅決，是現代黑暗世界中光明的燈塔，引導全世界人類走向光明。我們都知道，蔣總統對於共產無神邪說，有最徹底的了解、經驗和警告，是其他各民主國家領袖，所不能相比的。

我們今天追念總統蔣公，最大的意義，是要我們實行他的遺囑，即是：第一、

---

40 〈總統蔣公安息禮拜〉，收入於重提（本名：施卓人）編著，《雲彩》，臺北：中國平信徒傳道會發行，1976，125。



光復大陸國土，第二、實行三民主義，第三、復興中華文化，第四、堅守民主陣容。<sup>41</sup>

陳溪圳的致詞是非常精確的，全部重點都說清楚了，不管從何種角度來說，這位北部長老教會最懂得讚頌偉大領袖的牧師，他的這篇致詞是對蔣介石的基督教信仰以及黨國基督徒的反共神學做了極為簡要和準確的描述。基督徒在尊蔣的立場上，也就是要追隨或實現他的理想，他的訓示就像是保羅要我們「效法基督」那樣地「效法蔣公」、「追隨基督」那樣地「追隨蔣公」，基督徒即是以蔣的遺囑為念：第一、光復大陸國土，第二、實行三民主義，第三、復興中華文化，第四、堅守民主陣容，以信仰蔣介石的上帝為表率。

護教反共核心組織一世聯會，成立於七十年代，在面臨一系列外交風暴前夕的臺灣（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1972年尼克森訪問中國並發表上海公報），或許可以理解作先知先覺，也可以理解為力挽狂瀾。事實上，這一連續的挫敗不僅在國際上宣佈國民黨爭取中國正統的地位已失敗，甚至進一步地打擊護教反共運動的士氣，所以1973年將反共與擁蔣的活動結合在一起更見其必要，以堅固蔣的領導威望。

無論如何，基於對反共理念的堅持，反共成了判斷一切的標準，包括了愛國和愛教，都必須在反共的前提下予以實踐。隨著大陸政權的易手，國民政府到臺灣之後實行戒嚴，臺灣政治的發展差不多都在此氛圍之下，甚至反共成了鬥爭異己的手段，目的即是擁護蔣介石及其國民黨政權的主導地位。

在這種情勢之下，國外相關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或同情具有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傾向的基督教團體，一概地成了拒絕往來戶，甚至以反共與否為由判斷這些教會組織的正當性和神學立場，首當其衝的，在國際上具有強大組織力量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督教團體有接觸的普世教協當然成為一個反擊的目標，一方面聯繫起與之相抗衡的基督教團體和教會，另一方面則拒絕任何略對政治表達意

---

41 〈紀念蔣公安息週年〉，重提編著，《雲彩》，137-138。



見和帶有支持反對勢力的組織和思想。總之，任何的基督教團體或組織，若是不站在一致反共的立場上，都成了可疑的，甚至需要與之劃清界線的。

還有一項是，反共神學堅持「敵我分明」，只要反共，就是站在我這一邊，凡是不反共的則是站在敵人那一邊。所以反共這邊永遠是對的，不管他們如何解釋聖經，他們如何表達對神學或信仰的看法，都可以站在不敗之地，沒有人會質疑，甚至會無條件接受。相反的，要是站在他們的對立面，無論怎麼說，聖經、神學、教義等信仰問題都一概是錯的，在反共的立場上出現絲毫軟弱或與反共立場不同的，任何神學的辯解已不可能。成文秀曾就此批評小群教會：

不參加其他教派組織，亦不介入任何政治立場，自視為出世之超然立場，殊不知基督徒並非完全超凡脫俗而避世獨居者，豈可沒有國家民族觀念？我們若不能愛與我們有切身體察所看見的世上國家，如何能愛那我們所不能看見的天國呢？<sup>42</sup>

這樣看來，基督徒只有一種選擇，或根本就不存在著選擇，只有全盤接受反共神學的立場才是正道。

因此，所謂的反共神學，必然包含了「反共—復國—擁蔣」這三個元素在內，而且這三個元素是完全結合在一起的，勉強地可以說它是反共神學的三位一體。這三個元素把護教反共的構想與活動具體而為地變成了擁護蔣介石的領導，最終，以蔣的意志和做法為準，凡是對蔣的理想不予認同的，在其神學意義下將會被質疑其信仰的純正性，因此，爾後種種表面基於對信仰純正性的種種維護舉動，其背後實質的即是鞏固蔣的意識形態和領導。

反共必然是擁蔣，因為蔣反共，而且是徹底且堅決地反共；反共是為了復國，因此任何與復國的想法不一致的，即是在反共的立場上出現鬆動或妥協，而且，復國的無異議性即是不容許任何對蔣的領導的質疑，所以復國即等同於統一，相

---

42 成文秀，《護教反共叢談》，63。



反的，不是根據復國而是以其他的方案來理解臺灣的地位的，即形同於異端。復國是蔣的主張和理想，要復國必然要反共，反共的目的即是復國，蔣即是領導反共和復國大業的先知和領袖。這種種的「純正性」神學主張，正是造成了對普世教協以及與普世教協有任何聯繫的教會的懷疑，而且，從無法容忍「容共」到無法接受「自決」，都是因為違反了「反共—復國—擁蔣」反共神學之三位一體基本教義，只是護教反共者在論述的時候，往往都會說他們是如何根據聖經維護純正信仰，以「打擊異端（新派）」之姿，來維護「反共—復國—擁蔣」的政治正確，長老教會之後在思想和行為上，正是在這個意義下成為名副其實的「異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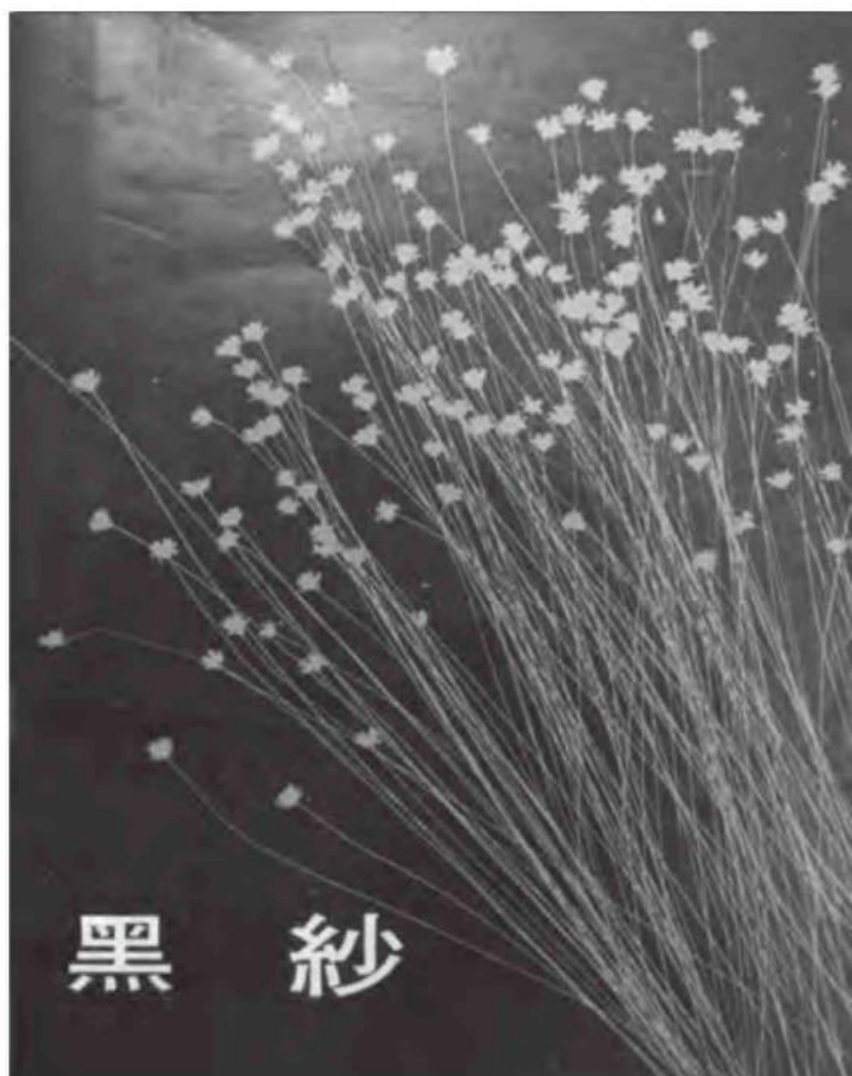
## ■ 張曉風的《黑紗》

1975年蔣介石逝世，在臺灣島內引起巨大的騷動，《宇宙光》第二卷第五期做了一個專題「追思總統蔣公專輯」。雜誌主編林治平寫了一段感人至極的話：<sup>43</sup>

……他竟去了，我們偉大的領袖總統 蔣公中正，居然離開他的國、他的民先我們而去了，我忽然明白了昨夜的風雨雷鳴，一顆偉大的巨星從地上殞滅了，他受盡了世人無法承擔的磨難，嘗遍了這一個世紀的辛酸，一身承擔了人類的十字架，雙肩背負著你我的重擔，他就這樣的去了，他就這樣沉默的為中國、為世界走到了各各他山的盡頭。是的，他的一生是各各他山的十架道路，這條路耶穌走過了，歷代的聖徒走過了，國父孫中山先生走過了，如今蔣先生也走過了，而未來—誰願繼續走上去呢？

43 《宇宙光》第13期，1975年5月。林治平另以〈誠實的追求者〉為標題，收入朱朱等著，《我找到了愛》，臺北：宇宙光出版社，1975。





▲► 《黑紗》是一本「崇蔣」之作，《另一位見證人》巧妙地避開了崇蔣之嫌。（作者翻攝）

同一期的追思文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篇題為〈黑紗〉的文章，作者是張曉風，在所有反共神學的擁蔣文字中，都沒有像〈黑紗〉那樣地打動人心。之後，這篇文章與其他的悼念文集結成一本小書《黑紗》，這本書在「國喪」中所刻劃出的那種感人熱淚、那樣地理所當然。<sup>44</sup>書中有一段文字是這樣寫的：

上帝的旨意對大多數的人而言是抽象的，而每一個世紀的偉人都是當代上

44 張曉風，《黑紗》，臺北：宇宙光出版，1975初版。《黑紗》內有三篇作品是先刊於報章上，之後集結出版成書，加上了另外兩篇，以及特別為蔣介石的追思禮拜撰寫的「啟應文」，附在一開始書的扉頁中。該書的出版版次和時間如下：初版於1975年10月出版，印製了5,000本，三個月後再版，印了5,000本，第三版則是半年後（1976年8月），又印了3,000本；四版，1978年4月，3,000本。基督教圈子也出版過類似於擁蔣的書籍，如《飛向慈湖的心》，重提編著，臺北：中國主日學協會，1976，但比較起來，沒有像張曉風表述得這麼露骨的，當然，那也可能是張的文學筆法太好了，其他的人比不上。這本書在多年後就漸漸不再出現在張曉風的著作名單上了，其意甚明。



帝意旨的新版本，蔣中正先生便是這樣一部具體而真實的詮釋信仰的新版本。

作者張曉風的這本小書堪稱是臺灣基督教文學中「擁蔣、愛蔣、崇蔣」的代表性和高峰性之作，亦可以視作是反共神學的文藝大作。

此書以「黑紗」表現出其痛苦之情，即在於蔣的逝世，而蔣的逝世是國喪、是民族救星的隕落。《黑紗》序的一開始是這樣的：

我愛中國，這件事並不可恥。

我愛中國人，這件事也不可恥。

我愛一個把自己給了中國的英雄——我為什麼要隱瞞這種愛？

本書引人注目的是其精心設計，特別在封面後第一頁和封底前配合其書名「黑紗」，書的蝴蝶頁用了黑色薄棉紗紙，以示披麻帶孝之意。而且，全書還加上了略帶有中國風的簡單素描之畫作，使整本書的意境更顯得哀傷。張曉風用了兩種文學手法表現了這種如喪考妣的心情和感受，一是書信體，一是禱文，兩者都是極為私密的語言修辭，所以當然更顯深情。熟悉張的作品的人，都知道她有一本書《詩詩、晴晴與我》，跟《黑紗》的寫作手法一樣，以寫給自己的孩子詩詩、晴晴那般的慈母口吻來表達內心的激動，文字是很感人的，當然也是很煽情的，其實這也無可厚非，那時的情景和氛圍有誰不感傷呢？問題是近乎把蔣給「神格化」，這是沒有受過神學教育的後果。

張曉風被邀請為蔣介石的追思禮拜作一篇啟應文。這篇啟應文是以祈禱文的形式表現的，內容交織著對蔣的人格和遭遇的敬仰和崇拜之意，特別是蔣就代表了中國，他就是中國的道成肉身，蔣是神聖的，也是偉大的：<sup>45</sup>

主啊祢所愛的人睡了

---

45 張曉風，《黑紗》，扉頁。



他曾按照祢的旨意服役了這一代的人  
 他曾以偉人的智慧選擇了僕人的憂勞  
 他曾以英雄的權利選擇了黎民的苦難  
 他的生命在祢面前已焚燒為馨香的火祭  
 他曾完成北伐抗戰  
 求主讓我們也成為戰士 不斷地和罪惡奮鬥  
 以得到真正勝利  
 他曾遭遇險詐和叛離  
 求主讓我們瞭解神聖的事業必須接受孤單  
 他堅持他的信心 愛心和希望  
 他執行了祢所交付的使命  
 而今 人間失去的芬芳在天國盛放  
 當有一天 主啊 我們要在祢的面前相見  
 那時我願說  
 「主啊，我們無愧於祢的名  
 我們已為祢所給我們的中國活過」

這段文字中，張曉風把許多聖經的內容放置對蔣的偉大的人格之詮釋上，在她的詮釋底下，蔣的地位相當程度就是聖經所說的偉大的人格的體現。我們再從她以書信體的方式，用了少女羞澀的口語對「詩詩、晴晴」表達了對蔣的愛戴與崇敬，當然也包括了寫給「蘇」和「江」的：

十年以來，每次我到學校去，車過士林，望見遠山之上樹木栽成的「中正」兩個青色大字，總覺得快樂，他的名字於我們是一個長青的記號。詩詩、晴晴，我愛他。

有一次，他走在我觸手可及的地方，我差不多屏息了，那是在一次晚宴上，每年，他總要設宴招待大專院校的教授，他讓我感到自己的工作是多麼神



聖莊重。

我喜歡你生命裡第一個學會的字是「中」，世界上再沒有一個字比這個字更美麗更深沉的了。<sup>46</sup>

上述這段文字如今讀起來，確實感到肉麻。

《黑紗》這本擁蔣的最偉大之作，事實上是刻劃出了那個年代所有寄望於蔣、並將蔣的信仰做出偉人般投射的基督徒共同的「集體潛意識」。從黨國基督徒那裡所塑造出來的先知和偉人，已深深地將蔣介石的神格烙於無形的崇拜中，越是訴諸於信仰的語言，越顯示出蔣的偉大和無以比擬，張曉風把許多聖經偉大人物的情操和信仰表現都挪用於去詮釋蔣，很難不對此偉人抱以歌頌與景仰的。

可見，在張曉風的眼中，蔣介石的所做所為，像神聖的。他是「殉道者」、「一粒落在土裡的麥子」、又是「約瑟」、又是「摩西」，無疑的，他就是一位聖徒、先知，他的犧牲無異於耶穌的犧牲，而且，在所有偉人之列中除了耶穌以外，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位像蔣介石的一生及其所做所為的了：

許多資料顯示，總統蔣公是熟悉這一段聖經的，他確將自己的一生化為一粒「種麥」，他活著的時候，每一刻都在「捨生」，都在「死」，因此當他「死」的時候，他卻在別人身上獲得了「生」。<sup>47</sup>

說到基督教界中曾經如此刻劃蔣介石的作品，沒有人不會想到周聯華的《另一位見證人》這本書。只有與張曉風的《黑紗》相比較，才能突顯出《另一位見證人》是如何成功地避免了「造神運動」。

被形容作「總統牧師」的周聯華，如此密切與蔣的互動，看來是最有資格寫蔣介石的宗教生活和其人格等方面的。可以想見，當時也必然引起無數的人期

---

46 張曉風，《黑紗》，11、18。

47 張曉風，《黑紗》，23。



待，希望周聯華也可以寫一本類似於《黑紗》的書，或者，周聯華怎麼有理由不寫呢？何況可以將目的放在傳福音，借助一位偉人的形象，傳福音肯定會更有效。

1976年4月，周聯華終於出版了一本名叫《另一位見證人》的書，封面是一張蔣介石坐在書桌上閱讀聖經的照片，書的內頁還是周自己用毛筆寫下書名和自己的名字。大概是經過刻意的包裝，道聲出版社的排版設計夾帶了許多照片，加插在書中的內文中，絕大部份都是蔣介石出殯的照片。全書共六章，目錄如下：

- 第一章 總統安眠的臥室
- 第二章 總統的信主經過
- 第三章 總統的靈性生活
- 第四章 信仰行動的合一
- 第五章 大人物的小故事
- 第六章 總統的神學思想

可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這本書竟絲毫不留下任何給人崇拜蔣介石或神化蔣介石的機會。也許，外界那些黨國基督徒或一般熱心的信徒，都期待周聯華可以藉此機會宣傳基督教，公開蔣的宗教生活無疑地是給人予以崇拜他的理由。但這些讀者的心理期待都在這本書中被拒絕了。《另一位見證人》給人近乎無從挑釁的理由，即在於全書很難找到對蔣近乎神格化的文字描述，果然是一位「讀過神學」的神學家，一位嚴守分際又有智慧的牧師。

首先即是書名，這是一個與基督教的信仰原則和立場相合宜的標題。從標題上已清楚說明，蔣只不過是眾多見證人的「其中一位」而已，所以他是「另一位」，而且，蔣也不過是普遍一般的「見證人」，不是什麼「偉人」，與其他所有的基督徒身份是一樣的，都只不過是「見證人」，蔣也是諸多的見證人之一，無須有任何特殊之對待。

從內容來看，周聯華更是處處表現得小心翼翼，全書有六章，前兩章都是在



說蔣夫人宋美齡如何如何地提到關於蔣的種種，另外三章都是說一些極其瑣碎、無趣的事，包括蔣介石的臥室、睡過的床、凱歌堂禮拜的題目或內容，還有令人更覺意外的是，他提及蔣介石講話的口音，官邸的小白狗、金魚、敬酒、吃油條等等瑣碎的事，刻劃出蔣是人而非神。

周聯華大約是從 1954 年開始到凱歌堂講道的，他主要接觸的人是宋美齡，更多的活動場合是在「中華基督教婦女祈禱會」，真正擔任凱歌堂的牧師始於 1966 年。周的一句說明了他在凱歌堂如何地保持低調：

每一位參加崇拜的信徒都是追隨總統和夫人數十年的袍澤或部屬，皆是尋常的聚會，自然地專心崇拜。在凱歌堂我所面對的會眾，總令人深深體會到他們每一位在對國家的貢獻和對領袖的效忠上，都是一個整體。在這整個會眾中如拿世俗的眼光來看，最疏遠的應該說只有一個人，那就是我了。<sup>48</sup>

儘管有這麼多的機會接觸蔣介石，周聯華在《另一位見證人》唯一用直接的口吻形容蔣的印象，就是他的鼻、眼睛、口型。正如周所說的：「我在凱歌堂講道二十一年，我沒有害怕過。與其說是我沒有害怕，倒不如說總統沒有使我害怕，我像是在其他教會完全一樣的講道。」所以他沒有去塑造蔣的神秘和偉大，自然也就不留下人們對他過分崇拜的理由。也許最令人注目的就是最後一章：「總統的神學思想」，看來這章可是一次吹捧蔣的思想偉大的機會，不過，周聯華竟然「聰明地」只是大段大段地摘錄或抄寫下蔣介石的一些片語，不做太多的解釋，而是將蔣的言論進行分類，有關本色化、宗教與科學、精神與物質、善與惡、信仰與行動等等方面的言論，尤其說明部份內容是由「夫人抄錄」交給他的。<sup>49</sup>

在那個狂熱的擁蔣年代裡，《另一位見證人》可以說是一本最為「清醒之作」，沒有護教反共的狂熱用語，沒有喪失信仰判斷地神格化蔣，它也沒有留下

48 周聯華，《另一位見證人》，臺北：道聲出版社，1975/4 初版，63。

49 周聯華，《另一位見證人》，111。



給讀者作文章的機會，儘管他是最有資格把蔣的信仰人格神化的人。這似乎應驗了一句話：「最危險的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正是周聯華善用了他與蔣介石如此貼近的距離，任何人想要從他那裡要他做些什麼事，都會觸及到冒犯蔣，也許因為這樣，這些人也不太敢對周有太多的要求或期待，所以周在蔣的身邊反而是安全的，但他並沒有濫用了他的機會，這一切都說明了周是一位踏踏實實受過神學教育的人，反觀那些「熱心」的黨國基督徒，他們對領袖和「主義」的崇拜，犯下了神學的錯誤也就罷了，也為見證信仰留下了污點。

從這本書並未引起黨國基督徒的大肆吹捧來看，《另一位見證人》是周聯華的「失敗之作」。<sup>50</sup>無疑的，這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因為它代表了那個年代還有如此清醒表現的基督徒。《另一位見證人》這本書，同樣是在政教關係的主題上突出了其意義，重點就在於，有沒有好好學過神學確實是有差別的。

世遠曾被人告他是「共匪」，理由是他在大陸時期參加過共產黨，當人問及周聯華對此事的看法時，周回答說：「即使他是，那又怎樣？」這又是一句極富智慧的話，堵住了所有想用此種理由陷害他人之舉。

## ■ 反共神學的結論：效忠領袖，保衛國家

當中國大陸的基督徒在「反帝」時，臺灣的基督徒在「反共」；大陸的基督徒把「愛國」放在愛教之前，臺灣的基督徒則將蔣介石打造成基督徒的模範去「愛蔣」。大陸的教會在反帝的鬥爭中分成了兩塊：三自教會與家庭教會；臺灣的教會在反共的矛盾中亦分成了兩邊：一邊是愛國愛教的黨國基督徒，一邊是被扣以「親共」大帽的長老教會。

---

50 張曉風的《黑紗》還獲得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的推崇，收入為其出版的文集《曉風自選集》（軍中版，非賣品）之中，臺北：黎明文化事業，1981。



中國大陸的反帝神學所欲論證的是：割斷與帝國主義關係，同時則是：愛國革新運動；臺灣黨國基督徒的反共神學所欲論證的則是：保密防諜，人人有責，同時的結論則是：效忠領袖，保衛國家。



### 3. 祈禱、反共、必勝： 護教反共聯合會的組織與活動

「絕不談判、絕不接觸、絕不妥協」

—反共標語

他們雖然無法直接知道「共匪」什麼，但統治者有系統地教他們懼怕「共匪」。他們必須對「共匪」又怕又恨，否則就被疑為同路人或共特。

—殷海光，〈剖析國民黨〉



## ■ 《真道手冊》與臺灣的政教關係

普世基督教協會（World Councils of Churches，簡稱「普世教協」[WCC]）是護教反共運動的頭號敵人。護教，是因為他們的信仰已不純正、背離了聖經的教導；反共，是因為他們已成了親共的政治團體，並企圖滲透基督教會組織。從萬國聯會到世聯會，普世教協一再地被描繪成具有高度政治目的的基督教組織；打擊共黨即是要打擊親共或容共的團體，包括普世教協以及與它有往來的教會或組織（包括美國基督教協會，NCC），都被打成「共匪同路人」。

在海內外華人基督教圈子中，一本散播極廣的小書《真道手冊》，是一本攻擊普世教協最具代表性之作。中國信徒佈道會創辦人王永信的名字，赫然出現在出席 1965 年於臺北召開的第一屆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的名單上，而且最為有趣的是，他的背景介紹竟是「真道手冊編輯人」。<sup>1</sup>王永信於 1926 年出

1 王永信，1926 年生於北平，1949 年從上海經香港到了臺灣，1955 年於臺北衛理公會受洗，1956 年進入臺南神學院，1957 年離臺赴美，1959 年入中央聖經學院（神召會）。1961 年，在美國底特律市創辦中國信徒佈道會，1961 年設立臺灣分會，1965 年在香港設立分會。1976 年在香港開始華福運動。1972 年籌備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1985 年王永信接受世界洛桑福音事工委員會之邀擔任副主席，1987 年擔任該運動之國際主任。1989 年創立主後二千年普世福音遍傳運動，目前擔任大使命中心會長。<http://www.ccmsouthbay.org/ccmhistory.php>，流覽時間 2013/10.25。有趣的是，王永信 1958 年移民美國並進修神學，究竟是接觸過什麼背景的基督徒？他的基要主義信仰立場是如何形成的？《真道手冊》是翻譯編輯而成的，從 1964 年出版至今仍在發行，究竟資料來源如何？這都是一件值得追究的事，因為王永信很少談及他在成立中國信徒佈道會前的種種，《異象與人生—王永信牧師六十選集》都是一些選文，沒有自傳或生平之類的文章，更添其神秘色彩。

「中國信徒佈道會」的名稱與計志文的「中國佈道會」極為相似，到現在仍有不少教會領袖分不清彼此的差別，這種魚目混珠的做法，對王永信在華人教會的興起也許起著了極為曖昧的關係，名字相近的還有黃約翰的「中國平信徒佈道會」。臺灣分會是王永信在美國以外第一個分會，事實上，主要的出版印行工作都在臺灣進行，其同工姚國祥為負責人，兩人關係非常的好。姚國祥的追思會和紀念文集中，完全見不到王永信出席和留言，可以想見兩人關係應有重大的變化。據說，王永信曾下令停止發行由華福會所發行的《華人神學期刊》，該刊因為「神學立場」的問題而只出了八期就結束（從 1986/6 到 1991/6），表面理由是「為精簡華福聯絡中心的刊物出版，節省人力物力」。



生於中國北京，是家族中的第三代基督徒，參加王明道的北京基督徒會堂。王在 1949 年離開中國，於 1958 年到美國之前曾短暫在臺灣衛理公會工作過。<sup>2</sup>

幾乎沒有人留意到，王永信曾於 1956 年就讀過臺南神學院，而且還是黃彰輝的學生。<sup>3</sup>王永信後來指控普世教協是「大背道」，這就等於說他當年在南神的老師是一個「大異端」。護教反共時期的臺灣，《真道手冊》成了基督徒信仰的指引，也成了當時政治壓迫的工具，1965 年黃彰輝因具有普世教協的身份被迫流亡海外，直到 1987 年返臺。1957 年王永信就趕赴美國，進入神召會中央聖經學院就讀。我們留意到，王永信很少提到他在美國的情形，我們不太了解中央聖經學院是一間什麼樣的神學院，從 1958 年抵達美國到 1961 年於底特律成立中國信徒佈道會，這段期間的他確實很神秘，因為連他的各種書籍中都未曾詳細說過這些年間的事。依王永信在華人教會的地位，至今尚未有人好好研究他，或有任何傳記或回憶錄之類作品，確實令人玩味。

2 衛理公會與國民黨的關係不僅是因為蔣介石和宋美齡同是這個宗派的會友，1949 年跟著國民黨到臺灣的高層人士，差不多都是衛理公會背景的，如于佑任、黃季陸等，參見一位傳教士的描述，唐培禮 (Milo Thornberry) 著，賴秀如譯，《撲火飛蛾：一個美國傳教士親歷的臺灣白色恐怖》，臺北：允晨文化，2011，85-86。

唐培禮是當年協助彭明敏偷渡出境的關鍵人物，本書充份的重現那個白色恐怖年代的氣氛和實況，唐培禮也透露了時任東海大學社會系著名的教授練馬可 (Mark Thelin) 與彭明敏的家人亦有往來，見頁 161。補充一句，練馬可離開東海大學之後轉任教於臺南神學院，練馬可在他的〈南神與我〉一文中形容東海是傾向於大陸籍統治者的，並透露出對南神一種政治上的同情，參見《神學與教會》21 卷 2 期，1996。

3 一張關鍵的照片，1957 年王永信在南神門口與院長黃彰輝合照，見《異象與人生—王永信牧師六十選集》，九龍：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1986。這個選集非常的怪異，沒有關於王永信的生平介紹，只有一些在中國信徒月刊上的文章選刊，分六〇、七〇、八〇年代，當然，從主要的選文中仍然看出他反普世教協的言論，特別是 1969 至 1971 年間的幾篇文章，都是以啟示錄的經文作為他批判的依據，1980 年代他在華福運動中仍以打擊新派、自由派為他的代表性標誌。「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王永信以基要派的方式讓他登上了華人教會領導的地位，宛如普世華人教會的教主一般，而黃彰輝被迫漂流海外，含痛思鄉。沒有人追究王永信對聖經「諸多的曲解」是如何地支配和扭曲華人教會對聖經和神學的理解，華人教會的江湖性格只問誰是老大，卻不太過問「大老們」講得到底對不對。



《真道手冊》一書對海內外華人教會的影響非常地大，其中該書對普世教協持全盤否定或批判的態度普遍影響著華人教會界，作者把普世教協形容為這種「世界大教會」的主張皆為啟示錄十三章的獸、敵基督，包括天主教在內均被作者說成是背叛基督教信仰的。本書由中國信徒佈道會發行，1961年總會成立於美國密西根底特律市，同年第一個分會即設在臺北，香港分會到1965年才成立。

由於《真道手冊》屬於贈閱品，其發行情況非常地大也非常地廣，其出版發行的情況如下：

- 初版，1964年2月，7,000本
- 再版，1964年5月，5,000本
- 三版，1964年7月，5,000本（萬國聯會遠東基督教大會）
- 四版，1965年5月，7,000本（第一屆亞聯會）
- .....
- 九版，1972年1月，20,000本（第二屆世聯會）<sup>4</sup>
- 十五版，1981年2月，3,000本
- 十六版，1982年2月，2,000本
- 十九版，1984年5月，3,000本
- 二十版，1985年2月，3,000本
- 二十三版，1988年6月，1,000本
- 二十五版，1992年2月，5,000本（革新版）
- 二十六版，1995年12月，5,000本（革新版）

4 根據中信月刊的報告，從1964年至1976年，此書已發行85,000冊。見《中國信徒月刊》第15卷第5期，1976，14。





▲《真道手冊》編者王永信於發行的《中信月刊》通告「第四版次」增加對普世教協的批判。  
(作者翻攝)

王永信的《真道手冊》先以「真道辨」的專文於《中國信徒月刊》(第一卷第九期, 1962年11月)上連載。1963年1月(第二卷第一期)刊載了對天主教的批評, 1965年6月(第四卷第六期)正式展開對「合一運動」的批評, 對象即是普世教協, 此刻正是臺灣島內慶祝百年大會之際:

感謝主, 從手冊的函索情形以及來信中, 看見神在此末世已經將守衛真道的決心放在了眾多弟兄姊妹的心中, 這是何等寶貴的事!

時日近了, 為真道呼喊, 為真道作戰, 為真道捨生; 是目前極需的工作與準備! 在遠東、在美國、在歐洲、在世界各處, 反抗神的情緒和勢力與日俱增, 敵基督者的靈已經在各地瘋狂工作, 用「撒旦深奧之理」迷惑一切



可捕捉的人（不單未信的人受迷惑，甚至有些基督徒因為對其本教會之冷淡與信仰失望，而竟飢不擇食的加入了異端組織，這是何等痛心的事！）

在神的恩典下，我們現準備印刷第四版，內中除真道辯文增加一章，說明普世教會合一運動（Ecumenical Movement）之異端外，並加添數首新譯奮興短詩。盼望兄弟們繼續代禱，並將神的真道放在你每一位親戚朋友的手中。<sup>5</sup>

無疑的，《真道手冊》第四版以增訂版的姿態刊行，目的是要打擊臺灣島內以長老教會為首的「異端分子」—普世教協的同路人。此舉充份說明了王永信可謂全面關注於臺灣島內的情勢發展，以在海外來護教者的姿態來宣傳其機構，他的崛起與此事情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從此因為《真道手冊》一書，王可以說是臺灣基督教內無人不曉的「真理護教者」。

《真道手冊》到了 1995 年就已發行了二十六個版次，該版次印刷 5,000 本，恐怕也是影響了這些護教反共的基要派份子，不容小覷。2000 年 6 月，與鮑會園等聯合出版《明白真道》一書，對異端的批判仍舊，但已見不到王永信之前說的異端—普世教協，對天主教的批評也未扣以異端之罪名；<sup>6</sup> 2000 年 9 月，《真道手冊》出版了簡體版，刪去了對「大背道」普世教協的章節，對天主教的攻擊也不說它是「大淫婦」了。關於這一點，根本沒有人予以追究為何有此變化。

5 《中國信徒月刊》第 4 卷第 6 期附加了一頁額外的插頁：「真道手冊四版通告」，表示特別加印，以配合該年在臺北舉行的護教反共大會。

6 《明白真道》，加州：美國中信出版社，2000。





▲王永信就讀於臺南神學院時攝，中間穿西裝者為黃彰輝院長。這張照片裡有兩個人物：黃彰輝院長和神學生王永信（右一），地點即在臺南神學院門口，1957年王永信曾在此就讀。1965年增訂版的《真道手冊》指控WCC是「大背道」，黃是島內WCC的頭號分子，這位神學生就這樣把黃逼得流亡海外。（作者翻攝自《臺南神學院八十周年特刊》）

228

### 本院學生名錄

(1957年三月現在)

神學科 乙班			李長貴 (軍訓中)		
第一學年			劉嘉音 (女)		
許翁	斌肇	碩禧	張瑞	雄	
王	天	惠	神學科 甲班		
神學科 甲班			第四學年		
第五學年			謝天祿	育	(軍訓中)
鐘朱	桂瓊	松四	周莊	再賢	(軍訓中)
			莊	道	

我們可以發現，護教反共的言論中，絕大部份對普世教協的批判用語，都是來自王永信。《真道手冊》的影響力是可以想像的，此書經常被基要派的報紙轉載（《福音報》、《聖經與信仰》），它成了打擊長老教會並要他們退出普世教協的理論打手之一。恐怕到目前為止，普世華人教會的圈子裡，還沒有哪一本書



像《真道手冊》那樣左右著華人教會的意識形態發展，以及被王永信冠以新派或自由派基督徒的命運和下場。王永信的功過該到檢討的時刻了，尤其是他另一本宣傳末世論的書—《末後必成的事》，更是值得仔細批判。

因此，比麥堅泰和成文秀的萬國聯會更甚，1964 和 1965 兩年內就發行了 24,000 本的《真道手冊》，目前能見到最早的版本是 1965 年的第四版，此年正是第一屆亞洲護教反共聯合會在臺北召開之際，該書可能也發給了當時的與會者，戴紹曾 (James H. Taylor, Jr.) 也出席了該次會議，他手上的版本即 1965 年 5 月第四版，估計是從當時會場拿到的。

王永信的《真道手冊》是護教反共時期黨國基督徒的「打擊異端指南」，尤其迎合了臺灣島內反對普世教協的情勢，《真道手冊》上的文章經常是大篇幅地刊於《福音報》，可見王永信對於臺灣教會的影響非常地深。王除了發行《中國信徒月刊》，也出版了其他的小書（最著名的是《末後必成的事》），都是以贈閱的方式發行，在那個極為恐共和封閉的年代，王的「神學」左右了臺灣黨國基督徒的思想，至於中國信徒佈道會與國民黨的關係如何也就不得而知了。

在其他出版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信徒佈道會先是在《中國信徒月刊》第十四卷第四期刊出專號「敬悼故總統蔣公安息」，並在之後印製出版了一本《總統 蔣公證道詞專輯》(1975)，表現得極為專業，對蔣的基督教談話收集得非常齊全。此一小冊與 1976 年由黨國基督徒發起的「中華民國基督教紀念總統蔣公安息週年禮拜籌備會」出版同樣書名的書，以及再與 1986 年的《蔣公的信仰與見證》相比較，中國信徒佈道會的版本仍然是最完備的，可見編者對蔣的言論和出版品相當地「在行」，相形之下，黨國基督徒的水平就差多了。<sup>7</sup>

---

7 一年內共發行兩版，合計 12,000 本。1976 年「中華民國基督教紀念總統蔣公安息週年禮拜籌備會」將《總統 蔣公證道詞專輯》拿來重出，編輯工作略微馬虎，沒有前言，沒有目錄，竟還短少了兩篇。



附錄（三）：王永信，〈斥責現代最大異端——所謂「普世教會合一運動」〉

[節錄自《中國信徒月刊》第四卷第六期，1965年6月號]

.....

今天很多的教會——尤其在歐美基督教國家中——按照聖經的教訓與原則來看，簡直不能再稱為教會。他們雖有漂亮舒適的禮拜堂，廣大的從眾和大量的金錢（很奇怪，越是不信主的教會越有錢），但他們不信聖經，不信基督代死贖罪，不信主的復活與再來，他們最多只能算為一些宗教集團而已，不能稱為神的教會。他們的「牧師」們不講福音，只講哲學與社會責任；他們的「神學家」們實際乃是鬼學家，……他們的「神學院」都成了鬼學院……。

.....

這些名義上屬神的人，實際卻是神以外的人，他們所信的是一個「頭腦宗教」，他們的信仰是一套自人而來的道德觀念，他們的上帝就是他們自己的思想，他們的心靈與我們所信的又真又活的神毫無關係。當這些徒俱基督徒之名而心中沒有基督，有聖經在手而不信聖經，有「牧師」，或「神學家」「學者」之稱呼而自己並未得救的人，一旦在教會中佔據重要地位時，教會背道之危機就來臨了，因為他們裏面沒有聖靈，他們的心受了撒旦的迷惑，他們不明白聖經的真理，他們到處宣講魔鬼毒害的道理還以為是在服務人類。

今天，在普世各處教會中，正有一批空前之多的這種頭腦宗教者名義屬神的人，在推進一個龐大的背道行為。因為他們所用的基督教名義，和他們迷惑動聽的口號，以及他們學術地位的號召力，大多數的新派教會，甚至一些昔日信仰純正的教會都加入了他們的組織。這一個逐漸蔓延的背道力量，就是所謂普世教會合一運動。

他們的最終目的是建立一個「世界大教會」。任何「教會」不論信仰，不論生命，不論負擔，皆可加入這大教會——其中將包括基督教中大多數的宗派，和希臘正教，俄國正教，並羅馬天主教，甚至也可能包括一些異教，如回教，佛教等。.....

.....

普世教會合一運動（以下簡稱合一運動）之起源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者乃是新派神學思想之影響作用。





▲曾受羅馬尼亞共黨監禁十四年之久的魏恩波牧師及夫人，1970年7月22日中午自漢城飛抵臺北，陪同者為張靜愚（右）和王永信（左）。魏恩波於24、25兩天在臺北中華文化體育活動中心舉行反共佈道大會。（中央社）

王永信在護教反共的思想推廣和行動上都相當地積極，最引人注目的一場由中國信徒佈道會主辦的「反共佈道大會」，主講人是國際知名反共佈道家、美國「殉道者之聲」負責人—魏恩波 (Richard Wurmbrand)，由王永信引薦，他還擔任該次聚會的翻譯，配合此次活動，中國信徒佈道會也特別發送給每位與會者一本《為主受苦》。<sup>8</sup> 1970年7月24日及25日兩天在臺北的佈道會，可謂萬人空巷，無疑的政治動員和恐共心態起了極大的作用，造就了一種特殊的信仰形態。

護教反共時期，黨國基督徒的佈道會也是政治宣傳會，那時這類大型的集會都叫「反共佈道大會」或「反共培靈佈道大會」等。早在葛理翰尚未到臺登上大型佈道會的場子之前，最為轟動，人數最多的，除了魏恩波之外，還有宋能爾，她是當時一位著名的華人女性反共佈道家。魏恩波的著作是當時最為熱銷的基督教書籍，因其反共和受共黨迫害之故事，《為基督受苦》一書幾乎人手一冊，之後中國信徒佈道會又重譯並印贈同一本書，更名作《為主受苦》，印量同樣地龐

8 《福音報》第512期，1970/8/2。



大，該書對作者的介紹中提及：

《為主受苦》是自由世界每一個基督徒所應該讀的，其中所記載的事實，可以震醒一般平庸冷淡，不察時勢的信徒們。本書著者魏恩波牧師所親身經歷的一切，實非筆墨所能形容。願神使用此書，藉它帶給今天敗壞的時代與沉睡的教會一個新的醒覺與轉機。

本書作者魏恩波牧師，是一位信仰純正的傳道人，……一九六六年他曾被警告說羅馬尼亞政府已經決定暗殺他，但生命的威脅並不能使他靜默不響，今天他被很多人稱為「地下教會之聲」，基督教領袖們稱他為「活的殉道者」和「鐵幕保羅」。<sup>9</sup>

1970年7月24日及25日，連續兩晚在臺北體育館內舉行「殉道者之聲」奮興佈道大會，根據當時的目擊者如此形容：

像任何一次國際性佈道大會一樣，臺北體育館內，是日下午七時半以前，就已座無虛席。但後到的人士，仍在萬頭鑽動中繼續進場，在座次與座次間尋找容身的隙地。參加的會眾，來自各地教會的信徒，以及他們所邀請的慕道友，成份和歷次佈道大會無異。唯一不同的是，大家不是來看神蹟、求醫治，乃是每一個人都想親眼看看這位「活」的殉道者的風采；親耳聽聽那代表鐵幕裏被囚者的人性的吶喊。<sup>10</sup>

這是一次政治宣傳，主要是這位反共佈道家被標榜為反共而受苦的羅馬尼亞基督徒，並且這位被譽為「歐洲地下教會領袖」的魏恩波曾因為傳福音被共產黨囚禁及苦刑對待。

9 《為主受苦》，葉惠生譯，臺北：中國信徒佈道會，1971年2月第四版10,000冊。

10 〈人性的吶喊—記「殉道者之聲」奮興佈道會〉，重提（本名：施卓人）編著，《雲彩》，臺北：中國平信徒傳道會發行，1976，111。



《為主受苦》這本書原是王永信主動著手翻譯的，後來再交給他人負責。中國信徒佈道會於 1969 年就已出版初版，1971 年第四版，魏恩波的反共佈道大會在 1970 年，可以判斷認為，《為主受苦》的出版和魏恩波的到來之間有許多精心的配合。事實上，早在 1969 年 11 月 25 日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在臺北成立之日，與會者就獲得了魏恩波所著《為基督受苦》（這個譯本只有原書的三分之一），實為同一本書的不同翻譯，該書的內容曾於 1970 年 1 月 4 日起在《福音報》三版大篇幅地連載，自 383 期起，至 395 期止，全部刊完。此書當時為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所翻譯，作者名字中譯為「理查·魏布蘭德」。魏恩波有不少著作於基督教界內流傳，其他的書籍還包括：《馬克思與撒旦主義》（真理之聲出版，1982，阮大年、林治平寫序）等。魏恩波可以說是護教反共時期影響臺灣基督徒政治意識形態的一位外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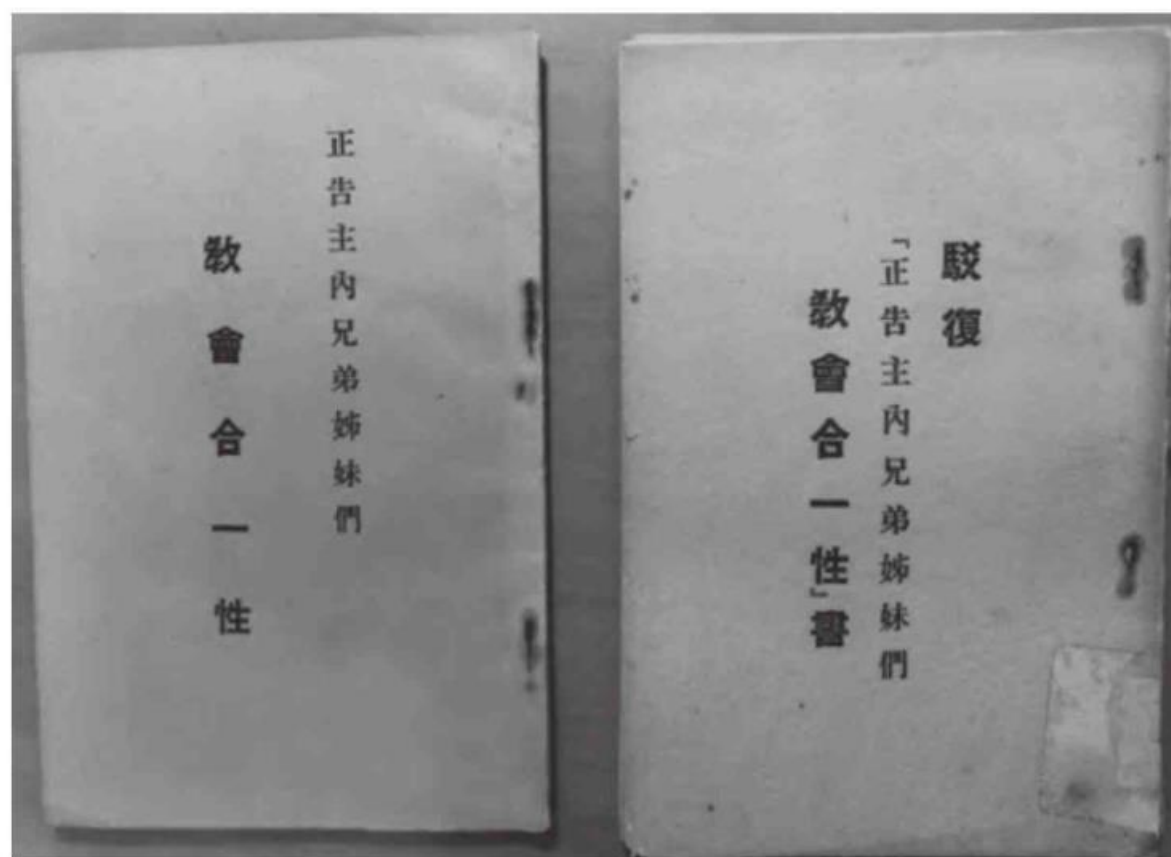


▲《中信月刊》也做了宣傳和報導魏恩波的著作。（作者獲同意翻攝自中信月刊）



從羅馬尼亞逃到了美國後，魏恩波成立了一個名為「殉道者之聲」的佈道會組織，非常類似於王永信的中國信徒佈道會，尤其特別針對共產國家的傳教工作。「殉道者」，顧名思義，就是為道殉難的忠魂，魏恩波以他活生生的遭遇作為控訴共產黨的無神主義和對自由信仰的迫害，他到各地去講述這類的見證，尤其是以他在囚禁和苦刑漫長拘禁的人間地獄中出來，專講述「反共產、反魔鬼」的信息，他稱馬克思是一位「撒旦教的教徒」。

魏恩波在他的故鄉羅馬尼亞遭受到共產黨的監禁與酷刑有十四年之久，他原是一位羅馬尼亞人所周知的作者與教育家。自從 1945 年共產黨取得羅馬尼亞政權並且進行控制教會的時候起，魏恩波就開始了地下傳道工作。1948 年和他的妻子一同被捕，妻子被迫接受了三年的勞動改造，魏恩波本人則被單獨拘禁三年之久。三年之後，他被轉到一個大眾拘留所，但是酷刑卻繼續不停。八年之後，他被釋放，即刻又恢復了地下教會的工作，1959 年他第二次被捕並被判廿五年監禁。1964 年大赦，魏恩波幸獲出獄並申請出國，1966 年 5 月抵達美國並在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作證，控訴其遭受酷刑而留下的傷痕，他的故事刊載在美國、歐洲、亞洲許多國家的報紙上，引起了基督徒反共分子的關注，並宣傳其英雄事蹟，稱他為「活的殉道者」和「鐵幕保羅」。



◀關於教會合一的爭論與對普世教協的指控和辯護的兩份關鍵冊子：《正告主內兄弟姊妹們教會合一性》（四大教派聯合）和《駁復正告主內兄弟姊妹們教會合一性書》（成文秀著）。（作者收藏）



王永信在〈再版序〉說到了這位反共佈道家的意義：

魏恩波牧師的經歷，應該震醒今天優遊於「象牙塔」中的「基督徒」們；他們以信仰為生活的妝飾，以作禮拜為每週節目，他們在「不妨害個人方便」的原則下去教會，他們不知道奉獻的真意，不肯作個付代價的門徒，更不願在極端情形下，為主忍受痛苦。<sup>11</sup>

從與衛理公會的關係看來，王永信與臺灣基督教界黨國基督徒的關係有多深，是一件值得探究的事。儘管人身處在海外，卻經常往返臺美兩地，透過了「免費贈送」書刊的方式，以一種正統主義的護教士姿態來傳播福音，他的思想遺害恐怕不是一、兩代人的事，相對於香港，臺灣受他的影響可說是非常非常地深。王永信赴美之前曾短暫旅居在臺灣，之後他對於普世教協和天主教的言論影響了臺灣基督教的走向，造成了與合一運動和天主教關係上極為重大的衝擊。

無疑的，王永信既是打著正統派的形象，並同樣是反共、關注大陸教會受到迫害等問題，與臺灣黨國基督徒的意識形態也就不謀而合。在臺灣成立第一所於美國以外的中國信徒月刊社，到反共佈道家魏恩波的書在中國信徒佈道會的名義下出版，另外也在蔣介石逝世不久就集結出版蔣的證道詞，都可以看得出他與黨國基督徒關係匪淺。

王永信以其基要派的護教者和反共者形象，與黨國基督徒的互動甚密也不奇怪。1981年，護教反共的最高潮，也可能是最後一場大型聚會，即是由中華民國基督教協會、中華福音聯誼會以及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中華民國總會共

11 王永信，〈再版序〉，收入魏恩波著《為主受苦》，臺北：中國信徒佈道會，1969年10月初版，1971四版印10,000冊。這類書的印刷出版，平均每個版次都以一萬冊為準，由於中國信徒佈道會出版之書籍均以贈送為主，此書於1971年再版就已是第四版，再加上他們的出版品經常是被全版收入刊載於《福音報》中，《為主受苦》即是其中的一例，其散佈和影響力是非常巨大的。根據中信月刊的報告，此書共送出60,000冊，見《中國信徒月刊》第15卷第5期，1976，14。王永信在華人教會基要派的形塑上是一個關鍵人物，這與他後來那種「福音派」形象不可同日而語。



同發起於主辦的「愛國愛教」的「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七十週年基督徒感恩大會」，王永信是這次大會的講員之一。

## ■ 反百年大會與全面反 WCC

早在四大教派（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臺灣聖公會，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基督教臺灣信義會）於 1965 年 2 月召開聯合記者會前，成文秀就已在《角聲週刊》中抨擊普世教協，成功地製造了教會界的輿論對普世教協的偏見，並直指臺灣這些教派加入普世教協，等於是親共行為。<sup>12</sup> 在四大教派發行《教會合一性：正告主內兄弟姊妹們》的小冊子中，按該書目錄有：

### 引論

普世教會協進會之組織

克利夫蘭之宣言

聖安得烈中央委員會之決議

新德里普世教協之「函電」

普世教協之反共立場

普世教協誣為「親共」之由來及麥堅泰萬國基督教聯合會之組織

臺灣基督教會之態度

從這個目錄很清楚的表現出來，所有爭論的焦點即在於：普世教協究竟是不是親共團體？到底參與該組織的人士是不是不反共了呢？關於萬國聯會的指控到底

12 《從阿姆斯特丹到乃洛比—普世教會協進會與第三世界》（臺北：協林印書館有限公司，1982）一書的翻譯出版，算是這一段護教反共時期表現出比較完整或全面地對普世教協進行分析和批評的出版物，畢竟此書是一本譯作，原書的作者在批評普世教協時，並不像中文作品那樣的粗魯，分析普世教協的內容比較中肯。



是事實嗎？等。因此在與普世教協的曖昧關係上，長老教會之後被指控為「不反共，即是親共」，即是前面提及有關普世教協已非純正信仰，所以長老教會在護教和反共兩方面都已背離了信仰正確和政治正確的立場，正如成文秀回敬文中指出的：

上述的臺灣四個教派為何要煞費苦心的來為普世教協 WCC 力加辯護？為何我們不能彼此在主裏同心協力，團結合作，一致的義正詞嚴，口誅筆伐，來共同反對這個信仰歪曲和立場親共的普世教協 WCC 和美國教協 NCC，以維護我中華民國基督教會之純正信仰與堅決反共之神聖立場呢？這的確是令人費解而要質疑的問題。<sup>13</sup>

成文秀在《駁復「正告主內兄弟姊妹們教會合一性」書》中，所有的焦點即是列舉了各種信仰問題益加鬆弛的例子，尤其針對接納所有申請加入者，甚且包括希臘東正教、蘇俄正教會、以及天主教等，認為都是邪正不分，甚至連無神論共產主義化的蘇俄正教會亦包括在內，像這樣混淆不清的地步，已說明普世教協從「容共」到「親共」，最後即是丟失了純正的信仰，已然成為一個「異端」的事實。

而且，成文秀對於上述小冊中直呼對岸「中共」、「中華人民共和國」，甚至是「新中國」的字眼非常不是滋味。針對三十八頁的小冊子，成文秀用了三倍以上的篇幅反擊，他說：

這在反共的中華民國臺灣，在一本首尾不足三十八頁的小冊，竟連連多次引用此一刺目稱呼，在今日臺灣的出版界，尚屬僅見，又在第十一頁所稱之「新中國」究何所指？凡我愛國熱血黃炎子孫和敬虔的中華民國基督徒們，諒皆對此等荒謬論調和稱呼，絕難苟同吧！<sup>14</sup>

13 成文秀，《駁復「正告主內兄弟姊妹們教會合一性」書》，3。

14 成文秀，《駁復「正告主內兄弟姊妹們教會合一性」書》，7。



成文秀認為此舉即是：姑息養奸，徒助長中共匪偽兇燄。

成文秀全面反擊四大教派對普世教協所做的辯解，並認為這些普世教協的支持者，已然背棄了純正信仰，同時又是親共或容共，而且還誣詆維護純正信仰的萬國教聯，無疑的，這些教會已被普世教協給愚弄，將來勢必成為共黨滲透教會的一個工具，對此不可不防。成文秀挑明地說：

1953年，臺灣長老教會加入了普世教協，從此信仰偏差，每況愈下，擾攘多事，令人傷心。<sup>15</sup>

所以必須對此全面反擊，一方面是維護信仰，一方面則是防止共黨滲透。成文秀認為，基督教會必須與普世教協劃清界線，如此才是真正表明反共，同時也是表示回歸到純正信仰的立場上。

從萬國聯會到亞聯會和世聯會的反共目標中，一切有關護教反共運動的發展，其具體挑明欲對抗的對象即是普世教協，它成了一個欲對抗的基督教團體，當然與長老教會之間的矛盾，也是與這個團體有關。臺灣護教反共份子打擊長老教會，即是緊盯著這個組織進行批判，因而有必要從認識這個基督教團體成立的過程開始。



▲萬國基督教聯合會中國分會長成文秀博士（右）於1970年6月參加萬國教聯華盛頓十萬人反共大示威後，15日中午返回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五組主任梁永章（左）在機場歡迎。（中央社）

15 成文秀，《護教反共叢談》，24。



## ■ 普世教協 (WCC) 與教會合一運動

1910年愛丁堡 (Edinburgh) 舉行的世界宣教大會 (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 是教會歷史的關鍵事件之一，為往後的合一運動奠基。這是基督教過去一個世紀以來為了普世宣教所進行的一系列跨教派會議之高峰。有別於以往只著重新教圈子的聚集，此會議的重大突破之一就是聖公會的積極參與。<sup>16</sup>

另一方面，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的東正教教會，即普世宗主教區 (Ecumenical Patriarchate)，於1919年正式著手研究設立教會聯盟的可能性，於隔年發表了前所未有的一項通諭，即〈致世界各地基督的教會〉之正式信函，提出了教會合一的議題，並邀請所有教會認真考慮組成一個教會的團契 (Fellowship of Churches)，甚至列出了一系列關於對話與合作的具體建議。這份高瞻遠矚的文件後來成為普世教協制訂方針的重要參照。與此同時，一些聖公會與其他基督教會領袖也作了類似提議，主張設立一個能夠聯結不同教會的全球組織。<sup>17</sup> 二十世紀有各種機構因為特定的關注而集合了來自不同傳統的基督徒，這些跨教派的活動如雨後春筍般展開，但為了讓有限的資源能被妥善使用並避免工作重疊，再加上經歷了一戰的浩劫，教會逐漸意識到有必要正式探討並實現不同教會之間的理解與合一。

與1910年愛丁堡大會交織的兩大運動「信仰與教制」 (Faith and Order) 和「生活與工作」 (Life and Work) 也同時蓬勃展開。「信仰與教制」運動原先主要是由美國聖公會發起，但不久就成立了跨國且跨教派的委員會，並且回應了君士坦丁堡的呼籲，邀請東正教加入該運動。1927年，「信仰與教制」於洛

---

16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Ecumenical Bearings of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 in Ruth Rouse and Stephen Charles Neill eds., *A History of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1517-1948*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67), 355-357, 360. 此部份內容涉及普世教協的歷史，是由林奕慧助理所彙編而成，特以致謝。

17 Thomas E. FitzGerald,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An Introductory History* (Westport, Conn.: Praeger Conn., 2004), 104-106.



桑（Lausanne）召開首次大會，就教會的共同性質與信仰告白作了詳細討論。<sup>18</sup>「生活與工作」運動的主要關切則是世界和平以及教會在道德、社會與國際問題上的實踐，於 1925 年在斯德哥爾摩（Stockholm）舉行第一次大會。其重要推手 Söderblom 大主教嘗試在這些問題上尋求教會的合一，並在反對聲浪中秉著對於「大公」（Catholicity）的信念，堅持邀請羅馬天主教與東正教參與該運動。<sup>19</sup>

1937 年，「信仰與教制」和「生活與工作」於愛丁堡召開大會，接受了建立普世教協的提案，兩個組織各委派了七位成員專門探討普世教協之基本架構。這十四人委員會於隔年開會後，議決成立一個為建立普世教協而設的「臨時委員會」。然而，不是所有從事教會合一運動的團體都贊同加入普世教協，例如國際友誼世界同盟（World Alliance of International Friendship）決定不涉及其中，而國際宣教協會（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則決定維持獨立運作，但與普世教協的發展一直保持合作，直到 1961 年才正式整合至普世教協的組織中。委員會向一百九十六個教會發出了邀請函，同時也沒忘了羅馬天主教教會。儘管先前羅馬天主教已拒絕了「信仰與教制」和「生活與工作」大會的邀請，但委員會主席 William Temple 大主教還是為了普世教協的計劃致函梵蒂岡國務卿。羅馬天主教表示不會參與，但仍然透露開放交流及磋商的可能性。<sup>20</sup>

「臨時委員會」本來計劃於 1941 年召開普世教協的第一次集會，卻因二戰爆發而擱置。委員會最終於 1946 年恢復運作，許多成員因為切身體會慘烈的烽火而更堅定地投入普世教協的建立。1948 年，普世教協的第一屆大會於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召開，因著二戰的悲劇，將主題定為「人的混亂與神的設計」（Man's Disorder and God's Design）。這是現代教會史上跨時代的事件，標誌著合一運動的重要里程碑。來自四十四個國家的一百四十七個教會的代表出席了這

18 Tissington Tatlow, "The World Conference on Faith and Order," in *A History of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1517-1948*, 417-418, 420.

19 Nils Karlström, "Movement for 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and Life and Work," in *A History of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1517-1948*, 533, 535, 538-539.

20 Thomas E. FitzGerald,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An Introductory History*, 107-109.



次大會。大會除了依據主題進行了重要的神學討論，也確立了普世教協的建制、形式與結構。<sup>21</sup>

普世教協第二屆大會於 1954 年在伊凡斯頓 (Evanston) 舉行，宗旨之一是與美國的合一工作有更密切的連結。在冷戰與種族歧視的背景下，圍繞著主題「基督：世界的盼望」做爭論。多數的歐洲基督教成員強調未來的上帝國，但許多美國新教成員基於社會福音傳統而重視基督徒在當前社會的行動，然而西方教會的這些嚴重分歧對東正教的參與者而言卻又是極其陌生的。

1961 年，在新德里的第三屆大會接受了來自俄羅斯、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波蘭的許多東正教教會的參與，<sup>22</sup> 使得東正教教會的陣容立即增強，同時意味著具有「共產主義」背景的東歐國家成員大幅增加。另外，有兩大五旬節教派也成為普世教協的會員。而來自第三世界—亞洲、非洲與南美洲—的十九個教會也在此時加入，使普世教協的成員增至一百九十七個教會，參與者就主題「耶穌基督—世界之光」檢視了來自其他宗教、政治與社會變遷（尤其是第三世界）所帶來的神學挑戰。<sup>23</sup>

臺灣教會與普世教協的關係，即是於 1950 年南北長老教會分別順利召開臨時大會並一併通過南北合一方案，於是 1951 年 3 月 7 日第一屆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正式成立，同年即加入普世教協。<sup>24</sup> 東海大學的成立，即是由具普世教協身份的長老教會說服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支持而得，1963 年周聯華曾被邀請到「信仰與教制」委員會進行報告。縱然教會合一運動看來是大勢所趨，但

21 Ibid., 109-110.

22 Ibid., 112. 另可參見何輔德 (W. A. Visser't Hooft) 編，陳舉譯，《新德里之聲—普世教會協會第三次大會報告書》(New Delhi Speaks)，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64。

23 Hanfried Hrüger, "The Life and Activities of 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in Harold E. Fey eds., *A History of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2, 1948-1968*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70), 41-42. 宋泉盛曾著有《認同與合一》一書，即在此背景下進行的。

24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南北兩大會於 1951 年 3 月 5 日，合一而成立第一屆總會（根據總會報告書，會期是 3 月 7-8 日）也在這一年開始了與普世教協的關係。真正南北大會的合一是在 1957 年。



普世教協的快速增長還是遭遇到了許多挫折，尤其是在 50、60 年代一些教會的退出。普世教協甚至被貼上這樣的標籤：「國家教會的帝國主義、與天主教和解、馬克思主義滲入的危機、急躁的合一與相對主義的神學」。<sup>25</sup> 臺灣在護教反共期間教會內的意識形態的矛盾，主要都是環繞在長老教會與普世教協的關係上，普世教協在政治上被扣以「支持共匪政權」的惡名，在基督教的立場上卻被定予「新派」的罪名。

## ■ 麥堅泰和他的萬國基督教聯合會 (ICCC)

追溯中華民國「亞聯會」和「世聯會」的組成，實與美國萬國基督教聯合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Christian Churches, ICCC, 以下簡稱「萬國教聯」) 關係密切，主要因為成文秀當時即已參加該會活動，是一個非常活躍的分子，他所主編出版的《角聲週刊》，是護教反共運動中最具代表性的喉舌，經常性地翻譯並轉載「萬國教聯」的官方報刊《基督徒燈塔週刊》(Christian Beacon) 反對普世教協的文章，而後成文秀特別積極撰文，前後又成了「亞聯會」和「世聯會」中的核心人物之一。<sup>26</sup> 所以我們有必要先認識萬國教聯這個組織，它究竟何時開始在臺設立分會，其組織和成員又如何，與臺灣的互動等等。

自萬國教聯於 1948 年在荷蘭阿姆斯特丹正式成立之後，於國際間的教會積極開展各項工作。在國際上，舉辦大遊行示威抗議反對共產主義，並請多方的基督教人士召開世界大會，其目的都是要在國際上爭取被看重的發言權，而《基督徒燈塔週刊》除早已於 1936 年發行外，亦創辦「二十世紀之聲」廣播電臺，盼藉此宣傳萬國教聯的理念，其他業務自是先後相繼推行。萬國基督教聯合會在國際發表的言論，其思想常圍繞兩大主軸：反對普世教會協進會，以及反對共產主

25 成文秀，《護教反共叢談》，56。

26 成文秀，《不要同負一轡》，臺北：萬國教聯中華民國分會，1969。



義。

根據成文秀的說法，中國最早的護教反共代表人士和組織，即是長老教會傳教士道雅伯博士 (Dr. Albert B. Dodd)，當時他在東北成立了「中國基督教聯合會」(The Union of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es)，其他的成員包括白秀生 (Dr. White)、賈玉銘、韓鳳崗等教會領袖。1929年11月29日和30日，中國基督教聯合會假山東濰縣華北神學院召開成立大會時，參加教會代表四十餘人，參加的各教會計有中國基督教長老總會、山東福音會、泰安浸信會、上海佈道會、苦力福音會、安徽宣道會、河南內地會等十餘個教會團體，白秀生當選首任會長，當即議定信條五項，共同信守。1930年冬季在中國山東濰縣召開遠東會議。<sup>27</sup> 萬國教聯臺灣分會是由道雅伯於1955年所創立的，1961年才正式成立作中華民國分會，負責人即是成文秀，當時參加此一組織的約有八個宗派，四十二所教會。<sup>28</sup>



▲成文秀（左）與曾在華盛頓舉行五次反共勝利大遊行的萬國教聯會長麥堅泰博士（左），偕同美國聖經長老會獨立差會長葛登博士（右），於1972年8月8日上午自美抵臺專程來臺參加最近去世的萬國教聯副會長道雅伯博士的追思禮拜。（中央社）

27 成文秀，《護教反共叢談》，235-236。成文秀甚至認為，萬國教聯這個組織真正的開端是在中國，言下之意是要表示萬國教聯不是「外國組織」。據說，賈玉銘曾被「騙」去參加了一次萬國教聯的活動，結果發現主要是在批判共產黨，回到大陸後自己公開認錯，指是在不知情之下去赴會的。

28 《臺灣省通志》第12冊卷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1，175。



萬國基督教聯合會自成立以來，就與臺灣當時的國民政府往來密切，在歷屆召開世界大會，以及所舉行的七次華府反共勝利遊行大會，當中多次臺灣的基督教人士皆有參與，並獲得政府相關單位的認可。除了每四年召開世界大會(The World Congress of ICCC)，最為注目的是自1970年4月至1974年4月，先後舉行七次華府反共勝利大遊行(Anti-Communism Victory March in Washington, D. C.)。此外，在美國各州亦曾舉行多次規模較小之遊行。舉辦大遊行目的，旨在揭發並反對無神論共產主義滲透教會、擾亂社會、鼓勵姑息氣氛等。

在華府反共大遊行中可以顯示出，萬國基督教聯合會與當時臺灣的國民政府關係相當良好，成文秀經常組代表團到美國華府，他的出國和回國都特別受到國民黨部相關人士的接送。反共大遊行中，不斷地訴求反對美國承認中共的政權，並反對中共介入聯合國；據說在第七次遊行中，會長麥堅泰博士還領導會眾高呼「中華民國萬歲！蔣總統萬歲」，表示其政治立場是擁護中華民國、反共及收復大陸國策。<sup>29</sup>

萬國教聯的核心人物是麥堅泰(Carl McIntire)，周聯華形容他為：保守、反黑人、反閃族(猶太)、反共產黨的，一個從長老會出來的分裂分子，因為他從長老教會出來，所以他第一個要分裂的教會就是長老會，韓國的長老教會即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sup>30</sup> 麥堅泰出生於1906年，1927至1929年在學期間介入了普林

29 成文秀，《護教反共叢談》，244-250。1972年7月11日，成文秀曾在世聯會第二屆代表大會籌備會中報告華府反共勝利大遊行之活動情形：

第一次：1970年4月4日，十萬人，目的為「反共勝利」。

第二次：1970年10月3日，二十萬人，目的為「反共援越南」。

第三次：1971年5月8日，十二萬人，目的為「自由與反共勝利」。

第四次：1971年10月23日，一萬五千人(大雨)，目的為「支持中華民國反共」。

第五次：1972年5月20日，二萬人(大雨)，目的為「支持中華民國信仰自由反共勝利」。

第六次：1973年4月14日，一萬三千人，目的為「擁護中華民國蔣總統反共國策」。

第七次：1974年4月6日，一萬人以上，特別「高呼中華民國萬歲！蔣總統萬歲！」

30 萬國教聯的「種族主義」表現在他們對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博士的污蔑上。成文秀說金恩博士是由美國教協與美國共產黨主使，鼓動黑人左傾教會為民權法案於1963年8月28日在華府示威大遊行，並說這是一次蘇俄共產國際對美國進行滲透顛覆陰謀的實例。見《國際共產與基督教》，31。



斯頓神學院的鬥爭與分裂中，之後與梅欽 (J. Gresham Machen) 從那裡出來另設韋斯敏斯德神學院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逐漸地就形成了美國的基要派，接著就一連串介入於美國長老教會的分裂事件中。

為對抗美國基督教協會 (NCCC)，另組美國基督教教會聯盟 (ACCC)，麥堅泰擔任該會會長，1936 年發行《基督徒燈塔週刊》，1948 年自組萬國教聯，接下來又是一連串與自己內部教派不和，最後又把焦點放在亞洲，1959 年也介入韓國長老教會以致於其也以分裂收場。<sup>31</sup> 成文秀非常地倚重麥堅泰，對麥堅泰的所做所為都視作是維護純正信仰之舉，推舉他作世界聞名的反共鬥士。<sup>32</sup>

麥堅泰的個人命運與萬國教聯的信仰立場是聯繫在一起的，他宣稱反對新

31 萬國教聯在新加坡也成功的分裂了長老教會。約於 1950 年，由受到麥堅泰影響的杜祥輝 (Tow Siang Hui) 和郭克昌 (Quek Kiok Chiang)，打著維護聖經基要真理的旗幟，指摘西方新派神學已入侵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教會，於是，杜祥輝於 1950 年 10 月要求新加坡中華基督教 (長老會) 生命堂退出馬來亞基督教理事會 (Malayan Christian Council, 簡稱 MCC) 不成，當時杜祥輝負責英文部教會，之後就將這批成員帶走，1955 年 1 月成立了「篤信聖經長老會」(Bible-Presbyterian Church)，1962 年還有了自己的神學院「遠東聖經學院」。孫耀光這樣寫到：

這時，一個嚴重的神學風暴在醞釀中。新加坡生命堂是屬於中華長老大會，而中華長老大會又是隸屬於馬來亞基督教理事會。杜祥輝牧師、郭克昌長老和徐清泰執事 (Hsu Chiang Tai) 等三人，被授命代表生命堂，要求長老大會退出 MCC，因為「在 MCC 的成員當中，有不少領袖和支持者是新派的。他們不接受基本信仰真道，這包括：《聖經》的無誤權威，耶穌為童貞女所生，他的肉身復活和第二次再來。」此外，MCC 被指控「參與世界宣教理事會 (簡稱 IMC) 和普世基督教協進會 (簡稱 WCC) 領導的普世教會合一運動。IMC 和 WCC 的成員包括拜偶像的希臘東正教和否定耶穌神性的惟一神教派。因此，長老大會若參加 MCC 為成員，就是與不信者認同，不順服神的話語，與這些不信者同負一轍。」而且「MCC 參與 IMC 和 WCC 所鼓吹的合一運動，這運動在尋求途徑使基督教和天主教合一。這豈非是使宗教改革前功盡棄，同時背叛改教運動的烈士嗎？」

另外，新加坡神學院 (Singapore Bible College) 的成立及發展，也與這股運動有關。相關的內容可參見孫耀光，《在祂手中—新加坡教會史 (1819-1992)》，新加坡：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出版，2001，264-282。

32 成文秀在說到麥堅泰如何地有名，特別提到連「在莫斯科印行之蘇俄百科全書，亦都有關於萬國教聯及麥堅泰之記載」，言下之意似乎是說國際共產的「大本營」都怕他。參見《國際共產與基督教》，39-40。



派教會的邪說異端，以及反對無神論共產主義。所以，他認為凡純正信仰的基督教會，絕不與任何不合聖經的主張和信仰妥協，甚至還要起來表達絕對反對之立場，對於那些破壞教會傳統純正信仰的，則一概視為是敵基督者。其次，在反對無神論共產主義的立場上，尤其地注意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俄共產國際的崛起，這股力量明顯地竭力從事滲透基督教會的工作，其最顯著的結果即是他們成功地打入了世界最大的國際性教會組織—普世教協，並利用教會而促成其赤化世界之陰謀。麥堅泰認為，共產國際的目標即是借助教會的力量來統治全世界，這樣的結果最終即是以毀滅基督教為目的，因為共黨的勝利即無神主義的勝利，在這種情形下竟還有一些基督教會與具有共黨背景的國家或組織合作，無疑是埋葬信仰、扭曲信仰的表現。所以，萬國教聯即是要組織起所有純正信仰的教會，來共同抵制這場世紀的大災難，共同堅決反對無神共產主義，共同援救純正的教會信仰，共同為基督打美好的真理之仗。

於是萬國教聯宣稱所負之任務即是：

聯合全世界信仰純正之基督教會與信徒，  
 鼓勵復興聖經信仰教會。  
 慎防新派邪說之毒害，同心協力抵擋一切的不信與妥協，  
 並反對羅馬天主教。<sup>33</sup>

麥堅泰於 1961 年 4 月到臺並進總統府見過蔣介石，他向蔣表示自己的立場不僅反共，而且，承諾盡最大的努力阻止中共進入聯合國。<sup>34</sup> 由麥堅泰所領導的萬國教聯亦曾在臺灣濟南路國語禮拜堂召開過一次「遠東基督教大會」，時間是 1964 年 7 月 24 日，蔣介石還特別致揭幕詞。從致詞內容可以得知，蔣介石對麥堅泰所領導的組織和活動似乎非常地清楚，無外乎即是標榜「維護純正信仰」以

33 成文秀，《護教反共叢談》，241。

34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中華民國五十年（一月至四月）》，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編輯，臺北：國史館，1980，902。



及「堅決反抗無神論共產主義」。<sup>35</sup>



▲萬國基督教聯合會遠東區第五屆代表大會揭幕萬國基督教聯合會所屬遠東基督教聯合會第五屆代表大會，於1964年7月24日在臺北市中山南路國語禮拜堂舉行揭幕典禮。（中央社）

比這更早前的是，萬國教聯第四屆代表大會在1958年8月21日於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時，據成文秀的說法是當時蔣介石還親自發了賀電。<sup>36</sup> 第六屆世界代表大會在1965年8月5日於日內瓦召開，成文秀出席了該次會議，蔣介石也還是以中華民國總統的身份為此次會議特別頒祝賀電文，由該會會長麥堅泰代為宣讀。<sup>37</sup>

35 〈對遠東基督教大會揭幕致詞〉，《先總統蔣公全集》，2858。

36 此事是否如實未經證實，大概也是根據成文秀的說法，見《福音報》第38期的報導，1958/9/7。另外也是從成文秀的五人反共代表團一次赴美，參加美國基督教聯合會的經過中，說到麥堅泰的種種表現，似乎是說他與蔣介石相當地熟並互動關係良好。《福音報》第65期，1959/8/23。

37 此文未見，只根據成文秀的描述，即是關於聯合反共的建議，參見《不要同負一轡》，94。



所以可以推算，萬國教聯麥堅泰等人從蔣的護教反共理念取得了重大的動力作用，就在「遠東基督教大會」召開後隔年，亞聯會就在臺北宣佈成立，所以亞聯會的成立是模仿萬國教聯而來的，也是蔣介石間接促成的，這可以從蔣為亞聯會開幕時的致詞獲得這種印象。<sup>38</sup>



◀嚴家淦接見麥堅泰（右二）。  
（國史館）

麥堅泰對臺灣護教反共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他不僅擔任了世聯會的榮譽顧問，1969年和1973年第一和第二屆年會在臺北召開時，他還出席並擔任了會議開幕典禮證道人。<sup>39</sup>除了萬國教聯，亞聯會和世聯會，另兩個外國反共的友好組織是「基督教反共十字軍」(Christian Anti-Communism Crusade)和「基督徒十字軍」(Christian Crusade)，前者代表人物是舒華茲(Fred C. Schwarz)，後者代表人

38 萬國教聯於1989年11月15日到20日在臺北召開「遠東基督教聯會第十二屆代表大會」，會長麥堅泰仍親自出席此次大會，吳清鎰牧師特別呼籲神學生參加此會，並表示對此位「中華民國之友」做出熱烈的歡迎。見《聖經與信仰》第288期，1989/10/30。這可能是麥堅泰及其萬國教聯在臺最後一次的大型活動。

39 第二屆世聯會召開，是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之後，也是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發表上海公報之後，作為親密的伙伴，麥堅泰講道的題目為「耶和華必不丟棄祂的百姓」，其意當然是要安慰護教反共之士不應氣餒，化悲憤為力量，認為真理最終會取得勝利的。參見《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第二屆代表大會紀錄》，1972/10/4-7，27-28。



物則是哈吉斯 (Billy James Hargis)。<sup>40</sup>



▲十字軍雜誌哈吉斯 / 賈嘉美。(國史館)

成文秀論述過這一段基要派與自由派衝突的歷史，並宣稱萬國教聯是為維護純正信仰而戰的團體。以麥堅泰為首的萬國教聯，其根源與從普林斯頓神學院分裂出來的威斯敏斯特神學院的基要派背景有關，麥自許為基要派精神領袖梅欽的繼承人，通過他的宣傳機器以及積極聯繫反共力量，使他躍身成為基要派的領袖，他與臺灣護教反共的關係極深，影響著臺灣黨國基督徒的神學偏向。<sup>41</sup>

周聯華在《回憶錄》提及萬國教聯的「不良記錄」，他們曾在韓國的長老教會興風作浪，導致了韓國長老教會的分裂。關於這段歷史，顯然並非如周聯華所描述得那樣簡單。的確，普世教協與萬國教聯的矛盾在韓國長老教會發生了重大的影響，以致於 1954 年導致長老教會分成兩個陣營，分作「統合」和「合同」兩派，甚至神學院也分作兩個陣營：Jungshin 大學和總神大學 (Chong shin

40 「基督教反共十字軍」在 1965 年曾於臺灣設有「中國總會」，幹事為信致文。「基督徒十字軍」代表哈吉斯曾把蔣介石、蔣宋美齡與韓國李承晚總統並列作「當代三位基督教巨人」，見《外籍人士對蔣總統之推崇》，臺北：國防研究所，1959/1966，23-26。

41 成文秀，《基督教與國際共黨》。



University)。<sup>42</sup> 這個區別仍然一直影響到今天，2013年在釜山舉行的普世教協大會，保守陣營或基要派教會人士仍到會場上去抗議示威。這些激烈的衝突不應僅僅理解為教會的分裂，事實上應該同時看到教會的多元，以及兩派人士分庭抗禮的平衡關係，這種現象與臺灣的情況非常的不同。臺灣和韓國教會在反共年代的情況相當相似，但結果卻非常的不同，所以與普世教協有關係的教會的命運當然也很不一樣。對照來看，更可以看出臺灣的發展結果是令人非常惋惜。

韓國教會在萬國教聯與普世教協的矛盾主要是基要或開放的問題，儘管臺韓兩地當時也在一種反共的氛圍中，而且普世教協被評作與具共黨背景的教會或團體組織互往也成了質疑的問題之一。但是情況是，一方面韓國政府並沒有介入教會的表態和選擇中，另一方面是韓國教會雙方的陣容還算是平衡或勢均力敵、不相上下，尤其韓國普世教協的教會立場比較是從人道主義的立場上來為自己辯護，所以反共或親共與否的問題相對而言並不十分被突出。

臺灣和韓國的情況非常不一樣，因此周聯華說萬國教聯使韓國長老教會分裂

42 參見려용덕 (呂惠惠), 그리스도교사 (基督教史), 서울 (首爾): 문화출판 한강 (文化出版, 漢江)。1958年, 韓國基督教長老會中有一派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 路線者, 向總會提案「退出 WCC 建議案」。此問題源起於 1951 年的戰爭, 使韓國政府首度臨時遷移到釜山避難, 並在對抗共產黨時, 高麗派以二十二名國會議員的名義批判責備韓國的長老會為「容共」團契, 意即容納共產黨之意, 長老會總會與國際性聯合機構, 就以普世教會協會 (WCC) 是與共產國家有關聯的教會, 以此為理由就把政治性的問題浮出水面。在這種情勢之下, 以表達進步的韓國基督教教會聯合會 (KNCC) 為路線的教會和表達保守路線的大韓基督教聯合會 (DCC) 的教會, 就成為兩大門派的政治教會之支柱, 以致演變成了與韓國長老會分裂的深谷。大韓基督教聯合會 (DCC) 是保守派的聯合機構, 他們是因為反對 WCC 普世性運動的立場而在 1967 年 12 月創立的機構, 會長金允燦牧師以及當時的領導級人物是創立的主要人物。大韓耶穌教長老會合同、高神 (高麗神學院)、耶穌教大韓聖潔教會 (聖教會) 等他們以教派或個人名義加入並協助, 1974 年他們因為對國家權力的服從問題而與 KNCC (韓國基督教教會聯合會) 有了衝突。1959 年大韓耶穌教長老會 NAE 路線的分裂症狀, 終於在 1959 年 9 月 24 日大田中央教會開辦的 44 屆總會中成為「合同」與「統合」的分裂起點, 因京畿長老會會員權益的問題而導致 12 次流會混亂的場面, 在此過程中, 總會長盧震鉉牧師在宣布決議時, Aan Gang kuk 牧師上臺朗讀執行委員會對此的不信任案而使雙方決裂, 從此合同與便分裂, 於是統合在 9 月 29 日首爾蓮洞 (Youn Dong) 教會招聚開會而成立「統合派」, 合同在勝洞 (Sung Dong) 教會也招聚開會而成立「合同派」。



的情況絕非一句話可以說清楚的，況且歷史和文化的元素也應該考慮在內。事實是，韓國長老教會分裂不同於臺灣教會的情況。臺灣的情況是，除了有政府力量介入教會之外，基要派全面的勝利並且一面倒的以反共牽制著護教的論述；基要派本身的護教已無可避免地被政治上的反共全面主導，從對聖經的解釋以及對參與教會團體的選擇問題上，「政治正確」決定了「信仰正確」，臺灣的教會全面倒向政府、全面倒向以政府的意識形態為依歸的團體和組織為認同的對象，只剩下長老教會「孤軍奮戰」。從 1965 年戰到 1970 年，當年共同發表《教會合一性》的另外三大教派都早已紛紛表態「支持政府反共」、「割斷與普世教協的關係」，可想而知，長老教會遭到「背叛」（先是信義會，後是聖公會和衛理公會前後離它而去），內心的感受實在難以言喻。

回到韓國教會的歷史，韓戰 1950 年爆發，之後韓國的命運似乎與臺灣一樣，捲入了冷戰的反共時期。但是韓國的情況並不如周聯華所說得那樣令人失望，儘管還是分裂了，但基要派與自由派勢均力敵，沒有被政治力借基要派滲透入教會。韓國教會的分裂是（長老會）內部的分裂，至少還是保留在一個大的長老會體系中，不像臺灣，分裂是由外部來的，分化從外部滲透而來；而且在韓國，內部的矛盾仍然是在一個總的長老教會體系之中，再如何的分化仍然具有機會面對面。甚至，除了部份的長老教會，韓國站在普世教協這一邊的教會還包括了衛理公會、聖公會、信義會等，不像是在臺灣，全是一面倒的，長老教會在普世教協那一邊，其他的則站在他的對立面。臺灣長老教會的分裂是內部的分化以及外部的矛盾，再加上政治力的介入，使長老教會的處境更顯得艱難，矛盾的結果對長老教會支持普世教協的一方無任何有利的條件。

換言之，在韓國的普世教協與萬國教聯可謂勢均力敵，不像在臺灣，一方面是站到了官方那裡去，加上萬國聯會又「藏身」於亞聯會和世聯會的那些黨國基督徒背後，因此其可以發揮的作用是巨大的。

另外，其他的外圍因素也不能不考慮在內。例如臺灣的現實是語言與歷史文化在以外省人為主的教會，和以本省人為主的教會有一種天然的分離作用，這不



是任何人刻意造成的。忠誠的問題可以因為語言的分歧大作文章，表面上語言只是一種溝通的工具或媒介，但語言的相互不理解也可能造成彼此的猜疑，尤其是執政者又對此特別地不在乎，這幾乎可以說是檢驗忠誠性的「必然條件」而非「充份條件」，這也不難了解為何所有的獨裁政治與他們推行的國語政策都存在著微妙的關係。

萬國教聯對亞聯會和世聯會的影響或主導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張靜愚本來就不是一位從教會牧職背景出來的基督徒，也沒有受過任何神學教育，儘管他表現出不能過於倚重成文秀，且儘可能地與萬國教聯保持一定的距離，但礙於他本身不具有與國外教會聯繫的網絡，所以也就沒有選擇必須倚重國外與萬國教聯有關係的護教反共人士，特別是日本和南韓的力量。

除了麥堅泰和成文秀外，亞聯會在韓國和日本的活動非常依賴萬國教聯在韓國和日本的代表，他們分別是金鐘根 (Kim Jong-Gaun) 和星野榮一 (E. Hoshino)，這兩位重要的人士分別是萬國教聯在韓國和日本的負責人。<sup>43</sup> 我們從亞聯會和世聯會的活動中，經常可以看到金鐘根和星野榮一兩人的身影，他們都曾分別擔任過上述組織的理事長，從 1965 年亞聯會開始，他們兩人的名字就已出現在會議手冊上，並經常受邀成為歷屆會議的重要講員。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萬國教聯的國際網絡給張靜愚的支持，不僅是國際友人的聯繫，還包括神學上的基要派立場，都受到麥堅泰的影響，如此一來，把亞聯會視為基要派組織當然不為過，把張靜愚當作萬國教聯在臺灣的代表同樣也是無疑義的。總之，美國基要派在護教反共的時期找到了「滲透」亞洲教會的機會，他們在韓國成功了，同樣的，在臺灣也是成功的，這項成功同時即是成功地將普世教協的勢力逐出了臺灣教會，基要派以反共之名在臺灣取得了關鍵性的勝利。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與以谷正綱為代表的世界

---

43 根據韓國新聞社社長呂惠惠口述，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萬國教聯在韓國的主要負責人分別是金允燦、金鐘根和他本人，我是從他那裡了解到許多關於普世教協和萬國教聯在韓國衝突的歷史，並獲得他指引尋得相關的資料及詢問的對象，包括朴永圭牧師的協助。



反共聯盟的關係也是非常緊密的，他們曾以國際組織代表的名義參加了「世界反共聯盟第一屆會議」（1967），以亞聯會代表身份出席的人士有星野榮一、荒原朴水、侯天民等，另外其他的基督教組織如基督教亞洲平信徒聯合會（Asian Lay-Christian Association）、「基督教反共十字軍」（Christian Anti-Communist Crusade Inc.），可見基督教相關團體相當積極涉入此反共組織和活動。<sup>44</sup> 被喻為「反共鐵人」的世盟榮譽主席谷正綱曾多次受邀出席亞聯會的活動並予以致詞，可見亞聯會與世聯會基本的興趣即是為了政治，或與當時主要的反共潮流完全融合為一。<sup>45</sup>



▲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會第二屆代表大會，於1967年10月7日上午在臺北市國賓飯店舉行開幕典禮，由亞聯會理事長張靜愚主持。（中央社）

44 《世界反共聯盟第一屆會議實錄》，1967，出版不詳，190-194。

45 包括了：一、和平必須以自由為基礎（1965年7月12日，亞聯會，臺北）；二、共黨必須將在基督的靈光前毀滅（1966年8月7日，亞聯會，臺北）；三、以耶穌精神對抗共黨邪惡（1968年7月15日，平信徒大會，臺北）；四、為真理與自由而奮鬥（1968年10月20日，世聯會，日本）；五、為維護宗教信仰自由而奮鬥（1972年10月4日，世聯會，臺北）；六、析共黨笑臉和平攻勢及因應之道（1972年10月8日，基督徒反共會，臺北）；七、認清中共對宗教及國際統戰陰謀（1978年10月4日，世聯會，臺北）；八、消除無神論及唯物論的邪惡思想（1981年6月6日，世聯會，日本）。見《為人類自由而奮鬥（下）：世盟榮譽主席谷正綱博士言論選集》，臺北：世界反共聯盟中華民國分會印行，1425-1455。上述所列的時間和會議名稱不少是錯誤的，本文引述照抄錄未做更動，特此說明。



## ■ 反天主教

護教反共的組織主要針對普世教協來的。一方面是他們接受了在共產政權底下的東正教會，加上某些左翼教會團體的加入，即被評作親共，甚而出賣了信仰，向與無神論或共黨有關的團體或國家妥協；另一方面則是接受天主教在內，因此對以基要派為首的護教反共人士看來，即是背離宗教改革以來的新教立場。上述兩方面加起來則是完全是信仰的問題，也就是被質疑其純正性或正統性，恰好又與反共的立場相衝突，護教的意味也就更為強烈。這也可以說明何以天主教在反共的立場上如此的堅定，但基督教護教反共的團體完全不與天主教有任何合作的餘地，問題即在於他們從一開始就與萬國教聯的立場是一致的，對天主教的偏見從來就沒有改變，這當然也與他們攻擊普世教協的護教立場有密切的關係。<sup>46</sup>

萬國教聯對天主教的反對，與黨國基督徒的立場是一致的。在這一段護教反共時期，基督教與天主教的關係也成了一個爭論的焦點，一方面是與合一運動有關，另一方面則是與聖經合譯的問題有關。

## ■ 張靜愚與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

由政府跨部會成立的宗教聯繫輔導小組，在 1966 年 12 月的會議中由臺灣省

46 1965 年四大教派因與普世教協的關係被指控為「親共」行為，在此同時，又因倡議主辦「天主教與基督教聯合祈禱會」，再形成被撻伐的「罪狀」，結果基要派群起攻之，指作與異端勾結，在護教立場上「罪加一等」，盧祺沃在《福音報》上撰文連載指控「聯合祈禱會」是「出賣耶穌」之行為。《福音報》第 284 期到 296 期，從 1966 年 1 月到 3 月間，都有針對此事的報導。將天主教以「異端」論之，王永信的《真道手冊》是重要的思想來源。因此，在此護教反共最為激烈的情況之下，與天主教的關係表示「護教」立場問題，加上普世教協與天主教的善意互動，對「幼稚」的基要派分子而言，又一次找到機會打擊普世教協和長老教會的「信仰理由」。



警務處所提交的「取締普世教會協進會 (WCC) 在臺組織與活動之作業程序」<sup>47</sup>，到外交部情報司於 1969 年 12 月 31 日之報告中，舉證說明了普世教協有「媚匪事實」。<sup>48</sup> 所有針對普世教協的調查、監控之工作，列名為「七二〇專案」，共同由國民黨中央第五小組（簡稱「中五組」）、內政部、外交部、國安局、警備總部及司法行政部調查局聯手進行。除了百年大會及其相關籌備工作之人士被監控外，其他教派的有衛理公會的方大林、樂威廉，信義會的董尚勇，長老會的韋禮遜。為了有效的進行任務，「七二〇專案」會議特別提出：

策動忠貞教會人士以說服、疏導或公開反對之方式促其退出

可見，教會內部的分化或收買之事，當然是理由正當，職業（神）學生或牧師穿梭於教會內當然也就不意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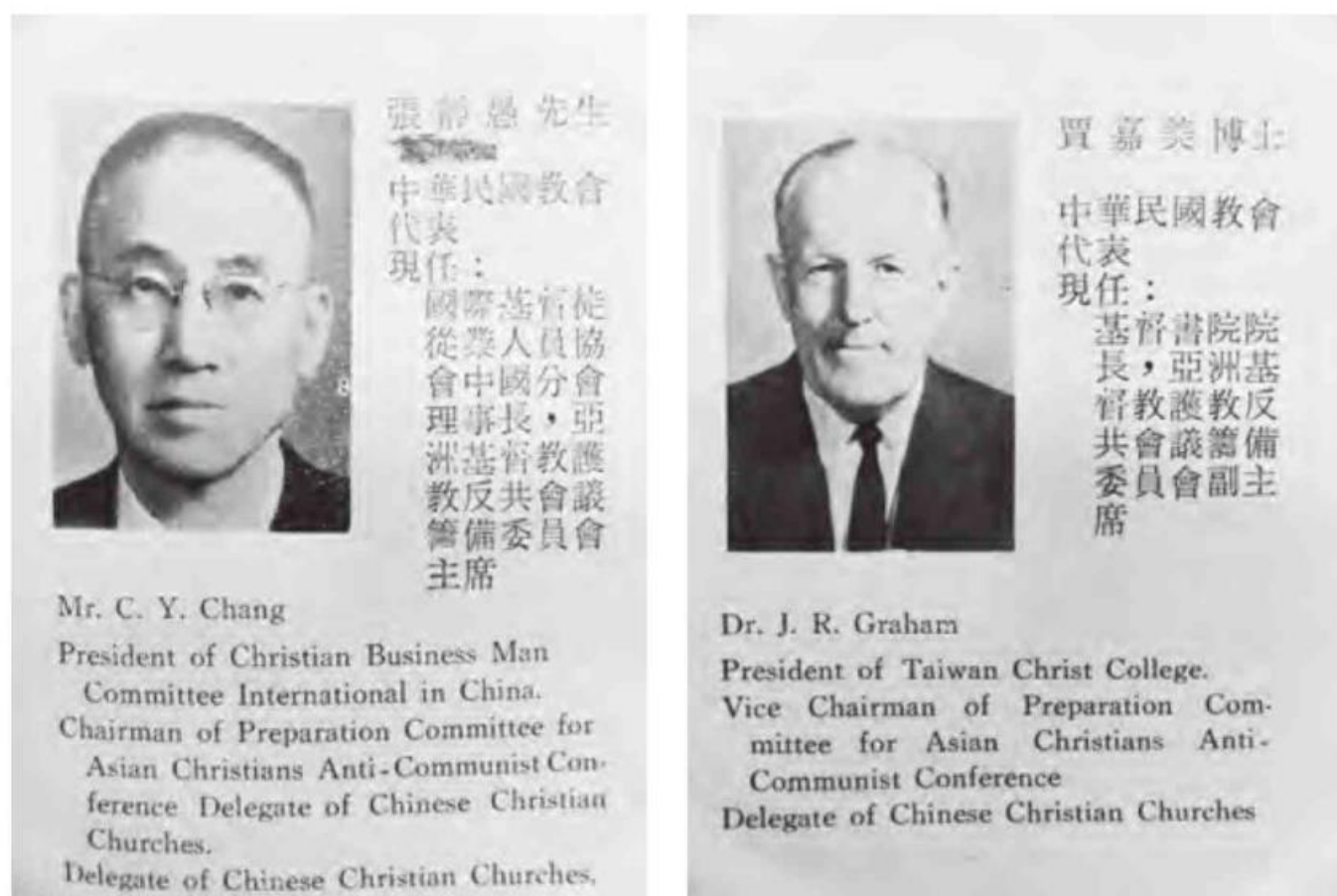
從各種資料上顯示，國民黨中央第五小組與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的工作進行有極為緊密的合作關係，中五組代表為劉耀中，基本上即是定調普世教協為親共團體。所以，通過了中五組策動，於宗教聯繫輔導小組第四十次會議中，提出了「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計劃要點」，<sup>49</sup> 表明第一階段的工作是「譴責共匪紅衛兵迫害宗教並對 WCC 為匪作倂表示遺憾」，第二階段即是「協調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之團體公開譴責 WCC 之親匪行為」，做法包括策動教會自覺、運用教會領袖出面反對 WCC 之曖昧態度、取締涉嫌參加 WCC 之分子，第三階段則是「援用懲治叛亂條例或法令」，將工作提高到法律的層面。

47 國史館檔案，卷名「宗教案件」，入藏號 02000017839A。

48 國史館檔案，卷名「教會活動」，入藏號 02000017840A。

49 這次會議召開的日期為 1965 年 6 月 4 日，會中邀請了陶希聖作報告，對於島內當時教會內的情勢多有分析，關於 WCC 和 ICC 的對立，他是非常了解的。張靜愚曾邀請他參加「陽明山靈修小組」的聚會並作報告，文中可見陶對於 WCC 的分析非常的深入並介入相當的深，見國防部研究院第七期靈修會《陽明山靈修集》第二輯，1966 年 4 月，1-18。





▲張靜愚和賈嘉美同為護教反共之要員。（作者翻攝自《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手冊》）

1965年6月16日，張靜愚致函中五組，向他們報告說：

反共宣傳不夠積極，而國際基督教會中有受共黨滲透，為匪張目者，深引為憂，乃聯絡教會人士，發起舉行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意圖加強教會反共宣傳，期有裨於反共鬥爭。<sup>50</sup>

之後，張靜愚與中五組之詹純鑑商議，向黨部提出補助經費肆拾萬元，以利於會議之召開。

臺灣島內的「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最早發端於1962年，由臺灣福音聯誼會來推動，籌備工作由康峻壁長老負責，主要的成員包括蔡培火、陳溪圳、孫雅

50 國史館檔案，卷名「宗教文物展覽」，入藏號02000016691A。據資料顯示，中五組補助壹拾五萬元於日本舉行之第四屆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第五屆在臺北（即第一屆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則補助叁拾五萬元，見國史館檔案，卷名「亞洲基督教反共聯會案」，入藏號02000017841A。



各等人。<sup>51</sup> 第一次正式的反共會議於 1962 年 6 月 29 日首先於新竹舉行，30 日在花蓮，7 月 4 日在臺中，5 日在嘉義，6 日在高雄。<sup>52</sup> 同年 12 月，在臺北中山堂又擴大舉行大型的基督教護教反共大會。

第一屆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召開前夕，《福音報》第 267 期 (1965/10/3) 大肆以全版刊出「籌備舉行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專頁」，張靜愚以籌委會主席身份發出公開信函，號召全體教會熱烈參與。該次會議的手冊上，臺灣基督教界的主要代表都羅列於其中，長長的一大串名單可謂一網打盡，與「百年大會」互別苗頭的意味非常的濃。值得注意的，名單上卻明顯地排除了當時位居長老會的主要領導人，包括黃彰輝（議長）、張逢昌（副議長）等人，其意識形態考慮可謂不言而喻，某種程度是認為他們「親共」或「不反共」，其中頗耐人尋味的。金仲庵不在內，周聯華只是一般的委員，《真道手冊》編輯人王永信也在名單上，整體而言，「護教反共」的氣勢更盛於「福音來臺一百週年」。



▲中國福音聯誼會，是另一個對抗普世教協的教會聯合組織，亦同作為與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組織的核心力量。（作者收藏）

51 臺灣也存在著所謂的「兩會」：中國福音聯誼會和中華民國基督教會協會。有趣的是，就像中國大陸的情況一樣，「中華民國基督教會協會」是空的，真正推動各類活動的則是「中國福音聯誼會」，後者又是護教反共聯合會真正的主事者，很明顯的，「中華民國基督教會協會」是與教會組織有關，「中國福音聯誼會」則不限於教會組織，主要是以個人身份參加。中國福音聯誼會成立於 1953 年，首任理事長為孫雅各（臺神院長），之後理事長有張靜愚、盧祺沃、黎世芬、吳嵩慶、周文磯等，發行會內報刊《中國福聯》。

52 《福音報》第 111 期，1962/6/24。



附錄（四）：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籌備委員名單

[錄自《第一屆亞洲護教反共會議手冊》1965年]

主席兼常務委員	張靜愚	國際基督徒從業人員協會 中國分會理事長
副主席兼常務委員	陳溪圳	臺灣福音聯誼會拓展委員會主席、 雙連教會牧師、馬偕醫院董事長
副主席兼常務委員	賈嘉美	基督書院院長
副主席兼常務委員	盧祺沃	美國佩帶聖經會遠東區代表及 招待組主任
副主席兼常務委員	吳嵩慶	國際基甸會臺北支會會長
顧問兼常務委員	陳維屏	自由中國基督教協會理事長
顧問兼常務委員	侯天民	基督徒救世服務總會會長
顧問兼常務委員	黃武東	臺灣長老教會總會總幹事
顧問兼常務委員	曾約農	前東海大學校長
顧問兼常務委員	施季言	前東吳大學校長
顧問兼常務委員	蔡培火	國際基督徒領袖負責人
顧問兼常務委員	周金耀	臺灣福音聯誼會主席
顧問兼常務委員	高頌義	遠東歸主協會總幹事
常務委員兼總幹事	康峻壁	臺灣福音聯誼會反共教育委員會主席
常務委員兼副幹事	黃六點	臺灣福音聯誼會財務委員主席
常務委員兼會議組主任	韓時俊	臺灣福音聯誼會副主席
常務委員兼會議組副主任	吳永華	臺灣長老教會牧師
常務委員兼會議組副主任	張啟芳	逐家文字佈道團負責人
常務委員兼總務組主任	林振南	臺灣福音聯誼會書記
常務委員兼總務組副主任	陳金鴻	中國主日學協會幹事
常務委員兼總務組副主任	黃辰尊	浸禮聖經會執事
常務委員兼招待組副主任	應家秉	國際基督徒從業人員協會 中國分會副會長
常務委員兼招待組副主任	賴炳炯	臺灣聖經公會總幹事
常務委員兼宣傳組主任	謝重仁	臺北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
常務委員兼宣傳組副主任	卓宗吟	中華日報副總經理
常務委員兼秘書組主任	榮篤愛	行道會會督



常務委員兼秘書組副主任	廖加恩	遠東歸主函授學校校長
常務委員兼秘書組副主任	王長淦	臺北市南京東路禮拜堂長老
常務委員兼財務組主任	任偉恩	臺灣福音聯誼會平信徒委員會主席
常務委員兼財務組副主任	林我鋒	淡江工商管理專科教務主任
常務委員兼財務組副主任	吳從先	基督徒聚會處長老
委員	董尚勇	信義會牧師
委員	雷法章	(聖公會)
委員	班概明	中國神召會會長
委員	張繼忠	浸信會牧師
委員	周聯華	浸信會神學院教授
委員	吳 勇	南京東路禮拜堂負責人
委員	林 烈	景美教會負責人
委員	寇世遠	靈糧堂主任傳道
委員	吳玄仁	路德會副經理
委員	黃約翰	福音報社社長
委員	楊石林	天橋報社發行人
委員	嚴以霖	標杆雜誌發行人
委員	信致文	基督徒反共十字軍中國總會總幹事
委員	劉我英	婦女祈禱會負責人
委員	成文秀	萬國基督教聯合會中國分會會長
委員	石超庸	東吳大學校長
委員	郭和烈	臺灣基督教神學院代理院長
委員	謝明山	中原理工學院院長
委員	金家祥	臺灣土地銀行總務處處長
委員	高吳生	臺灣神學院教授
委員	高蔭棠	亞盟中國總會秘書
委員	鄭俊樂	青年會團契執事
委員	陳紀彝	衛理女中校長
委員	林義昌	臺灣福音聯誼會幹事
委員	孟慶慈	臺灣福音聯誼會幹事
委員	黃 歧	浸信會文字佈道團負責人
委員	仲偉庭	教會記者
委員	烏行才	天生印刷廠總經理



委員	林自西	林自西三板總經理
委員	石彼得	中國基甸會總幹事
委員	陶 珠	退除役官兵輔導會
委員	王倩霞	臺灣浸信會神學院董事
委員	譚畏民	浸信會牧師
委員	吳可棟	中山堂主任
委員	丘國棟	信義會牧師
委員	謝鴻範	中國長老會牧師
委員	王永信	真道手冊編輯人
委員	朱嘉賓	浸禮聖經會會友
委員	盧美村	信友堂牧師
委員	劉晉奇	臺灣長老教會牧師、 福音聯誼會臺南區負責人
委員	倪頌德	高雄國語禮拜堂創辦人
委員	史國斌	左營教會長老
委員	柯勒曼	拿撒勒人會牧師
委員	鄭錦榮	臺灣長老教會牧師、 彌賽亞合唱團指揮
委員	李廣業	神召會臺光聖經學院教務主任
委員	劉家玉	中原理工學院教務主任
委員	丁曉亮	基督徒聚會處創辦人
委員	孫景華	臺灣鋁業公司總經理
委員	黎世芬	中國廣播公司總經理
委員	黃逢時	新生教會創辦人
委員	李幫助	道生院院長
委員	吳榮章	浸信會聯會主席
委員	李士琦	衛斯理團契牧師
委員	唐主謙	救世廣播協會負責人
委員	俞汝良	臺北市衛理堂執事兼主席
委員	穆靄仁	衛理公會負責人
委員	曲可寬	中央日報



張靜愚所成立的亞聯會和世聯會，確實得到萬國教聯會長麥堅泰不少的協助，他在會議的致詞中特別提到：

多年以來，世聯會曾舉行兩次全體代表大會，在兩次會議中，吾人曾蒙麥堅泰博士兩度光臨為吾人之主講員，根據其多年來反共經驗，曾貢獻其極具價值之深謀遠見。<sup>53</sup>

雖然萬國教聯與中華民國政府的互動非常良好，且部份臺灣的護教反共人士也參與萬國教聯的活動，但顯然地，黨國基督徒打算另起爐灶，這可能是與當時蔣介石的反共與對外政策的立場有關，一方面不願被外國組織牽制，另一方面則是減少外國勢力的涉入，以利於掌控。也許，最為關鍵的是，中華民國的護教反共有自身的政治議程（反攻大陸），所以另組一個組織無疑是一種把反共的力量置於主動的位置，特別針對與自身民族主義立場有關的議題，同時也可以作為防範共黨勢力滲透島內教會的一種力量，畢竟反共戰略中其中一項即是「反滲透」。中華民國自組的國際性護教反共組織—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就在這種諸多的考量和氛圍下形成。



◀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第二屆代表大會，1972年10月4日上午在臺北中山堂光復廳揭幕，由該會理事長張靜愚主持，兩百多位來自全球十四地區代表參加。世盟榮譽主席谷正綱在大會上致詞及大會揭幕場面。（中央社）

53 《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會訊》第17期，1973年8月，16。





▲開幕典禮盛況。（作者翻攝自護教反共聯合會手冊）

毫無疑問的，萬國教聯對亞聯會和世聯會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是成文秀非常積極地宣傳，成了對亞聯會和世聯會護教反共思想或神學方面的指導，另一方面則是亞聯會和世聯會的主要負責人張靜愚等並不具備有什麼神學教育之背景，他們自然倚重成文秀，所以成文秀也就有更多的機會發揮。第二屆和第三屆亞聯會，成文秀都有重要的演講，其內容後來成書，成了亞聯會的代表性著作，1967年出版的《共產國際與基督教》即是上述兩屆會議的結果。

《共產國際與基督教》一書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成文秀在此指出普世教協是如何地親共，這些「中共問題」當然是亞聯會和世聯會高度關注的焦點，這才是中華民國護教反共的核心問題。普世教協支持「中共」的事實包括：

- 1949年主張承認中共政權
- 1958年世界秩序研究會主張承認中共
- 1960年中央委員會主張承認中共
- 1965年世界秩序研究會又再次重申主張承認中共
- 1965年國際事務委員會致聯合國備忘錄提及「中國問題」
- 1966年中央委員會反對越戰並主張承認中共



所以，反共成了打擊普世教協的最高指導原則，普世教協成了護教反共基督徒圈子的「雙重敵人」。<sup>54</sup>

另一方面，由中華民國主導的亞聯會或世聯會，「共匪」（中國共產黨）這個「偽」政權才是他們真正關注的對象，而其中涉及到中華民國當時最為敏感的問題，即這些國外的基督教團體的政治態度，它們不僅沒有堅決地反共、反對共黨把持的政權，甚至還考慮或支持他們加入聯合國，這正是完全違反了「反共抗俄」的基本國策，已經觸及到最為敏感的黨國信仰，如果島內教會與他們有聯繫，無疑地是給了共黨滲透的機會，對反共的國策自然造成了威脅。

因此，普世教協及其相關的組織，正因為在反共的立場上不堅定或不清楚而成了可疑份子。護教反共的理由是，一方面要以反共的理由，另一方面則是站在維護基督教純正信仰的立場上，拒絕與這個團體往來。由於普世教協種種信仰立場上顯然與基要派的立場有所不同，自由派的傾向和熱衷於政治，護教反共的黨國基督徒對此無不質疑，他們形成反擊也相當的自然，因而也就使反共變成具有更強的理由、更為堅決的意志和行動。

從亞聯會到世聯會，護教反共的工作基本上是朝四方面進行：

- 聯絡國際反共力量，凝聚島內反共意識
- 反共黨滲透，特別針對普世教協（支持中共加入聯合國）
- 糾出共黨同路人，避免製造紛亂（干預政治）
- 維護純正信仰，打擊異端（解放神學）

第一屆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成立於 1965 年 10 月 8 日，會議由中華民國基督教聯誼會所促成，假臺北市中山堂舉行兩天，由當時任國際基督徒從業人

54 《共產國際與基督教》這本小書不容低估。成文秀就此總結，那些與普世教協有關係的，已明顯地傷害到中華民國，所以那些參與普世教協的沒有理由不退出的，況且普世教協屬下的教會竟然未發表過任何反共言論，更是說明這些組織早已被共黨滲透，見《共產國際與基督教》，38。



員協會中國分會理事長張靜愚主持召開，副主席為臺灣福音聯誼會擴展委員會主席、臺北雙連教會牧師陳溪圳、基督書院院長賈嘉美 (James R. Graham)、美國佩帶聖經會遠東區代表盧祺沃和國際基甸會臺北支會會長吳嵩慶。<sup>55</sup> 會議籌備會委員名單中，從顧問、常務委員到委員，約有近百人之多，差不多把臺灣當時重要的基督教教會、團體或組織主要負責人或代表都邀請加入，其中黃武東、周聯華、成文秀等人都羅列其中，另外如著名的外籍傳教士如戴紹曾、榮耀秀、道雅伯等均出席參加，可謂陣容浩大。外賓與會者中，主要都是一些在臺灣境內從事教會工作的外籍人士居多，再加上一些華僑，可見此時的國際聯繫還不是特別地強。

《會議手冊》上附有孫中山的肖像，底下的文字敘述：

中華民國 國父孫中山先生是上帝選召的聖徒適值本年十一月十二日是他的百年誕辰。本會議同人謹致最高崇敬和紀念。

附在手冊內的，即是蔣介石特別為此會議的召開電文致詞：<sup>56</sup>

現在正是發動護教反共運動最適當的時機，善與惡、正與邪、光明與黑暗、自由與奴役，是不能並存的，吾人要有信心，在神的指引之下，最後勝利定屬於我們的。

文中特別引用聖經哥林多後書所述的「不要同負一轡」，表示絕對不與共黨有任何的接觸和談判，宣示基督教與共產黨不可能和平共存。賈嘉美除了擔任籌備會

55 在亞聯會召開之前，許多的教派已紛紛表態響應。如中華基督教浸信會聯會於第十二屆年會中議決彙編「浸信會反共言論專刊」，並發表宣言表示堅決反共（《福音報》第 266 期，1965/9/26）；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臨時年會議會第三屆會議，通過「不參加普世教協」的議決案，並表示堅定反共，還特別上電總統，以反攻大陸早日成功（《福音報》第 271 期，1965/10/31）。《福音報》第 267 期於會議召開之前，就以全版刊出此次護教反共會議的「專頁」（1965/10/3）。

56 《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手冊》，1965/10/8-9；另見《先總統蔣公全集》第三冊，2878。



的副主席，他還特別為大會提供了一篇名為〈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的基本衝突〉的文章作為會議的資料（譯者為陶希聖和黎世芬）。<sup>57</sup>



◀ 蔣介石與賈嘉美（中）。  
（國史館）

此次會議主要交由臺灣福音聯誼會負責推動，由於是首次會議，其性質表現主要還是嘗試性的，目的是擴大組織功能，以期下屆召開會議之前可以做好準備，特別是邀請亞洲地區的福音聯誼會派代表參加。<sup>58</sup> 會中有六項提案，主要是

57 〈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的基本衝突〉一文最早於《福音報》中連載，開始於1957年12月29日（第4期）直到1958年7月20日（第31期）。賈嘉美與蔣介石的互動相當地良好，1952年他在美成立一個名為「自由中國基督教大學協會」（Free China Christian College Association），之後，他在臺獲得張靜愚等人的協助於1955年設立中原理工學院（即後作中原大學），所以賈嘉美實為該校的創辦人，但卻因外籍身份無緣於擔任隸屬於教育部的院長一職（即民國初期「收回教育權」之產物），之後又於1959年轉而設立與教育部無關的基督書院。可參見阮若荷，《中國心·宣教情—賈嘉美的一生》，臺北：美國基督教效力會基督書院出版，2001。據說他之所以能當上院長一職，也是蔣介石「默許」下才可行，關於這一點提到的人並不多。

58 事實上，在亞聯會召開會議之前，早就存在護教反共的活動，主辦過「基督教聯合反共大會」（董顯光、陳維屏主講，1961/4/3）、「基督教反共會議」（分別於1962年6月29日至7月6日間在新竹、花蓮、臺中、嘉義、高雄等地舉行）、「中華民國基督教護教反共大會」（菲律賓駐華大使羅慕斯、蔡培火主講，1962/12/3）等，但尚未能確定究竟是不是存在著這樣一個組織，其負責人又是誰，但可以肯定的是，當時康峻壁是籌備人員之一。參見《福音報》第90期，1961/4/16、第111期，1962/6/24、第123期，1962/12/6。另外，陳溪圳的臺灣基督教福音聯誼會之下另設有「反共教育小組」，也主辦過類似的活動。



關注教會被共黨滲透的情形，結合各國反共力量，特別是教會組織應團結共組護教反共聯合會，最終也考慮到如何將亞洲的護教反共力量發展成世界性的組織。尤其第六案最為關鍵，即「反對中共加入聯合國」。<sup>59</sup>



▲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成立前，基督教反共大會於1961年4月3日晚間在臺北市一女中大禮堂舉行，並發表宣言，正告全世界愛好和平人士，中華民國的基督教友將誓死反共到底。基督教反共大會是由中外國籍基督教各教會、教派領袖發起組織，企求耶穌仁愛精神，喚起此人共同消滅共產邪說暴行。（中央社）

會議也起草了一份「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憲章」，明定任務目標、會員、組織及職權、經費等事項。由於本次會議召開於國慶前夕，之後相關的活動均與國慶的參訪和旅遊招待結合起來。第一屆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召開後，教會大宗派組織紛紛表態，如：中華基督教浸信會省聯會第十二屆年會結束並發表「參與反共聖戰」之宣言，刊於《福音報》第266期；<sup>60</sup> 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臨時年會議會第三屆會議，「聯名上電總統請早反攻，並且痛斥普世教協親共份

59 《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手冊》，1965/10/8-9，19-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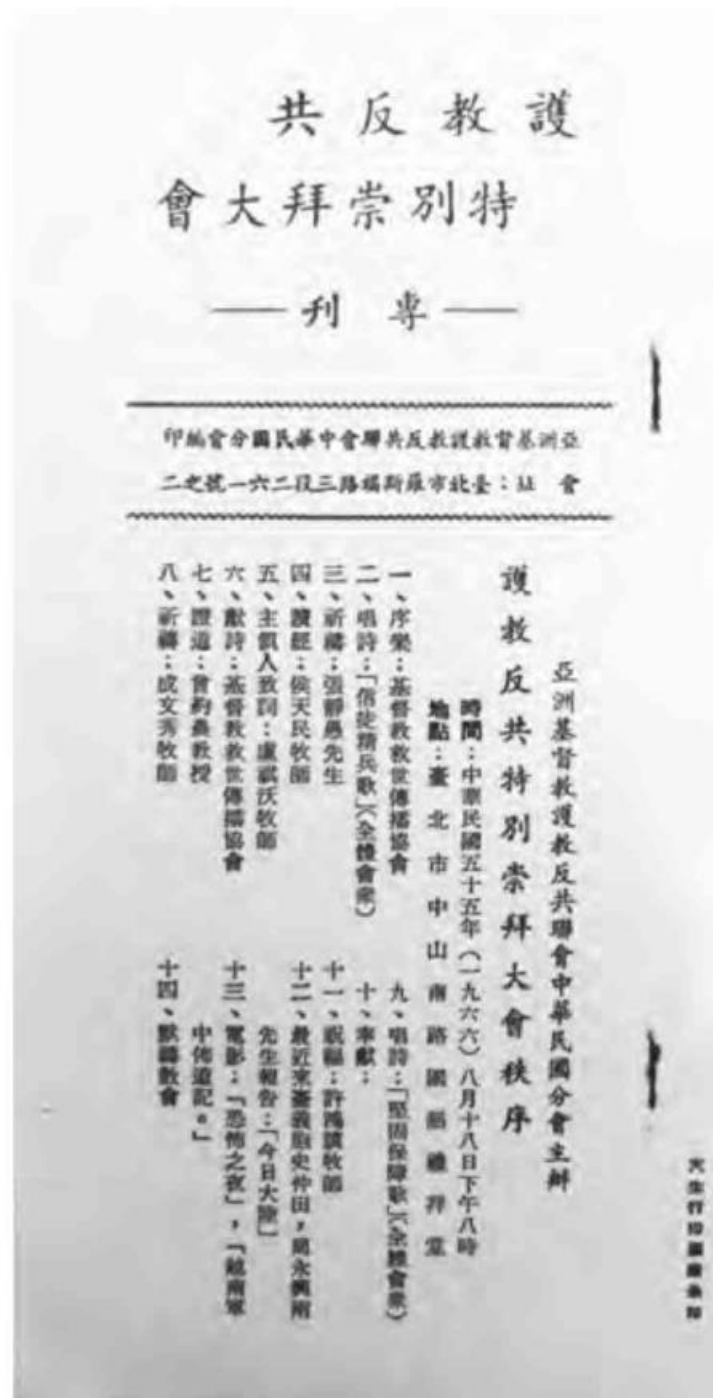
60 《福音報》第266期，1965/9/26。



子」。<sup>61</sup>

次年，在第二屆亞聯會代表大會於臺北召開前夕，亞聯會中華民國分會在臺北市中山南路國語禮拜堂舉行了一次「護教反共特別崇拜大會」，時間是8月18日下午八時，出席此次崇拜的包括有張靜愚、曾約農、盧祺沃、侯天民、成文秀等，救世傳播協會於崇拜中獻詩。此次崇拜的目的是：

請求各教會全體主內同工同道，共同在神面前，恆切祈禱，懇求神施恩憐憫，保守祂的聖教會，不受邪說異端所迷惑，更求恩主救我中華，福佑我總統，早日反攻大陸，還我河山，復我自由，掃蕩共匪妖氛，重建大陸教會。



▲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中華民國分會主辦「護教反共特別崇拜大會」，地點在濟南教會。（作者翻攝）

崇拜大會所發表的〈聲明〉中，強調了在護教反共的旗幟號召底下，其具體目標即是瞄準了國際上各種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或共產國家打交道或聯繫的基督教團體，尤其他們所極力於攻擊的對象即是普世基督教協會，其他任何「親共」組織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接觸的基督徒，都一概認為是背離信仰的，一概地被形容為「自由主義」或是「新派」之「邪說」，〈聲明〉中還點名批判了德國神學家邦厚福 (Dietrich Bonhoeffer) 及其在美國的宣傳者阿迪哲 (J. J. Altizer)。<sup>62</sup>

61 《福音報》第 271 期，1965/10/31。

62 〈亞聯會中華民國分會護教反共特別崇拜大會的聲明〉(1966 年 8 月 18 日)，《護教反共



由於矛頭指向普世教協，在這次特別崇拜的〈聲明〉裡，也暗示性地向長老教會發出呼籲：

已直接或間接參加了（WCC）或（NCC）的教會，應該群起抵抗所謂自由主義之新派異端，及其親共罪行。我們一同在護教反共的基督陣營裡，齊心努力，我們在國家是同胞，在教會是同道。

這份印得精美的護教反共崇拜專刊，裡面主要的內容都是針對普世教協和美國基督教協會（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的「親共」事實：「引共匪進入聯合國」。〈聲明〉中指證歷歷：

最顯著而舉世週知者，當為普世教會協進會（WCC）與其系屬之美國基督教會協進會（NCC）之親共份子，其以往之種種傾向無神主義共產黨之昭然若揭的事實，姑不細究，單就其最近不及一年所作之親共的事蹟，已足驚人，且令人疾首痛心而深惡痛絕者也，如在去年九月二十四日由普世教協（WCC）所屬之國際事務委員會（CCIA），正當聯合國召開大會前夕，而向聯合國致送備忘錄，建議「停止越戰」，「承認中共匪偽政權」等荒謬主張，迄十月二十三日又有美國教協（NCC）所屬之世界秩序研究會重申其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所呼籲「承認中共匪偽」之主張，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由莫斯科浸信會領袖所發出致世界各教會之通函（據聞已寄達臺灣），呼籲「中止越戰」，旋於本年元月二十三日紐約時報刊登竟有上千

---

特別崇拜大會專刊》，22-23。這份文獻的價值非常的高，基本上所有對普世教協的指控都清楚的明列於此，該項〈聲明〉更是前一年成立護教反共聯合會之後，最為明確表示此一組織的任務和目標，並以此對教內的人士作出呼籲，團結護教的力量，以作為反共的堅實基礎。值得注意的是，這群黨國基督徒的宣言竟提到德國神學家「潘霍華」，根據他們的譯法（「邦厚福」），完全可以推斷出此其來源與改革宗翻譯社有關，因為這個譯法只見於《信仰與生活》，這份刊物最早出刊於1953年，並以批判「現代神學」為旨，潘霍華為其批判之對象之一。2005年，本人在中原大學主辦「基督與世界：潘霍華神學研討會」，董事會就特別派人來監督該次會議，認為我們召開「神死神學」之會議極為不妥，至今才了解其中的原委。



之美國教會人士的響應。普世教協於今年二月在日內瓦召開的中央委員會所作之十項決議案，不外順應蘇俄共產主義化教會之呼籲，「反對美國介入越戰」，並主張「立即承認中共」，今年二月美國教協之總部會議，除追認世界秩序研究會上年十月之建議以外，並對中共政策發表宣言。仍是主張承認共匪政權，乃至今年三月間在美國召開之各宗教高階層會議，以響應當時一班姑息份子正在高唱入雲之呼籲美國改變對越南政策，撤退在越南駐軍，對中共實施「圍堵而不孤立」和立即承認中共等謬論，從以上這些不容抹殺之一連串的事實。<sup>63</sup>

可見，所有護教反共的主張，其對手總是指向普世教協。但對亞聯會而言，其「中國問題」成了首先被關注的事：到底在對待中共是否加入聯合國的立場上，尤其是最為關鍵的判斷標準，若是在此立場上有所鬆動或不同，就一概以予反對，在信仰上就指稱其為異端，理由是支持「無神論共黨」是違反基督教信仰和聖經的立場的。



▲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第四屆代表大會，1978年10月4日上午在臺北中山堂揭幕，來自世界各國和中華民國的基督各教會代表二百多人參加。籌備會主席團黎世芬等參加揭幕禮，中華民國副總統謝東閔在會中致詞。（中央社）

63 《護教反共特別崇拜大會專刊》，22-23。上述這些詳細的資料很可能是成文秀所提供的，因為相關的指控已見於1965年的《駁復「正告主內兄弟姊妹們教會合一性」書》的內容中。



## 附錄（五）：亞聯會中華民國分會護教反共特別崇拜大會的聲明（1966/8/18）

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中華民國分會，自今春成立以來瞬息半載，各項工作開展，均能按照預定計劃，逐步推行，我們為此感謝讚美神恩！今天我們首次舉行護教反共特別崇拜大會，承教會主內同工同道，及各界人士，賁臨參加，實不勝感幸之至！爰就舉行此一特別崇拜大會之宗旨願望與呼籲，敬謹作如下之聲明：

我們舉行此一特別崇拜大會之宗旨，為要闡明本會唯一目的，乃聯合各教會，共同維護我基督教純正信仰，高舉聖經真理，駁斥邪說異端，並確定基督教之堅決反共立場，提高警覺，絕不容共產國際，滲透於基督聖教會內，我們舉行此一特別崇拜大會之願望，當主耶穌在世行道三年將完，臨去耶路撒冷赴難之前，曾傷痛的說：「然而人子來的時候，遇得見世上有信德麼？」（路十八8）。當茲末世，人心唯危，道心唯微，道德陵夷，信仰歪曲，主耶穌早已見及，故預先作此做告。試看所謂「自由主義」（Liberals）之「新派」邪說，由懷疑聖經並非完全出自神的默示，而不信主耶穌之道成肉身，釘死十架身體復活，四十日升天並將二次由天再來，等基本要道。近復由邦厚福 Dietrich Bonhoeffer（一九〇六～一九四五）導始，又阿迪哲教授 Prof. T. J. J. Altizer 等發揚的「神死了」之褻瀆性的邪說，誠異端之尤者。此外更有一些教會受了共產主義毒素的滲透，甘為其所利用，不獨擾亂了基督聖教會，抑且危害了人類安全與自由。最顯著而舉世週知者，當為普世教會協進會（WCC）與其系屬之美國基督教協會（NCC）之親共份子，其以往之種種傾向無神主義共產黨之昭然若揭的事實，姑不細究，單就其最近不及一年所作之親共的事蹟，已足驚人，且令人疾首痛心而深惡痛絕者也，如在去年九月二十四日由普世教協（WCC）所屬之國際事務委員會（CCIA），正當聯合國召開大會前夕，而向聯合國致送備忘錄，建議「停止越戰」，「承認中共匪偽政權」等荒謬主張，迄十月二十三日又有美國教協（NCC）所屬之世界秩序研究會重申其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所呼籲「承認中共匪偽」之主張，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由莫斯科浸信會領袖所發出致世界各教會之通函（據聞已寄達臺灣），呼籲「中止越戰」，旋於本年元月二十三日紐約時報刊登竟有上千之美國教會人士的響應。普世教協於今年二月在日內瓦召開的中央委員會所作之十項決議案，不外順應蘇俄共產主義化教會之呼籲，「反對美國介入越戰」，並主張「立即承認中共」，今年二月美國教協之總部會議，除追認世界秩序研究會上年十月之建議以外，並對中



共政策發表宣言。仍是主張承認共匪政權，乃至今年三月間在美國召開之各宗教高階層會議，以響應當時一班姑息份子正在高唱入雲之呼籲美國改變對越南政策，撤退在越南駐軍，對中共實施「圍堵而不孤立」和立即承認中共等謬論，從以上這些不容抹殺之一連串的事實看來，我們舉行此一特別崇拜大會，並具至誠懇至迫切的願望，就是請求各教會全體主內同工同道，共同在神面前，恆切祈禱，懇求神施恩憐憫，保守祂的聖教會，不受邪說異端所迷惑，更求恩主救我中華，福佑我總統，早日反攻大陸，還我河山，復我自由，掃蕩共匪妖氛，重建大陸教會。

我們舉行此一特別崇拜大會之呼籲，我們衷心的呼籲各教會主內同工同道們，不忘為本會代禱，使我們順從主的領導，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我們衷心的呼籲，尚未參加本會之各教會主內同工同道，及早參加本會，好在主裏同心合意，共同為神的道並為主耶穌基督作見證，我們衷心的呼籲，已直接或間接參加了（WCC）或（NCC）的教會，應該群起抵抗所謂自由主義之新派異端，及其親共罪行我們一同在護教反共的基督陣營裡，齊心努力，我們在國家是同胞，在教會是同道。

最後本會還有以下兩點嚴正聲明：（一）我們以誠懇熱烈的心情和無條件的代價，竭力支援大陸同胞反共反毛的抗暴運動，我們更希望匪首核心的權力鬥爭急速促使共匪偽政權瓦解。（二）我們有一貫的態度和立場，即是始終堅決反對共匪加入聯合國。我們深信，上帝的教會是最後戰勝共產邪說的勝利者，阿們。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八月十八日



## 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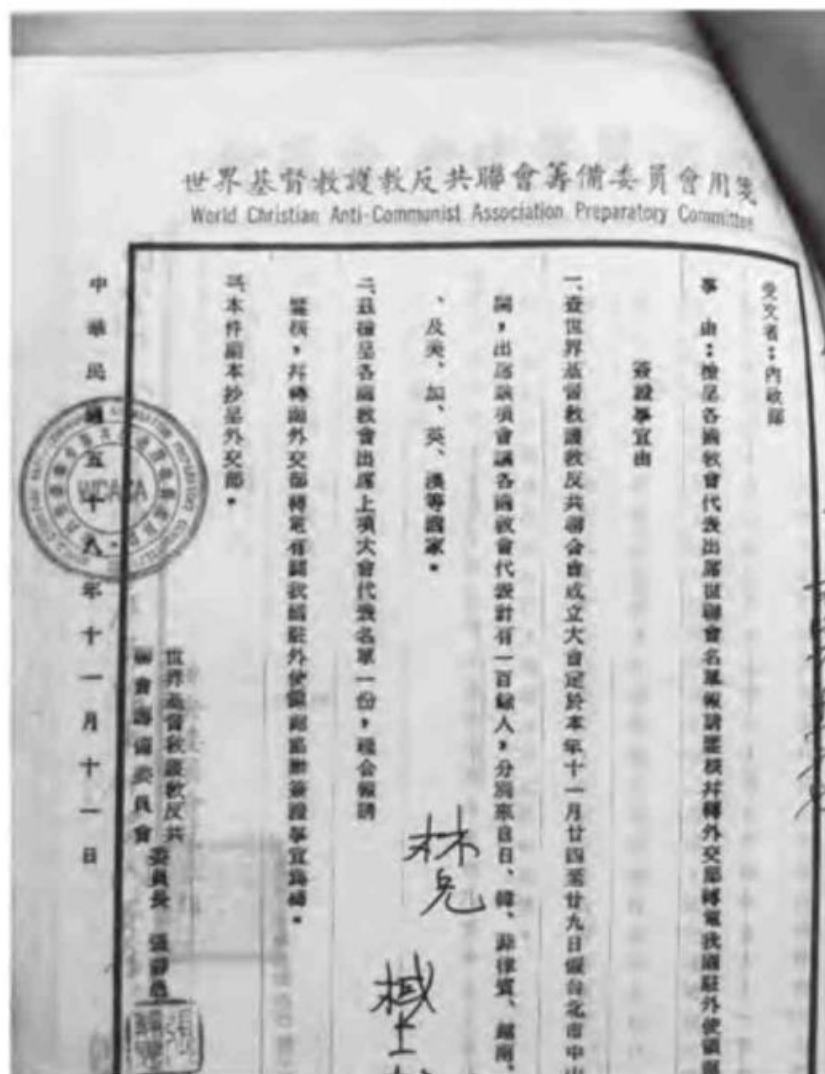
▲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分別於漢城、東京舉行。(作者翻攝自《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通訊》)



第三屆亞聯會移師到韓國，第四屆在東京舉行。

1968年10月27日至11月2日，在東京舉行亞聯會之際，提出了為適應時勢的需要，有必要在召開「第五屆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議」之同時，將之擴大為世界性的聯合會，這次會議於是決定了將於下屆在臺北舉行亞聯會之時，即擴大籌組「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為籌組1969年年底之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大會，亞聯會先在各地進行宣傳活動，包括1月29日在臺北市許昌街青年會禮堂主辦座談會、3月4日在臺北延平南路實踐堂舉行由日籍牧師荒原朴水主持的反共佈道大會、在臺中民族路長老會亦舉行反共佈道大會等。<sup>64</sup>

事實上，這兩個組織的基本成員和目標以及其工作的性質都是一樣的，世聯會成立之後亞聯會仍然存在，1972年6月20日為籌備第二屆世聯會會議中提案通過，隔年（1973）才正式將兩者完全合併。<sup>65</sup>



◀從「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擴大成「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之籌備會致給內政部的信函。（作者翻攝）

- 64 後兩個大會於會後還放映了中央電影公司出品的「還我河山」影片。本片由李嘉、李行、白景瑞聯手執導，葛香亭和唐寶雲主演，獲得金馬獎優良影片最佳發揚民族精神特別獎和第十四屆亞太影展最佳美術設計獎。劇情是戰國時，燕將樂毅統五國兵進攻齊國，後來齊國的田單縱火牛，收復舊地。其意甚明，即「反攻大陸、復國必成」是也。
- 65 《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中國總會會訊》第11期，民國61年7月10日。從第13期的《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中國總會會訊》（民國61年10月1日），到第14期出刊則變成了《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中國總會會訊》（民國62年2月）。



為迎接從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推展到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之召開，《福音報》的社論大表歡迎並加碼宣傳：

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簡稱 WCACA）的成立，說明了一樁不容忽視的事實：那就是全世界的基督徒們，已經從共產主義的美麗謊言中覺醒。並且在許多血腥的事實中得到了教訓。證明基督徒不能再沉默忍耐，必須化悲憤為力量，把流淚禱告變為積極的戰鬥。所以，我敢大膽地說：「WCACA」的成立，也就是全世界基督徒向赤魔共黨全面宣戰的最後通牒。

所以，我們今後必須利用講臺、電視、電影、家庭訪問等機會，盡量揭露共黨敵基督反人性的真面目，間或展覽共黨迫害宗教的真實記錄，或延聘從鐵幕歸來的傳道人。講述他們身受眼見的種種暴行。以喚醒一般人的敵愾心理。須知基督徒的最大敵人是罪惡，而共產主義者就是罪惡的化身，這是我們反共宣傳中應該特別強調的中心。<sup>66</sup>

「世聯會」（World Christian Anti-Communist Association, WCACA）標誌清楚是在「為真道打美好的仗」，其六項任務為：

- 一、「護教反共」是每位基督徒的責任
- 二、「護教」是守道、傳道、行道
- 三、「反共」是榮神、愛國、益人
- 四、「世聯會」是世界基督徒的聯合會
- 五、參加「世聯會」是團結精兵隨主爭戰
- 六、贊助「世聯會」是伸張公義維持和平

---

66 〈護教反共要有行動〉（1969/11/31），收入重提編著，《雲彩》，166。



在反共的旗幟底下，世聯會成了一種名副其實的大公教會、「普世教協」。<sup>67</sup>在《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憲章》第一章「總則」第二條載明：

本會遵奉聖經維護純正信仰，對抗共黨侵略及其無神邪說，以促進世界人類真正和平為宗旨。

世聯會把所有的目標都指向全面反共，以及以消滅共產黨為目的。一方面，指出共產黨的各種惡行惡狀，認為它與基督教的教義全然相背，所以反共即為維護自由與和平、以及人性的價值和尊嚴，因此也同樣是維護基督教信仰，並視為是「廣傳福音拯救人類」的任務和使命；另一方面，促使一切的組織和國家將共產黨視為非法和暴力的政黨，為了維護自由以及世界和平，應全面根絕共產黨，不給予任何的餘地，包括其在政治上的權利。

當然，世聯會把具體的目標置於中華民國的命運上，呼籲支持中華民國的復國大計，此復國大計和大韓民國、越南共和國和德意志共和國的理念和立場相同，即早日實現統一。可見「反共」與「統一、復國」的目標是一致的，這個目標的完成者當然是中華民國的政府，言下之意，只有中華民國才是真正的、合法的政府，反共與國民政府收復大陸，在與基督徒維護信仰的行動上是一致的：反共即護教，護教即反共。

成立世聯會的籌備會，於1969年11月24日於臺北市延平南路實踐堂召開，由張靜愚擔任委員長。正式成立的開幕禮於25日早上九時舉行，地點為臺北市中山堂光復廳，蔣介石送來了賀詞，副總統嚴家淦先生出席並代表致詞，會議中選舉了張靜愚擔任第一任世聯會理事長，閉幕禮於11月27日下午五時三十分舉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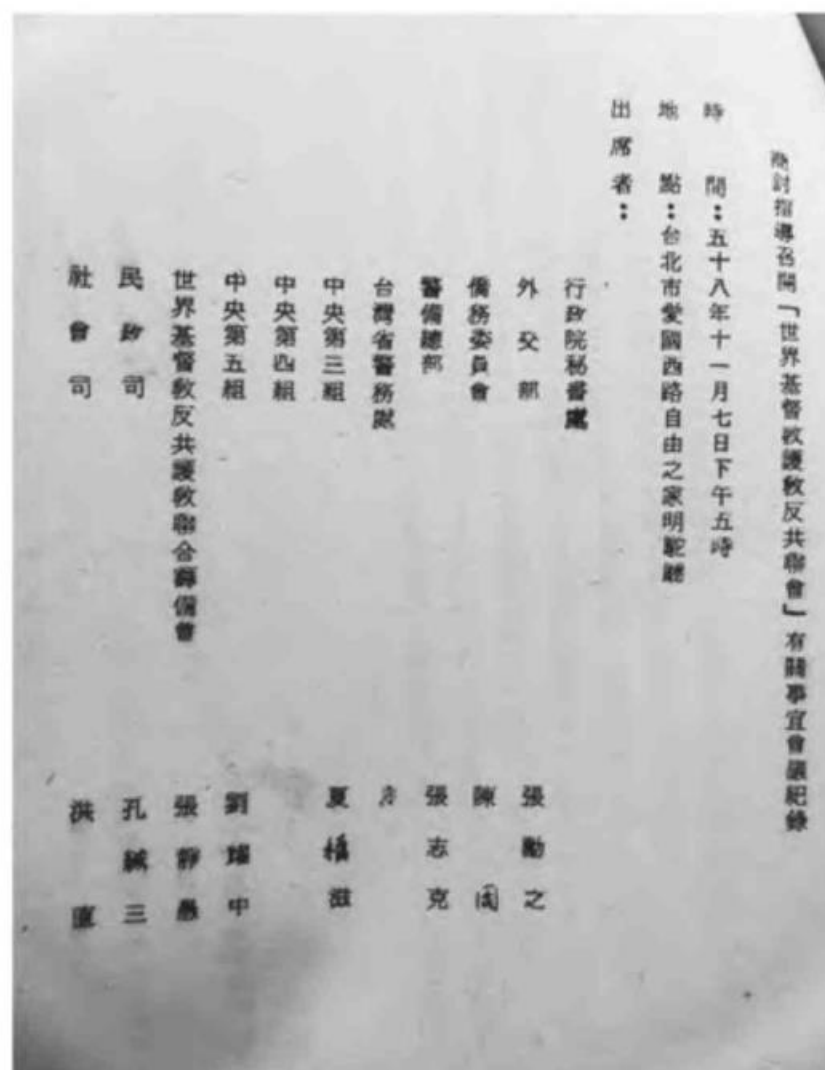
---

67 張靜愚報告，「中華民國基督教牧師長老座談會會議記錄」，載《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中國總會會訊》第13期，民國61年10月1日。





▲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的會議記錄。(作者翻攝)



▲「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之籌備會召集人張靜愚與政府相關部份代表出席的會議。(作者翻攝)



▲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和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出版的通訊刊物。(作者翻攝自《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通訊》)



世聯會的召開，特別提到了亞聯會過去所做的事，並肯定亞聯會四年來的表現。本次大會成立之初，即發佈「大會宣言」，重提護教和反共的兩大目標：

一、護教目標：

- (一) 維護我基督聖經真理之純正信仰。
- (二) 爭取信教自由，傳教自由，崇拜自由。
- (三) 駁斥一切異端邪說。

二、反共目標：

- (一) 反對共產黨無神唯物主義之謬論。
- (二) 反對共產黨背人性、踐倫理、迫害宗教之殘暴罪行。
- (三) 反對共產黨黷武好戰之侵略政策，及其在國際間之一切滲透顛覆陰謀活動。<sup>68</sup>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五次正式會議中，正式通過了韓國代表團的提案：

案由一：反對 WCC 促使聯合國承認中共之任何努力，以及 WCC 所表現容忍共產主義之態度。

案由三：反對有如像 WCC 所代表之類型的基督教，並且迫切需要傳揚純正福音。

關於這一點，在閉幕禮上所宣讀的「大會宣言」則更為明確：

駁斥普世教協 (WCC) 及美國教協 (NCC) 之歪曲信仰與親共行為，並堅決反對承認中共偽政權及任何牽引其介入聯合國之荒謬主張。<sup>69</sup>

代表會也確立了世聯會的會歌為〈奮起為耶穌〉（時收入於《萬民頌揚》第 577 首），又是一首「（屬靈）戰爭」意味濃厚的歌曲，為配合會旨，部份歌詞還特

68 《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第一屆代表大會紀錄》，1969/11，30。

69 《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第一屆代表大會紀錄》，1969/11，30。



別的做了改動，改作「魔鬼共產」、「戰勝共產黨」之字眼：

奮起！全世界的信徒  
認清魔鬼共產的罪行！  
看哪！撒旦抵擋真理  
危害天國的和平福音  
奮起！全世界的信徒  
讓我們攜手同心前進！  
看哪！基督已經得勝  
我們要靠主勝過魔君  
奮起！全世界的信徒  
跟隨榮耀的救主前進  
看哪！勝利已在面前  
榮耀冠冕留待得勝人

副歌：

奮起，奮起，全世界的信徒  
奮起，高舉我主的十字架  
戰勝共產黨  
跟隨救主行

另外，世聯會曾規劃出版一套護教反共叢書，第一本即是《何謂解放神學》，譯者是自稱作華北神學院第四任院長的胡鴻文。<sup>70</sup> 此套叢書預計出版的專冊還包括：<sup>71</sup>

70 《何謂解放神學》一書原是萬國教聯第十屆（1979）世界大會 William R. Leroy 的演講稿，成文秀同樣譯過此文，見《護教反共叢談》第十一篇，臺北：協林印書館，1982。

71 見吳嵩慶，〈弁言〉，見《何謂解放神學》，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中華民國總會編印，1989。這套叢書究竟出版了幾本不得而知，但另外見到的是李占澤的《聖經與三民主義》，



評述普世教協 WCC 的觀念與活動

評述中共三自教會

唯物主義的謬誤與弊害

神學理論的認識與辨正

信心與行為

現階段教會的社會使命

當前基督徒應有的態度與責任

要作捍衛真理正義的戰士

基督教愛仇敵的正確詮釋

中國文化基督化的理論與方向

世聯會的成立可謂熱鬧非凡。據悉，此次大會之代表有來自美國、加拿大、韓國、日本、香港、菲律賓、汶萊、新加坡、印尼、越南、澳洲、芬蘭、西德、挪威、瑞典、英國等十九個國家及地區，計約一百六十餘人參與。世聯會正式會議日程是由 25 日至 27 日，每日上午八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至六時，假中山堂

---

亦是署名「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編印出版」(1986)，以及劉真光著《宗教統戰論叢》(臺北：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中華民國總會，1982)。在此之前，亞聯會和世聯會也曾有過一些零星的譯作出版，例如麥克伯尼 (Rev. W. S. Mc Birnie)、葛蘭德 (Rev. R. Grant)，《基督徒應否與共產主義爭戰？》(*Should Christians Fight Communism?*)，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譯，此書附有「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憲章草案」，出版年不詳；赫大衛 (Daniel C. Head) 著，成文秀譯，《共產黨征服世界的藍圖》(*Communist Blueprint for World Conquest: Wars of National Liberation*)，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印行，1970；理查魏布蘭德 (Richard Wurmbrand) 著，譯者不詳，《為基督受難》(*Tortured For Christ*)，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印行，出版年不詳。後兩書原為戴紹曾藏書，現已致贈給華神圖書館。Richard Wurmbrand 另一個中文名譯作「魏恩波」，1982 年出版過一本名為《馬克思與撒旦主義》(*Was Karl Marx Satanist?*) 的書，此書由真理之聲出版，但沒有署名譯者是誰，出版社的地址和負責人也都沒有詳列出來，但這本書特別之處在於徵得兩位著名的基督徒寫序，分別是阮大年和林治平。

關於魏恩波此人，我們還可以補充多一些，他曾於 1970 年 7 月 24 日至 25 日在臺北市中華體育活動中心辦過一次名為「殉道者之聲」的佈道大會，魏恩波被稱作為「歐洲的地下教會領袖」，大會由中國信徒佈道會會長王永信擔任翻譯，並發送魏恩波的護教反共之作《為主受苦》，此次佈道會的確非常地浩大，出席者超過萬人，參見《福音報》第 510 期，1970/7/19，和第 512 期，1970/8/2。



光復廳舉行，節目詳述如下：

廿四日：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籌備委員會、中華民國教會及教會團體，假臺北市延平南路實踐堂，聯合歡宴各國代表，下午六時為聚餐，七時起歡迎大會，節目包括——介紹各國代表名人演講救世主合唱團演唱中國曲調之聖詩（中廣國樂團伴奏）。

廿五日上午九時的開幕典禮；廿五日下午七時半，假臺北市新生南路一段衛理堂舉行國際聖餐禮拜，將由中、美、韓、日等國牧師，分別按各宗派之儀式主持聖餐禮拜。

廿六日下午二時半，在中山堂光復廳，特別邀請韓國培靈佈道家作一次培靈會。同日下午八時，假延平南路實踐堂，舉行中國文化之夜，節目包括：中國聖詩演唱中國民間藝術中國民族舞蹈國樂演奏等。

廿七日下午四時的閉幕典禮中，均有聲樂家演唱及特別演講節目。

世聯會重申基督教必須堅決反共，摧毀唯物無神論的共黨政權。他們通過的憲章草案，提到該會將喚起世界基督徒確認共產主義為反人性、反道德、反宗教的邪惡思想，應徹底將其肅清，並呼籲全世界自由國家政府，宣佈共黨為非法組織，使其不能進行任何滲透顛覆活動；揭發教會團體親共人士欲承認中共偽政權及使其加入聯合國的謬論；協助被共產力量侵略破壞的國家，早日獲得統一。世聯會於此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提案中，尚有團結全世界教會及教會反共團體，抵制國際共黨假借教會名義、破壞純正信仰、赤化滲透教會的暴行案等。<sup>72</sup>

代表大會也議決以每年1月與7月第一個禮拜天為護教反共公禱日，公禱內容包括：（一）為蔣總統及夫人福躬康泰禱告。（二）為我們國家復興禱告。（三）

---

72 《基督教論壇報》，1969/11/30。



為政府首長及官員禱告。(四)為三軍將士，全國同胞禱告。(五)為全國教會興盛禱告。(六)為光復國土解救大陸禱告。(七)為世界公義伸張真正和平禱告。<sup>73</sup>其中以「為光復國土解救大陸禱告」最為突出。

世聯會財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議決定每年10月第一個星期日為「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日」，建議教會於該日為世界和平祈禱，並推動見證報導反共事工，當然其目標還包括收集各教會之奉獻。<sup>74</sup>世聯會也曾討論並議決：

聯絡協助鐵幕及中國大陸地下教會成立本會機構，從而積極採取主動，秘密傳道，暗通消息，並聯絡各種反共勢力隨時準備摧毀暴政。<sup>75</sup>

至於具體的做法如何，並未見過有相關的說明和記錄。

第二屆世聯會於1972年10月4日在臺北舉行，這正是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隔年；第三屆原定於美國舉行，之後改於1975年7月在韓國舉行，第一和第二屆都獲得蔣的開幕賀詞，本屆召開時，蔣介石已於三個月前逝世。

之後，第四屆世聯會原定在日本舉行，大概因為國際外交的重大挫折又移師回臺北，會議召開前一年，張靜愚因中風行動不便，改交黎世芬代理理事長一職。為籌組於在臺北召開第四屆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世聯會中華民國總會代理理事長黎世芬、中華民國基督教協會理事長陳溪圳、中國福音聯誼會理事長張靜愚等人於1977年12月16日下午三時，假臺北市雙連教會九樓舉行大會籌備會，大會主題為：「奮興基督教會，消除共黨罪行」，並議決在明年10月4日在臺北市中山堂舉行。<sup>76</sup>

雖然蔣介石逝世、前理事長張靜愚因中風半身不遂，且1977年以後的臺灣

73 《基督教論壇報》，1973/06/24。

74 《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會訊》第15期，1973/4，2。

75 《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第二屆代表大會紀錄》，1972/10，57。

76 《基督教論壇報》，1977/12/25。



外交處境更是艱難，第四屆世聯會還是在 1978 年 10 月 4 日假臺北市中山堂光復廳順利召開。大會討論以下四項議題：

- 一、檢討共黨滲透赤化、顛覆教會的惡果，已使某些教會變質，離棄教道。喚醒世界基督徒覺醒，奮起反共。
- 二、配合美國總統卡特先生之人權聲明及道德原則，擴大推行護教反共運動，揭露共匪迫害宗教罪行。
- 三、援救鐵幕內遭受迫害之基督徒並呼籲全世界各同道，推翻共黨邪惡暴政。
- 四、團結世界教會，加強對共黨控制國家傳揚福音，並要求聯合國採取行動以保障關閉在鐵幕內教會的信仰自由。

本次大會於 10 月 6 日閉幕，7、8、9 三日安排與會各國代表南下參觀十大建設，並赴慈湖謁陵，10 月 10 日參加國慶典禮。<sup>77</sup>

第五和第六屆世聯會分別於 1981 年在日本和 1984 年在香港舉行，主要的領導人為吳嵩慶將軍。第六屆世聯會之後，護教反共的活動氣勢已越來越走下坡，沒有之前在張靜愚時代那樣具有國際性的拓展，吳嵩慶的風格就是辦大型活動，加上社會的變遷，世聯會也僅僅辦些禱告會之類的活動，《聖經與信仰》旬刊則仍然以長老教會的一舉一動作為他們批判的題材。1984 年 7 月又成立了一個類似的組織名為「中華民國基督徒滅共救靈（救民）祈禱團契」，此一組織間接與臺北市國民黨黨部有關，主要是一些不太有名的人士主持和加入，特別有趣的是，這個組織從事的祈禱竟是「詛咒」：

提出應該毀滅敵人的名字求神敗壞他們的健康，增加他們彼此間敵對和矛盾。

77 《基督教論壇報》，1978/09/17。



他們宣稱可以舉不少例證說明這種做法非常有效。<sup>78</sup>

## ■ 愛國、愛教與聖經無錯誤論

世聯會除了主辦與其會務相關的活動，另外也積極的推動教會的聯合性聚會，關於教會的復興、宣教工作，甚至是神學或聖經的議題，黨國基督徒都成了教會的領袖，表現出他們不僅愛教，也自認懂得諸多的神學知識，由他們來指揮和引導教會，無疑是正確無誤的。

護教反共最高潮也可能是最後的一場大型聚會，即是由中華民國基督教協會、中華福音聯誼會、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中華民國總會共同發起於1981年10月11至14日主辦的「愛國愛教」的「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七十年基督徒感恩大會」。<sup>79</sup> 此次大會籌備委員會主席是吳嵩慶將軍，他在張靜愚身體不便後成了護教反共的重要人物。<sup>80</sup>

今年欣逢中華民國建國七十年，感謝神的恩典，既賜給我們信主愛主，開國救國的國父孫中山先生暨先總統蔣公，又加給蔣總統經國先生聰明智慧，丕承領袖，繼續帶領國人反共復國，正邁向勝利成功的光明大道。凡我敬畏真神，堅守真道，愛主愛國的中華基督徒，必須揭發現代神學思潮一切不合聖經真理的教義、信條和學說。<sup>81</sup>

大會的主題為「奮興教會，復興中華」，但大會宣言仍向基督徒提醒或強調「反

78 《聖經與信仰》，1985/10/20。

79 《聖經與信仰》第2期，1981/10/20。

80 中原大學張靜愚紀念圖書館落成，吳嵩慶受邀為之剪綵，可見彼此關係的深厚。

81 《恩光普照中華：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七十年全國基督徒感恩大會文獻》，大會文獻審查委員會編，臺北，1982，143。



共復國」的使命，當然，為對抗共黨、無神論，此次大會尤其強調維護純正信仰和防範共產黨破壞教會的工作，所以四天的大會看起來就像是一次大型的神學研討會。根據大會安排的內容，他們宣稱主要藉以「闡揚聖經真理」、「駁斥異端邪說」、「保持教會興旺與成長」，有關「聖經神學與現代神學」的議題包括：「從現代神學思潮談到維護純正信仰」、「奮興中華教會的研究」、「基督信仰與中國歷史文化」等，對於護教反共的部份還是非常努力的，像「無神論及其追隨者如何破壞基督教」、「如何防止共產黨破壞基督徒教會」這樣的主題才是大會精心著力的地方，是黨國基督徒仍然念茲在茲的終極關懷。

此次大會在政要人士方面來了何應欽、邱創煥、李國鼎等人，島內的教會代表有吳勇、林道亮等，海外華人基督徒人士也受邀，包括了王永信、滕近輝、趙君影等。當然，國際人士的參與可以說就比較單薄，主要來的還是一些「反共協會」的人士。大會宣言重申基督徒即是愛國愛教者，奮興教會與護教反共的信仰和行動是一致的，在大會給蔣經國的致電函上提到「共魔利用其統戰機構及同路人，進行滲透分化活動，妄逞邪說謬論與卑劣行為」的事例，因此亦重申信仰純正的基督徒是不會從事危害國家社會的事的，此一大會即是表明基督徒是「榮神而愛國」、「護教而反共」，因此大會主旨即是：

維護純正信仰，奮興中華教會，擁護政府，奉行國策。<sup>82</sup>

在愛國救國方面，大會預備了針對「基督信仰與中國歷史文化」、「基督徒與國家」、「基督徒對國家及社會的責任」、「基督徒新形象」等專題演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會鎖定了解放神學作為批判的對象，因此在護教反共的議題上，大會事先準備有專題討論的小組和資料，如「共黨滲透把持的普世教協」、「我為什麼反對共產主義」、「基督徒對共產主義應有的認識」、「共產主義之本質及其如何滲透破壞教會及民主社會」、「如何提高教會及國人對共產陰謀之警覺」等討論。總之，黨國基督徒不外乎強調其兩點主張：

82 《恩光普照中華：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七十年全國基督徒感恩大會文獻》，25。



除傳揚福音外，無論得時不得時，還要傳揚共產黨是基督徒的敵人，隨時隨地根據事實，揭發共產主義滲透基督教會的活動。

喚醒世界基督徒覺悟，奮起護教反共，謹防共產陰謀滲透教會；呼籲被共黨控制、奴役之國家和地區的基督徒，奮起推翻共產暴政，以耶和華為神，靠主得勝，維護世界永久和平。<sup>83</sup>

從大會顧問和大會主席團人員的名單以及主要參與籌備過程的人士中可以看出來，最為積極的參與者大都具有護教反共聯合會的背景，除了吳嵩慶，還有黎世芬、陳溪圳、康峻壁、胡鴻文、劉真光等人。在籌備委員會印製的討論資料中，以護教反共宣傳最為積極的劉真光所編寫的〈第三專題討論參考資料：如何防止共產黨破壞基督教會〉尤其重要，因為此次大會的主要目標即在此，此小冊子據了解可能印製了兩萬冊之多。

同樣的一批基督徒，由陳溪圳、吳清鑑、黃六點三位長老教會牧師另開辦了《聖經與信仰》（旬刊）之報刊，時間是1981年10月10日開始發行，頗有取代《角聲》的意味，持續扮演「護教反共」、「匡正信仰」的工作，此刊一直發行到1992年，只是不確定何時停刊，可能是因為主要的負責人黃六點過世後就停刊了。《聖經與信仰》發刊詞中表明該刊的主旨為：

我們要徹底反對將聖經的宗教要素剷除殆盡，而使基督教變成一種倫理道德或政治運動；也堅決反對任何人利用教會的團體力量，作為政治資本和工具，去干預政治或奪取政權。<sup>84</sup>

83 《恩光普照中華：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七十年全國基督徒感恩大會文獻》，214。本次大會鬧了一個烏龍，差一點把校園福音團契此一組織說成與美國的親共團體有關，所幸即刻澄清：「大會第一參考資料第三十五頁所言校園團契為新福音派，係根據基督思想導論及趙君影牧師評一九七零年洛桑會議等二書，其中指證美國校園團契參加新福音派。我在臺校園團契為純正信仰之事工團體、與美方校園團契毫無任何行政、財務及信仰關係，應由大會負責予以更正。」臺灣校園團契差一點就變成了「共匪同路人」。

84 《聖經與信仰》創刊號「發刊詞：聖經與信仰」，1981/10/10。



這兩段話表示一方面是維護聖經的信仰和權威，不容否定或貶低聖經價值與地位的思想或神學，另一方面則繼續堅持某些教會參與政治活動是違反政教分離之原則和立場的。凡這兩種對手或敵人，正是他們要全面反擊的，故刊名標誌「聖經」與「信仰」，其意甚明。<sup>85</sup>



▲中華民國基督教聖經年大會，1983年12月30日晚上在臺北國父紀念館舉行，由主席陳溪圳主持，共有一千多人參加。（中央社）

《聖經與信仰》絕大部份的內容即是針對長老教會的神學立場和政治行動進行批判的，撰文的理論打手主要是劉真光。該刊的內容包括持續地批判普世教協、解放神學、高俊明等長老教會人士的「政治干預」行動等等，劉真光的言辭

85 坊間出版一本批判普世教協和拉美解放神學為名的譯著《國際共黨與左派運用基督教會從事活動》(The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Advocate for the World's Militant Left)，臺北：協林印書館有限公司，1983，譯者為吳東河，最早已將部份譯文先刊於《聖經與信仰》，後才集結成書。



鋒利，經常出現在反共演講場合上，他的活動和寫作，是續成文秀之後最為活躍的人物，甚至還經常被邀請到軍中去演講反統戰的題目。<sup>86</sup>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同樣是這一批黨國基督教代表，把陣地也漸漸延伸到關注起「聖經無誤論」的問題。他們指出，不管是普世教協或是解放神學，及種種神學思潮或聖經研究之主張，越來越對聖經的權威形成了質疑，進而否定了聖經是上帝啟示的話語，因此必須起而維護聖經。這樣的想法最後導致主辦了一場「聖經無錯誤大會」。<sup>87</sup>

在世聯會理事長吳嵩慶積極的號召之下，1984年10月8和9日兩天在臺北市辛亥路國際青年活動中心主辦「中華民國基督教聖經無錯誤會議」，大會主辦者世聯會聯繫了全臺主要的教會組織和神學院一同參與，共邀請五位來自美國的學者牧師論證聖經無誤的說法，中華歸主神學院趙君影牧師是其中的一位。正如往常所為，會後也發表了一篇聲明，矛頭仍然指向解放神學，指這種神學對待聖經的態度和立場上都不是把聖經當作上帝的話，鄭大和牧師在總結講詞中又再次提到了解放神學，批判普世教協，指明共黨滲透臺灣教會的情形，因此可以看出來，此會議仍然是在一種護教反共的基調中進行，仍然以打擊長老教會為對象，他們想藉維護聖經無誤的高姿態來打擊他們的對手，做法與之前將他們說成是自由派或新派沒有任何差別，只是這次以聖經作為主題，名為護教，同樣是為了打

86 劉真光著有《宗教統戰論叢》(臺北: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中華民國總會,1982)一書,本書是集結散見於一些刊物上的文章編輯而成,封面題字為吳嵩慶將軍,由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中華民國總會出版。劉真光,本名劉光弼,中央警官學校研究班一期,政工幹校戰政研究班一期,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大陸研究班一期,革命實踐研究院興二十七期畢業。曾任報刊、期刊社長兼主筆,大專院校講師、副教授,中央警官學校警監系主任、公共安全系教授,其《宗教統戰論叢》曾交由中央警官學校印制。教會所屬為中和召會,曾在胡鴻文主持的東方神學院上過課,也寫了論文,其論文內容即是與護教反共的主題有關,後期繼續從事於從反共到反臺獨的理論批判之工作,非常地活躍。曾在華神早會上講道批評倪柝聲,亦屬於世聯會中華民國總會的理事之一,解嚴後其言論大概已無市場,另出版題為《人生信仰與中國文化之探索—基督真理與儒釋道比較論集》,轉向於做起比較宗教或文化來了。

87 《聖經與信仰》第107期,1984/9/30,第110期,1984/10/30。



擊對手，目的和對象沒有改變。<sup>88</sup>

1986年，吳嵩慶又召集了臺灣基督教界共同主辦了一次盛大的「中華民國基督教紀念先總統蔣公百年誕辰感恩禮拜」。1987年，第七屆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在美國科羅拉多州曼尼托市舉行，這場從9月4日到9日共四天的集會被形容作是「全球民間反共聯會大會」，談的都是之前的老話題，會後也做發電給相關元首的電文，臺灣代表有四十三人出席，包括洪文山、胡鴻文、鄭大和等，其中元老級的人物則是吳嵩慶和康峻璧，臺灣團是所有地區代表團人數最多的。<sup>89</sup>

1987年7月15日政府公佈解除戒嚴，10月15日宣佈開放大陸探親，沒有人再提起「絕不談判、絕不接觸、絕不妥協」的反共原則了。護教反共的黨國基督徒大老們相繼逝世，1984年張靜愚逝世、1991年吳嵩慶逝世，沒有聽說在他離世之前還辦過第八屆（應該是1990）的護教反共大會。終於，這場從1965年到1990年臺灣基督教界內的基督教黨國化的大戲，雖然就這樣靜悄悄地消失了，但黨國基督徒所造就而成的基要主義已形成一股勢力。

黨國基督徒以護教反共之名，創造了不少「得利者」，也創造了不少的「受害者」。當年被說成是「親共」的，「出頭天」的口號則是愈喊愈理直氣壯，長老教會的牧師高唱著「臺灣，咱我母親」。1987年，長老教會迎接著「回來探親」的黃彰輝，回到他闊別二十二年的臺南神學院，接受贈與的榮譽神學博士，隔年，這位「普世」的神學家告別了「不甘願」的情緒，安息於「上帝國」。

---

88 中華民國基督教聖經無錯誤會議委員會編印，《聖經無錯誤會議實錄》，1986年12月。事實上，此次會議是有特別針對性的，也就是新譯本出現以後，《聖經與信仰》也在護教的立場上攻擊了此一譯本，「中華民國基督教聖經無錯誤會議」也是針對譯經問題而來的，讀者應知道，新譯本是周聯華之作，所以攻擊他的人又找到了一次機會。

89 《聖經與信仰》第216期，1987/10/10。





▲黃彰輝和黃武東回臺紀念。(取自臺南神學院)

#### 附錄（六）：「黃議長彰輝博士事績誌略」

[黃武東撰，錄自《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第十二屆議事錄》]<sup>90</sup>

黃議長彰輝牧師，臺南市人，即吾臺初代牧師故黃能傑氏之令長孫，第四屆南部大會議長故黃俟命牧師之長公子也，一門三代司牧，永紹箕裘，於百年教會史中，惟黃家獨享殊榮。先生自幼聰穎，器識過人，畢業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系，嗣秉承父志，負笈英國，進入劍橋西敏斯德神學院專攻神學，畢業後觸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暫阻歸程，遂僑居英京執教於倫敦大學，迨一九四八年攜眷回國。一九四九年因臺南神學院長滿雄才牧師退休返國，乃奉命接掌該院，當時只有專任教員三人，學生十七人，授課於一座不堪入目陳陋教室。十有六年於茲，黃院長以百折不撓精神，艱困經營，竟將一陳舊古老學校之面目改觀，建設成為東南亞最優秀之神學院，現擁有教職員三十九人，學生二二八

90 黃彰輝卸下議長一職，總幹事黃武東給這位親密戰友寫下其功績，文詞中除見黃彰輝的個人才華外，更見兩人友誼之深，另外從此文也可略見黃武東文筆精煉，其所具有的中國文化底蘊可以由此文中窺見一二，收入於《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第十二屆議事錄》，1965/2/15-19，330-331。



人及幾十座堂皇之現代建築物，其功績之卓著，焉可磨滅，茲略誌二、三如左。

一、栽培後進：先生擅長神學，春秋朝夕，教導有方，寒暑晦明，孜孜不倦，十六年間學子如坐春風，沾化雨者，濟濟有深造，多半業經成功，回校執教。現在該院大半教員均屬程門桃李，悉先生培植之力也。

二、改進學制：自從一九四九年接長以來，不斷努力，改進學制，提高程度，先將本科四年制改為六年制，一律收容高中畢業生，進而增設大專畢業生之研究科，授與神學士及神學碩士學位，另設四年制之基督教教育科，包括基督教教育、幼稚師範及宗教音樂等三科，一九六三年獲普世教聯神學教育基金會之補助，增設神學研究院，成為東南亞最優秀之神學教育機關。

三、經濟籌措：主政當時，由前院長交接港幣壹千元及一冊賬簿，於今成為每年要花將近新臺幣兩百萬元之大機構，其經濟之來源，專賴黃院長之籌措，首先呼籲臺灣教會之經援，倡導一口拾元之捐助，其成績顯著，因此，於一九五一年獲得南京金陵神學院基金董事會之同情與協助，繼之於一九五九年承臺灣聖公會及衛理公會之合作，最近且獲普世教聯神學基金會之協助等，藉以維持經常費及一切施設之擴展，最近為安定經濟計，開始參百萬元基金之募捐，預定於其離任前完成，由過去之成績觀之，其功之成，可拭目而待。

四、大興土木：接長當時，只有一棟破壞不堪之課室，嗣後承南部大會批准，接收原新樓病院幾棟破爛之院舍，加以修建為師生宿舍，一九五五年以新臺幣六十一萬七千餘元重修原校舍，即今之巴克禮紀念館，同年新建行政大廈，一九五七年興建禮拜堂及男生宿舍，及一棟教員宿舍，一九五九、六〇兩年建築兩戶用教員宿舍四座及水塔，一九六三年建築研究院、頌音堂、院長公館及兩戶用教員宿舍兩座，一九六四年增建幼稚園課室，及裝置鋼管大風琴於禮拜堂，本年以預算新臺幣壹百伍拾萬元興建獨身教職員宿舍等。於此十年間共費新臺幣玖百捌拾柒萬參千參百柒十貳元，使荒廢之新樓構內面目一新。

以上謹誌其主政臺南神學院之偉績。至於有關教會政治上之貢獻，亦應一筆。先生非僅擅於神學教育，亦長於教會政治之才，一九五七年眾望所歸，榮膺我教會最高榮譽職位，即為第四屆臺灣總會議長，其任中促進南北兩大會各選四十名代表制之總會，成為以堂會代議長老組織之代議制總會，廢兩大會以強大總會，使總會成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實質的最高機關，其功也良非淺鮮，至本一九六五年即我長老教會設教百週年，因其學識淵博，品學兼優，再登總會長寶座，先生主持惠物，果斷力行，隨地措施，尤為議長中之不可多得者，



所為錚錚佼佼也。

語云：「有麝自然香」，先生不單是我教會之傑出英才，亦榮譽國際，一九五九年受聘為美國聯合長老會宣道研究會主席，且以其神學之造詣高深，對世界教會之貢獻鉅大，榮獲美國、加拿大及日本等國著名大學及神學院之神學博士學位，且數年來擔任東南亞神學教育協會之主席，及世界長老會聯盟常務委員，此次應普世教聯神學教育基金會延聘，為該會駐倫敦幹事，又顧及其應為之工作亦告一段落，於此卸任，固無後顧之憂，乃向總會請辭臺南神學院長職位，總會於萬千惋惜中核准，並議決應念其任內功績，而嘉其德，命僕撰文誌之，標於本屆總會議錄，俾免湮沒，不固揣陋，援筆敬略梗概，以誌不忘，至於謏陋無文，膚淺不及之處，冀諸君原諒云爾。

黃武東 謹撰



## 4. 1965：從合一到分裂

「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

—反共標語

他們雖然無法直接知道「共匪」什麼，但統治者有系統地教他們懼怕「共匪」。他們必須對「共匪」又怕又恨，否則就被疑為同路人或共特。

—般海光，〈剖析國民黨〉



## ■ 山雨欲來：四大教派聯合記者會

「基督教來臺百年大會」由此氣氛中開始，……。

1965年2月13日下午三時，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臺灣聖公會、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基督教臺灣信義會等四教派為與普世教協「教會合一性」做辯護，假臺北市松江路新臺北大飯店舉行記者會。<sup>1</sup>與會者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議長黃彰輝，臺灣聖公會主教王長齡，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會督華納，基督教臺灣信義會監督金仲庵等代表親自臨席，並有傅樂明博士，基督教福利會主任葛利亞，及四教派代表等，各報參加的記者約二十名，全體共四十名參加，由總幹事黃武東主持招待會，說明舉行記者招待會的意義，說明《教會合一性：正告主內兄弟姊妹們》小冊子的內容並發表聲明。<sup>2</sup>在「四教派聯合聲明」中特別重申：

一個真正的信徒絕不可能與共產極權妥協，進一步更是從觀念上破碎共產思想之最好鬪士，我們四個教會願在總統之英明領導下，服從國法，團結愛國，成為復興中華之一股力量。<sup>3</sup>

上述記者招待會之後，萬國基督教聯合會（ICCC，下簡稱「萬國教聯」）會長麥堅泰（Carl McIntire）還特別專程於3月30日飛抵臺灣，並於第二天在臺北中國之友社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書面聲明〈誰是誣控者？誰是曲解者？〉。<sup>4</sup>不久，該會的中華民國分會於同年6月16日印行《駁復「正告主內兄弟姊妹們教會合一性」書》，全面逐條針對前書的內容一一反擊。<sup>5</sup>

- 1 原為四大教派：臺灣聖公會、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基督教臺灣信義會、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共同聯署，而基督教臺灣信義會是最後加入又是第一個退出的。
- 2 《福音報》第234期報導標題是：「澄清反駁萬國教聯誣控，三大教派聯合將舉行記者會」，1965/2/18。
- 3 《瀛光月刊》第162期，1965/3/22，3。
- 4 《福音報》第241期，1965/4/4。
- 5 本冊子選在6月16日出刊，是特別針對百年大會而來的，雖未署名作者，但是內文諸多的



針對即將召開的百年大會，中華民國外交部特別召開一個跨部會的「宗教聯繫輔導小組會議」，全面關注1965年從聯合記者會到百年大會的一舉一動。此一小組第三十九次會議（1965年5月5日）中，提到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的召開，其旨是「轉移基督教在臺宣教百週年紀念大會可能發生之不良影響」，特別請警備總部成立的「天聲小組」報告監控百年大會發展之情形，會議的內容中特別提到了四大教派《教會合一性：正告主內兄弟姊妹們》中把「共匪」稱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指出他們違反了出版法。接著，第四十次會議中，還特別指明康峻璧作為基督教臺灣福音聯誼的總幹事，應積極辦好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之各項工作。

同年10月8日，由張靜愚領導的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ACACA）正式成立，蔣介石特別發表了書面的開幕詞，也就正式宣佈對普世教協（WCC）展開一系列的批判工作，黨國基督徒承擔了思想性和組織性地的任務。來自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五組的信函（1965/6/16）中明確地提到：

基督教會中本黨同志張靜愚等，鑒於國內基督教會對反共抗俄宣傳不夠積極，而國際基督教會中有受共黨滲透為匪張目者，深引為憂，乃聯絡教會



▲四大教派聯合聲明後，引來宗教內部的一遍分裂潮，衛理公會某些堂會公開登報表明態度，反對加入普世教協。（作者翻攝）

來源見於成文秀之後在別處又出版，可推斷全書出於成文秀之手。



人士發起舉期，有裨於反共鬥爭。

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張靜愚同志商同本會第五組詹主任純鑑，於上月超邀請黨政有關機關負責同志研商，出席人員對此項會議一致表示，贊助關於經費問題經決定。<sup>6</sup>

所以，這意味著不管是意識形態方面或是經費方面，張靜愚所領導的護教反共聯合會，都與國民黨有關，甚至獲得授意舉行。此現象與當時的思想控制有關，非全是基督徒自覺發起的，所以應該是在反共之前提下領導護教，而非為了護教而反共。以政領教之意甚明。在護教反共聯合會的領導下，教會界上演一場又一場的壓迫長老會「割斷與普世教協」的運動，雖然說不上是控訴，但是在打著「護教」之旗幟下，長老教會已成了孤立無助的「異端」。



最關鍵的莫過於這一年所召開「基督教在臺宣教百週年紀念大會」，按原來的計劃是一場「合一運動」，最終卻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之下，演變成「分裂運動」，分裂成長老教會與其他非長老教會。這場百年大會即是全面籠罩在一股政治緊張的氣氛中進行，這是臺灣基督教史最為驚心動魄的一年，周聯華形容作「心酸史的序幕」。<sup>7</sup>

◀《瀛光》刊出聯合記者會之內容報導。(作者攝自《瀛光月刊》)

6 國史館檔案，卷名「宗教文物展覽」情報司，入藏號 020000016691A。  
 7 兩本長老教會「準官方版」的歷史論述，陳南州的《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社會、政治倫理》和鄭仰恩的《定根本土的臺灣基督教》，對此「割斷與普世教協的關係」所述非常的有限。



## 附錄（七）：四大教派聯合記者會〔錄自《瀛光月刊》〕

過去我們因人之誣陷而經常被人誤解，謹藉此記者招待會，將我們對國家、社會及其他教會之關係，佈諸於眾。

我們這四個教會代表全省二十萬信徒，會同全省許多與普世合一運動有關的基督徒團體，共同認為教會乃耶穌所設立，是一群信靠耶穌基督之信徒的團契，我們相信聖經，承認耶穌基督是上帝的兒子傳播福音，教導人，解救人類一切心靈和肉體上的疾苦，行各樣的善事，雖然我們是四個不同的宗派，我們認為宗派是歷史上人為的分歧，我們共同相信上帝呼召我們成為祂的子民，互相親愛，是奉上帝服務人群，在共同信仰下，通力合作，因此，我們無論在國內或國外都求信徒的合一，我們四個教會或直接成為普世教會協進會（以下簡稱普世教協）之會員或間接為成為普世教協之一員，普世教協擁有會友三億五千萬人，以謀在崇拜、宣教、生活和服務上之合作與合一。

普世教協現有二百〇九個會員教會，來自九十二個不同的國家，在這些國家中，有少數是屬於極權政治所管轄的，雖然這些位會員教會是在不利於他們的環境下，仍奉行耶穌的教訓，甚至在逼迫中求生存，在民主自由的國家中，教會是國家心理建設與協助合作之最大力量，在殘暴極權政治下，雖然遭遇苦難，仍能效忠基督，維持信心。

普世教協之會員教會及個人有發言之自由，除非經普世教協之正式通過，個別教會及個人之言論不能代表普世教協之官方態度及方針，根據一九四八年普世教協成立大會之宣言，反對無神主義者，馬克斯共產主義，認為共產之唯物論與基督之信仰對人之價值觀點相反，並反對其對人類所施殘酷的手段，我們四個教會已印發了「教會合一性」小冊，詳細解釋過去普世教協引起外界誤會及誣告之點，事實之真相及其態度。

在自由中國之四教會願聯合一切在臺之基督的教會共同推行上帝所託付的使命，從同胞的內心著手，徹底勸人悔改，服從耶穌教訓，成為新人，實行新的生活，由個人出發，推己及人，謀整個社會之福利，上帝之旨意實現地上，我們以往除建立教會外，更在醫藥、教育、社會福利等工作上略盡微薄的力量，今後願加倍努力，以求貫徹我們的宗旨。

我們深信基督的信仰是促進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原動力，這些自由世界之民主精神實肇基於耶穌之信仰。共產之唯物無神論，仇恨之人生觀與基



督之信仰恰好相反。一個真正的信徒絕不可能與共產極權妥協，進一步更是從觀念上破碎共產思想之最好鬥士，我們四個教會願在 總統之英明領導下，服從國法，團結愛國，成為復興中華之一股力量。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臺灣聖公會  
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  
基督教臺灣信義會

1965 年對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而言，是一個充滿著創傷記憶的一年，這一年「基督教在臺宣教百週年紀念大會」（後來改稱作「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設教百週年紀念會」）於 6 月 16 日下午六點始為期一個月的會在憲警監視之下進行；<sup>8</sup> 也是這一年，任教於臺南神學院十六年之久並時任院長的黃彰輝選擇流亡海外，傷心地告別了他所熱愛的這塊土地，直到二十二年後，於 1987 年才獲准返臺。

在此反共護教意識形態巨大的衝擊下，臺灣基督教分成了兩個陣營，一是傾向於「萬國基督教聯合會」護教反共的基要派，一是合一運動的「普世教協」成員。這兩個陣營的對立和矛盾，可以從他們各自出版針鋒相對的著作表露無遺：基督教臺灣信義會／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臺灣聖公會／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聯合出版的《教會合一性：正告主內兄弟姐妹們》，以及由萬國基督教聯合會中華民國分會印行的《駁復「正告主內兄弟姐妹們教會合一性」書》，後者全書的內容都是由成文秀執筆。<sup>9</sup>「基督教在臺宣教百週年紀念大會」變成了「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設教百週年紀念會」，從這個大會名稱的更改透露背後的事實，從此長老教會與非長老教會之間的關係可謂「越走越遠」。諷刺的是，「合一運動」變成了「分裂運動」。

8 黃武東，《黃武東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1989，282-287、294-296。

9 《駁復「正告主內兄弟姐妹們教會合一性」書》全文之後收入成文秀所編著的《護教反共論叢》一書中。



周聯華說得很白，在這種惡劣的環境裡，他數次有去國的念頭，認為臺灣不是一個值得留下來的地方，他在回憶錄裡把他與長老教會的關係史形容成「個人的磨難」：

一些「大陸」來的基督徒，和過去「皇民化」的基督徒，不斷製造臺灣長老會「靠不住」的謠言，硬要長老會退出普世教協。<sup>10</sup>

1965年的百年大會召開前夕，國民黨和情治單位越來關注長老教會的一舉一動，尤其更緊盯著百年大會的召開。這個事情的演變，即是一步步地要迫使長老教會最終以退出普世教協為目的。

## ■ 插曲（一）：教會裡有多少個「金仲庵」，有多少個「丘國棟」

國民黨為了嚴密的監控長老教會，收買、密告等各種手段盡出，對教會造成嚴重的干擾，《臺灣教會公報》的社論還不得不公開規勸教內人士不應有向政府告密、投書等動作。<sup>11</sup> 當時教內確實有許多這些類似的現象，即是因為內鬥或意見不和，密告對方「共匪」、「匪諜」等漢奸走狗之詞應該是相當普遍的；要知道這樣一句話在那段白色恐怖（護教反共）的年代，是非常可怕的。這種種的故事，都要從1965年的「金仲庵事件」開始講起。

臺灣信義會的金仲庵監督出席了四大教派聯合記者會，引來了信義會內部的

10 周聯華，《周聯華回憶錄》，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84，270。黃武東也說過類似的話：「連長老教會中，於日據時代大呼『天皇陛下萬歲』的投機分子也同流合污大肆攻擊，正如耶穌所說：『吃過我的飯的人，也舉腳踢我。』」（《黃武東回憶錄》，345）此謂之呼「天皇陛下萬歲」的投機分子，很可能是指臺北雙連教會的陳溪圳牧師。

11 〈反共、愛國之心不容置疑〉，《臺灣教會公報》第1113期，1973/6/17。政府單位收集金仲庵的個人資料，詳見國史館檔案，卷名「教會活動」，入藏號02000017888A。



反彈，基隆福音堂執事會特別針對金發難，並針對此一教會的丘國棟牧師與金的矛盾，特別召開會議向金發出警告。基隆福音堂執事會於登報啟事中提到丘是一位「反共傳道人」，因為不認同金的做法反被他反咬侵吞教會公款，於是執事會為丘打抱不平，並警告金應放棄參加普世教協的立場，否則將起訴金企圖殺人。關於企圖殺人案件是指金於 1965 年 7 月 24 日曾因為丘不同意參加普世教協而被金以刀威脅，結果被丘提告金涉嫌殺人，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庭於 1966 年 9 月 23 日開庭審理，金為此事已離臺赴港。此事是 1965 年記者會後最為戲劇性的事件。<sup>12</sup>

金仲庵監督與丘國棟牧師的衝突案，可謂轟動一時，《中央日報》、《新生報》都做了報導，臺灣信義會監督被控「殺人未遂」，最後法院還傳喚他到案，結果金匆忙逃離出境去了香港。這是一則護教反共時期引起教會鬥爭最為血淋淋的案子，金的事件絕非只是個案，可以猜想得到，有無數個「金仲庵事件」，這些人利用了護教反共的意識形態來打擊異己、污蔑、落井下石，在反共的政治意識形態掛帥的年代，信仰與人性都受到嚴酷的考驗，教會內部所形成的扭曲和衝突更是血腥。

金仲庵是臺灣信義會的創始人，同是信義會的牧師周景周述說過對金的人格和才幹的肯定。周景周的回憶錄中記述了信義會內部可怕的鬥爭，從其用詞遣字中處處都可以感受到當時教會中的恐怖氣氛。他作詩、寫掛幅，都反映了他對那些壓迫者的憤怒，教會裡那些小人、惡棍、陷害、利慾薰心等比比皆是，可謂慘烈和恐怖至極。<sup>13</sup> 儘管《周景周牧師回憶錄》只著墨於金與外國傳教士的矛盾，沒有直接提及金的遭遇與他被污名成為親共分子和加入普世教協的關係：

金牧師他是臺灣信義會拓荒者，也就是創辦人，為主作工，辛勞倍之。可是所受待遇，不是享受，乃是部份同工惡毒毀謗攻擊，為什麼？因他治會嚴謹，再加上他的神學思想超群，及領導能力過強，可以說是中國歷代難

12 見《福音報》第 288 期，1966/2/27。

13 參見《周景周牧師回憶錄》（私人出版，2003，感謝王在康牧師提供此書及金仲庵之照片）。



得的一位牧者，可惜的受到部份不屬靈的同工嫉妒，願為西國同工效勞，也可能得點好處，來抗拒金牧師，並散布謠言毀謗他。<sup>14</sup>

創辦臺灣信義會的金仲庵牧師，他是拋棄名醫之物質享受，走耶穌背十字架之路。神學思想超人，傳耶穌救恩之道，秉持真理，治會嚴謹，破除百餘年西國同工的優越感在中國教會之權勢，而建立中國同工在教會的自主權，普及全國各教派之效法，雖遭西國培植的中國幹部同工攻擊，秉持耶穌真理的勇為下一一擊潰，成為中國同工的馬丁路德精神領導者，所治理的首間前鎮教會，帶領群羊準則，不以窮富、階級待人，全以靈程高低，及熱心、愛心選拔幹部。所以在他治會的教會期間，絕無絲毫紛爭。可稱中國牧者歷代治會的楷模。<sup>15</sup>

可是，這樣一位被同工如此肯定和讚揚的牧師，結果卻是遭到全體臺灣信義會對他無情的撻伐。臺灣信義會第十一屆總會代表發表了一篇公開信，對金做全面性的指控，羅列了六項金的罪狀，全文刊載於《福音報》：<sup>16</sup>

「敬告臺灣信義會第十一屆總會代表的公開信」

(一) 違反信仰：基督徒信仰的依據，就是聖經，但金常說：「聖經是不完全的」。聖經教人「謙卑」，但金常說：「我就是驕傲，我永遠不能謙卑。」聖經教人饒恕，但金不知恕道與謙卑為何物，馬丁路德提倡宗教改革，建立了基督教會，金仲庵卻於本年一月卅日與天主教簽署，召集了與異教的聯合祈禱，以致臺灣信義會被友會以及各報攻擊為「出賣了馬丁路德」這是我們教會的恥辱。……使我們的教會再回復到歐洲中古世紀最黑暗的時代。

14 《周景周牧師回憶錄》，117。

15 《周景周牧師回憶錄》，120。

16 《福音報》第288期，1966/2/27。



.....。

以上六項不過略舉梗概，實則金仲庵一切敗壞之作為，瀝筆難盡。總之，金仲庵一日不除，則信義會永無寧日。

我們在主內永遠團結在一起為護教反共而奮鬥到底

中華基督教信義會反共護教聯合會謹啟  
一九六六、三、廿五

相關政府部門的檔案顯示，丘國棟的行動是獲得授意的；換言之，他是被相關情治單位所策動，整個事件旨在控訴金的親共行為，起因即是與 WCC 有關，但卻用了這類手段。<sup>17</sup>《福音報》還特別刊出「金仲庵先生所用九吋長的刀」、〈信義會基隆福音堂執部啟事〉（第 288 期，1966/2/27），「社論」（〈為真理打美好的仗〉）和讀者呂萍的投書〈維護真理支持正義〉（第 290 期，1966/3/13）。教界的輿論全都加入圍剿金的行動中，也藉此表態反共的政治立場。



◀臺灣信義會金仲庵被丘國棟控告殺人事件之報導。（作者翻攝自《福音報》）

17 信義會的三位牧師，張齊堂、金作煥、劉義文為國民黨黨員，均被動員反金仲庵。



這件事引起的波瀾非常的巨大，內容無疑就是針對金帶領信義會參加 WCC 並於《教會合一性》的小冊上署名，直指其「容共親共」、「異端邪行」。

《福音報》也在「社論」中以〈為真理打美好的仗—從金仲庵丘國棟事件談起〉標題再批判金一番。<sup>18</sup>

附錄（八）：〈為真理打美好的仗—從金仲庵丘國棟事件談起〉  
[節錄自《福音報》社論]

關於金仲庵與丘國棟之間的糾紛公開化之後，若干讀者來信，表示對該一事件的意見，本報已刊佈具有代表性的投書數封，這是關心教會維護信仰的必然措施，惟最近有一二讀者來信詢問，何以支持丘某某打擊金某某，故有將本報之立場加以說明之必要。

首先應說明者，即本報之言論與報導方針，完全以闡揚真理打擊邪惡維護純正信仰為基礎，任何具有爭執之問題發生，本報首先關切者，厥惟真理與信仰的基本原則問題，換言之我們所關切者是該一事件，該一問題的本質是否與基督真道相悖，是否違背純正信仰。

更明白的說，我們所注意的是事而不是人，我們依遵上帝的旨意，多數主內讀者的意願去處理這些問題，而非基於人的是非恩怨。相反的呢如果丘國棟也向金仲庵的作法，站在真理立場，我們也是反對的。

事實上，金仲庵與丘國棟的齟齬已非一日，本報早在去年夏間即有所聞，但以「這是他們兩人之間的事」而且盼望信義會的同道能在內部調解此事，因而保持緘默未加報導。

然而當今年二月十四日信義會的所謂牧師團在中國大飯店舉行記者招待會，以及在社會報章上刊登廣告啟事之後，此一問題已經變為「做得對不對？該不該？是否合乎上帝的旨意？是否合乎聖經的教訓？」的原則問題了。

我們非常遺憾信義會沒有把這件屬於內部問題的事件化解下來，甚至不惜假藉若干牧師的名義發表不實的聲明。

18 《福音報》第 290 期，1966/3/13。



如「牧師團」聲明信義會沒有參加 WCC 就是一項謊言，有一本公開流傳叫做「教會合一性」的手冊上，即赫然列有信義會的名字，我們並沒有見信義會公開或私下否認這一事實。同時金仲庵也確實出席過有關為 WCC 辯護沒有容共親共的記者招待會，並且發表過談話，明顯的以 WCC 的一員自居，這也是賴不掉的事實。

其次，根據各方面的報導與證實，金仲庵為打擊丘國棟，不惜利用組織上會督的權力與挾嫌誣告的方式，停止基隆福音堂的開支。把神聖的教會，作為鬭爭的工具，不僅愧對基隆福音堂的全體信徒，而且更羞辱了主的聖名！

本報對異端邪行決不姑息，對金仲庵個人我們沒有絲毫世俗的恩怨和愛憎觀念滲雜在他與丘國棟之間的糾紛中，關於他動刀的事「牧師團」的聲明有代為洗刷刑事罪嫌的意圖，我們認為既已由司法當局在審理，這些要負刑責的話應該對法庭說。果如「牧師團」說得那麼輕鬆，司法當局又何必如此「多事」？耶穌曾教訓彼得說「動刀的必死於刀下」，如果真正犯了罪，又豈是「牧師團」的一紙聲明就可以開脫得了的？

國難當頭之際，對於任何親共容共的團體、個人，我們都深痛惡絕！世界末日之中對於任何敗壞分化教會，褻瀆侮蔑信仰的集團、份子，我們決予迎頭棒喝！堅決為真理為純正信仰打美好的仗！

對比於臺灣信義會和《福音報》對金的嚴厲控訴，可謂內外夾持，從人格到信仰，再到政治，對金全盤的否定，但周景周回憶錄中的兩段文字都可以說是對金的平反，信義會和《福音報》的說詞全是一種政治考慮，金成了名副其實的代罪羔羊。

金仲庵可以說是長老教會體系以外「殺雞儆猴」的犧牲品。參加 WCC 的合一運動及《教



▲臺灣信義會金仲庵。（作者收藏）



會合一性》小冊的發行都直接與長老教會有關，代表基督教界主流的《福音報》的所做所為，即是藉金的事件來反對長老教會，以社論的方式加入了對信義會內部的衝突表態，不如說是向長老教會表態，以及向所有與長老教會有關的人士喊話「堅決為真理為純正信仰打美好的仗」，既是反共也是護教。金仲庵是第一位為參加百年大會做出犧牲的人，這種現象在多年後浸信會神學院的「倒周」運動可以說是類似的。

那個年代，不知道造就了多少被收買打報告、寫黑函的「職業牧師」、「職業學生」，利用人性的醜陋。教會裡那些利用政治黨同異伐的情況，恐怕至今還是有的。

## ■ 血跡斑斑的彩衣：百年大會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南北兩大會於 1951 年 3 月 5 日合一而成立了總會，也在這一年開始了與普世教協的關係。真正南北教會的合一是 1957 年，第一屆正式在總會裡選出了黃彰輝為議長、黃武東為第一任總幹事，這一年也是倍加運動 (PKU) 的第三年。<sup>19</sup> 為了把合一運動擴大到全臺其他教會的共同加入，長老教會於 1960 年就已積極地邀請不同宗派背景的教會之間相互聯絡，包括了聖公會、信義會、衛理公會都反應熱烈，甚至還力邀真耶穌教會。<sup>20</sup>

19 「倍加運動」一詞始於高雄中會，由許有才牧師提出的「往鄉鎮廣設教會」演變而來，故許又被譽作「倍加運動之父」。1954 年 7 月 7 日，「倍加運動」於第十三屆的南部大會提案通過，原屬於南部設教一百週年的工作，之後於 1959 年 2 月 17 日才於總會的第六屆通常議會通過設置「PKU 委員會」，定名作「福音來臺百週年紀念教會倍加運動」，其標語為「紀念設教百週歲，信徒教會要加倍，靈修傳道與獻金，全體信徒要同心」，當時的議長為蘇天明牧師。參見陳勝政，《臺灣教會宣教的剖視》，臺南：公報社，1972，195-197。

20 1965 年百年大會的三位主要人物：黃武東 (1909-1994)、黃彰輝 (1914-1988)、周聯華 (1920-) 都是正值年青時期，分別年齡是 56、51、45，象徵著臺灣教會的活力與遠景，然而這一切



1963年，第十屆總會正式議決於1965年主辦百年紀念大會，並邀請各不同的基督教會及團體一同參加，以合一的運動推向更加完好的地步。所以，百年大會不是長老教會自己的事，藉此大會，目的即是促進全臺教會的合一，而不是僅僅是為長老教會而已。最值得注意的是1963年在臺中市真耶穌教會所召開的會議，更是來了天主教界的代表，到該年的年底11月，就已準備成立一個正式機構，之後定名為「臺灣基督教會聯誼會」。<sup>21</sup>

「基督教在臺宣教百週年紀念大典」的相關活動內容，由總幹事黃武東報告如下：<sup>22</sup>

慶祝基督教在臺宣教百週年的今天，我們祇有一句話：「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願榮耀都歸給祂。」

每一位宣教士的來臺，每一個個人的信主，每一個教會的設立，都是神蹟；這一連串的神蹟，發生在臺灣的每一個角落裡，以致有今日蓬勃的教會及許多信主的耶穌門徒。

在這一百年中固然有很多宣教士及傳道們的壯烈犧牲及辛勞勤苦，值得人們表揚及追念。但是他們仍是主的僕人和使女，應該表揚的是他們的順服和虔誠，不是他們的才幹和努力。讓我們再度歸榮耀於主。

籌備這一項的慶祝，固然為了紀念過去，但是我們的目標是感謝上帝，並求祂帶領我們的未來。

願我們牢記基督的教訓，並在我們的生活上表現出來，凡我耶穌門徒，同心同德，向著本省宣揚福音的第二世紀邁進。

同意參加教會及團體包括：臺灣聖公會、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基督教臺灣信義會、基督教浸信會臺灣省聯會、臺灣聖教會、門諾會、行道會、安息日會、宣道會、國語禮拜堂、凱歌堂、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臺灣福音聯誼會、聖經公會、

都因現實政治的複雜原因而各奔東西，所幸的是這些幾位關鍵人物都相當長壽且各有所成。

21 《黃武東回憶錄》，282-287。

22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第十三屆議事錄》，淡江中學，1966/2/7-11，10-11。



遠東歸主協會、中國主日學協會、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中國平信徒傳道會、臺灣基督教視聽聯合會、東海大學、救世傳播協會。

### 附錄（九）：百年大會的籌備委員會及紀念大典綜合日程

#### 籌備委員會

主席：周聯華

書記：方大林

總幹事：黃武東

委員：王長齡、華納、金仲庵、王載、黃金田、許遵道、馮國光、林朝陽、任偉恩、吳勇、陳繼彝、黃彰輝、余沙伯、賴炳炯、高頌義、吳揚道、謝重仁、錢湯靖宇、黃約翰、陳光輝、吳德耀、唐主謙

#### 紀念大典綜合日程

典禮名稱	日期	地點
1 全省培靈佈道大會	自三月初至五月底	全省四十市、鎮、鄉
2 紀念週諸行事	自六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	臺南、花蓮、臺北
臺南地區紀念大典	六月十六日、十七日	臺南市
東部地區紀念大典	十九日、二十日	花蓮市、光復鄉
臺北地區紀念大典	二十一日、二十二日	臺北市
3 紀念禮拜日	六月二十日	全省各教會
4 基督教歷史資料展覽會	自六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	臺南神學院
5 基督教婦女大會	六月二十二日	臺北市
6 主日學大會	六月五日	臺中市
7 基督教青年大會	八月十九日	臺南市
8 紀念慶祝運動會	自八月十七日至二十日	臺南市





▲▼百年大會場景：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外觀。（作者翻攝自《瀛光月刊》）



◀臺南頌音堂門口，百週年慶祝大會的看牌。（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收藏）





▲百年大會場景：開幕禮拜。（作者翻攝自《瀛光月刊》）



▲▶百年大會場景：遊行活動。  
（作者翻攝自《瀛光月刊》）





▲百年大會場景：基督教臺灣宣教百週年紀念大會，北部慶祝大會場次於 1965 年 6 月 21 日晚上在臺北市中華體育館舉行首日慶典，由臺灣聖公會主教王長齡主持。（中央社）

這一切事情的發展，使我們可以了解何以這幾個不同宗派的教會會於 1965 年共同發表《教會合一性：正告主內兄弟姊妹們》一書。事實上，正是這個合一運動在護教反共的意識形態之下受到了關注，所以，想借用發表上述的小書來緩和氣氛，以期讓該年中旬欲舉行的百年大會不會受到影響。然而，因著外部政治現實的牽動，教會內部權力之間的角力可謂暗潮洶湧，臺灣基督教界內的對立氣氛，不斷地上升中。

1965 年的百年大會即是在「保密防諜」的高度緊張狀態中進行，國民黨和勤治單位越來越嚴管長老教會的一舉一動，事情一直演變下去，最終即是要迫使長老教會割斷與普世教協的關係。

百年大會首站從南部開始，原定 6 月 16 日晚上的遊行活動，因前一天周聯華已被警務總部參謀總長召見，並告誡他遵守四項要求：(1) 可以遊行，但不准有任何的聲音；(2) 遊行過程中，不准發任何宣傳品；(3) 臺南小流氓很多，你



們不准與任何人肇事、打架；(4) 限當晚十一時結束。<sup>23</sup> 因為情況越顯緊張，20日在花蓮的遊行就乾脆取消。

最棘手的問題莫過於，原來預訂給外國來賓的飯店，也被告知客滿而不接受住房了，因為接到風聲說來住的這些人是「親共份子」以及「蘇俄人」，結果造成有些外國客人最終被迫安排住進一些信徒家去。在《駁復「正告主內兄弟姊妹們教會合一性」書》一書中，成文秀列出一張參加百年大會的與會者名單，還特別清楚標記出哪一些是「容共分子」（含普世教協、美國教協，以及出席新德里會議的代表等），教會弟兄姐妹突然被囑咐接待那些「可疑的」外賓，可以想像得到那種無法言喻的恐慌，那些接待外賓的信徒及其家人，正承受著巨大的政治心理壓力，有誰不害怕被情治單位盯上並被扣以違反「反共抗俄」國策之罪名呢？

整個慶典的活動，一直舉行到9月底，這樣一個被周聯華形容為「生日會」的百年大會，從開始到結束，就一直存在於「恐共」的風聲鶴唳下。不管是周聯華或是黃武東，都情願把一切的問題歸咎給一個外國人（麥堅泰），<sup>24</sup> 但是，這樣一個外國人有可能具有此天大的本事在島內興風作浪嗎？

這一年的10月，緊接著在臺北召開的「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才是真正的答案所在。這個會議的召開，獲得了黨政和國家領袖的支持，與會的名單差不多羅列了全臺基督教界的主要代表人物，這樣一個會議怎麼也不會是麥堅泰或其在臺的代理人成文秀可以搞得起來的。我們應該不會忘記，這原來是一場婚禮而不是生日會，當然，婚（合一）最後是結不成了，但是，這個變成慶生會的活動，卻是成了「分手」（分裂）大會，留下了長老教會獨自面對排山倒海的「不反共就是親共」的可怕罪名。

23 《周聯華回憶錄》，272-273。

24 見《黃武東回憶錄》，294，及《周聯華回憶錄》，269。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屆的《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手冊》上的外賓名字，並未見到麥堅泰。



百年大會的「彩衣」一倍加運動，可以說是臺灣宣教運動最為成功的一次，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李嘉嵩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得很清楚：

信徒數屬於基督新教尤其是長老會的就達到約六萬人之多。就是平地方面，由長老會所舉辦籌慶傳教百週年紀念的信徒倍加運動，的確也收到非常豐碩的成效，所以在戰爭中，教會數全省只有二百多間，信徒數亦僅五、六萬人，到了一九六五年慶祝傳教百週年大慶之時，單是長老會方面，教會數包括山地與平地已達到八百多間，而信徒數也增加到十六萬人之數。<sup>25</sup>



▲為迎接百週年紀念，長老教會推行 PKU(倍加運動)，成果豐富，是臺灣教會史上最為成功的一次增長運動。(作者翻攝)

25 李嘉嵩，《100年來》，臺南：人光出版社，1979，125。在這十年中，平地教會從 250 所增加到 460 所，信徒人數從 45,000 增加到 98,000，山地教會從 0 進展到近 398 所，信徒也有 70,000 多人。這是名副其實的倍增，這是臺灣宣教史最輝煌的一頁。



「倍加運動」成果空前的豐碩，作為迎接百年大會的一年大禮，可以說是一件「彩衣」。生日收到禮物本來是應該歡喜快樂的，但在這充滿著恐懼與不安的氣氛中過生日，對所有長老教會的信徒而言哪裡高興得起來，尤其是許多信徒恐怕都「接觸到了親共分子」，更是一件揮之不去的恐怖記憶。

百年大會開始當天，他們被下令不准大肆慶祝，就像生日不能唱生日歌，活動過後也不准再提起、不准興奮，要像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一樣。<sup>26</sup>《臺灣教會公報》和《瀛光月刊》除了刊出一些活動照片，其他的報導可謂少得可憐，接下來一期的內容幾乎已完全看不見任何與百年大會相關的消息了，《瀛光月刊》的社論竟然刊出「欣聞基督教論壇報即將實現」的文字，這樣的編輯手法，任何人都可以讀出其中的無奈。百年大會前，當時擔任議長的黃彰輝，早已向總會提出辭呈，8月把臺南神學院院長一職交給了當時才三十五歲的宋泉盛，自己則選擇到「普世」「流亡」去了。<sup>27</sup>黃彰輝這一走，直到二十二年後（1987）才獲准返臺。

作為百年大會負責人的黃武東在他的回憶錄提到教內人士對他的攻擊：

原來有一位福建人，據他自稱因患了癌症祈禱後痊癒，乃半路出家，獻身傳道。在臺北市，他自設教會，自成一派，自己不以牧師自居，和會友均以兄弟姊妹相稱，一時頗有名氣，中華神學院成立時，他曾擔任董事長。

就在一九六六年春天，他到菲律賓培靈佈道，言談間竟不斷離間，告訴教

26 《周聯華回憶錄》和《黃武東回憶錄》都有深刻的描述。

27 黃彰輝究竟是如何出境的？何以他兩年後就獲准加入英國國籍？這些都是有待解開的謎。1965年到臺灣，時任教於臺灣神學院的衛理公會傳教士唐培禮（Milo Thornberry）提及，因為退出普世教協的事件，長老教會背景的人物除了被監視，神學院裡還有一些人給情治單位打報告，參見《撲火飛蛾：一個美國傳教士親歷的臺灣白色恐怖》，臺北：允晨文化，2011，187-188、193。關於白色恐怖的情況，唐培禮做了一個深刻的描述：國民黨多元的情報系統不僅容易誘發令人恐懼的暴行，同時多頭馬車也容易造成腐敗，保證缺乏效率。（參見上書，頁216）

黃彰輝的離臺，肯定不是他所說的那麼簡單，只是純粹為了與家人團聚。事實上，作為議長的他，百年大會的前後，是被情治單位盯上的WCC在臺的頭號人物。



會，說我是自由派人士，和天主教合作，是異端。<sup>28</sup>

這位自成一派、頗有名氣的「弟兄」，即是林森南路禮拜堂的吳勇長老。正如周聯華所述的那樣，在基督教圈子裡，「對付一個不喜歡的人，只要冠以『新派』的標籤，他就翻不了身了」，包括只要肯定天主教或與長老會人士接觸，很快就被這些人懷疑，稍惡劣些，就成了鬥爭的工具。<sup>29</sup>

百年大會的總幹事黃武東牧師，一首近似於「愛國歌曲」〈上帝賜福中國各省〉的作者，先是被說成「親共」分子，之後又成了「臺獨」分子，這些身份都是國民黨給他按的。事實上，這首完成於1961年之作，黃武東本人並不贊成做任何修改，在黃逝世之後，被他的弟子們改寫作〈上帝賜福臺灣各境〉。原歌詞如下：<sup>30</sup>

上帝賜福中國各省，東西南北美麗風景；  
春夏秋冬水秀山明，歷史悠久人傑地靈。

土地廣闊物產豐盛，風調雨順五穀豐登；  
士農工商共存同榮，安居樂業生活安寧。

願咱官員遵主命令，內外政治正義公平；  
家庭社會不起紛爭，全國受恩享受太平。

28 《黃武東回憶錄》，308。

29 周聯華，《我的一生》，臺北：臺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0，110。

30 1973年10月18日在臺南市主辦的「基督徒慶祝蔣公華誕暨護教反共大會」上，臺南神學院詩班還特別獻唱了這首詩歌。這首標準的「愛國歌曲」，最終是黃的學生們將之改作〈上帝賜福臺灣各境〉，見 <http://hymn.pct.org.tw/Hymn.aspx?PID=P2011112800014>，2013/10/1 瀏覽。



願主道理到處通行，全國百姓做主學生；  
照主法度遵趁聖經，賜阮中國萬代昌盛。

之後改作：

上帝賜福臺灣各境，東西南北美麗風景；  
春夏秋冬水秀山明，歷史悠久人傑地靈。

賜阮鄉土物產豐盛，風調雨順五穀豐登；  
族群和諧共存同榮，安居樂業生活安寧。

願阮官員尊主命令，內外政治正義公平；  
家庭社會無起紛爭，全民受恩享受太平。

願主道理到處通行，男女老幼做主學生；  
照主法度遵趁聖經，賜阮臺灣萬代昌盛。

黃武東的情況和當時長老教會的立場基本上都是一致的，他們都宣稱長老教會的信仰立場非常的清楚，其《信仰告白》即是宣示了對上帝的信仰，這意味著任何與此信仰告白有別甚至是矛盾的，都是他們所拒絕或否認的，特別他們所堅持的，即是站在教會信仰的立場上，必須要實行基督的教誨，必須因為共同的信仰前提實行「合一」的教導。<sup>31</sup> 對於外界始終都是一面倒的說他們是「親共」，基本上是毫無道理的，全是「欲加之罪」，我們從 1981 年由長老教會總會出版

31 事情來得實在太巧合了。由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發行的《公報》第 21 卷第 6 期（1949 年 6 月），該期內容刊載了黃武東的文章〈南部臺灣基督教長老會概況〉，同時該期還特別介紹了〈臺南大會議長楊士養牧師簡歷〉和〈臺南大會副議長黃武東牧師簡歷〉，時間就發生在 1949 年，是否會有些告密者根據這些資料大作文章加之「匪諜」之罪名就不得而知了。



的《認識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小書中清楚說明，他們在 1978 年在《臺灣教會公報》上的一篇文章如此說到：

我長老教會於國家面臨危急之際，為響應政府呼籲人民團體貢獻國是意見，以表達人民心聲。在出於誠心愛國、愛同胞的心情下，呼籲美國不要因急欲與中共關係「正常化」，而將臺灣一千七百萬同胞之人權出賣。同時主張國家的前途應由我們人民自己決定。

本宣言所提「新而獨立的國家」，實際上完全與臺獨無關。<sup>32</sup>

迫於此排山倒海而來的政治壓力，其最終還是逼使長老教會退出了普世教協，當然，接下來的一連串事件的發展，最終也將長老教會推到「自決」的道路去了。<sup>33</sup>

百年大會後，長老教會的發展明顯走下坡。曾任教會公報社主編的李嘉嵩回憶時說得極為曖昧，情況當然不是他所說的那樣表面，一切的問題就在「政治」，一句「其間教會所遇到的困難，對內、對外都有不少難以應付之處」道盡了滄桑：

自從一九六五年慶祝臺灣傳教百週年以後，就立定目標發動宣教第二世紀的傳道方案。不過，教會自從慶祝傳道百週年之後，領導中心人物黃彰輝牧師應聘就任世界神學教育基金會的幹事；又黃武東牧師離開在長老會

32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澄清外界對人權宣言之誤解〉一文原刊載於《臺灣教會公報》第 1362 號，1978 年 4 月 9 日。這篇文章以「社論」的形式刊登，是非常具代表性之作，之後曾收入《認識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臺南：人光出版社，1981，61-65，以及宋泉盛編著《出頭天——臺灣人民自決運動史料》，臺南：人光出版社，1988，198-202。

33 黃武東提到，第一個宣言是由「中華民國教會合作委員會」議決的，這個委員會亦包括了天主教在內。1971 年 11 月 19 日，「中華民國教會合作委員會」於東海大學開會，南神院長彌迪理提出發表宣言之建議，周聯華和衛理公會的華納會督也同意，成立了一個起革委員會，成員包括了周聯華、于斌、彌迪理、羅愛徒和龐德明（聖公會主教，但總是由雷法章代為出席）在內，據說草案中有一句：「人權既是上帝所賜予」是由于斌所建議的。只是之後因著部份代表紛紛退出而告終，然而，這個草案卻於 12 月 29 日在長老教會總會中死裡復活，30 日單獨行動召開記者會對外發表，1972 年第一個主日（1 月 2 日）全臺灣所屬長老教會主日晨間禮拜講道後向會眾宣讀。見《黃武東回憶錄》，340-342。



十六年的總幹事職位，轉就於基督教福利會主任，繼而離職舉家遷居美國；臺北、臺南兩所神學院新院長也任職不幾年便離職轉就美國與日內瓦兩地聖工。其餘許多受保送出國深造的人材，多人未能如期歸國服務，北部大會又因未便於解散，無法同心協力來扶植總會的發展，整個教會因此仍停留在籌慶傳教百週年當時的狀態。其間教會所遇到的困難，對內、對外都有不少難以應付之處。<sup>34</sup>

百年大會結束後黃彰輝、黃武東走了，李嘉嵩本人也走了，他去砂勞越神學院任教；之後宋泉盛也走了，整個長老教會在那極端不安全的情況之下，在這些關鍵位子上的人都要承受很大的壓力，能走的都走了。李嘉嵩主編《教會公報》時，可以說是公報最高峰的階段，他也可以說得上是一個人才。令人諷刺的是，百年大會竟成了臨界點，從此急速地往下滑。政治給長老教會的傷害，難以撫平。

約瑟身上這件彩衣（光榮的 PKU 成果），沾滿了鮮血，這一切竟是出自於他的弟兄們……。



▲百年大會三位關鍵人物：黃彰輝、黃武東、周聯華。（作者翻攝）

34 李嘉嵩，《100年來》，128。



## ■ 插曲（二）：節外生枝，與天主教聯合祈禱會

除了與普世教協的關係引來教內的撻伐，1966年與「天主教與基督教聯合祈禱會」之事件，也引發爭議，此一事件同樣是與普世教協有關，同樣是直指長老教會的神學偏差，引起軒然大波。接著，各種教派背景的人士全面攻擊「四大教派」，說與「異端」天主教聯合是「出賣耶穌」，陳維屏、賈嘉美、盧祺沃等都發表相同的主張，甚至遠在美國的趙天恩也特別寫信來，反對天主教、反對普世教協，認為與天主教的往來嚴重地背離了基督教信仰，呼籲要組委員會來揭發異端的合一運動。此事正是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中華民國分會成立的這一段前後時間，參見《福音報》第284期到296期，從1966年1月到3月間，都有針對此事的報導。<sup>35</sup>

在此敏感和爭議的時刻，反對「天主教與基督教聯合祈禱會」的主張仍然是根據王永信的《真道手冊》，他批判普世教協是「大背道」、最大的異端，批判天主教則是根據啟示錄所指斥的「大淫婦」，全文轉載刊於《福音報》第296期（1966/4/24）。長老教會圈外，藉反對「天主教與基督教聯合祈禱會」，將反共與反普世教協的活動推向最高潮。

為了表示堅決維護純正信仰，反對「天主教與基督教聯合祈禱會」，全臺三十三個教派領袖聯合召開會議，並一同表示立場，發表了一紙〈告同道書〉，表達嚴正立場並宏揚真道。這份〈告同道書〉係由上述人士於2月3日上午十一時，假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二號美而廉餐廳集會討論，推請寇世遠、盧祺沃、吳勇、俞汝良等四人負責起草。據說此一〈告同道書〉印刷五萬份，分派給各教會，

35 關於此事，由於《天橋新聞》特別刊登並鼓勵參加天主教與基督教聯合祈禱會的消息，結果之後「被迫」要楊石林結束該週刊，但在表面的解釋則是說與《福音報》合併，見《福音報》第271期，1965/10/31。《天橋新聞》於1965年8月停刊，內中的複雜關係與此事件有關，發行人楊石林最後被迫將此發行五年多的報刊拱手讓人，1967年1月15日復刊（第251期），發行人變成了李約伯，該期首頁刊出「本報緊急啟事」，開始的一段文字寫著：「本報原發行人楊石林牧師願本愛心，將天橋新聞無條件餽送新發行人李約伯牧師。」



〈告同道書〉全文不僅刊於《福音報》頭版頭條，《中國信徒月刊》也轉載了。<sup>36</sup>

〈告同道書〉羅列出了天主教十大罪狀：

茲舉出其錯謬之犖犖大者，簡述如次：

- 一、擅改經訓—以教皇令諭，宣告馬利亞無原罪，目為中保，向之求告。
- 二、偷竊神榮—教皇高踞寶座，接受教徒跪拜，又造各種偶像，使人膜拜。
- 三、歪曲教義—教人刻苦己身，鞭體自贖，重行為，積功德，不講因信稱義之救恩要道。
- 四、濫用權柄—曾售贖罪券，倡行煉獄之說，以資廣斂錢財，賄賂罪人良心。
- 五、不傳真道—不傳基督福音，拯救靈魂，不按正意解經，造就信徒，正如耶穌責備法利賽人說，你們走偏海洋陸地，勾引一個人入教，卻使他作地獄之子。
- 六、徒重形式—以望彌撒唸經，製造神秘氣氛，有敬拜的形式，無敬虔的實意。
- 七、轄制人性—從事聖職之神父修女等，硬性規定不准嫁娶，違反神當初造男造女的本意
- 八、包辦聖工—教皇定規惟有聖品人可作聖工，失去教會肢體配搭事奉之應有功能。
- 九、封閉聖經—不容許其教徒保有一本完整的聖經，以遂其愚民政策。神父唸經則讀拉丁文，令人莫測高深，不知所云。
- 十、政教合流—梵蒂岡對世界政治，極感興趣，政治亦入宗教，使永生神的教會失去聖別的立場。

當然一切的重點即在於抨擊「天主教與基督教聯合祈禱會」，他們甚至用了極為

36 《福音報》第292期，1966/3/27；《中國信徒月刊》第5卷第4期（1966）。



尖銳的語詞批判天主教，認為他們此舉是滲透，也是收買基督教：

我們看出這次「聯禱會」的出現，不過是一連串陰謀詭計的開端，如果任憑發展，後果不堪設想！這次「禱告」既可聯合下次「講臺」亦可交換，而「望彌撒」與「領聖餐」輪流在天主堂和禮拜堂舉行，也就勢在必行，長此以往，必將形成一種態勢。

我們實在看不出基督教與天主教之間，直到如今有任何共通的地方，可以本著聖經交通印證；有任何正當的理由，可以共聚一堂齊聲禱告；有任何穩當的基礎，可以合而為一同奔天路。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天主教所倡導且為極少數基督徒所附和的合一運動（Ecumenical Movement），不過是併吞基督教的一種手段。

所以，〈告同道書〉總結地認為基督教與天主教毫無任何相通之處，當然也無須有任何的合作可能，重點仍然是打擊普世教協的合一運動。<sup>37</sup>

特別令人玩味的是，當黨國基督徒如此激烈地反對天主教、大罵作異端、大淫婦，但他們所敬愛的蔣介石夫婦與他們口中的異端—天主教—可是有深厚的關係，甚至，在靈性及友誼方面都是超過基督（新）教的牧師的。例如蔣介石書房中擺了一尊「耶穌像」，他邀請天主教教友吳經熊重新翻譯新經（即新約）和聖詠（即詩篇），花了很大的精力針對吳經熊的譯文進行詳細的眉批、修譯，靈性上的互動很深；又如宋美齡外婆家的天主教背景，以及其家族與徐光啟的累代親家，不難理解她何以接受並擔任了長達廿五年輔仁大學的董事長一職，而且，她與于斌樞機主教、教廷都有深厚的情誼。但是，當他們在攻擊長老教會時，卻又是另一套標準。

37 其他坊間流傳批評天主教的小書包括有：徐萬黎編著《馬丁路德為何要作改教運動》（1959年6月初版，自印；1962年2月再版，臺灣宣道社出版）、以及署名作「主的使女底波拉」著者的《以法蓮是我的長子—獻給羅馬天主教徒》（1961）和《與羅馬天主教徒檢討主日彌撒經典》（1961）兩本小冊。



KĪ-THA<sup>a</sup>: Kok-ka

上帝賜福中國各省 427

HŪ-SĪA<sup>a</sup> SĪONG-TĒ SŪ-HOK TĪONG-KOK TĀK SĒNG LŌH I-TŌ. 1934-

Unison

1 上帝賜福中國各省，東西南北美麗風景，  
 2 土地廣闊物產豐盛，風調雨順五穀豐登，  
 3 願哈官員遵主命令，內外政治正義公平，  
 4 願主道理到處通行，全國百姓做主學生，

春夏秋冬水秀山明，歷史悠久人傑地靈。  
 士農工商共存同榮，安居樂業生活安寧。  
 家庭社會不起紛爭，全國受惠享受太平。  
 願主法度避除聖難，賜福中國萬代昌盛。阿門。

\*Bân-kun é iá-hô-hoa kóng, Bân-ko̍k beh chheng iá chòe ū hok-khi é, in-ūi iá beh chòe thang hoa<sup>a</sup>-hí é tōe (Má-lá-kí 3:12).

1. SĪong-tē sŭ-hok TĪong-ko̍k tāk séng,  
 Tang-sai lám-pak bí-lé hong-kéng,  
 Chhūn-hā chhiu-tong chú siá san béng,  
 Lék-sú iú-kiú jin kiát tōe léng.
2. Thó<sup>a</sup>-tōe kóng-khoah bút-sán hong-séng,  
 Hong tiau ú sūn, ngó<sup>a</sup>-kok hong-téng,  
 Sū lōng kong siang kiōng-chūn tōng-éng,  
 An-ku lók-giáp seng-oáh an-léng.
3. Goán lán koa<sup>a</sup>-oán chun Chú bēng-léng,  
 Lái-gōa chēng-tī chēng-gī kong-péng,  
 Ka-téng siá-hōe bô khí hun-cheng,  
 Choán kok siū-un hióng-siū thāi-péng.
4. Goán Chú tō-í tō-chhū thong-héng,  
 Choán kok peh-si<sup>a</sup> chòe Chú hák-séng,  
 Chiàu Chú hoat-tō<sup>a</sup> chun-thán Sēng-keng,  
 Sū goán TĪong-ko̍k bân-tái chhiōng-séng. A-mén.

SG BŪ-TONG. 1909- 651

◀黃武東所做的詩歌〈上帝祝福中國各省〉。(截取自網路)

## 成立「反共推行委員會」

依當時的情勢，臺灣教會界不論何種宗派背景，皆有牧師或長老參加「護教反共」的活動，表示與親共的教會團體劃清界限。當中國大陸的教會在面對「割斷與帝國主義」的控訴運動，臺灣島內正掀起「割斷與普世教協」的分裂運動，在與普世教協的關係上，長老教會受到前所未有的「嚴重關切」。

1967年2月20日長老教會召開第十四屆總會議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即是關於退出普世教協的議案。政府為表明要讓長老教會知道「如果不退出，後果嚴重」之警告，內政部民政司一位官員康峻璧（要留意此人的影響力），還親自



列席了第十四屆長老教會總會會議，要監督由七星中會提交出「退出普世教協案」之討論，他還特別請了記者對所有的發言人照相存證。<sup>38</sup>當時的提案的內容與說明如下：<sup>39</sup>

（第三十三條）：請慎重研究總會加入普世教會協會的得失，如益處多則繼續留在該團體，表示我們反共的堅決立場為國家效勞，如得不償失，則退出該團體案（星中）

說明：查有關國際事務局似有不利我國反共國策之言論，雖我長老教會總會及中華民國基督教會協會等業已以公函表示反對在案，為求更進一步澄清我們長老教會反共的一貫立場，必須弄清事實，如有過份違我立場必須強烈抗議，但如無大碍則必須向全體教友澄清事實並向國家社會有所交代。

在正式開會以前，氣氛就已顯得格外緊張。在此案開始討論之前，已有十名左右的各報記者接踵進入議場，案由說明者就是七星中會議長卓耀隆牧師，繼而有七星中會的議員鄭君芳牧師、臺北中會的黃六點議長、七星中會的吳清鎰牧師，甚至中中的謝隆輝牧師先後起立做了表示贊成的發言，個個都慷慨激昂。

突然有人問及，究竟政府方面有無向教會通知應該退出普世教協時，前議長張逢昌拿著《角聲週刊》及某報指摘所載消息，認為都是不實的指控，同時他也表示並未接到任何有關當局的指示或通知，並再次呼籲全體出席代表應慎重，無

38 《王南傑牧師—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口述歷史》，42。作為內政部專員的康峻壁，他一直都是護教反共委員會最為堅定和持久的委員，根據會議記錄，他在諸多護教反共人士中會議出席率是最高的一位，時亦擔任中華基督教協會總幹事一職，有說是中華基督教信友堂的會友，也有可能是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長老，後者是因為與侯天民牧師的關係。康與雙連教會陳溪圳牧師往來甚密，又曾是趙天恩結婚時的證婚人，與趙中輝是同鄉（遼寧），讀過神學院，亦擔任過教會牧職。根據周聯華透露，康峻壁曾夜訪神學院，要周出來帶領護教反共的組織與活動，結果被周堅決地回拒了。詳見本書周聯華部份，另見周聯華〈臺灣教會史中之一頁悲慘史〉（未刊稿，見本書第219頁，感謝吳昶興教授提供此資料）。

39 《第十四屆通常議會議事錄》，1967/2/20-24，17。



須急促於會期中立即決議。張逢昌於是建議交由研究小組研究，半年後再報請總委會裁決發表聲明。

這是一次極具戲劇性變化效果的場面。此時，列席的內政部康峻璧則突然請求前來發言，經全體鼓掌歡迎後，登場發言表示說，他的確並未和張前議長談過退出普世教協之事，不過以他作為中華民國基督教協會總幹事身份而言，是希望長老教會總會退出普世教協。接著，由副書記高俊明勸勉大家不要紛爭避免使第三勢力乘機造成裂痕，高的語意沉重，獲全會報以掌聲。這一天會議的結果是，張逢昌之提案以 147 比 15 獲得大勝，將該案推遲。<sup>40</sup> 當天決議的結論如下：

1. 由總會指派專案小組蒐集資料，研究檢討我等在普世教會協會之得失，該小組必須包括神學家，總會幹部及公正客觀熟習政治的平信徒組成。
2. 將蒐集資料檢討意見由總會分發總會轄下各教會以備研究及了解。
3. 如我等在普世教會協會確有益處請即時透過大眾傳達工具如論壇報或印發小型資料卡或招待記者聲明我們反共的立場及我們信仰根據。
4. 總會有關人員，與中央政府必須保持聯繫、接觸、使其努力於政府對我長老教會之信用及信任。<sup>41</sup>

「普世教協研究委員會」的成立，算是暫緩了此一緊張情勢。「普世教協研究委員會」分為五個小組進行：

- 第一小組：稱「政務小組」，負責與政府聯絡，並向政府請示對普世教協應採取的態度。
- 第二小組：向母會、差會及國外基督教團體，搜集參考資料。
- 第三小組：向在臺各基督教團體與友好教派搜集參考資料。
- 第四小組：與天主教交誼聯絡，獲取參考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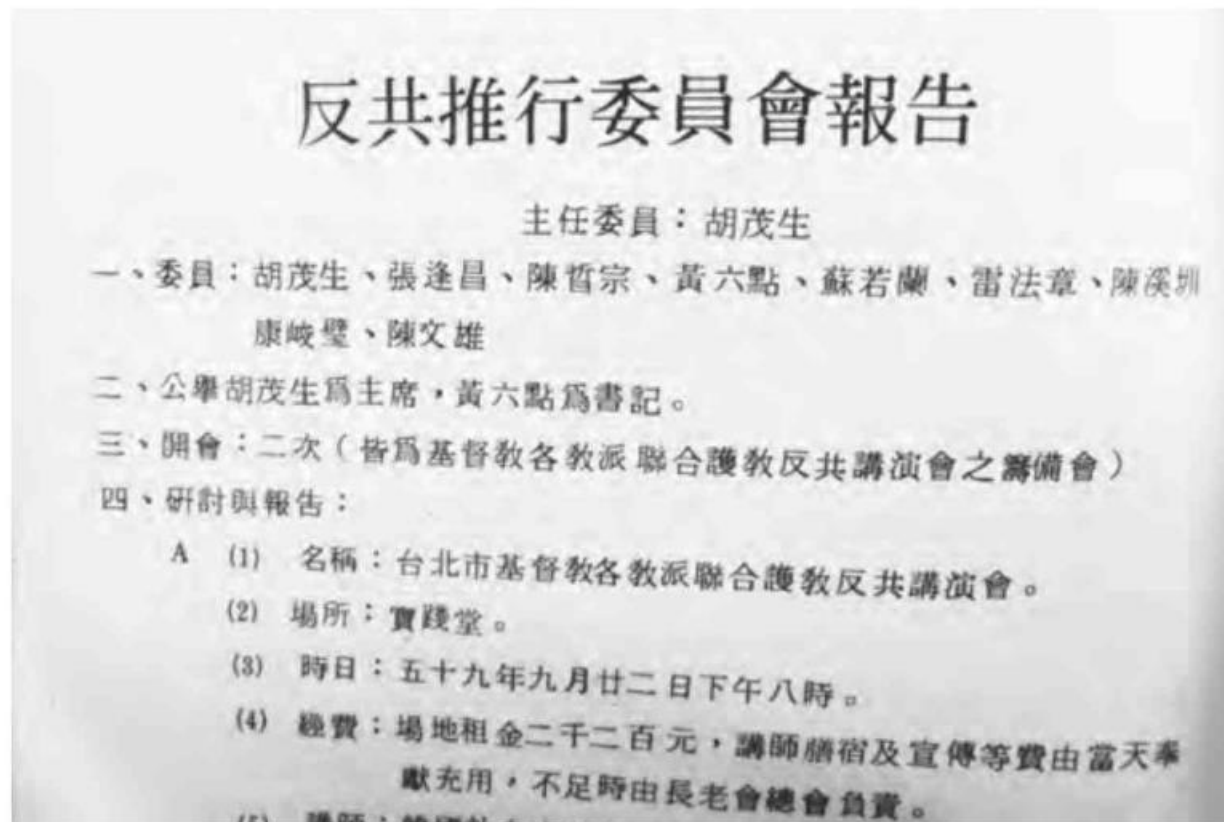
40 《瀛光月刊》第 208 期，1967/2，3。

41 《第十四屆通常議會議事錄》，1967/2/20-24，17。另可見於《王南傑牧師—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口述歷史》，42。



第五小組：「神學研究小組」，從神學信仰立場搜集參考資料。

其中，政務小組曾拜訪過政府官員，談論並請教有關「普世教協」問題。<sup>42</sup> 種種活動安排都顯示，長老教會在配合政府反共的大原則或前提下，即是為「退出普世教協」做最大努力的抵制工作。



▲長老教會被迫於總會組織內成立「反共推行委員會」。(作者攝自長老總會議事手冊)

但是，儘管風波短暫被平息下來了，但問題仍然未見明朗。護教反共的陣營持續不斷地攻擊普世教協，並不斷地宣傳其出賣信仰、違反基本聖經立場、異端等。對此，「普世教協研究委員會」曾於 1967 年 3 月 20 日下午二時在臺南神學院研究院召開第一次會議。會中曾邀請四位神學教授，以客觀立場發表演講，講題為：(一) 普世教協之歷史、(二) 研究普世教協與臺灣教會之關係、(三) 普世教協在臺灣互助的情形、(四) 萬國基督教聯合會之歷史。<sup>43</sup> 值得注意的是，此委員會竟然特別安排介紹與普世教協敵對陣營的萬國基督教聯合會，其意甚明，想釐清誤解，但效果顯然有限。

42 《基督教論壇報》，1967/4/9。

43 《基督教論壇報》，1967/4/9。《第十五屆通常議會議事錄》報告，1968，200。



另一方面，長老教會也積極要求普世教協為上述的指控提出澄清，終於還是獲得了回應。1967年6月20日，普世教協總幹事勃來克 (Eugene C. Blake) 曾致函長老會總幹事，指出「貴教會當中有人以為普世教協是一個親共的團體，這完全是無稽之談」，並說明「論及中共，普世教協絕無意在政治上與中共發生任何關係」。<sup>44</sup>

由政府情治單位主持的「七二〇專案」(針對普世教協案)第二次會議中，周中峯報告了長老會成立之「普世教協研究會」進行之概況，提到研究會第二次會議於1967年5月11日在臺灣神學院召開，第三次會議於1967年7月20日召開，形成壁壘分明的兩派人馬，一方是宋泉盛、高俊明、鄭連明、鍾啟安、鄭玉兒，另一方則是吳清鎰、陳溪圳，據說該次會議原欲發表宣言公開表示不退出，結果還是被壓制了下去。<sup>45</sup>

1969年9月8日，長老教會第十六屆傳教師總會暨靈修會「突然」關心起中國教會的問題，特別配合了中華民國基督教協會於關渡基督書院召開以「中國教會的前途」為主題的聚會，此次一篇由陳建中主講的內容亦同時刊出。<sup>46</sup>而且，為了嚴肅面對攻擊普世教協的頭號分子萬國教聯，《臺灣教會公報》曾特別轉載了一篇於美國《時代周刊》(1969/11/14)公開萬國教聯會長麥堅泰惡行惡狀的報導，說明他是教會中的「離間分子」，其特點即是搞分裂，凡他曾經參與過的組織，最終都在「魔術手」中分裂出來。<sup>47</sup>

為了仍可留在普世教協中，長老教會不斷地努力地使自己表現出對國家的忠

44 《瀛光月刊》第219/220期，1967/8，3。《基督教論壇報》，1967/7/30。

45 國史館檔案，卷名「宗教案件」，入藏號02000017839A。中華基督教信友堂於1967年4月退出臺灣基督教長老會，見《中央日報》1967/4/22。

46 〈中國教會的前途〉，見《瀛光月刊》第246期，1969/10，27。第247期的《瀛光月刊》還特別選刊了時任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的梁寒操一篇〈三民主義與基督教〉一文，編者特別標明為紀念國父作為一位愛國愛民的基督徒，也為了明白時代所賦予基督徒的使命，梁寒操亦是基督徒，以宏揚三民主義為志，曾被人喻為「三民主義牧師」。

47 《臺灣教會公報》1053期，1970/2，12-13。



誠。1968年的雙十國慶，基督教界以「中華民國基督教會」之名參與了遊行活動。基督教各教派團體，共有兩百餘人代表參加慶典和遊行，其中，據說以臺灣神學院的四十位師生代表為最多，救世軍和道生神學院各三十位居次，其他有青年會、浸信會神學院、路德會、歸主協會、福利會、信義會、長老會、聖公會、衛理公會、安息日會及神召會等，並有十數位外籍牧師及教友參加。<sup>48</sup> 一切的努力，即是想平息這場風波。

在第十五屆總會中，鍾茂成總幹事特別就上述問題提出報告，說到去年曾為此事特別派代表晉謁政府首長，表達對總統及政府效忠之誠，並表示堅決反共態度。同時，也慎重地研究是否退出普世教協或保留會籍的問題，經過分析結果認為：

退出教協易，保留會籍難，為積極效忠國家，應保留會籍，在普世教協中力爭……。其理由是：在聯合國的組織中，及許多國際性的會議中，我中華民國都參加，雖有時也有共產國家參與，然而我們可藉以介紹我國之進步。長老會參加普世教協，可以在會中發言、抗議，隨時發表意見，為反共而力爭。<sup>49</sup>

在保留會籍的理由中提出，要是失去了普世教協中的反共同志，將失去在國際上反共的力量，而且也考慮到，退出則可以不再給予反對長老教會教派攻擊之藉口。當然，重點仍然是，長老教會認為沒有理由退出普世教協。

為了向普世教協表達堅定的立場，總會還是特別發表了書面聲明，聲明中開宗明義地說：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再三查考聖經並研讀普世教會協會之憲章及成立旨趣，認為其對獨一上帝之信仰、「合而為一」教會之觀點，及教會之宣揚福音

48 《基督教論壇報》，1968/10/20。

49 《基督教論壇報》，1968/2/18。



使命，與對世界之關切等項，與本教會之信仰與認識相同。上述之基本態度與本教會當初參加為會員時之瞭解並無改變。至於該協會曾有危害於我國之宣言，該項宣言並不代表本會之態度，依照憲章該協會不得代會員教會制法、執行、及發言。不但如此，本會為會員教會得發言抗議，並隨時作有效之處置。

此處所言「有危害於我國之宣言」，即是指關於承認中共的問題，此聲明以最強烈的口吻向普世教協表達「反共」之堅決態度：

綜上所述，本教會重申對上帝及世人之救主耶穌基督之效忠，願盡力推行教會之「合而為一」，我們為普世教協之一份子，應研究，促其再討論，並抗議中央委員會之聲明。例如：使共匪混入聯合國等荒謬建議。本教會聲明，今後如再發生危害我國前途之建議，我們站在上述信仰之真理立場決採取更積極強烈之行動。<sup>50</sup>

然而，面對越來越大的壓力，眼見不得不做些事來證明自己的立場並不是親共的，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最終還是表現出一種軟化的態度。於是在 1969 年 10 月 14 日的會議中，決議設立一個「反共推行委員會」，以取代原來的普世教協的研議小組，推派議長、總幹事、助理總幹事、兩神學院院長、謝貴、梁許春菊、張逢昌、鄭玉兒等九人為委員，議長是當然召集人。<sup>51</sup> 主席謝緯在「反共推行委員會」於 10 月 30 日召開第一次委員會時致詞說，總會設置「反共推行委員會」的意義，乃是「站在反共立場從事傳教事工，以盡中華民國國民的責任」，擬定推行辦法如下：<sup>52</sup>

50 《瀛光月刊》第 225 期，1968/1，3。《基督教論壇報》，1968/2/18。

51 《臺灣教會公報》第 1051 號，1969/12，27。

52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第十七屆議事手冊》，臺南神學院，1970/3/30-4/3，155。反共推行委員會這個組織曾經存在於長老會總會的組織架構內，大多數長老教會的關鍵人物都不太願意提及此一組織，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這個委員會或是退出普世教協的這個事件，事實上即成了長老教會領袖們心中永遠的痛。



- (一) 呈報政府有關機關、關於本總會設置反共推行委員會乙事，並呈請惠賜資料，以資推行。
- (二) 召開總會時聘請講員宣講反共精神。
- (三) 通知各中會在召開中會時聘請講員宣講反共精神。
- (四) 託張逢昌向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會聯絡安排反共人士前來本總會屬下教會證道。
- (五) 同時建議教會合作委員會與本總會反共推行委員會同一步調。
- (六) 通知各教會經常為光復大陸及復興大陸教會而祈禱。

第一次的會議討論了六點辦法，其中七星和臺北兩中會擬案提出建議總會脫離普世教協，但有委員認為此議案可以再多研究，而建議留到下屆總會討論。<sup>53</sup>此時，長老教會仍做最大的努力，想爭取時間挽回此一情勢。

除了成立「反共推行委員會」，長老會總會在此之前還曾設有「光復大陸教會設計委員會」，其委員包括總會議長周金耀牧師、副議長黃加盛牧師、總幹事鍾茂成牧師、陳溪圳牧師、張逢昌牧師及宋泉璋長老等。他們曾於1967年3月中訪問過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秘書長郭澄，請教有關對光復大陸教會設計工作應如何設法安排。<sup>54</sup>可見，長老教會為了留在普世教協，其他一概都相當「配合政

53 《瀛光月刊》第246期，1969/10，28。在提到召開第一次反共推行委員會的報導時，同一頁的文字中同時也附上了「普世教會協會反共五大原則」一文，以及同時也刊出萬國基督教聯合會會長麥堅泰「支持」共產主義的話，想藉此做些反擊，見《臺灣教會公報》第1051號，1969/12，28。謝緯還在講道中重申反共、反攻復國等說詞，見〈為教會，為國家而活〉一文。

54 《基督教論壇報》，1967/4/9。雷法章於1963年始擔任「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委員。「光復大陸教會復興設計委員會」報告三項內容：1. 本總會代表大約五名曾經於去年二月中前往拜訪中央政府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秘書長，請教有關大陸教會復興設計事宜；2. 本委員會託書記設法將本委員會成立乙事呈函中央政府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報備；3. 籌備舉行一次大陸教會復興設計座談會邀請在臺各教派代表前來參加共襄商討應辦事宜，見《第15



府」。

1970年第十七屆總會會議之手冊上，提列了「反共推行委員會」的報告，說明了去年10月30日曾召開過一次會議，也曾議決了有關展開反共之宣教事工，特別也說到今天1月9日羅列並抄發了重要的反共資料一覽表，發送到長老教會各個中會，希望教會可以購閱這批書籍。這些反共資料一覽表如下，企圖給長老教會進行「思想改造」：<sup>55</sup>

名稱	著作人	出版書局	備註
三民主義	國父	中央文物供應社	
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	蔣總統	中央文物供應社	
反共抗俄基本論	蔣總統	中央文物供應社	
蘇俄在中國	蔣總統	中央文物供應社	
解決共產主義思想與方法的根本問題	蔣總統	中央文物供應社	
耶穌受難節證道詞	蔣總統	中央文物供應社	蔣總統思想言論集 第二六、二七卷， 五十五年 十月卅一日出版
為誰而戰為何而戰	蔣總統	中央文物供應社	蔣總統思想言論集 第二十卷
剿匪成敗與國家存亡	蔣總統	中央文物供應社	蔣總統思想言論集 第六卷
中國反共與世界安危	蔣總統	中央文物供應社	蔣總統思想言論集 第二十八卷
中共奸匪在大陸的暴行	蔣總統	中央文物供應社	蔣總統思想言論集 第二十八卷

屆通常議會議事錄》報告，1968，199。

55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第十七屆通常議會手冊》(1970/3/30-4/3)，154-156。



名稱	著作人	出版書局	備註
揭發奸匪和平攻勢之目的	蔣總統	中央文物供應社	蔣總統思想言論集 第二十八卷
所謂和平共存	蔣總統	中央文物供應社	蔣總統思想言論集 第二十八卷
摧毀匪幫即可避免世界大戰	蔣總統	中央文物供應社	蔣總統思想言論集 第二十八卷
恢復亞洲和平必先 根絕大陸共匪	蔣總統	中央文物供應社	蔣總統思想言論集 第二十八卷
中國共產主義為亞洲禍亂 之核心問題等談話	蔣總統	中央文物供應社	蔣總統思想言論集 第六卷
為何漢奸必亡侵略必敗	蔣總統	中央文物供應社	
辯證唯物論與心物合一論	崔載陽	中央文物供應社	
三民主義的反共原理	伍平一	中央文物供應社	
馬克思主義之批判	羅時實	中央文物供應社	
共產主義批判	羅時實	中央文物供應社	
新民主主義批判	任卓宣	中央文物供應社	
國際共產主義的本質	陶希聖	中央文物供應社	
駁毛澤東底 「論人民民主專政」	葉青	中央文物供應社	
反共方策論	黃玉明	中央文物供應社	
共產主義批判大綱		中央文物供應社	
毛澤東批判		中央文物供應社	
共產主義真相		中央文物供應社	
中俄共關係年表		中央文物供應社	
歷史唯物論批判		中央文物供應社	
中國三十年反共戰爭		中央文物供應社	
俄共內鬪史實及其內幕		中央文物供應社	
共產國際擾亂中國記	孫福坤	中央文物供應社	
中共竊據大陸實況	鬱鳳歧	中央文物供應社	
鐵幕內的革命怒潮	曹文亭	中央文物供應社	
附庸主義就是侵略	葉公超	中央文物供應社	
共產黨人！你們錯了	孫麟生	中央文物供應社	



名稱	著作人	出版書局	備註
從大陸聽眾來信看匪區	中央廣播電 臺編	中央文物供應社	
難胞血淚話大陸		中央文物供應社	

走到這一步，連蔣介石的書都成了教會的指定讀物，可見其中的壓力有多大。然而，這一切的努力看來並未有顯著的成效，最經常性的事件即是表現在長老教會代表申請出境時總是受到刁難，其中有名的案子是鍾子時、鄭連坤、王再興、余克賢等四人所組成訪問日本之代表團，從監控人給警備總部的報告，可以窺見教會內部的分化也越來越嚴重，類似以下的言論，足見長老教會內部關係的矛盾、猜疑等：<sup>56</sup>

此次被管制的這些人，都是二流人物，像宋泉盛、黃武東等人，在國外說話的影響力比這四人更大，而宋、黃對政府，向來不存好意，過去他們出國，卻都是很容易的獲准了。這大概是政府以往對教會過於寬大了吧？這班為數甚少的教會領袖，缺乏國家觀念，對於此等人物的出國，今後也許會管理嚴格些。

長老會臺中中會議長○○○表示，據聞悉鍾子時等被禁止出境的消息後，喜憂交併，所喜的是，此輩 WCC 份子，實在應該要受到這樣的教訓，他們平常只顧到個人利益（指 WCC 支助下的出國旅行，進修與經費支援）卻不管教會的純正信仰立場。他們對付長老會內部的人，總是高高在上，講話從鼻孔出音（臺語指態度傲慢之意）。如有人反對 WCC，他們必給予無情的打擊，這班人現在面臨的困難，可說是罪有應得，我所憂的是，長

56 見國史館檔案，卷名「宗教案件」，入藏號 02000017839A。1966 年 12 月 19 日，宗教聯繫輔導小組第 45 次會議，內政部余慶部長提交了「教會團體申請設立教義研究機構規則草案」，以此規範教會神學院授課的範圍，並指定國父思想這類課程為必須。



老會首腦部門存在這樣的人物，自然影響我們整個團體的名譽。

難怪，連《臺灣教會公報》的社論也做出奇怪的呼籲：<sup>57</sup>

最近教會內不斷地發生騷動。密告書滿天飛，以致使許多教會人士感到惶恐、坐立不安。我們對於那些不負責任的胡亂投書、匿名的密告者提出嚴厲警告，不要用這種手段使政府對教會反共愛國的意志有所誤解。

我們也了解投書、密告之事是預防不了的，但我們相信政府當局對於密告、投書的處理必定是謹慎而客觀地查明事實，期使真相大白，不致使教會遭到無謂的困擾。

看似提醒，卻可以推斷出，長老教會內部的矛盾已經到達不可收拾的地步。面對退出普世教協的壓力，使得長老教會與政治現實的糾葛越來越深，教會的宣教變成了反共的宣傳。另外，再加上政治收買和分化，內部的矛盾也越來越深，教會的關係已難有基本的信任，猶太式的出賣經常地上演，實在是一件悲哀的事。

在面對此排山倒海而來的壓力，長老教會還是努力解決政府的疑慮，以行動來證明教會的反共立場。1970年初，各中會一時間紛紛開辦「反共講座」，如東部中會邀請王挽危將軍講「基督徒與反共」（1月26日）、七星中會邀請臺神院長陳哲宗牧師講「基督教和共產主義」（2月17日）、新竹中會請少年監獄典獄長陸國棟講「基督教護教反共」（2月2日）、臺中中會請張靜愚講「基督教與共產主義」（2月16日）、屏東中會請屏東客運公司副經理陳乃經講「基督徒對反共護教應有的體認」（2月12）等。<sup>58</sup>在接受這一連串護教反共的「思想洗禮」下，仍然改變不了外界對長老教會的猜疑，無論怎麼不願意，還是在政府與（護

57 〈反共、愛國之心不容置疑〉，《臺灣教會公報》第1113期，1973/6/17。

58 《臺灣教會公報》1054期，1970/3，26-29。《臺灣教會公報》1055期還特別刊出了陳乃經在屏東中會主講的內容：〈基督徒對反共護教應有的體認〉全文，6-7。



教反共)教會的壓力下低頭，而承受這一切壓力的人，即是第十七屆長老教會總會議長謝緯。正是這一年7月30日召開的總會議會，終於堅持不下去了。



▶長老會出版刊物《瀛光》。  
(作者翻攝自《瀛光月刊》)

## ■ 謝緯最後的講章：〈只傳十字架〉

從1965年百年大會到1969年，退出普世教協的決定已不能再拖下去了。一位自喻為「沒有政治頭腦」的醫師、牧師—謝緯，1969年2月11日被請去出席國民黨十全大會，儘管不是黨員的他感到這種會議的無趣，但心中仍然單純地念著要是此舉對長老教會有利，也算是一種收穫，就算參加多幾次也無妨。此時被推到政治風暴的浪頭上，當時任總會議長的謝緯飽受巨大壓力，其心理煎熬完全在他的日記中表露無遺：<sup>59</sup>

59 《謝緯日記》，謝大立編，臺南：人光出版社，2001，227-229；另可參見陳金興《臺灣另類牧師醫師—謝緯》，臺北：草根出版事業，2010，174-176。關於謝緯的事蹟，亦可另參見謝大立著《謝緯和他的時代》，臺南：人光出版社，2001。



為了總會的會議而北上，連續兩天要開會，但在我腦中浮現的是 WCC 的問題。差不多一個月前就開始祈禱上帝，指示我明確的道路，行為不得違背國家以及基督長老教會。現在政府認為 WCC 是親共的宗教團體，等我好好地研究之後，若發現 WCC 是親共的話，我們就違背了國策，是絕對不行的。但是，假使 WCC 是一種像聯合國那樣的國際性組織的話，我想提出主張，說明事實的真相。(1969/6/26)

從就任議長開始，所擔心的事現在發生了。總會議長的立場萬一有錯，而導致全體皆錯的時候，只有自己挑起責任是無法解決的。請上帝賜我智慧與勇氣及力量。(1969/6/27)

看來退出 WCC 好像是情非得已，若真的決定退出的話，我的心境是痛苦的，擔心將教會引導至錯誤方向。(1969/7/15)

自擔任議長之始，黨國系統更為積極針對這位醫生，想說服其退出普世教協。關於謝緯對於退出普世教協的態度，以及他積極努力對各種狀況的了解，其中最為關鍵的，恐怕是 1969 年 10 月 10 日他在南投埔里見到了一些關鍵的人物，影響了他的判斷與決定。

謝緯在日記中提到這一次與五位重要的人物晤談，這次的晤談內容，全被國家安全局以「七二〇專案」記錄下來，內容中提及一位匿名的「某牧師」與謝緯談及諸多有關退出普世教協的事宜，其中也涉及到與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五組（簡稱「中五組」）的梁主任、劉耀中等人的互動，從這份報告的內容判斷，謝緯傾向於支持退出普世教協。<sup>60</sup>

根據這一份來自臺灣省警務處的詳細報告，它同時發給國家安全局成立、內政部、外交部、臺灣警備總司令部、中央委員會第五組、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內

---

60 相關檔案參見國史館檔案，外交部 105067 號檔案。



容關係到如何取消了「普世教協的研究小組」並成立「反共推行委員會」，最終以達到退出普世教協的目的。此份報告非常的詳細，並附有《角聲週刊》第 221 期，報告中有一位關鍵的匿名者「某牧師」，極為神秘且最為關鍵，整個資料之部份大致即是說明了準備退出普世教協的準備，儘管內部仍有阻力，謝緯認為有信心可以解決問題。<sup>61</sup>

1969 年 10 月 21 日，謝緯以總會議長的身份發了一份公文給內政部，直接詢問政府的意見：應否退出該組織。公文中提及一封於 9 月 25 日原是去函給「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五組」（代電五八新五字第一零三二號開），現在則轉而向內政部求問。公文之內容如下：<sup>62</sup>

內政部鈞察賜示。其呈文如下：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呈  
頃 奉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五組代電五八新五字第一〇三二號開：

「一、本年九月廿五日呈及附近鈞悉。二、關於貴教會參加普世教會協會為會員，應否退出該組織乙案，希逕洽政府主管機關辦理。」

等因奉此謹呈說明書乙份，關於本教會參加普世教協為會員教會，  
應否退出該組織乙事 謹請  
鈞察並賜示祇遵  
謹 呈  
內政部長 徐

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總會

議長 謝 緯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月廿一日

61 「事由：七二〇專案—長老會常置會之諸般狀況」，文號「五十八年十月十一日慎固字第 六三〇八號」，國史館外交部檔案 105067 號檔案，編號 020-990-600-2701。

62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第十七屆議事手冊》，1970/3/30-4/3，157。



關於退出普世教協與否的問題，長老教會嘗試做最大的努力，一方面呈請內政部直接說明意向如何，一方面也不斷地提供資料佐證以扭轉之前的一些誤會或傳言。在謝緯提呈給內政部的信函中，還特別附了一篇長文，說明長老教會與普世教協的關係，其中，主要是交待普世教協的工作和業務，也藉此針對一些特別的問題做陳述或回答。這份說明書可以說是自 1965 年《教會合一性》小冊後最為詳細的辯解文。以下摘錄其內容：<sup>63</sup>

### 說 明 書

對我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參加「普世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簡稱為 WCC），為該會會員一事，近日又有少數教會內外人士，又舉出數種理由，迫本教會退出該組織，本會謹鄭重說明該會宗旨，組織如下。

- 1 合一工作
- 2 研究工作
- 3 服務世界的工作
- 4 國際問題的研究

最近又有部份教會內外人士，對普世教協第四屆總會的報告提出異議，並力促臺灣基督教長老會應立即退出該一組織。茲列舉如下，並說明我們的意見，以為大家討論與決定的參考。

- (1) 關於匪區教會參加該組織的問題：據我們所知，共匪政權慘無人性，反宗教，反自由，自竊據大陸以後，人民即已喪失宗教自由，教會早已受迫關閉，傳教者遭受迫害，此乃人所共睹，怎有可能再遣代表參加這一宗教團體？一九六八年總會報告書（四四六頁）中的「會員教會名單」確列有下列團體：「浸信教會聯會」，「中華基督教會」

63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第十七屆議事手冊》，157-162。



「中華聖公會」及「華北公理會」。然而我們若與一九四八年的第一次總會會員名單對照，則四個教會的名稱完全一樣，這原因就是它們是一九四八年就參加了的，而一九四八年時大陸尚未淪陷，則此四教會實際上是我中華民國政府治理時前往參加的，並非共匪政權統治下的教會，更不是共匪派遣去參加。一九四九年大陸淪陷以後，無人知曉這些教會的命運，究竟逃出大陸，另外組織？或是被共匪作了統戰工具？總之，這四個會員教會自那時起未能與普世教協聯絡。於是總會會員名單每屆有其名，而實際上除第一次總會外從無其代表。又細看一九六八年會員名單（第四二五頁第四四三頁及第四五九頁）中有中國人，即香港中華基督教會的牧師李某及王某，據吾人所知：李某等一向痛恨共產，斷不可能是共匪代老。

- (2) 「總會報告書中提到牽匪混入聯合國」一事：聯合國有一部門稱「資料部」Dept.of Information 世界各種團體若欲與聯合國交換資料，即可登記為會員。普世教協也登記為會員，供給與獲取資料。所以普世教協的會議記錄照例行公事自動送到聯合國，這是一種研究上的交換，而不是為「牽匪混入聯合國」特別送呈，或為特殊決議而照會，更非特為危害我國立場而向聯合國知會。而去年第四屆烏普沙拉總會的報告書確有提及共匪之事，但這只佔全報告書共五一三頁中之四行而已（參閱報告書第七十頁）。對於部份人士的謠傳，我們長老教會曾於本年度六月廿三日致信給普世教協秘書詢問：有無派人到聯合國並散發傳單，要求共匪進入聯合國事。覆函（七月二日）謂「斷無其事」。
- (3) 經濟方面：有人認為臺灣長老教會參加普世教協純粹是為了得到經濟援助。這種說法更是無稽而屬不負責。如上所言，該組織的宗旨是傳揚福音，而我們的參加乃是為了同一宗旨與理想。如眾所共知，我長老教會在經濟上早已力足自立，且有餘力派遣宣教師赴海外華僑居



地。各地方教會都未曾接受任何援助，只有某種學術、醫療、福利等機構接受學術、技術等交換與援助，且今也已漸漸步入自立。任何巨大經濟利益，倘若與信仰違背，當然不能接受，這是自明之理，我長老教會自一九五一年參加以來，始終是為了信仰，別無意圖。

- (4) 正名問題：部份人士指出，我長老教會參加普世教協的名稱問題，這倒是值得我們研究。我教會的名稱是自民國二年（一九一三）第二屆臺灣大會就是「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參加普世教協也用同一名稱。我們自認臺灣屬於中華民國的一省，若因大陸一時淪陷，便匆忙改名稱為「中國某某教會」，似乎對反攻大陸信念，自行動搖。參加普世教協是以教派單位參加，而不是以國別參加，是以一國有數教會參加。倘若我們改名稱為「中華民國臺灣省某某教會」參加，是否自認臺灣即中國，中國即臺灣，而中國只有「長老教會」一個教會呢？不過，這只是我們的疑惑，如果名稱問題成為政治問題，而如果我總會認為改名妥當，我們便訂正名稱。

- (5)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在普世教協為會員教會，對我國家有無利益？這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以國家立場而言，我們處今日國際政壇，應盡量爭取機會，參加世界性的組織，努力站在這些組織中為國家爭取地位。我政府若明瞭普世教協的宗旨與我們參加的根本信仰與動機，而給我們支持與鼓勵，我們必可在會中發生有力作用。過去有部份教內外人士，有意誹謗普世教協，採取種種方法，企圖迫使我們脫離普世教協，使我們確有進退兩難之苦。若本於信仰，我們便應參加，而為我國家效力。然另一方面，我們也擔心政府當局誤解，而生不良後果。因此，過去二屆總會，我們都未曾派代表去參加。今若能達到互相理解，消除疑議，便可在這一組織中替國家盡綿薄之力。

據說去年參加大會的韓國某代表，曾強力譴責共匪，反對其混入聯合



國，增加反共聲勢不少。如果我們詳讀每屆大會報告書，某種提案倘對某國不利，該國籍會員莫不起而反對，以維護其本國利益。環顧今日亞洲的反共國家中，如大韓民國，如泰國，如菲律賓，如印尼等諸教會都是該教協的會員教會，為什麼我們偏要自摒門外，坐失加強反共力量的機會？實值三思。

(6) 上述共匪的反宗教政策，在一九五一年九月驅逐羅馬教廷駐華公使出境，並迫使大陸天主教會與羅馬教廷脫離關係。這種作法在自由世界已引起了很大的反感。羅馬天主教與普世教協的關係日益密切，其與我中華民國的關係亦極為密切，並互派公使。我們若在此時退會，而與羅馬天主教自行割緣，自滿於狹隘的，昔日的仇視異派的成見中，其對自身，對國家利弊如何？實洞然可知。

(7) 最後，反對人士又藉口普世教協秘書長布萊克博士的個人人格為由。對於布萊克，我們因多年未參加，對其人認識不深，也無義務為其辯護。

總觀上述各項，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由於信仰立場言，應站立腳步，在普世教協內為「凡信基督作救主的所有信徒之合一」而努力，並在此一組織內努力宣揚我國立場。倘若組織內有部份有關政治問題，與我國利益相符或相抵，亦應繼續努力，並站在反共立場以盡我中國國民的義務。以上幾點說明，祈望

我政府明鑒 並賜指示。

最終，1970年3月10日內政部徐慶鐘部長來了其覆文，最終確定，過去種種的努力，現在已再沒有轉寰的餘地了：<sup>64</sup>

64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第十七屆議事手冊》，167。



內政部（59）3、5、臺內民字第三五六八一四號通知，內開：

「一、申請書暨附件均悉。二、宗教活動向以純正信仰傳播教義，增進教友間之靈修，進而服務社會，匡導人心為主旨，其在國際間之活動，自亦以此為範圍。茲查普世教會協會（WCC）於一九六一年十一月至印度新德里召開之第三屆大會，一九六八年七月在瑞典烏普沙拉召開之第四屆大會，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在美國克里夫蘭城及一九六六年三月在瑞士日內瓦召開之中央委員會，據悉曾主張承認共匪並准許其進入聯合國，此種政治性之議論實已超出一般宗教活動範圍，殊以為憾。希本宗教不干預政治之立場，審慎處理為要。

部 長 徐 慶 鐘

對於山雨欲來的時刻，高俊明牧師卻得意地讚揚「總會第一次流會」（1970年3月30日）的事，但在謝緯那裡，可就不是逞英雄之事，他對此事感到羞恥。<sup>65</sup> 事

65 亞聯會第五屆理事會第一次會議（1969年11月27日）曾特別提到此次的「流會」事件，表示他們極其的關注長老教會退出普世教協案的進展，會議中特別提到流會的主因是「南部教會牧長拒絕出席」，造成人數不足，對於此事，他們的因應手法即是努力在各縣市展開護教反共之宣傳工作，可見亞聯會是高度關注此事，並要徹底貫徹「要長老教會退出普世教協」的計劃，參見《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第一屆代表大會紀錄》，1969/11，33。

關於「總會第一次流會」之事，《謝緯日記》主編謝大立曾追問過高俊明牧師究竟是什麼原因開不成會，謝大立問及如果按照後來還是通過的情況來看，這次消極性的流會是否有其他的原因，高的回答沒有多過在回憶錄裡面所說的，至於謝緯是否也是贊成脫離普世教協，這已是一個謎。見〈盡忠至死〉（高俊明口述），收入《謝緯日記》，333-335。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謝緯在此屆總會開會講道題目為〈只傳十字架〉（《臺灣教會公報》1970/4），引用的經文是哥林多前書一章22至25節說到「猶太人要神蹟，希臘人要求智慧」，但在內容中處處提及羅馬的強權和統治，這篇引人遐想的講道充滿著政治神學的暗示，但是因為會議無法開成，也就無法見證一次「只傳十字架」的堅定態度，因此謝緯的難過可能不在於流會，而在於喪失了一次表示「只傳十字架」的機會，這種情況恰恰好不是那些以為流會就是給國民黨政府好看的做法那樣，顯然，這是一次喪失了「以十字架勝過羅馬人」的機會。所以，這篇充滿著微言大義的講章，正是說明了不是依靠「神蹟」（猶太人）使退出普世教協的事不發生，當然「流會」更多像是「自以為聰明」（希臘人）的做法，問題應該回到的是：「只傳十字架」。按我們的判斷，謝緯的難過不是流會，而是長老教會已經分裂，他不認為結果如何重要，重點是教會不能因為這件事而分裂，對於這一點前任議長張昌逢即曾提出過這個警告。



因是起於在臺南神學院的第十七屆會議，原就已準備接受政府的建議，提出退出普世教協之議案：

第六十八條：

案由：建議總會脫離普世教協案（星中、北中、竹中、屏中）<sup>66</sup>

結果因人數不足四十幾人而宣告流會，故無法進行討論及表決。對此，謝緯難過地表達說：

結果，總會成立不起來而流會，有人憤慨、有人悲傷、也有人害怕。這是總會成立以來最羞恥的場面，自己的議長任期又延長了。總會委員會很快就開會決定下回開會的日期及地點。事態極為嚴重……，那是應該要反省和檢討的。總會機構要改正，應該要簡化、強化。許多問題（包括 WCC）都只是擱在那兒，實在是應該認真去思考，不得不去想解決之道。<sup>67</sup>

這是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會議史上最為沉重的一次，時任議長的謝緯視此為生平中最可恥的一頁。會議在凝重的氣氛下，未達法定出席人數，結果流會，當然也埋下了長老教會內部一次「公開」「分裂」的記錄。這次的會議，除了預定的提案討論外，另安排了兩個晚上的「特別聚會」：

4月1日夕 7.20-8.00 「基督教與反共運動」（陳哲宗）

4月2日夕 7.20-8.00 「反共宣傳電影」（視聽聯合會）

會議於開始陸續報到，晚上七時十五分由謝緯議長帶領唱詩，邊唱邊等，結果統計人數，法定應出席人數為 698 人，報到出席 247 人，缺席 451 人。理應出席人數為 350，因此不足近一百人，議長議決等到明天再點名一次。

66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第十七屆議事手冊》，59。

67 《謝緯日記》，252。





▲謝緯醫生。(作者翻攝長老總會議事手冊)



▲謝緯及其車禍留下的血衣和褲。  
(作者攝於長榮中學展覽館)

一個夜晚過去了，第二天清早上午七時五十分，副議長高俊明率會眾唱詩並祈禱後，討論有關不足法定人數事宜及決定點名時間，徵詢了在場的出席者，從兩個意見中，經表決贊成第二意見者為多數，即決議採納了：「下午二時來賓請安後點名，假如尚不足人數者交代總委及新任各中會議長，繼續執行及研究有關這事情。」於是，會議再拖至下午看看情況會如何。最終，結果並未如謝緯所願，會議還是宣告流會，下午二時四十分統計人數，出席議員 310 人，尚不足 40 人，故不足法定人數而宣布議會無法召開。<sup>68</sup>

事實上，總會早已做好了退出普世教協的說明文，並態度強烈地指控普世教協，其內容與護教反共團體所論及的言詞大致是相同的：

---

68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第十七屆議事手冊》，66-68。



根據去年普世教協總會「烏普沙拉」報告書中，為匪張目，親共容共實例，我們必須即時聲明退出以示抗議擁護真理。查一九六八年七月四日至廿日普世教協（W.C.C.）在烏普沙拉召開第四屆總會之所謂烏普沙拉報告書中數點，例如：<sup>69</sup>

- (1) 侈談所謂正義與和平（該報告五十八頁一至四節）。
- (2) 反對核子試爆（同書六十二頁十二節）。
- (3) 支持青年逃避兵役（同書六十四頁廿一節）。
- (4) 對抗世界經濟制度（同書六十八頁卅三節）。
- (5) 非難越戰（同書一七〇頁一、三、四節）。
- (6) 普世教協國際事務委員會的任務報告（同書二一八頁至二一九頁）等處干涉政治，充分證明左傾思想，煽動暴力與非暴力革命和社會改革等之行為，尤其
- (7) 為匪張目策動中共進入聯合國一件已經足夠危害我國之主權和地位甚鉅，怎麼讓我們再容忍保留會籍而不即時聲明退出該組織以示抗議。  
「為匪張目部份（中文譯本），為了人類的將來應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這個國際社會為黨務之急，需要迫切研究，並尋求一種各方面都認為公平合理的方法來達成此事。」

.....

四、普世教協提倡人道，和平主義，暗中推動與共產主義同目標。不但W.C.C.的政治思想親匪容共宗推信仰歪曲差錯，自從加入以來從我國保送美國深造回國一些人，他們一般學問極高，神學家，我們真誠檢討部份在臺灣教界服務人員，他們所發表的神學思想，教義和教理，是否妥當，合乎我們長老教會從來純正、保守的信仰呢？並且受W.C.C.一手訓練返國部份之教導者，他們所提倡之「合一運動」始

69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第十七屆議事手冊》，61。



終違反我們從來所提倡長老教會信仰，我們應該提高警覺，早日認清混合似是而非，不純之信仰，例如批評創世紀是一種神話並否認基督的神聖三位一體等之信仰，危害極深。<sup>70</sup>

因為會議無法開成，說明內容也就用不上。然而問題仍在於，退出普世教協的案子一天在他任內沒有塵埃落定，他就寢食難安。謝緯的日記只寫到4月17日，他於6月17日車禍身亡，退出普世教協的案子，則是在他缺席的情況之下，終於，7月30日順利通過。

第一部 開會禮拜		
(30日下午6:00—7:00 地點：頌音堂)		
司儀：書記 劉華義牧師		
1	奏樂	駱維道牧師
2	聖詩	455首 全體
3	祈禱	副議長 高俊明牧師
4	聖經	哥林多前書1：22—25 副書記 胡茂生牧師
5	講道	「只傳十字架」 議長 謝緯牧師
6	祈禱	同上
7	聖詩	470首 全體
8	聖餐	
9	獻金	
10	獻金感謝	財務主委 周榮華長老
11	報告	總幹事 鍾茂成牧師
12	頌榮	510首 全體
13	祝禱	議長 謝緯牧師
14	奏樂	駱維道牧師

◀長老教會總會第十七屆會議議事手冊及開會禮拜議程表。(作者翻攝自長老教會總會議事手冊)

謝緯面對此巨大的壓力，也許6月17日車禍逝世的他，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死了，就可以休息」。謝緯的死，自然就卸下了他議長一職的身份，退出普世教協與否的燙手山芋就留給別人處理了，謝緯的死帶走了所有的壓抑與悲

70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第十七屆議事手冊》，62。



傷，同時也帶來了平靜。



◀謝緯於擔任議長並於推動退出普世教協一案失力後，不久車禍逝世，追思禮拜出殯場面哀戚。（作者翻攝自《謝緯紀念文集》）

1970年7月27日，「反共推行委員會」主委之鍾茂成總幹事，於第十七屆總會通常年會中提出「退出普世教協建議書」，建議書全文如下：

我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自一九四八年加入普世基督教會協會，迄今已歷二十二年，其信耶穌基督為世界唯一救主之根本信仰及反共態度始終未變，並基於此立場與世界凡誠心信主之兄弟姐妹同走合一的道路，使世界早日歸向救主，以實現上帝國。

不料，過去幾年中，普世基督教會協會之委員會之一，即國際事務小組，發表牽匪入聯合國等荒謬言論，危害我國利益甚鉅。我教會有鑒於此事態嚴重，屢次去函普世基督教會協會總部，表示嚴厲抗議，然似不見效。我教會信徒，莫不為此痛心萬分。

基於上述理由，本反共推行委員會於此鄭重建議，我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脫離普世基督教會協會，以示最嚴正之抗議。倘他日該協會之國際事務小組停止牽匪入聯合國等言論，我教會則可考慮重新參加，以促進基督信徒之



合一，俾基督福音普傳世界。

今日世界正值人心徬徨不定，是非不明，如保羅所說：「因為有寬大又有功效之門為我開了，並且反對的人也多。」（林前十六：9）願我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牧長及信徒，仰望基督，同心一意，為福音之廣傳臺灣，全力以赴，榮耀主名。<sup>71</sup>

總會公決接納此一建議案，並委託反共推行委員會修改該建議書後正本寄送普世教協，副本抄送有關差會及政府機關。<sup>72</sup>

反共推行委員會負責提出有關普世教協的相關報告，包括向普世教協表達長老教會堅決的反共，對於普世教協任何與容共相關的言論都表示關切。這個委員會實際上即是影響著爾後長老會退出普世教協主要的推動者，最終還是於 1970 年 7 月 27 日於會議中由反共推行委員會提交「建議脫離普世基督教會協會，以示最嚴正之抗議」乙案並通過，將退出普世教協的信函和聲明書送出，同時也附送給政府有關機關。<sup>73</sup> 雖然在過程中充滿著為難與痛苦，但是當時聲明文中有一段話：「認耶穌基督是主與堅決反共，乃是我教會一貫的立場」，乃可以看出反共的政治正確與信仰的堅持形成了一種極為扭曲的聯結。<sup>74</sup>

高俊明牧師在開會禮拜時，先以〈火燄中的荊棘〉為題講道，內容中透露此棘手之問題，形容作「此火燄燒到裡面來了」：

71 《臺灣教會公報》1060 期，1970/9，12。

72 《臺灣教會公報》1060 期，1970/9，12。

73 在聞知長老教會退出普世教協，愛國愛教的《福音報》在第 512 期社論中不無調侃地說：「退出普世教協是明智之舉」（1970/8/2）。

74 《王南傑牧師—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口述歷史》，新北市：財團法人自由思想學術基金會出版，2011，43-46。退出普世教協的事件，正是高俊明牧師擔任總會會長，根據他和王南傑的回憶，高俊明巧妙的「不在場」時通過，以示與他無關。可見，這個「不名譽」的事件，誰都不願成了「賣主的猶大」，另參見《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師回憶錄》，臺北：望春風文化事業，2001，224-225。比較有趣的是，高俊明在列舉其長老教會總會的委員會和組織時，完全沒有將「反共推行委員會」列於其中，事實上，正是高俊明在擔任會長時，此一委員會是設於其中屬於「事工委員會」之組織下的，參見同上著，頁 220-221。



普世教協的問題，亦是一炬灼熱的火燄，普世教協應是信仰最基本的一基督合一的見證。教會分裂的時候，沒有合一的見證，將不能榮耀上帝之名，可是我們確已碰到「容共問題」，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我們誠有美好的動機，可惜的是我們已經觸到「容共」的暗礁。基督徒的信仰是絕對反共的，如今所面臨的問題該如何解決呢？<sup>75</sup>

高俊明的講道已明白地說明，截至如今，退出普世教協的案子已帶來了分裂與合一間的矛盾，這個代表著長老教會標誌的「火燄中的荊棘」，已無法迴避地在

外面燒、也往裡頭燒。第十七屆總會的議程，灼燒出了一條長長的傷痕，在無奈中宣佈退出普世教協，但也因此弔詭地說，從此長老教會與其他教會，合一不成，結果就是分裂。7月30日，該案就在代議長高俊明主持下通過了。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第十七屆總會議事錄（第二次會）  
第一堂 開會禮拜（7月27日下午7:00-8:45）

- 1 民國59年（主後1970年）7月27日下午7時，第十七屆總會聚集於淡水淡江中學禮堂。
- 2 議長高俊明奉眾議員開會禮拜。
- 1 司 儀……………總會書記 劉華義牧師
- 2 奏 樂……………淡中校長 陳泗治牧師
- 3 聖 詩……………455首……………全 體
- 4 祈 禱……………前任議長 黃加盛牧師
- 5 聖 經……………出埃及記3章1-12節……………副書記 胡茂成牧師
- 6 講 道……………「火燄中的荊棘」……………副議長 高俊明牧師
- 7 祈 禱……………同 上
- 8 聖 詩……………470首……………全 體
- 9 聖 餐……………
- 10 獻 金……………
- 11 獻金感謝……………財務主委 周榮華長老
- 12 報 告……………總幹事 鍾茂成牧師
- 13 追思故謝韓議長……………副議長 高俊明牧師  
議員全體肅立二分鐘默念
- 14 頌 榮……………510首……………全 體
- 15 祝 禱……………副議長 高俊明牧師
- 3 副議長宣佈休息5分鐘

◀長老教會總會第十七屆會議議事手冊及開會禮拜議程表。（作者翻攝自長老教會總會議事手冊）

75 高俊明，〈火燄中的荊棘〉，《臺灣教會公報》1060期，1970/9，6-8。本期公報除了高俊明這篇文章外，同期還刊出了一篇題為〈以親嘴賣主〉的文章，是鄭連坤「聖經研究」專欄之作，在同期中刊出，確實是「意味深長」，相信應該不是巧合。



## ■ 雨後並未天晴

第十七屆第一次總委於 8 月 18 日在臺神的會議中，也議決了反共推行委員會的建議邀請韓國「反共佈道家」朴永出牧師來臺演講，即後來於 9 月 13 日在臺中中會民族路教會舉行「反共護教培靈大會」。<sup>76</sup> 儘管大局已定，他們還在想努力地告訴執政當局他們是反共的，但這些行動在護教反共的份子眼中，竟然說他們是兩手策略。

「反共推行委員會」於 1972 年 8 月 22 日當天，曾發函給各屬下長老教會，公開宣示表達盡力支持並配合第二屆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的活動。其內容如下：<sup>77</sup>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反共推行委員會致所屬各教會函

主內敬愛的牧長及弟兄姊妹們平安：

世界基督教反共聯合會將於本年十月三日至七日之間在臺北市中山堂舉開「世聯會第二屆代表大會」。本總會反共推行委員會曾於八月廿二日開會，並議決如下：

1. 請全省教會於九月三日至十日為護教反共事工同心祈禱。
2. 九月十日（星期日）請全省教會為世聯會第二屆代表大會的費用特別奉獻（請以劃撥二一五七寄到本會事務所）。
3. 配合世聯第二屆代表大會的行事，請臺北近郊的傳教者與信徒踴躍參加十月四日下午六時在中山堂的聚餐（應先預約）七時半的歡迎晚會以及十月四日至七日的世聯會第二屆代表大會。

76 《臺灣教會公報》1061 期，1970/10，44。本期公報也特別刊出一篇〈白鷺之歌—簡介朴永出牧師其人其事〉的文章，見證朴牧師全家是如何受到共黨的迫害以及其後如何宣教之工作。

77 《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中國總會會訊》第 13 期，1972/10，8。



4. 十月八日（星期日）需要大會代表來主持聖日講道的教會，請寫講道語言、聚會地點、聚會時間等而後，敬請總會屬下的全體教會鼎力支持世聯會，並為該會代禱與奉獻是盼。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反共推行委員會  
主席 胡茂生  
書記 鍾茂成

雖然，反共推行委員會一方面居中扮演政府與總會之間一種互動的管道，向政府相關單位請示和表明立場以及報告與普世教協交涉的情形，另一方面在內部則為推動退出普世教協做出相關的動作，以緩和情勢。結果「退出普世教協建議案」最終還是在第十七屆總會年議會中通過了。相關的聲明書有一句話極為警扭：

認耶穌基督是主與堅決反共，乃是我教會一貫立場。<sup>78</sup>

儘管普世教協也努力澄清原委，但是最終迫於現實，長老教會還是不得不議決退出普世教協。關於此案，長老教會不願再提及，《臺灣教會公報》就暫時不再出現有關普世教協的消息和相關報導了。

事隔一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接下來則是發表了著名的〈國是聲明〉。1972年《臺灣教會公報》的消息報導方面，又重新恢復出現了有關普世教協的消息，儘管在此同時仍重申堅決反共的立場。挑起〈國是聲明〉之同時，《臺灣教會公報》社論以「革新內政，決意反共」為標題，在提及反共的決心中寫到：

基督教原是反共的，其信仰立場是與無神論的共產主義勢不兩立的。現在大陸上的同胞，宗教自由全被剝奪，這足可證明我們反共，乃是生與死的

78 參見《王南傑牧師—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口述歷史》，45。



絕大問題。政府基於政治上的觀點，採取反共的政策，而基督徒在信仰的立場上，亦是反共的。<sup>79</sup>

從這個角度看來，長老教會的立場沒有任何如之後所理解的那樣，被強化作分離主義的解釋，這種解釋都是因為事情的演變越來越複雜後給予的「想像」，經由一再的「想像」，似幻似真，結果並不是一開始就那樣的。事實上，長老教會對於〈國是聲明〉的說明，其意仍是堅定於反共的立場上，即是反對共產黨可能吞併臺灣的立場上表明生死與共，絕不在此退出聯合國之際有所動搖，甚至，也向國外團體或美國表明決心決不妥協的立場。同時，它還批評了不少立場搖擺的人士在此時此刻的媚共行為。

〈國是聲明〉的主要問題是，長老教會的努力顯然比國民政府更加地被國際社會所關注，這種現象造成了對蔣介石的威信之懷疑，整個國民政府看起來還不及一個教會組織。無疑的，自然就構成了對國民政府領導的一種威脅。<sup>80</sup>當然，提出「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的建議，更是踩到了國民黨的痛處，在如此不堪的時期，無疑的，對那些曾經倉皇來臺又從中獲得特別照顧的「權力階級」而言，更是一次重大的打擊。

「反共推行委員會」於 1973 年撤消，其中〈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是在這個委員會仍然存在的時候發表的，1971 年正是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退出聯合國的那一年。<sup>81</sup>長老教會接下來面對的，是比退出普世教協更為嚴峻的考驗，他們一步步地走上一條與政府對抗的道路，他們退出了「親共」團體，再也不能用這個罪名來威脅他們了，政府當局已不理會他們到底反不反共，轉而注意這個不斷對外發表言論的教會團體是不是給政府難看，他們變得越來越「不愛國」，越來越「干預政治」。在原來那些護教反共的基督教人士那裡，則是把他們打成了

79 《臺灣教會公報》第 1077 期，1972/2/1。

80 因為參與〈國是聲明〉的起草，臺南神學院外籍教士彌迪理被迫中止簽證而離開臺灣，彌迪理一抵香港就召開記者會，引起了國際輿論認為政府限制宗教自由。

81 陳南州，《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社會、政治倫理》，90-93。



具有新派或自由派色彩的「解放神學」，意指他們扭曲了教會的本質，指控長老教會去搞顛覆政府、搞社會革命去了。也就是說，護教反共的團體對於長老教會的攻擊，並沒有因為退出了普世教協而就此鬆手，他們仍然以同一種口吻指控他們，護教是說他們「新派」（異端），反共則是說他們搞「解放神學」（共產主義）。

比較有趣的是，高俊明牧師在他的回憶錄裡提到，在他主持的第十七屆總會年議會中通過退出普世教協時，他是沒有在場的，對此他感到自豪，言下之意此案通過與他無關，而且，他也表明本來就不贊成通過。無疑的，這似乎是要突顯他的英勇和堅持。

但是我們又從別的例子中看見不完全是這麼一回事。退出普世教協後，高俊明於 1972 年 3 月 21 日還是出席了世聯會第二屆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在臺北機械公司會議室所召開的第一次籌備會議，之後被推舉擔任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第二屆代表大會籌備會的委員之一，且負責是次大會會議的教會聯絡靈修組的委員之一。<sup>82</sup> 他也曾於 1972 年 8 月 21 日參加由世聯會在濟南長老教會國語禮拜堂主辦的「中華民國基督教會牧長座談會」。更為特別的，當然是高俊明被安排主持「紀念蔣公安息週年禮拜」（1976），他在禮拜中對蔣的推崇和歌頌，曾被教內同仁譏評，高曾為此辯解。<sup>83</sup> 在那一個年代，有誰可能公然說蔣的不是，況且是在他的追思會上，我們有理由相信，在當時錯綜複雜的政治環境下，許多的行徑都不能說完全是自主的。

不管是做給政府看，或是礙於壓力，「反共推行委員會」就是這樣一個時代意識形態下的產物。顯然地，這種努力並未完全獲得執政當局的承認，隨著海外具有長老教會背景的人物發表一些批判島內政治的言論，「反共推行委員會」沒有能成功替長老教會洗脫親共的嫌疑，最終，原來不是臺獨的不斷地被說而成了臺獨，被說成臺獨的原來也不接受，但礙於不管怎麼說也都無法洗脫這項罪名的

82 《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會訊》第 10 期，1972/5/30，5。

83 《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師回憶錄》，252。



情況之下，就不如乾脆接受它，而且，也樂於當「先知先覺者」的角色。<sup>84</sup> 歷史總是如此地微妙，「凡合理的即是存在的，凡存在的即是合理的」（黑格爾語）。

臺灣省警務處在致外交部情報師的信函中，透露其在處理「七二〇專案」之倦情。1970年3月的長老教會總會流會，接著謝緯6月車禍逝世，等於宣佈迫使退出普世教協之努力未能成功，不僅無功而返，而且又要重新佈線。在一次跨部會的第18次的會議（1970年7月7日）記錄中，警務處說到了他們這六年來的工作內容，以及倡議將此工作轉交他處：

警務處擔任七二〇專案執行秘書，迄今已逾六年，在此期中，諸蒙各單位通力合作，上級指導有加，極為感激。惟本案工作六年以來，雖然基督教四大教派中之衛理公會，已率先宣告退出親匪容共之普世教協，信義會亦由於前任監督金仲庵之勢力已被排出，情形好轉，以及聖公會自王長齡逝世後已趨向穩定外，唯獨長老教會，在少數紛歧分子之把持下，玩張跪詐，不易就範，致使本專案迄今尚未能順利完成，有負最高當局之期望，亦深感沉重，蓋本處在七二〇專案之中，原屬情報蒐集及偵監調查單位，舉凡出國許可，護照核發，入出境之管制，郵電資料之檢查，以及有關宗教輔導聯繫，海外資料之調查，均非本處力所能及，尤以近年來該長老教會親普世教協分子之興風作浪，變化莫測，種種跡象，即「一二四專案」，似亦與該教會有關，其情況複雜，無以復加，……，面臨如此嚴重局面，難以應付，應請其他單位接手。<sup>85</sup>

謝緯日記裡的這一段禱告詞，恐怕是最能反映當時參與決定退出普世教協之敬虔事主者的掙扎：

84 黃彰輝也被塑造成此種形象，見張瑞雄著《臺灣人的先覺—黃彰輝》，臺北：望春風，2004。

85 國史館檔案，卷名「教會活動」，入藏號02000017840A。



上帝啊！給我智慧和勇氣，使我不違背教界的權益又對國家盡忠誠。請引導我用充分的準備和冷靜的頭腦來處理事情，不誤大局。萬能的上帝！請讓我真實感受祢將我當作祢的工具，什麼都不怕，賜我走正當道路的勇氣。  
(1969/5/30)<sup>86</sup>

#### 附錄（十）：臺灣教會史中之一頁悲慘史 [周聯華未刊稿]

做人不能沒有主見，但是不能有偏見；做學問也是如此。我們希望人人只有主見而沒有偏見，然而這是很難的，主見和偏見都是主觀的。我們希望做人和做學問都能客觀些，但是這似乎更是辦不到的困難。舉例來說，好比最近的選舉，你有沒有客觀地評估一下候選人的生平、為人的記錄，還是你很快在主觀中早已決定要投那一位了？如果這不夠客觀，我再舉一個例子：跟選舉這事有著相當關聯的連勝文槍傷事件，不就是藍綠分明，各有主張嗎？我故意舉後面這個例子，是以為能有比較客觀的見解，但是終究也不客觀了。現在我們回過頭來談做學問，我們感到這一定是客觀的，不應該有任何偏見。就專業而言，我的本行－聖經經文分析和評估告訴我，在客觀的分析以後，最後一條是神學的意見 (theological bias)。假如把「神學的意見」放在最後，已經算是真正的學者了，因為平信徒和牧師常常把「神學的意見」放在第一條，認為這樣才算是好的、優秀的基督徒。

我扯得太遠，現在回到本題。但是請允許我再講一句閒話，希望在座的朋友不會覺得我離題太遠。我在此鄭重地為景教辯護。在研究景教碑時，我們應該客觀地研究它的內容，尤其它是中國教會史上的第一件大事，是真正次序上的第一。但是今天，教會界竟然因為歷史上的景教來自聶司多留派 (Nestorians)，而認為它是異端而完全不去研究，或不屑當它是第一支來華的基督教。現在總算真相大白，還它一個公道，但有多少人群起直追，而去真正研究呢？

現在我們進入正題——不僅是臺灣教會史，也是臺灣歷史中悲慘的一頁。

86 《謝緯日記》，225。感念謝緯之作，可參見《故謝緯牧師醫生紀念精選集》，臺南：人光出版社，1993。



同樣地，在我認為是悲慘的事，也許還有人當作為萬中取一的得意傑作呢！這事發生時正值於臺灣基督教會史中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年代。一定有人認為正因為出於那個時代一情願「錯殺一萬，也不願放過萬一」的時代，所以就把這一切罪名都歸到某一個人身上。等一會兒我會說明，這個想法也不一定正確。

那時，教會中有人組織「中華基督教反共抗俄聯合協會」，這立刻就造成許多信徒的恐慌。用「恐慌」二字形容一點不為過，因為在那個時間點上，只要有人發起這樣的運動，人人就非得參加不可；尤其是發起人，至少真正負責的人是內政部社會司的專員康峻璧先生。當時，似乎也有其他幾位有頭有臉的發起人，但是這跟是誰發起毫不相干，重點在表態。按說這樣的人民團體，你可以參加，也可以不參加；然則那是黑白分明的時代，簡言之就是「不反共就是親共」的時代，試問，你敢不參加嗎？

當時就有許多朋友、同道和學生來問我：「我們能參加這組織嗎？」我能說什麼呢？我回答：「不知道。」我不能害我的朋友，現在時過境遷，說來容易，但當時可是非常緊張的。對他們而言，不參加可能落一個親共的罪名；對我而言，若勸他們不要參加，我可能因此而到綠島報到。在那時候，有好幾位基督徒同道為了某些「莫須有」的罪名，已經「不自由」了。這使這個組織的表態意味更加濃厚，擺明給人一個自清的機會。

我曾去參加第一次的會議，最主要是去看看這是個怎麼樣的會議。去過後就決定不再參加了。自從那次以後，康先生，不，他是康專員，曾在夜間來神學院找過我一次，那時我是神學院的專任老師，住在學校分配的宿舍裡。這次談話對我非常重要，也使我決定絕對不參加這一組織。我們在月光底下，坐在神學院的欄杆上，按說情調和背景都是很好的，應該談話融洽，結果卻不甚理想。我現在把扼要簡錄之於下：

康（康峻璧先生，下同）：「按說，你應該當這個會的主席才對。」

周：「為什麼？」

康：「因為你是總統的牧師。」

周：「這跟總統有什麼關係？」

康：「你是明知故問。」

周：「難道這個會與總統有關係嗎？」



康：（他大概是怕我真是傻傻地去問總統）「你是明知故問。」

周：「既然如此，我就不參加了。」

康：（語短心長地說）「我看你還是參加的好！」

最後一句話他倒是很夠朋友的勸導，可惜我志已決，不參加就是不參加；我已經考慮過一切後果，莫說我早已在他們的黑名單中，就算再加一個罪名也無所謂，參加了也不能幫我洗刷他們給我按的罪名。

後來我為了另一件事去找他，好像是宜蘭有一個基督徒去把神像的手臂給折斷了，我希望他站在同道的份上，可以幫幫忙。結果他說他不能幫這個忙，當時我還向他勸說，你不是要把所有的基督徒都聯合在一起嗎？這是一個好機會，假如你真的幫他的忙，至少有一半的教會會真心的參加你的組織。

也許在座的朋友，也有興趣知道這個折斷神像手臂的插曲，想知道這位宜蘭的信徒要如何解決這事。最後這件事是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去解決的，基於各地的廟宇在當地均有著極大的勢力，黨部的職員會同宜蘭黨部的職員請這位基督徒出面請人在廟前唱三臺戲作為和解，那位基督徒也答應了。當這位基督徒與宜蘭黨部職員離開後，我感覺有句話似乎非說不可。我告訴這位中央黨部的職員：「我記得小時候讀的教科書，有一課記載孫中山先生年輕時，曾有一次把一個神像的手臂折斷過。假如孫先生這案子到了你手裡，你怎麼辦？我看這位宜蘭的信徒好像是在效法國父呢！」他告訴我說：「這件事好不容易已經解決，請你不要再惹事生非！」

讓我再回到剛才的本題，我跟康先生談話時，打量過他的座位，發現康先生是主管「同業公會業務」的；我在他背後大大的行事牌上，看見寫著「理髮業同業公會」開會的日期，在另一天也寫著「反共抗俄聯合協會」的開會日期。頓時才發覺原來這位康先生所主管的業務就是同業公會，所以我們教會也是他主管的範圍，搞了半天，他不過就當我們是個「基督教會同業公會」而已。

除此之外，還有一次在長老會的年議會上，一位衛理公會的教友以友會代表的身分參加長老會的年議會。在致辭的時候，希望長老會退出 WCC（世界基督教協進會），因為 WCC 是一個親共的團體。其實這是非常不合宜的一段話，因為長老會參加 WCC 與否與衛理公會毫不相干，他何必干預長老會的事？當時大概有一位紐約時報記者在場，就去採訪他，他大概身上沒有衛理公會董事會的名片，只有他在財政部服務的名片，就把這名片給了記者。於是第二天這



個消息就在紐約時報刊登出來，指出臺灣的政府官員竟干涉教會內部事務。這對政府的國際形象是極為不利的。當時的蔣總統（介石先生）要張群秘書長去徹查，究竟是哪一位官員發表如此的言論，張秘書長後來查出是財政部的專門委員俞汝良先生。最後政府怎樣處置我不知道；但是張秘書長在某次主日崇拜後問我：「財政部的專門委員有多大？」我告訴他：「在您的眼光看來，他的官自然很小；但是從一般老百姓看來他是很大的。」他告訴我：「也正因为這緣故，他能闖很大的禍。」他給我看了紐約時報的記載。他說：「長老會參加WCC跟財政部有什麼關係？」我告訴他，外面一般情況就是這樣！人人可以批評長老會。（由此可見總統與秘書長並不同意、也未曾授權讓俞專門委員去發表這樣的言論。）

這些內部的現象是配合了ICCC（萬國基督教教會協會）的麥堅泰，他是存心要拆散長老會。他不斷給情治機構資料，指控WCC是親共的，凡是與他們有關的人都是親共的。他對拆了韓國的長老會還不滿足，還要分裂臺灣的長老會。我曾參加WCC的Faith and Order的大會當講員演講，ICCC的駐臺代表來拜訪當年的柯理培院長，堅持要我的神學院開除我。我首先告訴院長：「這是我們家務事。我請假去參加外面集會，也蒙院長照准。至於我的演講是否恰當，等聽完我的報告後，請院長裁奪。但是請院長先請那位來報告的先生離席。」院長真的跟對方說完客套話後就送客了。事後，我把那次大會的節目單給院長看，表明我是以非會員教會代表的身分參加，我也把我的講稿給他過目，他也認為並無不得體處。但從情治單位的角度會怎麼看，就不是我所能控制的了。每次情治單位都告訴我：「告你的案子一大堆！」這件事當然也算在裡面。

這一連串的事情（好比勉強牧師傳道加入「反共抗俄聯合協會」，俞專門委員的談話，一大堆人列入黑名單等等）的後果如何？包括長老會的百週年紀念，後來施明德事件，特別在施明德事件上，幾乎許多國語教會的知名的牧師都寫文章來攻擊長老會和高俊明牧師。有一次長老會的牧師問我：「為什麼你不寫文章來為高牧師辯護？」我告訴他們，人人都批評長老會，而我沒有寫過任何東西，這就已經在表明我的立場清楚不過了。我曾為了高牧師的事與蔣彥士秘書長有過一次談話，當時也邀了學園傳道會的邱志堅牧師在場，我希望蔣秘書長能從中斡旋釋放高牧師。這當然是沒有結果的談話。

這些事的後果如何？我想歷史學家要問的是：「這些事發生的後果如何呢？」一大堆人上了黑名單，總共有一百個之多，包括唯一的一個非臺灣人，只有兩個非長老會的，我也「敬陪末座（也許還不是末座呢）」。不知道是否



可憑這一點，就能算我是臺灣人了？這些事以後說國語的教會與長老會越漸行漸遠。我在此鄭重呼籲，儘管說國語的教會與長老會的政治主張或其他方面容或有不能協調的地方，但是主內的團契，教會中弟兄姊妹的關係是絕對存在的。

這些事以後讓長老會的領導層許多都反對國民黨，與黨外越來越近，甚至公開反對國民黨，與民進黨發生牢不可破的關係。許多老一輩的長老會的領袖，其實在當年的日據時代，都是反對日本「皇民化」最激烈的份子。但當時政府忽略這一點，未對他們多加安撫和鼓勵；結果他們反成為反對國民黨的核心份子。

2000年福音運動，由1991年元月開始至2000年十二月結束。十年中，說國語的教會和說臺語的教會一起合作。我堅持在開始籌備的時候就請長老會參加，不是組織好了再請長老會參加。感謝主，這個運動總算合在一起推動了，由我當主席，夏忠堅牧師為總幹事，大家一起合作。雖然這福音運動結束時沒有達到預期的結果，不過大家的合作團契是值得紀念的。

此後各教派各忙各的事，但是長老會的復興和回歸長老會的優點，以及繼續的發展是值得欽佩的。



▲康峻壁到北部七星中會發言。（作者翻攝自《瀛光月刊》）



## 附錄（十一）：〈只傳十架〉（取自瀛光月刊）

[謝緯牧師於第十七屆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開會禮拜證道詞，臺南神學院]

哥林多前書一：22 ~ 25

「猶太人是要神蹟，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們卻是傳釘十字架的基督……。」

回顧既往的歷史，我們可發現最文明最富有的國家便不一定就能控制全世界。歷史告訴我們，野蠻民族也能征服文明國家，控制富有的民族。歷史中二個極優秀的民族——猶太與希臘，也在野蠻人羅馬兵士的刀箭下而俯首稱臣。在我國號稱文明之邦的漢民族，也二度為元、滿二落後民族所擊敗，所統治。歷史上常有野蠻人統治文明民族，這是文明的悲劇，也是對歷史的諷刺。猶太與希臘這二優秀民族在受羅馬未開化的人征服之後，經歷了許多的苦楚，他們不但受恥辱，受壓制，受毀滅，甚至連家族也得忍受野蠻人之奴隸的痛苦，他們以不能打倒羅馬人而內疚不已。

猶太人尋求神蹟，但他們的目的乃希望藉著神蹟的力量來打倒統治者羅馬人。在異邦的世界中，惟只猶太人相信創造宇宙的獨一真神——上帝。從歷史的事件中，他們學會了依靠上帝，因為每當他們陷入窘境而無所自拔之際，上帝的神蹟便會常藉著某些人而降臨到他們的身上，並得以克服一切的困難，諸如摩西在埃及所行的大能奇事，約書亞的攻破耶利哥城，士師的興起，大衛，以利亞，耶利米等都是被上帝重用來拯救猶太人的先知，因之猶太人再次希冀神蹟，希望神蹟能使他們脫離羅馬人的統治而得以自由，故他們要求神蹟，要求神蹟以便國家得以復興，民族得以強盛。如果耶穌用神蹟給他們看，他們便將會相信彌賽亞已至，因之他們要神蹟。

希臘人，追求智慧，也是為了能脫離羅馬人的束縛之故。在羅馬帝國當中，希臘人是最文明的民族，他們擁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舉世的賢哲，且他們的文學，藝術，美學方面的表現更是舉世無雙，但他們卻在異族野蠻人的統治之下，他們認為要使他們國家復興的唯一憑藉便是智慧，他們希望在追求智慧的過程中能改變他們的現況，他們要以文化的超越來征服羅馬人的思想，因此，他們繼續的在追求智慧。

雖然猶太人希冀神蹟，希臘人追求智慧，但保羅卻傳釘十字架的基督，因為十字架就是上帝的神蹟，就是上帝的智慧，保羅認為十字架就是上帝最大的



力量，也是上帝最大的愛，這個力量能克服羅馬人，這個愛能感化羅馬人，但猶太人與希臘人卻都失望了，因為他們沒有真正了解十字架的真義。上帝的全能超乎全世界，這完全了許多大的事件，但其中最偉大的，便是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希臘人尋求智慧，以勝過羅馬人，但保羅所傳的十字架，不只是上帝的智慧，也能勝過羅馬人並克服罪惡，因之保羅所強調的是作為上帝之權能以及智慧的十字架。

今天我們若不是傳上帝的十字架，則我們所傳的必等於空無。今年的總會我們有很多的議案，但我們若不以十字架為中心，我們所討論的也將無補實際。保羅說：「猶太人是要神蹟，希利尼人要求智慧，我卻是傳釘十字架的基督……」（戴正德記）

#### 附錄（十二）：〈火焰中的荊棘〉（取自瀛光月刊）

[高俊明牧師於第十七屆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開會禮拜證道詞，淡江中學禮堂]

幾年來，我們的教會所面臨到的「內面的火焰」首屈「機構」問題，總會如今仍是軟弱無力，因何？是不是我們的「機構」已經望時代而莫及？我們的確刻意地將之改善，想來想去，提出此案，供出彼案，到底是要強化總會？或中會？還是強化地方教會？究竟要強化上面或是下面？這些事情把我們搞得頭昏腦脹。我們越是研究，越是發現問題的癥結不僅在機構組織，若是面臨交通問題，我們不但要修整道路，亦要訓練出優良的駕駛員——它是關係著人事問題，雖有良好的道路，駕駛員不遵行交通規則，亦將有很多不完善的事情要發生。組織的問題聯繫著人事問題，面臨這些問題，我們將如何謀求解決？一幢建築物可在幾個月建造完成，教會要產生偉大的領導者，並不是一年半載可產生，而要有十年，五十年，甚至要一百年才能產生。如今，機構的問題已經碰到人事問題，我深覺到：它有如火燄，內外燒燃著的火燄，若僅是外面的火燄，還不致於那麼嚴重，然此火燄燒到裏面來了。

普世教聯的問題，亦是一灼熱的火燄，普世教聯應是信仰最基本的——基督合一的見證。教會分裂的時候，沒有合一的見證，將不能榮耀上帝之名，可是我們確已碰到「容共」問題，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我們誠有美好的動機，可惜的是我們已經觸到「容共」的暗礁。基督徒的信仰是絕對反共的，如今所面臨的問題該如何解決呢？一方面，我們頗願意與全世界的兄弟姐妹打成一片



成為一體，心同意合的團體，以高舉十架福音榮顯主名。然而，這裏面已發生了「容共」的危險，它使我們不得不醒目群起抵抗到底。問題是我們如何在分裂中謀求合一，進而自合一中排除分裂，甚是使我們深思熟慮！

火燄在外面燒著，亦在裏面燒著了，那兇猛的火燄如今已焚延至總會，我們的教會，我們的選民裏面。火燄正熾熾燒著，而我們的「荊棘」在火焰中，我們該如何是好？所當考慮的是要有好的指導者，可是我們所期待良好的指導者，我們總會的議長，已受上帝的揀召安息。上帝將這些工作交托給我們每一個人，我以為大家應自覺它是屬於我們本身的責任，不應單純地設想十七屆總會僅是繼往開來的總會，它應是上帝所施加我們的鞭策，就是以前我們還尚未經歷過，而今天已呈現的事實，使我們自總會議長之死喚醒我們昏沉的心靈，因為我們所面對的並非普普通通的事實，而是新的時代，需要新的信仰，新的愛心以及新的決心。我們每一個人對這新時代應有新的態度，相信這是上帝給予我們的挑戰。

昔時，上帝在何烈山的「火燄的荊棘」向摩西挑戰；我們知道這是什麼意思？摩西先不明瞭其中蘊含嚴重性的意思只想進前去觀看之。諸位，這並不是讓我們觀看以滿足一下好奇心，這乃是以前未曾而今已碰遇到的上帝愛之鞭與棍，要擊打我們至死地，使我們知道異象的意指，倘若我們僅清楚異象的外貌，而未知其內在的含意，我們還不夠理解異像。今天，上帝叫我們看見其異象——火燄中的荊棘，定有祂的旨意，要叫我們面向著新的目標，新的夢和理想。

### （三）上帝看見和聽見了他們的苦難

摩西走過去觀看火燄中的荊棘時，上帝對著摩西說：「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見了」（三：7）這件事叫我大受感動。火燄中的荊棘，軟弱不堪，經不起燃燒，也許它的生命即將枯竭，上帝卻看顧它，沒把它燒毀。祂說：「我實在看見了」，的確上帝親眼看見了他們的困苦，亦聽到了他們痛苦的哀嚎，眼睛看見了，耳朵也聽到了，所以上帝就「下來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三：8）我自這種事實，深切地感到：我們所信的上帝真是一位活生生的上帝，使我們得到莫大的激勵和鼓舞。

我們當認定今天所站立的环境，「火燄中的荊棘」乃是我們的現實，在現實中我們要失望嗎？我們反而要在這試驗——「火燄中的荊棘」的現實要有指望，受安慰及受勉勵。因上帝看見我們的困苦，也聽到我們的哀聲，祂要「下來」在我們中間。不是在外面，乃是在我生存的基礎，撐持著我們。祂應允著說：「我



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這是消極的，是拯救的開始。離開埃及的開始以致達到終局，它不是絕望的終局，乃是光明的終局，此終局是進入美好寬濶流奶與蜜之迦南地。離開那困苦哀叫的環境，一步步地走，走進那流奶與蜜的國度，不僅僅是上帝這樣應許過，聖經記載過，歷史亦向我們證明，上帝如是說即如是行，祂說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的言行完全一致。祂說過「我要領他們出了那地，到美好寬濶流奶與蜜之地」便照辦不誤！他們在耶路撒冷的聖山敬拜上帝的事實，對著我們提出有力的證明——所相信的上帝乃是活生生的上帝。

最近，我本身經歷了一件小事情，雖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卻給了我莫大的鼓勵。就是今年中的四月九日，我在早上十一點鐘自花蓮乘坐中華航空公司的飛機飛往臺北，平常不消卅分鐘便可抵達松山機場，今天看起來有些異常，飛機已抵松山機場的上空卻不降落。我的座位剛在機翼的後側，我看見機腹的跑輪被擊了出來忽又縮了進去。它使我憶起日本曾有類似的事件，那架飛機因輪子擊不出來，只好盤旋在空中等到油量耗盡，方以機腹擦行在地面上，然後停在機場，事後人員沒有傷亡。我即料想到我們乘坐的飛機定發生相同的毛病而無法降落。已經過了半個鐘頭，仍然無法降落，旅客們逕向服務員或空中小姐詢問起這件事，他們卻不談真妥，僅對大家勸慰著說：「沒什麼多大的關係，請各位別慌張，只要你們束緊袋子。……」

經過了十分鐘，一些不安的旅客詢問服務員，所得到的回答是：「請放心！請將你們所攜帶之尖銳銳利：如鋼筆，刀子之類的東西放在旅行包，放置在後面的位置，然後請你們也移向後面的位子坐好，並把帶子束緊……」旅客遵辦，隨即聽到駕駛員的報告：「我們的飛機已到達臺北的上空，飛機有點小毛病……」他不談飛機將遇到的危險何在，非常佩服駕駛員和服務員鎮靜安詳的服務態度和智慧。「我們先要試著飛向高處然後往下急降，這只是發生微小的毛病，因此請大家將束帶綁緊」，忽然覺得飛機直聳入雲霄，一會兒便往下俯衝，也許可藉著衝力震出輪子，可惜它沒有辦到。以後的幾次這種試驗，使得我們的心情忐忑不安，焦急萬分。

飛機在臺北的上空已盤旋了兩個多鐘頭，盡量要把油量消耗掉。在飛行的當中，中間的輪子已露了出來，但未見到前面的輪子，駕駛員又宣布：「我們要試著降落」，也許他正打算著陸的剎那，震動著中間的輪子，好讓前輪同時被打出機腹。這次沒有成功，我們都感嘆惜哉！第二次的試驗亦屬枉然，飛機只得升空繼續盤旋。油可能愈來愈少了，駕駛員不間斷地對著地面的機場保持聯絡，請備救護車與消防車。我們自窗口可以看到地面上準備工作的完善。



在這最後關頭的瞬間裡，我想到那兩位在臺北念書的孩子們，每當飛機滑過國校上空時，我自忖著；是否還有機會讓我見到孩子們？……今天會是我最後的日子？想來想去，我竟然想出了這兩種結果：

我打算現在就寫好遺書，我若死了，內人或可看到它，然後要寫什麼呢？想來，我只要寫一句話——「感謝上帝」，這實在是我們基督徒很大的結論，為什麼要說「感謝上帝」呢？設若今天的飛機安然地降落而無意外，我可與大家見面，同時可與家人見面，我還可以在地面上做很多工作，所以要感謝上帝。

第二個結論是死，飛機降落了，燒了起來，同時在跌跌撞撞地時候震盪了我的腦部，人死了，這樣基督徒究竟是什麼？亦要感謝上帝。也許我要先各位得到主耶穌，見到祂，見到吾先父，我的恩師以及敬愛的前輩們，兩方面都要感謝。我想，這恰是「火燄中的荊棘」在其中所得到的事實，而並不是理論，亦非哲學，乃是體驗，在「火燄中的荊棘」我們將變成如何即將分曉。

飛機降落了，安全地著陸，並沒有起火。飛機上的所有人員，除了兩位慌張的旅客折斷骨頭，大家都安然地步下機場，沒有一個傷亡。我要感謝的是能夠平平安安地下去，這是首先要感謝的，然更值得感謝的是在「火燄中的荊棘」使我感覺到勝利感。是的，我們曾經度過一場虛驚，然在恐懼之餘祂卻不叫我們失望而致喪失信仰，反而當荊棘燃燒的時候，更確切地顯明我們所信的上帝是活生生的神；在火燄中仍然看顧著這軟弱沒有價值的荊棘。

最後，我要鄭重強調；我們乃是置於火燄中生存的荊棘，本身懦弱不堪，何況險象萬生，很難生存下去。然而我們卻不要失望，因為我們所信的上帝是亞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是活生生的上帝，是要領我們脫自埃及人的迫害；進入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的上帝。無論是「外面的火燄」或「內面的火燄」都不能叫我們害怕，怕的是失去信仰。若沒有失去信仰，就是多凶猛的火燄亦不能把我們燒毀，願上帝祝福我們的教會，使我們的教會儼然成為「火燄中的荊棘」以榮耀上帝，並讓人知道我們的上帝是永生的父神。  
(陳添登錄)



## 5. 黨國基督徒與 臺灣基要派的形成

臺灣土生人士對共產黨的恐懼都是間接的，因為他們從未跟共黨直接打過交道。但他們直接知道國民黨的話並非如它的功業那麼可信。他們自從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以來所切身體會到的恐懼，是對於那一幫專門與可怕的「共匪」鬥個你死我活的人產生的恐懼。

—般海光，〈剖析國民黨〉



## 5.1 黨國基督徒與教會政治資本

### ■ 黨國基督徒的「三愛運動」：愛國、愛教、愛蔣

蔣介石是基督徒並不意味著基督教受到特別禮遇。相反的，正因為他是基督徒，他對基督教的解釋也就成了不容質疑的權威，越是標榜他的虔敬，越是容不下對基督教其他可能不同的解釋。在此反共的風潮之下，基督徒集體潛意識像著了魔似的，反共成了護教，護教即必須反共，一種「屬靈爭戰」的敏感神經，常常以不同的方式出現，打擊「共黨同路人」成了打擊共產黨最能自圓其說的一種成果。蔣介石成了「黨國基督徒」(KMT Christian)的先知、使徒，成了領導護教反共的思想導師。

從世界基督教歷史來看，除了被標籤化為「自由派」的普世教協以及護教反共依附的「基要派」，實際上還存在著「福音派」，尤其是亞洲基督教普遍受到北美的影響，對福音派的接受應該是順理成章的，可是護教反共的黨國基督徒則偏向於基要派而捨棄福音派。值得注意的是，臺灣的基要派基本上與中國大陸的基要派如王明道、賈玉銘等沒有任何神學上的繼承或教派意義上的聯繫，這些護教反共份子並不是從某個教會宗派傳統出來的，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神學主張或見解，他們完全是從對黨、對國家意識形態的效忠而生產出對基督教的解釋。<sup>1</sup>因此，這個現象的發生給出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它說明了護教反共之所以靠向基要

---

1 儘管王明道被喻為中國的基要主義者，但是他從不喜於推動各種形式的組織，也不與政治意識形態掛勾，他只是默默地撰文批駁，避免落入任何形式的權力機制之中，這是爾後的華人基要派分子沒有清楚認知到的。尤其是臺灣基要派分子，他們大都是追隨蔣介石的忠黨愛國之徒，這個因素極為關鍵，同時亦不斷地打造與王明道的「師徒」或「衣鉢傳人」的形象，王永信、趙氏父子等在某種程度上都在「利用」王明道，以為自己的教會政治創造資本。



派，主要更多的是基於政治的考慮而非信仰的考慮。所以，護教反共分子所謂的「傳福音」實質上是為了反共，為了實現他們的政治議程，這種意識形態的訴求使得他們與萬國教聯可謂一拍即合，他們因政治而結盟。

「黨國基督徒」是指臺灣基督教在蔣介石作為「主內總統弟兄」的情況之下，將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加諸於對基督教的教義和思想的判定，形成了愛國愛教、以黨意解釋聖經、黨國大老為教會領袖、以認同國民黨為信仰正統的代表等現象。在一種極度恐共和統治正當性的危機之下，黨國意識形態以樹立敵人並打擊異己為其特性，尤其對於與外國勢力有聯繫的團體，基本上都抱持一種懷疑的態度，正是在此強烈的政治現實之下，也就與麥堅泰這一類的美國基要派分子所主張的正統主義和離間主義相吻合，於是，就創造了形成這類神學立場或主張的良好機會，臺灣基要派實為一種護教反共的結果，是道道地地的政治產物。因此，臺灣的基要派在其本質上，即是一種通過政治現實生產出來那種具有教會政治和屬靈政治的圈子。<sup>2</sup>

基要派 (Fundamentalism) 又稱作原教旨主義、基本教義派，在對中國教會史的解讀和書寫上，它與所謂的純正信仰、福音派、正統，甚至與所謂的「戴德生模式」有關。這裡所謂的「戴德生模式」，即是對照於被污名化的「李提摩太模式」，後者往往進一步說成是新派、自由派、社會福音派等屬於「非正統信仰」的代表。<sup>3</sup>

黨國基督徒的基要派成份，主要是表現在以黨國意識形態凌駕於對基督教信仰的認同和解釋上，甚至標榜基督徒在政治的忠誠或忠貞為一種信仰的素質，他

2 如同針對國庫通黨庫的情形一樣，黨國基督徒也具有國家主義、集體主義、黨國一體等現象，將黨國意識形態輸入至教會的政治和權力關係中，我們可以類比於「黨國資本主義」的用法，只是方向必須反過來。可參見陳師孟等合著，《解構黨國資本主義》，臺北：自立晚報社，1991，23-25。

3 張靜愚在文化大學舉辦的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其禮拜堂即取名為「德生堂」。關於基要派的形形色色的分析，可參見 Karen Armstrong 著，《為神而戰—基本教義派的起源與發展》，王國璋譯，臺北：究竟出版社，2003。



們以政治意識形態的敵我關係，用其政治上的優勢來壓迫與自己同屬的宗教團體卻在政治立場不同的人，而且，所採用的思想性用語都是教內熟悉的「教義性」語詞，以「反對不純正」來為政治辯護，以「政治的優勢」來決定信仰的立場。這就是黨國基督徒所表現出來的那一種基要派型態，他們要求以信仰正確來服務政治正確，聖經的政治辯護等於聖經的科學辯護，對於在權力或政治的效應上達到「危害生命者」（政治和信仰兩方面的雙重白色恐怖：共匪同路人／叛教者），將政治上的好戰與信仰的好戰結合起來，然而，這一些所掩護的，正是其在意識形態和權力誘惑的情況下，卻把對政治的服務或個人的權力看成了信仰上的奮鬥。

黨國基督徒對權力的崇拜，源於政治而非信仰。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們總是迷信權力，並以政治的成就來定義信仰的好表現，黨國基督徒將基督徒在政治的表現，來突出其屬靈的優越，本質上是一種成功神學的濫觴。臺灣最習於以黨國大老的政治權位來標榜其見證基督教信仰的做法，主要的鼓吹者為宇宙光傳播中心，從他們樂於出版黨政人物信仰見證就可以看得出來。<sup>4</sup>

換言之，黨國基督徒的護教本質上是政治的。在蔣介石的高壓統治下，臺灣教會無選擇地只能向神學上的保守主義那邊靠攏，



▲黨國基督徒愛國愛教愛領袖，籌辦國慶大會。  
（作者收藏）

4 相關學者的研究中，上海大學楊衛華曾以「黨國基督徒」來稱呼民國初年那些出入政界擔任高官的基督徒，這些人有黨員身份並投身於官僚體系，他的用法主要是針對這一種現象而言。同樣的，國民黨到了臺灣也仍然保有此一特色，尤其是國語教會背景的總是標榜這些人為「基督徒的表率」，「宇宙光」即是為黨國基督徒擦脂抹粉的基督教媒體，以黨國要員（如李登輝、李國鼎、王建瑄等人）的「權位大」來吸引人認識基督教，這個組織可以說是臺灣「成功神學」的濫觴。



臺灣的基要派是伴隨著護教反共的勢力一起成長的，成了好鬥的基要派（militant fundamentalists）。正如我們看到北美基要派的立場一樣，當他們越來越不能控制時代或世界政治的發展時，他們只好轉向於一種「離間主義」（separatism）或分離主義，而且慣於使用最為極端的口吻攻擊與他們在神學立場上不一樣的人。<sup>5</sup> 所以，像萬國教聯麥堅泰那種教會性的離間主義，在亞洲的韓國和臺灣的恐共氣氛找到著力點，在臺灣的情況則是通過了黨國基督徒的政治勢力，以忠於信仰又忠於政治的姿態，對其對手陣營不留餘地予以打擊。

作為一位美國基要派的發言人，麥堅泰對政治的熱衷使得他對基督教的解釋都帶著強烈的政治意味，這種敵我分明的區分，即是不斷通過了教會鬥爭的形式來實現。<sup>6</sup> 馬斯丹（George M. Marsden）如此形容這樣的一位基要派的好戰分子：

麥堅泰的嚴謹準則限制了組織的規模，但他通過出版物和電臺廣播進行了強大的宣傳，煽情味十足地攻擊自由派及其機構，並且經常地強調他們勾結共產主義，這些特色給他帶來了驚人的影響力。<sup>7</sup>

麥堅泰正是透過了反共宣傳，吸引了黨國基督徒的呼應，當反共與恐共之間存在著一種複雜的矛盾心理狀態下，宣傳共產黨滲透教會的可怕立即地受到了支持與認同。由於光明與黑暗的大鬥法使任何與政治正確對立的一方注定失去其支持者，反共護教的中堅分子本身即是呈現出了某種政治利益的表現，不管它是否被理解為「忠黨」或「愛國」，黨國主義的色彩可謂清晰可見，甚至是赤裸裸毫不掩飾的，因為在他們看來「忠黨」與「愛國」與「愛教」三者是劃等號的。

正如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基要派主要的文化特徵即是反智，但最為特別的則

5 對於基要派分離主義的解說，可參見馬斯丹（George M. Marsden）著，《解構基要主義與福音主義》，宋繼杰譯，香港：天道出版社，2004，73-80。

6 《解構基要主義與福音主義》，110-111。麥堅泰出生在密歇根州一個長老會牧師家庭，曾組織美國基督教教會聯盟（ACCC）、國際教會聯盟（ICCC）的組織，他激烈地反對共產主義、天主教、民權運動、存在主義、1970 人口普查、槍支登記，當然也強烈地反對葛理翰。

7 《解構基要主義與福音主義》，77-78。



是，他們對於技術向度的文化則顯得非常地相容或無所懼怕。<sup>8</sup> 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何以張靜愚一方面反共護教，一方面則促進高等教育工作的推動，而這裡所謂的高等教育，實為一種技術主義的教育。因此我們可以解釋，中原大學一開始是以「理工學院」起家，並且，長久以來他們就對「人文或社會學科」存在著來自心理底層的抗拒，這看似矛盾的情形，又說明了那種來自於政治正確下沒有含混或去價值判斷的理論或學科體系，正好完全符合其反共的意識形態區分：不容模稜兩可。<sup>9</sup> 換言之，推動「科技」是可以的，至於人文或社會科學則免談。

任新舫對中原大學的創立所做的描述非常地有意思：

中美熱愛基督熱心教育之人士，鑒於無神論之唯物主義者一毛共匪幫竊據中國大陸之後，寶島臺灣，成為自由中國反共抗俄之中心，億萬人民之燈塔，在「反攻大陸，復國建軍」之時代使命下，自由中國之高等教育，不僅急需培植「建國之科學人才」，更須陶鑄「反共之精神力量」；爰本基督愛人救世之精神，致力培育有志科學及工程之各項人才，儲為國家社會之用。因有應運而生之建校建議。<sup>10</sup>

上述的言詞表現出了反共與工程人才的相容性，這並不是因為受時代影響所致，相反的，這是基要派內在邏輯的必然。可見，基要派思想本身即充滿著這一類的矛盾，但他們要不是看不見，就是不承認自身的矛盾性，正如馬斯丹所言的：

或許最諷刺的莫過於，它用清楚的兩極表述充當簡單答案；然而，它卻是

8 《解構基要主義與福音主義》，125。

9 有趣的是，張靜愚在中國文化大學中華學術研究院成立了「基督教研究所」，中原大學則連人文學院都沒有，一直到2000年才成立宗教研究所。儘管如此，董事會對宗教研究所不在他們的掌握之下一直都是不信任的，宗教研究所博士班兩度成功在校務會議中通過，但卻在董事會中被否決了，「黨國基督徒」認為宗教研究所「偏離了方向」，言下之意即是他們才了解該往那個方向。中原大學用基督教這塊招牌，卻是以「理工」起家，其中反映出了這所學校的發展確實與基要派的意識形態是吻合的。

10 任新舫編著，《私立中原理工學院成立十年概況》，1966，1。



各傳統與信念的如此複雜的結合，以致所包含的含混與矛盾遠遠超出其大部份信奉者—或反對者—所能意識到的。<sup>1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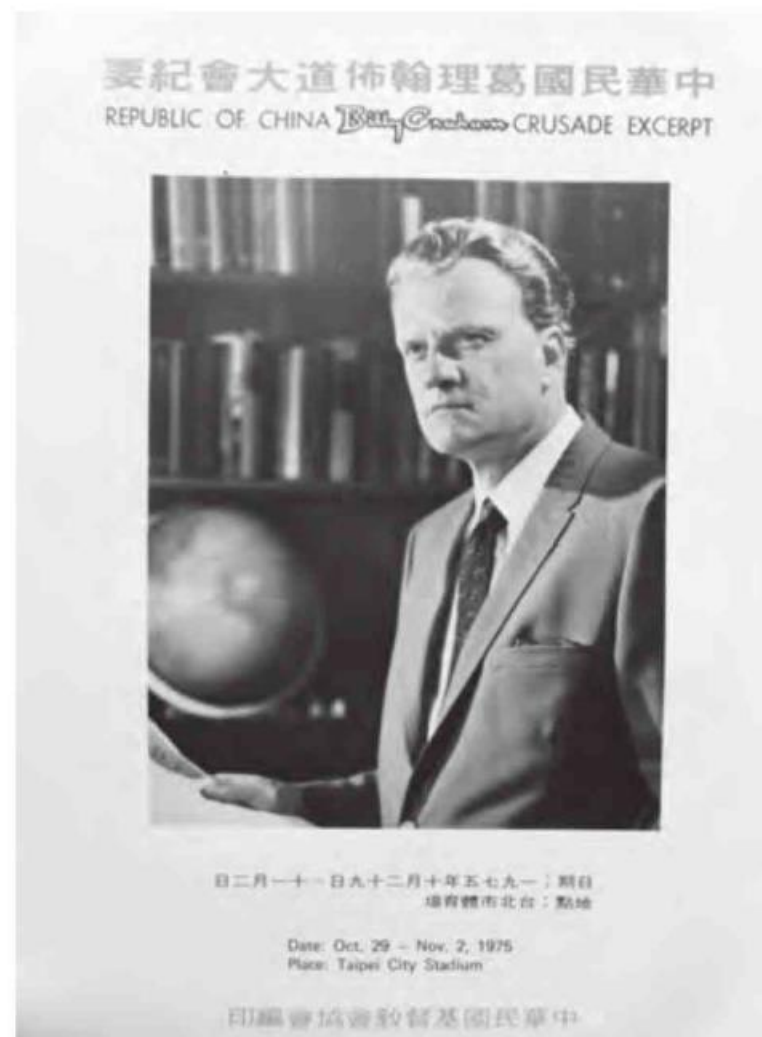
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從臺灣的黨國基督徒所強調的護教與反共的說法或做法中看到了這樣的矛盾，就只有基要派看不到其自身的矛盾性。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明。

## ■ 葛理翰涉入臺灣的宗教外交

回顧北美福音派和基要派的發展關係來理解，特別是以佈道家葛理翰 (Billy Graham) 為代表性的標的來理解在這一段護教反共時期是非常有意思的。在介於福音派與基要派的選擇上，我們可以看到黨國基督徒的信仰立場從未離開過政治的考慮。

葛理翰很早就與基督徒總統蔣介石有所互動，1956 年就曾被邀請到總統府會晤。1971 年退出聯合國的事件中，葛理翰還扮演了穿梭於臺灣和華府間的居間角色，數次與基辛吉、尼克森有過一些極為高度敏感和機密的接觸，並代華府向蔣介石傳達了誠懇的盟友關係之保



▲葛理翰佈道大會手冊。(作者收藏)

11 《解構基要主義與福音主義》，127。



證。<sup>12</sup> 蔣介石逝世那一年，葛理翰在華府為蔣介石主持了追思會，同年又特別來到臺灣，在 10 月底至 11 月初主辦了大型佈道會，可見葛理翰與臺灣基督教有著一種政治上的特殊關係。

從種種事件可以看出，黨國基督徒是如何地利用葛理翰的宗教地位來處理美國與臺灣的外交關係，但也因為並未從福音派人士中獲得重大的政治利益，特別是在反共與對待中國大陸的態度上未獲積極的支持，蔣以及黨國基督徒在信仰的立場上自然更多靠向於基要派而非福音派。我們從「葛理翰佈道大會」的設計與安排就可以證實這一點，此次佈道大會的說明文就已傳達此清楚的信息：

舉行追思總統 蔣公安息禮拜，與中華民國葛理翰佈道大會就表面與性質而言，好像是兩件事，彼此毫無關係，然而再深一層的追究，兩者不但有密切的關聯，而且有很大的影響力。在前言中業已提及，中華民國基督教會協會每年聯合各教會於十月卅日晚慶祝總統 蔣公華誕大會。葛理翰佈道大會定於十月廿九日起至十一月二日止，就是計劃在六十四年的十月卅日為慶祝 蔣總統華誕舉行佈道大會，並擬組織祝壽致敬團依例赴總統府簽名祝壽。不意於六十四年四月五日總統 蔣公被主恩召榮歸天國，促使慶祝總統 蔣公華誕計劃予以改變。<sup>13</sup>

原來，黨國基督徒是想利用葛理翰在美國的影響力來創造雙贏，一方面利於傳教，一方面利於外交關係。因此，將「葛理翰佈道大會」與為蔣介石的祝壽結合起來，這是黨國基督徒的精心設計，從所刊印的《中華民國葛理翰佈道大會紀要》可以見到處處是對蔣介石的歌頌以及述說蔣的基督教信仰等可以證實，只是蔣等不及葛理翰的到來就於同年的佈道會前幾個月逝世了。

作為一位福音派的新興領袖，葛理翰於 1950 年就已崛起，同時亦通過了他

12 涂怡超，《美國基督教福音派及其對國際關係的影響—以葛理翰為中心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25-227。

13 《中華民國葛理翰佈道大會紀要》，中華民國基督教會協會編印，1975，17。



在大型佈道工作的成就，逐漸地躋身於國際舞臺。但是，就信仰派別立場而論，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葛理翰在 1950 代中期就已和基要派形成某種疏離，在基要派的眼中，葛理翰「背叛」了他們，接著 1955 年他在紐約一次成功的佈道大會，正式地與基要派公開地告別。<sup>14</sup>

早期葛理翰也是不遺餘力的「反共」，認為左翼和共產主義都是有害的，甚至指摘他們本質上是「罪惡」的，據說他還個人買了五百本的《共產主義與基督》(Communism and Christ) 一書送給全體的國會議員，並在洛杉磯也辦過一場「護教反共奮興大會」。<sup>15</sup> 但這一切卻隨著他的佈道活動成功展開，以及對於基要派的分離主義的不滿而公開與基要派絕裂，甚至，葛理翰也在教會與社會關係的立場上趨向於比較溫和的態度，更多地熱衷於福音的傳播，而非政治態度的表達。因此，像麥堅泰這類基要派分子，對葛理翰產生了極為嚴厲的批判，甚至認為他比自由派還危險。

美國福音派的發展，主要與葛理翰的佈道工作的開展有關，所以他們重視福音工作，而不同於基要派把所有的焦點置於護教的立場上。而且，葛理翰在許多的立場上表現出溫和與理性的態度，包括對待天主教和普世教協的人士，他都是維持以「合作而不妥協」的關係，儘管他對自由派還是抱持批評的態度，但也不至於惡言相向，可見他不認同基要派那種分離主義或失敗主義的做法。

對基要派而言，遵行上帝的話語，遠比傳福音重要；持守教條的純正（走分離路線），遠比愛心（接納包容）重要。因此，妥協就是投降。他們強烈地表達必須劃分界線，竭力持守真理，不但不要與立場對立的人接觸，更不可以讓新進的基督徒到那些「自由派」或是「異端」的教會去。信與不信，不可有任何相交，特別是在傳道事工上。正因為上述的態度，基要派對葛理翰展開了批判，其罪狀

14 Alister McGrath 著，董江陽譯，《福音派與基督教的未來》，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32。

15 本書的作者是 Charles W. Lowry，出版於 1952 年。見《美國基督教福音派及其對國際關係的影響—以葛理翰為中心的考察》，195。



包括了：

1. 與天主教會掛鉤；<sup>16</sup>
2. 與靈恩派合作；
3. 與宗教右派對抗；
4. 推荐 RSV 版本的聖經（此版本雖被公認為最忠於原文，但是卻是自由派的國家教協贊助的）；
5. 與自由派（等於不信派）人士合作；
6. 支持民權運動；
7. 容許婦女講道；
8. 接受基督教協搖滾樂；
9. 接納同性戀者（葛氏反對同性戀）；
10. 反對用暴力手段對待墮胎診所；
11. 倡導基督徒應有社會關懷（即是鼓吹社會福音）；
12. 贊成與蘇聯和共產中國打交道。<sup>17</sup>

臺灣的黨國基督徒與美國基要派往來，是基於反共的前提，他們的「準機關」報如《福音報》、《聖經與信仰》，在後期漸漸地對於葛理翰在世界各地的佈道活動和表現相對冷淡得多，未視他作基督教的真正的領袖，透露出了他們的「神學偏狹」。他們寧可將美國的麥堅泰、日本的星野榮一、韓國的金根鐘視為國際上基督教的真正代表人物就可以證實，他們的思想與萬國教聯的神學立場上是一致的，因為他們在神學的立場上，明顯地主要偏向於那些與反共的立場相一致的派別，對萬國教聯和麥堅泰等人的支持，左右著他們的基督教事業，也造就了他們的神學思想性格。

16 關於對待天主教的態度上，黨國基督徒的立場也是同仇敵愾的（1966年強烈地反對「天主教與基督教聯合祈禱會」之事件），儘管天主教的反共非常的堅定，而且也從來沒有動搖過，但基於基要派的「護教」立場，他們從來就拒絕與天主教合作、視他們為異端，至於在政治立場上則從來就未懷疑過地支持黨國的意識形態主張（加入脅迫長老教會退出容納天主教團體的普世教協）。

17 參見飲水：〈正「斜」之爭——從葛理翰牧師紐約佈道大會談起〉，載《海外校園》雜誌，2005年11月刊。[http://www.oc.org/big5\\_txt/bh0020/2405.htm](http://www.oc.org/big5_txt/bh0020/2405.htm) (April5,2006)。另見《美國基督教福音派及其對國際關係的影響——以葛理翰為中心的考察》，195、84。



福音派另一位大將亨利 (Carl Henry) 在《現代基要派的焦躁不安》(*The Uneasy Conscience of Modern Fundamentalism*) 一書對美國基要派所做的描述，完全適用於對黨國基督徒的描述。正如亨利所指出的，基要派的分離主義和失敗主義，使其注定地與現代精神脫節，所以他們不可能去影響或改變社會，他們的社會觀非常地狹隘和保守，並不像福音派那樣主張某種程度的參與並改變社會的行動，也不那麼積極於福音工作的展開。相反的，在政治後果上，他們處處變成了對當權者的無條件的擁護，甚至還協助當權者去打擊異己，目的即是貫徹某種政治上的意識形態。這正是黨國基督徒的本質。

我們可以再列舉一個例子說明。

1986年當第三屆華福會準備在臺灣召開前夕，又發生了一場小風波，起因於在《今日華人教會》(1984年4月號)上刊登了一篇「不利於中華民國」的文章，結果，吳勇長老還特別要求華福會總幹事王永信要對此文做說明。<sup>18</sup> 在《共黨能和宗教和平共存嗎？》一書中可以清楚的看見，所講的「宗教」指的就是「基督教」，這本沒有署名作者的著作，出版社是「光陸出版社」(此出版社的社名就有「光復大陸」之意)，時間是「民國七十五年8月」，作者羅列了批判基督教的內容包括普世教協、解放神學、三自教會、臺獨、新約教會、華福會等關鍵主題或對象。當然，特別值得關注的是華福會的例子，因為林慈信的一篇文章惹來了非議，包括國語禮拜堂的吳勇長老也提出批判，正逢第三屆華福會即將在臺北召開，同時，他們也附帶點名批判了該次大會邀請了長老會的代表出席，包括謝禧明、李勝雄，他們被形容作「高俊明的同路人」。再一次說明，臺灣基要派的神學立場本質上是一種政治神經的自然反應，華福搞的是合一，這些基要派分子

18 《共黨能和宗教和平共存嗎》詳述了這個事件的內容，54-62。本書作者後經查明為「郝志偉博士」，見於《真光季刊》第270期，本人認為這應該仍是一個「假名」。《聖經與信仰》對華福會的事件表現得最為強烈，認為華福會已與普世教協在對待共產黨的態度上無差別，他們甚至說吳勇、邵遵瀾、林道亮等人揚言退出華福會。參見《聖經與信仰》第133期，1985/6/20。依本人之見，這些人的反映正好說明了他們的政治正確優先於信仰正確，說到底就是怕觸到政治敏感問題。



硬是要表現其政治正確，基本上，仍是緊抓著一種「離間主義」，但卻又掩飾其背後的政治理由，把自己刻劃為一位正統的維護者。

關於臺灣基要派的種種發展，再詳見下一節論及趙天恩與華神的部份。

## ■ 張靜愚與他那幫黨國基督徒圈子

這一位在《華神院訊》被呼作「黨國元老」的張靜愚，因著其護教反共的領袖身份和形象，加上長期擔任中原大學董事長一職，他也受邀擔任中華福音神學院的董事及聖光神學院的董事，只因他有著極為特殊的「從政經歷」。<sup>19</sup> 張靜愚可以說是黨國基督徒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外界熟知的張靜愚，主要是他參與了中原大學創立，並近三十年的時間長期擔任該校董事長一職直到離世。另外，基督教界也會提及張靜愚是國際基甸聖經會的創始人、國際基督徒從業人員團契的創始人等。事實上，這都不是他在政治和基督教兩界最重要的位子，因為，在政、教兩界的作用上，無疑的，亞聯會和世聯會的理事長身份，才是他發揮最關鍵影響力的地方。因此，關於張靜愚如何躍升於臺灣基督教界的核心人物，必須從其深厚且隱蔽的黨政關係史來理解，以及經由他的周邊所形成以他為核心的黨國基督徒小圈子之譜系才能看出所以然。

張靜愚，1921年6月入黨，黨證：特（字）01623號。民國十三年7月，中校，任蔣介石黃埔軍校英文秘書；民國十四年始，任廣東航空局處長，升作少將，又任廣東航空局局長，升為中將，又轉任國民革命軍航空處處長。也曾為何應欽下屬任軍政部航空署長，孔祥熙擔任行政院長，任行政院參議。曾獲「國民革命軍

---

19 據說，張靜愚在身前留下不少的日記，這些重要的私人記述目前為他的兒子張光正所持有，看來要更多深入理解張靜愚及其周遭相關發生的事情，這些日記是非常重要的資料，問題就在於張光正肯不肯將之公諸於世。



誓師十週年紀念十字勳章」，自述：

回國後即任黃埔軍校英文秘書，追隨校長蔣完成北伐統一中國。

於「中央訓練團」第29期黨政訓練學員〈自傳〉中提及：

在軍校時親聆先總理之教訓與校長蔣之訓示，深為感激，對於主義之認識，與革命之意志，益為堅定。

綜觀之，1949年之前在大陸時期，張靜愚曾在黃埔軍校時期擔任過蔣介石的英文秘書，參與過北伐，擔任過航空局局長、國民天府軍政部航宣署署長、河南省建設廳廳長、財政部參事等，國民政府遷臺後，則擔任過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經濟部政務次長等，從張參與公務和投入政黨的活動與關係看來，張在黨國的地位是非常特殊的，儘管他並未有直接涉入太多官場和黨務的活動，也未有黨職，但他從來就是作為一個堅貞的愛國主義份子為黨國效勞，蔣介石與他有一種近乎私人的情誼。<sup>20</sup>



▲中華婦女祈禱會。（國史館）

20 林治平對於張靜愚推動護教反共的事蹟隻字不提，看來應該是刻意不提，箇中的原因當然很複雜，見氏著〈短小精悍，影響深廣多元—張靜愚〉，收入《風雨中的彩虹—基督徒百年足跡》(5-3)，100-106頁。林治平此舉有損基督徒的良心，也有損於學術工作者的誠實，更是有損於他長期執著於文字傳教工作的形象，殊不知，張與基督教的關係，絕大部份的心思即在護教反共的事業上。林治平不談這一段，也許確實有太多的私人考慮，從他



我們不太清楚張靜愚究竟是屬於哪個禮拜堂系統的，初步猜測他屬於永和中興錫安堂的長老。但是，他每個星期天主要都到「凱歌堂」參加主日崇拜，張靜愚夫人每周三下午參加宋美齡主持的中華婦女祈禱會，<sup>21</sup> 沒有人對他有過懷疑，從他爾後致力於高等教育的建設工作如此順利（曾擔任東海大學、中原大學、中國文化大學董事），並與黨務人員和軍方關係也相當的良好，地方士紳也與他有很好的互動，可以看出其在黨政方面的深厚基礎和影響力。<sup>22</sup> 「黨國元老」之譽，絕非虛名。



▲張靜愚於中國文化大學中華學術研究院下成立的「基督教研究所」，圖為畢業典禮合照，右二起分別為柯希能，張靜愚，吳嵩慶。（作者收藏）

主編《風雨中的彩虹—基督徒百年足跡》這五冊書的參與情形而論，他親手下筆介紹張靜愚，是熟悉，更是感恩，林碩士畢業後就到中原大學任教，從人事室主任（1968）、總務長（1969），一直作到院長，他與張靜愚家族和小圈子的關係足見深遠。

- 21 中華婦女祈禱會的「黨國基督徒夫人團」包括了：1. 蔣宋美齡（總統夫人）；2. 陳譚祥（陳誠夫人）；3. 王朱學勤（王寵惠夫人）；4. 王尤祥雲（王叔銘夫人）；5. 尹程湛英（尹仲容夫人）；6. 何王文湘（何應欽夫人）；7. 余上官德賢（余漢謀夫人）；8. 余歐授真（余伯泉夫人）；9. 杜姚香谷（杜月笙夫人）；10. 李陶湘文（李駿保夫人）；11. 李青來；12. 林盛關頤；13. 馬沈慧蓮（馬超俊夫人）；14. 俞梁就先（俞鴻鈞夫人）；15. 胡葉霞翟（胡宗南夫人），曾任臺北師專校長；16. 洪李蘭（洪蘭友夫人）17. 浦陸佩玉（浦薛鳳夫人）；18. 陳純廉（陳玉麟夫人）19. 曾寶蓀（國大代表）；20. 黃侯叔芳（黃少古夫人）；21. 黃郭佩雲（黃朝琴夫人）；22. 彭鄭碧雲（彭孟緝夫人）23. 蔡黃卓云；24. 劉我英（衛理堂，未婚）25. 錢蔡鎮華（錢昌祚夫人）；26. 徐陸寒波（徐柏園夫人）；27. 陳紀彝（衛理女中校長，國大代表）28. 鈕黃梅仙（鈕永建夫人）；29. 黃金文華（黃仁霖夫人）；30. 郭張美德（郭克悌夫人）；31. 張陳秀德（張靜愚夫人）；32. 葉吳晴湘（葉秀峰夫人）；33. 劉胡秀瑩（劉耀漢夫人）；34. 劉蘅靜（立法委員，未婚）；35. 戴費馬利（戴籟三夫人，美國人歸化中國籍）；36. 瞿許地欽（瞿荊洲夫人）；37. 蕭劉欽孟（蕭勃夫人）38. 沈葉德馨（沈慈輝夫人）；39. 陳逸雲；40. 蕭孝徽 41. 董趙蔭薌（董顯光夫人）；42. 蕭王如琳（蕭鼎華夫人）。見李靖波《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與中華基督教婦女祈禱會之研究》，中華福音神學院碩士論文，2004，31頁。

22 參見《一束思念—張靜愚先生追思紀念集》，1987。



另一方面，由於張靜愚個人對基督教信仰的熱忱，始終都想以基督徒身份盡一己之力報效國家，儘管他並不具有教會職務或受過任何與牧職有關的訓練，他沒有牧師身份或具備神學學位，但他對於教會的組織和相關事務都表現出高度的熱心。

1966年，張靜愚曾與一群黨國基督徒於中國文化大學的中華學術研究之下，成立了一個「基督教研究所」。這所以基督教為名的研究所，可以理解為是護教反共的一個延伸。<sup>23</sup> 中華學術院基督教研究所於1966年4月18日，在陽明山華岡大仁館觀海樓舉行成立會，由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親自主持，出席者有院長王志鵠先生、基督教界代表及嘉賓二十餘人。基督教研究所第一屆理事會由理事長張靜愚主持，寇世遠擔任所長，曾約農、蔡培火、葉霞翟、吳勇、林祥光等十四位理事共同組成。

我們可以理解，中國文化大學的前身是國防研究院，校長張其昀是一位軍人背景出版的黨國大老，與張靜愚的關係也相當深，還擔任了該校的董事之一，再加上蔣介石當時鼓吹「文化復興運動」又與反共的政策是相關的，中國文化大學的黨國色彩始終非常地濃厚。無疑地，在中華學術院之下，除了匯集中國文化儒釋道不同道統的研究院，也加上天主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所等之成立，其實這一切都明顯是帶有政治目的，以配合「文化復興運動」來達到反共的目標。「基督教研究所」的成立，無疑地，也配合了反共的意識形態主張。

1971年10月，在大恩館四樓（一層約一百坪）成立基督教研究所「德生堂」，據稱是為了紀念中國內地會創辦人戴德生傳教士。此一教堂曾對外籌款，根據報導，基督教研究所禮拜堂工程需七百萬元款項，分三期籌足，第一期經費二百二十萬餘元已籌到。第一期的工程完成可容約二百七十人，也就是後來名為「德生堂」的主堂（1971年10月26日獻堂），加上地下室和牧師室等，再加上

---

23 事實上，這個研究所是體制外的，所以之後不了了之，也與這樣曖昧不明的定位有關。



第二和第三期的空間設置，其建築規模相當地大，至少有三至四層樓這麼高。<sup>24</sup> 後來，竟因產權不明被文化大學佔為己有，結果基督教研究所「德生堂」只好搬離到校外，研究所的相關負責人對此事未有任何對外的說明，實在令人不解。

之後，基督教研究所於 1976 年又成立了「神學研究班」，其招生的簡章上寫著「護教反共」的字句：

由於中國文化學院暨中華學術院創辦人張其昀博士，基督教研究所理事長張靜愚博士，以及中國文化學院潘維和院長的全力支持，本神學研究班於 1976 年十月成立，由林祥光教授任班主任，柯希能牧師任副班主任，胡鴻文牧師任教務長。對外招生，研讀神學，學成畢業授予神學學位。本班設立之意義，是為要訓練熱心的青年基督徒，作全時間傳福音和教會工作，本班以研究聖經為主，並配合中國文化，訓練青年具有愛神愛國，護教反共的正確思想。<sup>25</sup>

神學研究班理事會，除理事長由張靜愚博士擔任外，另有蔡培火、吳嵩慶、林祥光、徐陸寒波、賴孫德芳、黎世芬、關世傑、劉毓棠、戴紹曾、馮龍、柯希能等黨國基督徒或外籍傳教士擔任。<sup>26</sup>

以此研究所的師資班底看來，它相似於一所「護教反共神學院」。第七屆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於日本舉行時，代表團曾提出各項反共運動之計劃，其中日本代表團曾建議設立「護教反共神學院」。參與這個研究所的基本成員，也都積極投入並參與過張靜愚所主持的護教反共活動，包括了胡鴻文、<sup>27</sup>柯希能等人。

24 參見中國文化大學《華夏日報》（後改作《華夏導報》）1968 年 11 月 3 日。

25 相關內容見〈基督教研究所概況報告〉，中國文化大學《華夏導報》1978 年 7 月 4 日。

26 同屬中華學術研究院，天主教研究所於 1968 年 11 月 21 日成立，基督教研究所與天主教研究所沒有任何的互動，更談不上合作，黨國基督徒的「神學立場」可見一般。著名的基督教學者謝扶雅於 1979 年 12 月 29 日拜訪中國文化大學，主講「宗教與人生」，主要是應張其昀校長之邀，完全與基督教研究所無關，黨國基督徒的基要派立場，又是一例。

27 胡鴻文，1915 年出生，齊魯大學英文班。1939 年入黨，黨證號：（軍名）字 01781 號，自述：好哲學，熟悉政治、社會、歷史、經濟等諸領域，嘗研究「民生史觀」。胡鴻文參於後期





▲基督教研究所下屬成立華岡團契，禮拜堂名稱作「德生堂」。(作者攝於華岡團契)

基督教研究所的創立，可以看出張靜愚的努力和積極程度，並自認為自己對於神學或聖經研究都是屬於「正統性」的。無疑的，其信仰的熱切與其在相關事務的表現方面，可以看出他對基督教信仰非常地投入，這種投入又與其政治關懷聯繫起來，基督教研究所實為一所「反共神學院」：

其設立除教授聖經外，更配合中國文化及當代科學思潮，以對抗共產主義

---

護教反共的事務相關的多，他與曾是在大陸時期華北神學院創辦人之一的道雅伯 (Albert B. Dodd) 關係密切，對此也與萬國基督教聯會多少有些關係。道雅伯是美國聖經長老會的牧師，與萬國教聯的關係很深，萬國教聯的臺灣分會即是他在 1955 年成立的，之後才交給了曾是他在華北神學院任教時的學生成文秀。他在臺病逝時，萬國教聯總會會長麥堅泰還特別到臺灣參加他的追思會，胡很早就參與道雅伯在臺灣的崇正神學院、基督神學院的工作，1972 年道雅伯逝世後，胡將之改辦作東方神學院，1991 年又將之改作華北神學院，對外宣稱為於臺北復校，從東方神學院到華北神學院，胡一直擔任院長一職到終老。在其官網上，「自封」作華北神學院第四任院長，任職從 1949 年到 2005 年，在他逝世之後，神學院的交棒工作也一直未明，《真光》雜誌發行人排的是胡夫人。胡鴻文的外語能力特別好，所以許多反共方面的神學論述和書籍，多由他負責逐譯，最具代表性的即是翻譯出版一本全面清算普世教協的著作：《從阿姆斯特丹到乃洛比》，同樣也是一份護教反共的刊物《真光》雜誌的負責人。胡鴻文也是一位軍人背景身份出身的黨國基督徒，成文秀是陸軍官校第四期，他則是第十期，在臺期間曾任教於三軍聯合大學，長期擔任國民黨要職，逝世時還特別獲覆蓋黨旗。《宗教統戰論叢》一書的作者劉真光是胡的學生，其就讀於華北神學院撰寫的論文也是與護教反共有關。



無神論鬥爭。並從聖經觀及現今時局發長，培養學生擔負起護教反共、愛神愛國之責。<sup>28</sup>

因此，張靜愚可以在基督教界佔有一席之地，從來就不是以一位教會牧職的身份自居的。他在基督教界裡的影響力，主要來自於他站在了與主流政治意識形識相一致，甚至「裁判者」的角色上，因此一切與之打交道的，事實上，還是與護教反共那個組織有關，類比地說，他就是「臺灣的吳耀宗」，在政治掛帥之下，臺灣教會基本上是由他來領導的。所以，是他的政治勢力擴張了他的教會資本，在那個政治掛帥的年代裡，他自然地與當時所有教會界中略有名氣的牧師都有很多且良好的互動，包括寇世遠、吳勇、陳溪圳等人，或反過來說，是那些牧師不得不與他互動，無論是主動或被動的，張靜愚可以說是臺灣教會界最高的領袖。

由於特殊的人生際遇和熱衷於政治的參與和想像，張靜愚與黨國基督徒都自認為懂得聖經、比一般的基督徒多一些信仰的使命，所以他們成立基督教研究所，並擔任起神學和聖經教導者，這種情形再加延伸，即是對任何與他們不同「政治立場」的人都可以被視作是「離經叛道」，並以信仰的理由或他們所說的「維護聖經真理」的前提來批判他人。這種情形正是臺灣基要派信仰的隱微主張，他們往往更多是夾雜著政治認同來定義信仰的，並以政治的手段來完成對信仰的維護。因此，臺灣黨國基督徒與王明道等人的中國基要派是完全不一樣的，至少王明道沒有與任何的政權有所聯繫，後者不是基於政治的考慮，所以是真正「護教的基要派」，而非「黨國的基要派」，前者落入階下囚，後者仗著護教旗號享受著政治權力。

另外，通過了中原大學這個冠以「基督教大學」的平臺上，也為張靜愚打造了一個特殊的王國。在基督教界裡，有許多的人都想進入高等教育之行列，張靜愚為這些有所期待的人打造了機會，當然，這個機會的給予者是張，透過了這一

---

28 萬國基督教聯合會的日本代表星野榮一為該研究所的理事，〈中華學院基督教研究所簡介〉，中國文化大學《華夏導報》1978年10月6日。



層關係，也為他開啟了另一個「隱匿的幫子」，不是黨政人士，而是一些學術上優秀的基督徒，如韓偉等。換言之，今天中原大學的董事會成員，主要都是曾經受惠於張靜愚的。

這些黨國基督徒，一方面遊走於黨政的良好關係中，一方面則是在基督教界成了名副其實的領袖。借助於當時臺灣政治掛帥的環境，基督徒對這種「教內的基督徒官員」的敬重也是無法避免的，當然這又與蔣介石所形塑的一種「愛國愛教的典範」崇拜有密切的關係。如果說中原大學是一所基督教大學，不如說它是一所黨政關係良好的大學，因為，從在位最長的董事長到在位最長的校長，他們雖然是基督徒，但更好地說是「愛國愛教的黨國基督徒」，所以這所大學一直都不存在與任何教派的聯繫，這也就意味著不受到教會力量的牽絆，可以自由地憑藉小圈子的關係共享權力。

《一束思念》一書曾如此形容張靜愚所做的：

襄助中華學術院設立基督教研究所培植教牧人才。倡導以分送單張傳播福音之國際基督徒從業人員協會中華民國總會，叫人同得這福音好處。並協助每周末在實踐堂樓下對政府各部門現職人員，舉行星期團契，由主內學者或名牧擔任講員。其目的希望革命幹部，人人能以總理、總裁的宗教信仰為信仰，早日完成國民革命第三期之神聖使命。

在那個以反共為政治動員或政治領導為要的年代，重要的是政治正確：希望革命幹部，人人能以總理、總裁的宗教信仰為信仰，早日完成國民革命第三期之神聖使命。不具備牧師職份的張靜愚，於1965年躍上了臺灣基督教領導的核心位子，這個位子當然不是他所成立的國際基督徒從業人員團體或是國際基甸會那樣的邊緣性的基督教團體可以相比擬的，也不是中原大學董事長這樣一個位子，因為「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的地位差不多就是中國大陸「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一樣，是凌駕於一切基督教組織之上的核心或最高的組織，透過了反共之名，將所有教會聯合起來，某種意義上已具有一種跨宗派姿態的基督教組織，和當時



想促進另一種跨宗派聯結的普世教協形成對立。

表面上看來，張靜愚是推動反共的事業，但不要忘了，在他同時擔任護教的任務時，也就給自己賦予了「信仰裁判者」一般的地位。在以政治氛圍中的反共作為唯一的政治正確和思想正確的前提下，護教反共組織就是愛國愛教、護國護教的核心組織，沒有哪一個教會或基督徒會質疑這樣的組織的神聖性和偉大。因此，張靜愚成了當時名副其實的臺灣基督教領袖，他的政治正確（反共）身份，成了信仰正確（護教）的理所當然的地位，其他在他身邊的「牧師們」，基本上都聽命於他、服從他的領導，他跨越政治和教會兩界，成了臺灣教會史上最有勢力的人。

護教反共的組織是張靜愚畢生最為重要的工作。在那樣一種政治氛圍之下的他，除非獲得黨國領袖或是關鍵人物「默許」或「信任」，張不可能如此「凡事順利」，包括他投身於高等教育的工作，也是展現他與黨國高層的「深厚關係」，這也都發生在一位不具有特殊明顯黨國「政治高位」的人身上，畢竟，也產生了令人感到好奇的理由。也許，正是張靜愚不具備牧師身份、也不位居官階位子，才使他更方便於遊走在基督教界和教育界，使他有更好的發揮空間，其好處即是無法使人直接地意識到或留意到他與黨政深層的關係，當然也就不容易識破其複雜且隱蔽的政教關係。<sup>29</sup> 這種隱密的關係是所有黨國基督徒所共同具有的特色，基督徒往往搞不清楚，這些人的思想立場究竟是來自基督教或是來自黨國意識形態，只要他官位大，自然就證實他有好的信仰見證，所以也就不會懷疑他，使得某種政治思想的傳輸也就變得自然或隱蔽，當然也比較有效。

---

29 關於這一點，當我們類比於中國大陸於1950年後的情況相當一致，只是共產黨的手法是公開的、直接的，國民黨的手法則是比較隱微，比較難以識破。



## ■ 護教反共運動中的一位外國傳教士

在黨國基督徒的行列中，張靜愚、吳嵩慶、黎世芬是護教反共的三位中堅份子，其中又以張靜愚為首的黨國基督徒圈子，從黨國基督徒身份拓展到黨國資本家的延伸，嚴然形成了一個小圈子，分別輪流擔任幾個特殊的基督教團體和組織的人士包括：

國際基督徒從業人員協會：陳定川、陳光榮、陳定吉

國際基甸會：吳嵩慶、黎世芬、韓時俊、陳定川、陳光榮

中華民國福音聯誼會：吳嵩慶、黎世芬、盧祺沃

中國文化大學基督教研究所：吳嵩慶、黎世芬、柯希能、胡鴻文、陳定川

中原大學：黎世芬、柯希能

上述這些團體都可以說是由張靜愚所促成的。張靜愚與吳嵩慶、黎世芬的關係最為緊密，尤其是黎世芬，他曾在張中風患病後代理了張在護教反共組織中的理事長一職，以及還曾短暫代張擔任中原大學董事長一職，可見兩人關係的密切。吳嵩慶的情況也一樣，作為張身前的好友，中原大學以紀念張靜愚為名建成的圖書館，吳嵩慶受邀擔任開幕剪綵嘉賓，吳與張都具有軍方背景，後來護教反共組織和活動的推動主要都交給了吳。

另外，我們也不得不提到在護教反共時期的基督教中，張靜愚身邊一直有位非常親密的外國友人的協助，此人對張極為忠誠並也受到張的賞識和提拔，這位在臺北成功地發展其教會事業的外國人稱張為他的「中國人父親」，此人即是基督教以琳教會的創始人—柯希能（克魯辛斯基）。

《聖靈全能的工作》一書是柯希能的代表作，臺灣的第二波至第三波的靈恩運動為他所推動，通過他推行的「靈恩運動」可謂影響臺灣基督教界極深，以琳以其龐大的翻譯和出版系統（章啟明父子的支持），廣傳了一種類型的基督教，餵食了一、兩代基督徒的胃口，也塑造了臺灣絕大部份基督徒的泛靈恩思想。這



是一件值得研究的課目：究竟靈恩運動與護教反共的政治系譜有何種關係？為何打著正統的黨國基督徒可以接受說方言、來自共黨國家的「克魯辛斯基」？

可以這麼說，柯希能與張靜愚是形影不離的。在張擔任護教反共聯合會理事長時，柯希能即是英文秘書，張把中華學術院的基督教研究所所長一職交給了柯，也安排了柯擔任中原大學董事之一。可見，柯可以在臺灣落腳並站穩在基督教界的地位，與他參與了張的護教反共活動有絕對的關係，張的護教反共為他創造了教會資本，結交了多位黨國基督徒。

柯希能與護教反共這個組織的關係是相當微妙的。有時他是一位牧師或傳教士，定期從臺灣出去傳教，有時又是「白俄羅斯代表」、「加拿大代表」之身份，給這個組織提供不少的國外消息，而且還負責聯合會通訊的外語版文字編輯工作，成了重要的成員。

柯希能非常勤於從事護教反共之工作，從他給《護教反共聯合會會訊》的來信看來，他經常地來信報告各地的情況，尤其是注意中共在國際上的種種動作，並向國民黨或政府當局傳達在當地傳教並從事宣揚國威的情形，宛如情報員。有一次，當時身在烏干達傳教的克魯辛斯基（Nicholas Krushnisky，即後來的中文名字為「柯希能」）致給亞聯會理事長張靜愚的一封信中，特別提及他在國外期間對中華民國所進行的宣傳工作，信中特別徵求寄來一些宣傳單，此信最後經由張傳給了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主任陳裕清，陳主任在回函中提到將寄宣傳小冊《介紹中國國民黨》給他。<sup>30</sup> 谷正綱特別讚揚柯希能對「宣揚中華民國進步」所做的努力，一位牧師到異國傳教，竟也做起中國國民黨的宣傳工作。可見，黨政系統與護教反共的組織之間緊密和自然的關係。

在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第四屆代表大會上，柯希能主持了一場靈修講道，他以「加拿大代表」的身份述說了他的擔憂：

---

30 《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會訊》第8期，1972/2/20，18。



我很痛心，有少數臺灣的同胞，在加拿大受共產黨的利用，甚至有少數牧師也誤解了聖經上的真理。

共產分子在加國，他們利用新聞廣播等大眾傳播工具詆毀中華民國，我們愛國的同胞，愛國的基督徒，可以不問這些事嗎？沒有了政府、沒有了國家，還有宗教嗎？宗教還有自由嗎？然而我們感謝主，在加國有成千上萬的人都支持中華民國為我們中華民國禱告，「禱告」是最有力量的武器。當我們加國傳道人回國時，除了為主傳福音以外，就是為中華民國講話，讓加國人民真正了解中華民國的實況。<sup>31</sup>

柯希能經常以一種更為堅定的口吻表示他反共、熱愛中華民國，甚至願意替國民黨做宣傳。柯希能自己也是如此講述他與張靜愚夫婦之關係的：

中國的父母親，張理事長靜愚夫婦：神使用他們開了文化大學福音的門，因他們在主裡之愛、接納及協助，使我的服事更寬廣。<sup>32</sup>

一位（共產國家）烏克蘭人移民至加拿大，後來到臺灣傳教，前階段到山地鄉傳教（1958），之後負責喜信聖經學院的工作（1966），柯希能受惠於張靜愚。中國文化大學中華學術院基督教研究所的所長、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副理事長、中原大學擔任董事等，都是柯後來擔任的要位。柯之所以能在臺灣發展並順利地結交黨國（大老）基督徒，全拜張靜愚給他創造的機會。1991年，柯希能在他負責的以琳基督徒中心成立十週年的會刊上，李國鼎親筆為之提賀詞；《柯希能牧師來臺宣教四十週年紀念見證集》，給他提筆寫嘉言的除了李國鼎，還有白培英、吳嵩慶、王建煊、陳定川等黨國基督徒。

我們從張靜愚的女兒文中就可以證實這一點：

31 《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第四屆代表大會代表紀要》，1978，46。

32 《柯希能牧師來臺宣教四十週年紀念見證集》，臺北，以琳基督徒中心發行，1998，33。



柯牧師稱先父張靜愚先生是他的「中國爸爸」，而先父也的確喜愛這樣的稱呼與關係。這份異國父子情絕不是一般人所謂的「緣分」，而完完全全是神的作為。在神國度的計劃中，把他們兩人安排在一起，這也是神特別賜給先父的殊榮，使他在神國度的大使命中扮演一個穿針引線的小角色。<sup>33</sup>

透過張與柯的關係來看，充份地說明了黨國基督徒的關係和圈子是如何形成的。有人把張靜愚列為中華民國基督徒中十二位傑出基督徒 (outstand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Christians) 之一，與孫中山、蔣介石、宋美齡、陳維屏、董顯光等並列；亦有教會中人題詩讚揚張靜愚，可以作為他的一生最佳註腳：<sup>34</sup>

教育英才計百年，福音廣播志彌堅。

平生反共鋤奸志，耆老會中揖國賢。



▲中國信徒佈道會臺灣分會總幹事姚國祥按牧，王永信、吳勇、張靜愚、成文秀等都出席了。  
(作者翻攝於《姚國祥牧師紀念集》)

33 張培士，〈異國父子情〉，收入《柯希能牧師來臺宣教四十週年紀念見證集》，77。

34 鄒建中，《榮神見證詩》，永和中興錫安堂，1978，14。





▲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於10月30日上午在婦聯會孺慕堂舉行紀念禮拜，由陸寒波女士主持。（作者翻攝《先總統蔣公百年誕辰紀念實錄》）



## 5.2 趙天恩與中華福音神學院

### 臺灣基要派神學議程的起源



▲中華福音神學院。（作者攝）



◀《華神》通訊。  
（作者翻攝）

2012年，一本名為《見證耶穌是基督》的小書，在臺北基要派圈子中引起了極大的波瀾，作者是新約聖經學者彭國璋，畢業於中華福音神學院後赴英國雪菲爾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彭國璋畢業後主要參與聖經公會的工作，其中亦曾兼教於中華福音神學院，同時也接受了臺北中華基督教信友堂的支助，名義上還是該



教會差派的宣教士。但是，這本書卻被曾是同窗的康來昌點名彭背離了信仰，不能接受他對聖經的理解以及對天主教的評價，於是要求彭收回所有已出版的書，並公開脫離與信友堂的關係。這件事無疑地是中華福音神學院的「茶壺風暴」，但這當然是事出有因，而且還觸動了這間神學院與臺灣基要派信仰的代表教會之神經，也正好說明了中華福音神學院的基要派立場一直都存在，必須回到其創立過程中的政治背景，《見證耶穌是基督》引起的只是偶爾被挑起並又再發作一次基要派焦慮和分離主義。<sup>1</sup>

要認清這條敏感的神經，就要從趙天恩與臺灣基要派的神學教育來開始說起，以下的這段話說到：

那時候港臺還沒有一所專為大專畢業生而設的神學院，所以我回美國之後，就在中國神學生中傳遞這異象，後來就成立了「中國神學研究院籌備委員會」（1967）。不久，吳勇長老和戴紹曾牧師在一九七〇年也發起了一個聯合神學院，定名為「中華福音神學院」，並且在當年九月開學。由於他們沒有師資，於是向我們「中神」剛剛成立的「教授團」請援。我們的董事會就派陳濟民和我來臺協助戴院長；陳濟民作輔導主任，我作教務主任。所以，我也參與了華神教務架構的建立。<sup>2</sup>

當時趙天恩的學歷也不過只有碩士，但卻已經在臺港兩地主導「高等神學教育」的方向。表面上看來，趙天恩的神學理念是以本色化的神學教育來中斷外國差會

- 
- 1 前一次發作是1991年，因為《現代中文譯本》翻譯羅馬書8章3節引起的爭論，黃子嘉和王長淦代表華神，公開質疑此一譯文為背離信仰真理，並要求聖經公會予以更正，矛頭還特別指向周聯華是「同路人」，相關的發言可參見張德麟〈駱博士與新使者雜誌〉，收入《聖經、詮釋、實況—駱維仁博士榮退紀念文集》，臺北：永望文化出版事業，2001，450-454。華神院訊曾有兩篇文章做出反應，一是林道亮的〈「童女」抑「少婦」？〉，載於《華神通訊》第242期（1990/12/5），以及陳藹宜的〈罪性知多少？〉，載於《華神通訊》第259期（1992/5/5）。
  - 2 趙天恩，〈三化異象的事奉基礎〉（1993），收入於《扶我前行》，臺北：中國與福音出版社，1993，24。



對中國神學教育的支配和影響，實際上是將具有宗派色彩的神學逐出中國神學教育的領域，這正好與 1965 年以來臺灣島內的政治意識形態有關。<sup>3</sup> 目的很清楚，即是與具宗派和外國勢力的神學院互別苗頭，最終是要根本地割斷與普世教協的聯繫，當然，本色化神學教育的內核即是反共神學，同時也是反自由派神學。趙天恩很早就表現出他的神學動機，他努力於推動的本色化神學教育，無疑的，即是抵制長老會神學，以下的這段話再明顯不過了：

那時我又發現臺灣某些教會中有新派神學的影響力，福音派當中，又有一股反神學的潮流。<sup>4</sup>

中華福音神學院（以下簡稱「華神」）是一所「地方教會」發起「聯合」「去宗派」之神學院，剛成立不久，第一任教務長趙天恩就與院長戴紹曾共赴臺南參加了一場研討會，這次研討會的結果即是臺灣教會神學教育史的一次重大的絕裂。

這是一場基要派與自由派之爭，公開地體現在 1971 年於臺南神學院所舉行的一次關於宣教學的研討會上。

1970 年 3 月在西德神學學會發表〈法蘭克福宣言〉（The Frankfurt Declaration on the Fundamental Crisis in Christian Mission）的拜耳豪司博士（Peter Bayerhaus），同年 6 月獲邀請訪臺，參加了由臺南神學院暨基督教互談會聯合舉辦的宣教學研究會，並發表演講。一場原來是開明的討論和公開的交換意見，但是卻惹來了質疑，形成了宣教神學上的衝突和矛盾、神學教育立場上的對抗。

3 中華福音神學院於 1970 年正式開學，但根據戴紹曾的說法，歷經五年禱告和籌劃，這意味著華神的成立又與 1965 年有關，是巧合或是醞釀於第一屆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之時，就只有當事人知道了。參見戴紹曾，〈中華福音神學院簡介〉，刊於《同工月刊》第 58 期，1971/2，32。

4 趙天恩，〈三化異象的發展〉（1991），收入於《扶我前行》，11。另參見王嗣岳，〈趙天恩在當代中國基督教的歷史意義〉，發表於「第一屆趙天恩學術研討會」（2014），臺北。



舉辦者認為，儘管〈法蘭克福宣言〉是一篇保守的宣言，但宣言的提出，無疑地是對於近代的教會史上鮮少具有影響力的一宗大事件，其「宣講工作七項不可放棄的因素」乃由一群德國福音派神學家所提出，曾激起神學界一陣迴響。這次研究會專論法蘭克福宣言所提出的「一九七〇年代基督教宣教的根本危機」，主要是這群不同的德國大學和神學院的「福音派神學家針對普世教協的觀點而發」，據他們認為，普世教協在1968年在瑞典烏普撒拉所採取的立場太激進了，此宣言對普世教協的立場做出了批評，並力陳簡單扼要的七項宣教上不可或缺的基本因素。對此，臺灣神學界也應對此廣泛地交換意見，《臺灣教會公報》報導此次會議時還特別說明了原委：

對此宣言將不作任何神學上的斷語，而將它當作「歷史事實」呈現於讀者面前，同時編列幾位教會界人士對此宣言及有關此次互談會的介紹及反應，作為參照。我們咸認；對此宣言的批判，常取決於各位讀者的信仰抉擇。

拜耳豪司博士在這次的研討會上發表了兩篇演講，一方面針對法蘭克福宣言本身而論及「今日世界的宣講角色」，對其反應則有代表新教和天主教各會的參與者發表的意見；另一方面專論「今日亞洲的基督教宣教角色」。拜耳豪司博士演講之後，緊接著是小組討論和激烈的總討論。這是長老教會認真看待問題的做法，也反映了與當時世界的神學走向的接軌，頗具普世之勢。

然而在會議上，趙天恩就明確地表達了他對普世教協立場的反對，〈當前臺灣宣教的危機〉（或〈當前臺灣宣教的神學危機〉）一文主要是針對《基督教論壇報》關於1971年6月的「宣教學研究會」的報導，並替拜耳豪司以及其所發起的〈法蘭克福宣言〉作出辯護。<sup>5</sup>按趙天恩的文字脈絡看來，他有意糾正《論壇報》的報導，以他當時在場的經驗，與《論壇報》的報導有所出入。他認為不是拜氏的立場在此項會議中僅獲少數與會者的支持，關於這方面他和戴紹曾可以

5 原標題為〈法蘭克福宣言—論宣教基礎的危機〉，全文刊於《臺灣教會公報》第1073期，1971/10，17-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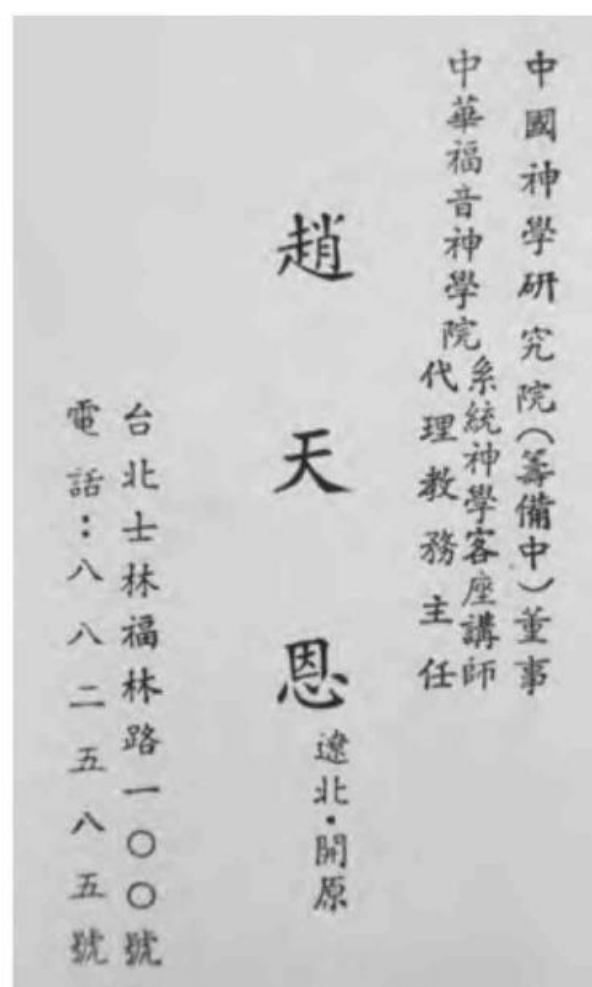


作證，而且這種情形也不能代表大多數臺灣牧者的看法。<sup>6</sup> 趙天恩分析了與會者的「神學背景」，其中七成為天主教神父、修女、臺南神學院教授及站相同立場者，覺得他們在根本上就與拜耳豪司的立場有一段距離，而餘下三成是「福音派」人士與立場不明者，才會導致誤以為座談會中認同拜耳豪司者「僅佔少數」。顯然趙天恩認為該報導有誤導之嫌，與此同時，也將之視為一種警訊來理解，表示他看到了「危機」，要改變此一危機，福音派就必須振作。

趙天恩在文中特別的提及了〈法蘭克福宣言〉的背景：「當1968年（第四屆）普世教協在烏普沙拉（Upsala）發表他們所謂的宣教神學後，拜耳豪司教授及其他十三位教授為了闡明與聖經基本宣教之根本大相徑庭及其謬誤，故在法蘭克福（Frankfurt）發起了這個宣言」，而「在該宣言裡簽署之人的神學立場皆是忠於聖經」。他認為大教派的宣教組織所建立的聯合機構，因受「『宗教比較』及近代神學的影響，採取了一個神學上的姑息主義路線……使人『悔改信主』的動力就被『對話』而取代了」。

趙天恩更進一步地指出：

普世教協的重點近年來不再放在傳統的佈道，而放在對社會上及政治上的關懷……不再基於「大使命」，而另居於一個「神受苦」的新觀念上……他們認為救恩乃在世界的歷史內被彰顯出來……教會應該在世界各地的革命行動上有份。教會與世界之間的差異因



▲趙天恩名片。（作者收藏）

6 趙天恩，〈當前臺灣宣教的危機：宣教神學的危機〉，載於《華神通訊》（1971年9月5日），2。這篇文章同時也刊在《臺灣教會公報》第1073期，1971/10，21-22；然而最先是新聞稿之方式刊登於《基督教論壇報》（1971-07-11），另也見於《中國信徒月刊》第十卷第十期，1971/11。共見於四個不同的刊物上，可見趙天恩的「危機感有多重」。



而被抹殺了。<sup>7</sup>

他認為，「拜氏指出了對世界歷史與救恩史混合而談之荒誕，不基於聖經基礎之危險及他們對教會觀之謬論」，在他看來，拜氏的〈法蘭克福宣言〉引起了在場的天主教及自由派人士攻擊，而爭論的焦點在於基督是否唯一得救之途，無疑地，這正是臺灣的宣教神學最大的危機，天主教與自由派人士已經主導了臺灣神學與宣教的命運，問題的源頭當然與普世教協有關。

趙天恩對於這場座談會的分析，兩度強調七成的出席者對〈法蘭克福宣言〉持反對意見。事實上，現場並沒有投票表示支持或反對，他的看法僅僅是基於他對於出席者的「神學背景」之判斷而作出的假設。他將天主教的代表及臺南神學院的教授與支持者「歸類」在反對拜耳豪司的陣營裡，但未作具體解釋。天主教是福音派「想當然耳」的敵人，所以基督教對與之談論合一更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無疑地，這就形同是對宗教改革的背叛。

至於臺南神學院，當然也就被視為是反對拜耳豪司的「自由派人士」，理由有二：一是臺南神學院時任院長宋泉盛的教育背景為美國協和神學院神學博士，是一間新派神學院；二是臺南神學院與普世教協「直接有關」，長老教會即是普世教協之一員，其神學院便是充斥著極其曖昧不明的政治關係。

趙天恩針對這次研討會的反應做出了分析，認為這種反應已顯示了嚴重的危機，他親臨並感受到自由派的強勢，也感到福音派的弱小和無知。趙從福音派人士極少發言的情況之下說明他們似乎是「不敢表明立場」，也可能是「不能分辨是非」，這反映了福音派神學批判的能力有待檢討，同時，也藉此寄望於一間具有正確的宣教神學和使命的神學院來茁壯基要派的隊伍。在他的文章中表達了他的焦慮，認為此舉無疑是使宣教的行動變成不可能，最後，趙天恩向基要派大聲疾呼地發出了動員令：

7 趙天恩，〈當前臺灣宣教的神學危機〉，《臺灣教會公報》第 1073 期，1971/10，21。



當傳福音本身面臨危機的剎那，我們今日中國基督徒應該作些什麼？我們體驗了基督的生命的國人應當開始採取一種神學上的獨立精神，基於信仰及聖經的立場，對所有由西方輸入的神學思想，應當採取一種批判的態度，我們不能再隨著西方教會思潮之波浪而搖動，被他們的異風吹來吹去。不論它來自何方，是天主教、自由派或是福音派。我們也不必在中國站在歐美的陣營內打他們的宗教仗。我們應該利用我們的精力，我們奉獻的心建立一個蒙主喜悅的中國教會，建立一套有能力，合乎聖經的宣教神學，而且向我們社會中百分之九十五尚未信主的同胞們傳主的福音。<sup>8</sup>

趙的呼籲明顯地將中國與西方對立，認為西方的神學是一種異教之風，把天主教、自由派說成是同一個陣營的，她們都背離了聖經的信仰，因此中國基督教應小心翼翼，因為自由派或新派、包括福音派在內的宣教神學，將嚴重地破壞了我們傳福音的熱忱。這是基督教最大的危機。從政治立場的對立（反共／親共），神學立場的對立（正統／新派），現在延伸到宣教神學上的對立（傳福音／社會服務），這無疑更加說明了華神的成立其肩負的使命何其地艱鉅和神聖。

萬國教聯與黨國基督徒從反對 1965 年合一運動開始，就一直緊盯著普世教協與共產國家的關聯，尤其身為普世教協成員之一的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更是首當其衝成為被質疑其正統路線的對象。趙天恩所言的「宣教的危機」，無疑的，真正想要指出的是「純正信仰的危機」，換言之，以臺灣長老教會為主的神學和宣傳路線，是可疑的，也是危險的，福音派應立即做出反撲。

對此我們可以理解，趙天恩何以強烈地批判差會、批判在差會背景下的神學教育，為何如此激烈地倡議本色化神學教育，他果真是時代的先知、或者他的呼籲與當時的政治現實有關？

我們不得不這樣問：差會的行政人員真願意這樣繼續下去嗎？西方教會致

8 趙天恩，〈當前臺灣宣教的神學危機〉，《臺灣教會公報》第 1073 期，1971/10，22。



力貢獻的就是這些嗎？我們能寄望這樣一個分歧而又疲弱的神學教育制度，會產生有力的領袖來帶領新一代的中國教會嗎？現今福音派神學院能否對抗自由派神學？她能有效地向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人講明福音嗎？<sup>9</sup>

我們很難明白，何以初出茅蘆的神學生會如此強烈地抵制差會以及與差會有聯繫的神學教育，差會的問題真的如他所言的那樣一無是處，並只有將差會去除才能辦好神學教育嗎？問題的重點應該在於神學立場方面，當然不僅僅是因為趙天恩在美國基要派神學院韋斯敏斯德神學院（Westminster, 1962-1964；1966-1967）所受的神學薰陶，更多的可能性是他也在某種程度上參與了「護教反共」的行列。<sup>10</sup>

這篇文章最早以〈西國差會與中國神學教育—臺灣的個案研究〉為題，發表於1972年1月所主辦的「中文神學教育研討會」，後收入於《中文神學教育研討會報告書》。趙天恩在會議的總結中，尤其聲明了這是一次保守派神學院與教會的參與，其中有一段話相當的玩味：

美中不足的，就是我們這個研討會祇能限於「福音派」的人士，而未能廣泛地包括所有中文神學教育人士。但願我們中國基督徒都能夠在聖經的權威下，在基督裡，共同推動來日中文神學教育之重任。<sup>11</sup>

9 趙天恩，〈西國差會與中國神學教育—臺灣的個案研究〉（1973），收入於《扶我前行》，310。

10 從1962年至1967年，趙天恩兩段時間在韋斯敏斯德神學院，其中1965年短暫的在臺北生活，主要是在基督書院任教，這也就意味著他與賈嘉美應有所互動，也可以間接證實其神學上的基要主義傾向可能來自於與這些人接觸的結果。同年6月他與鄭簡卿女士結婚，在結婚證書上，臺灣「護教反共」的穿梭於政教兩棲的人物康峻壁先生竟是他們的介紹人，說明了他們之間的關係匪淺，而且是同為遼寧人。

11 見《中文神學教育研討會報告書》，香港：證道出版社，1973，284。1973年，第二屆「東南亞中文神學教育研討會」於菲律賓碧瑤市舉行，「中華民國代表團」中除了張之信（浸信會神學院）、趙中輝（改革宗翻譯社），其他的都是華神代表，有沈介山、邵遵瀾、蘇文隆，以及學生黃子嘉、陳鐳等，未見有長老教會或其他神學院代表出席，見《神學教育與教會增長》，香港：中文神學教育促進會，1975。此會議的邀請名單大致上是由趙天恩所安排的，其他地區的代表相對多元，有宗派背景的神學院出席，只有臺灣主要是華神系統。



在《華神通訊》中，趙天恩敘述個人蒙神呼召從事傳道與神學教育的經歷，他「進入學術有名、信仰純正的韋斯敏斯德神學院」後「大量地吸收聖經真理」。<sup>12</sup>在求學過程中，他曾於 1964 年休學並短暫到臺灣做了一些考察：

我在臺灣那年正是基督教來臺百週年紀念的節期。我發現那個紀念的後面好像有普世教聯合一運動的影響。普林斯頓神學院院長馬克德被請為主要講員，所講的也不外於推動那個合一運動的話。一九六六年一月推動合一運動的人在臺北首次與天主教舉行聯合禱告會。福音派人士大吃一驚，轟動一時，好像不知道那是普世教聯在世界各地推行已久的工作。身居異國的一群中國神學生聽到這類的消息何不痛心！對祖國教會的關懷使我們在韋斯敏斯德的中國神學生常在一起討論本國教會的需要與難處。<sup>13</sup>

趙天恩在此雖未直接批評普世教協，但字裡行間充滿了對其合一運動敵意的態度，並暗示了臺灣的福音派人士若未能及早察覺此合一運動，將給教會帶來嚴重的「危機」，尤其是與天主教的密



▲中國信徒佈道會加入了對臺灣島內教會的批評，一是反對普世教會合一運動，一是反對重新聖經翻譯。（作者獲同意翻攝自《中信月刊》）

12 趙天恩，〈呼召與帶領〉，載於《華神通訊》（1971年6月2日），3。之後收入《如雲集：中華福音神學院師生見證專集》（一），1972

13 同上。



切互動，更是觸動了其韋斯敏斯德派的神經。趙的暗語處處表露了將北美自由派與基要派的爭論帶到了臺灣。趙在提及韋斯敏斯德神學院時，崇敬地以「學術有名、信仰純正」形容之；說到普林斯頓神學院院長時，卻以輕蔑的言辭描述其演講內容，這位好鬥的華人神學生，將普林斯頓神學院與韋斯敏斯德神學院的對立搬到臺灣上演。

眾所周知，韋斯敏斯德神學院的創辦，正是由於指控原來所屬的普林斯頓神學院受「新派」影響、不再堅守「純正信仰」，而決定與之分道揚鑣、另起爐灶，趙天恩在臺灣樹起了韋斯敏斯德派的大旗，向普林斯頓派宣戰。

## ■ 反對合一運動

趙天恩何以如此敵視西方差會或宗派呢？他本身即是接受浸信會按立為牧師的。<sup>14</sup> 答案就在於一封英文信之中。



◀ 《福音報》刊出了署名為 Jonathan Chao 的來函，點名批判黃彰輝等 WCC 代表。（作者翻攝自《福音報》）

14 趙中輝，《神恩浩大》，臺北：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1983，188-189。



1966年5月3日，《福音報》的頭版刊出了一篇「海外來鴻」，本信函據稱是自美國費城寄來，以英文書寫，由盧祺沃譯作中文，寫信的人署名為：「你們在主內的弟兄神學生聯會總幹事 Jonathan Chao 敬上」。<sup>15</sup> 這篇信函足以解釋趙天恩所有思想的「秘密」，以下列出全文供讀者了解：

主內親愛的弟兄姐妹平安：

我們是賓州費城附近各學校的同學。

貴報和各位忠心愛主為真理奮鬥，使我們這些「遊子們」很興奮也很敬佩。未想到這所謂「合一運動」和 WCC 的毒素竟然在寶島上蔓延。最近一月三十日在臺北舉行的「天主教和基督教聯合祈禱會」證明教會內的領袖離經叛道愚昧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起初是漠視聖經真理，然後漸在神學院裡「修正」聖經，再後便是不信「神的話語」（提後二：15）最後落到不敬虔的地步，隨著「異教徒」向虛無膜拜——與離經異端的天主教徒一起崇拜起來了。

我們願意與你們全心一意站在一條戰線上為真道而作戰（屬靈的戰爭）。無疑的這些創辦「聯合祈禱會」的人是有整套計劃要「合一」臺灣的基督徒，並且偽裝是「在基督裡合一」，請叫各信徒注意他們的印刷品，都是「開明」或「新派」人士執筆，完全是背棄了「一次交付的真道」。

WCC 在遠東開過：

15 《福音報》第 289 期，1966/5/3。趙天恩帶領的這群學生聯會，其中主要都是香港學生居多，像陳濟民到華神任教並之後當上院長，即是其中一人，另外臺灣來的同學，恐怕只有韓偉一人。韓偉在臺灣基督教的地位，除了因其父韓時俊（信友堂的創辦人之一）的關係，也可能在北美就已與這些華神的主幹結識，故很快就成為教界的紅人，信友堂有「韓偉館」、宇宙光有「韓偉廳」。韓偉被喻為國民政府遷臺後第一位完成公費留學畢業返國的學生，其回臺的消息還特別登上報紙的顯著版位。為迎來國防醫學院生理學系任教的韓偉，國防部參謀總長彭孟緝上將還特別獲得頒獎給「二等級學獎章」。這個消息刻意被突出，顯然與韓時俊無關，更多是與愛國主義有關，表現出了留美學生愛國，願奉獻於國防醫學，成了一個宣傳品。



「東南亞基督教會議」是 WCC 的分會。狼狽為奸的有：「東南亞神學院協會」是 John Fleming 領導的。

在臺灣推動的是：

臺南神學院院長黃彰輝牧師，該會會長是臺南神學院主任宋泉盛牧師（按最近黃出國後宋已升任院長）。臺南神學院副院長米彌理（英國人）；臺北神學院教授韋理遜（外國人）；臺北神學院下任副院長蘇若蘭。從民國四十八年他們出版了一連串的刊物。這些不信聖經的「名人」開始研究，再而同意，至終決定「決策」領導這東亞會議的題目。

最後一期的「東南亞神學報」（S.E. Asia Journal of Theology）黃彰輝寫了一篇文章指出臺灣今後神學動態的報告。由 WCC 總部，日內瓦，每週的新聞報導 EPS（合一出版社）詳細報告臺灣「合一運動」的驚人進展。

我們十分惋惜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又選出張 XX（編輯諱其名）做這一年的議長。照我們看鐘 XX（同上）總幹事，也是偏向 WCC 的一方面。這些人和鄭 XX，吳 XX 等都正邁著昔日和今日大陸上的迷途「神學家」——趙紫宸和吳耀宗等的步履。（按：趙某最近發表一篇既荒謬又騙人的報導，叫做：「中國的好日子來到了」）。

我們貢獻意見：

- 一、請楊天石先生或天橋週刊的編輯留心分辨各方的報導，不要再把有害基督道理的稿件登出。（按：天橋週刊立場不堅定，經常刊登此類稿件為親共的 WCC 及新派不信派辯護）
- 二、組織一個委員會去研究 WCC 在臺灣和東南亞的「運動」。這委員會應當留心這些「開明派」人士的行動，警告各教會並且與他們「爭辯」，猶大書第三節。
- 三、組織一個完善的「禱告運動」在全臺灣各處舉行禱告會（當然不是容納污穢的「祈禱會」）。主的靈一定會祝福並賜真正的信徒分辨的能力認識真假道理。



四、其他研究「開明」派的所謂「神學」好明白他們的戰略。

賓州和紐州同學們一定在禱告中扶持你們努力的衛道。「上帝是忌邪的上帝」（原文妒忌）祂不肯與別的人物分享祂的榮耀的。主是復活的主，祂有一切天上地下地底下的權柄，從今一直到永遠，願主祝福你們。

你們在主內的弟兄神學生聯會總幹事  
趙約拿單敬上五五年二月十六日費城

這封信足以使我們完全看清楚了所謂的「本色化」神學教育究竟是指什麼，其目的很清楚，就是要反普世教協的神學教育。趙天恩在檢驗臺灣的神學教育時，尤其點名批判長老會神學教育，他的信函批評的對象非常清楚且「指名道姓」，包括了黃彰輝、彌迪理、宋泉盛、張逢昌、鍾茂成等人（盧祺沃的翻譯又用一些強烈的字眼），說他們「未能脫離其西方宗派色彩」，是「神學的帝國主義」，而且還「恐嚇」臺灣的教會若不成功地抵制具西方宗派色彩的神學教育，將走向自由派或新派的神學危機：

以長老會來說吧，她在臺灣有一百年了，還未能脫離其西方宗派色彩，蛻變成中國式的教會。宗派主義的防線加強，真正屬於中國人的本色教會就會受到抑制。<sup>16</sup>

他甚至具體地提供數字，以昭告地方教會要團結起來，以維護「福音派」的立場。所謂的「中國式的教會」、「中國人的本色教會」等云云，並不是什麼大家所熟悉的那種意義的本色化，其父親趙中輝就曾批評本色化神學是一種危害正統信仰的東西，所以趙天恩的本色化並不是什麼特別的神學主張，其真正的主張即是與島內的政治情勢相吻合，以反對長老會神學教育以及與之相關的普世教協的神學立場的一併反對。

16 趙天恩，〈西國差會與中國神學教育—臺灣的個案研究〉（1973），311。



為激起強烈的危機感，趙天恩將長老會的神學院和十二間福音派神學院對舉，具體表明了「兩種殊異的神學立場」及其後果，比較一下並說明：

十二間福音派神學院中，全時間讀書的有一百七十五名，平均每間學校有學生十七名，若把選修生算在內，則平均有二十六點五名。三間長老會神學院共有學生三百八十二人。四十四名具有專上畢業程度的神學生，有三十個是在長老會的，其餘十四人，則分別在三間福音派神學院內就讀。具有高中畢業程度的神學生，只有一百一十五人是在那十二間福音派神學院內，亦即是平均每間只有十個是具有中學畢業程度的。<sup>17</sup>

這些數據本身即具有高度的政治意義，因為趙所倡議的本色神學不是什麼溝通儒釋道或傳統中國文化的神學，本色神學即是「政治」神學，「三化異象」本質上即是包裝了的政治議程，是「護教反共」的「福音呼籲」，這與之後他轉而批判中國大陸三自教會的神學和中共對基督教的態度是一致的。換言之，臺灣當時的情勢說明了趙天恩所憂心的，即是中國教會恐又一次再一次的「易手」，正如發生在1949年前後大陸的神學變化或情勢那樣，所以要在臺灣進行「神學重整」，即是保障「福音派」不致於在中國或亞洲失去地位。因此，趙天恩說：

中國教會當前之重要活動有三：（一）提倡本色神學。（二）重整神學教育。（三）新派教會正在企圖領導亞洲神學教育—這些都極需「福音派」信徒對中國神學發展的方向及內容作慎密的考慮。<sup>18</sup>

趙天恩十歲離開大陸到香港，隔年到了日本神戶，住了九年遷居到美國西岸，1965年到了臺灣，接觸了賈嘉美、康峻璧等人，擔任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臺灣辦事處主任。對這麼一位當時連中文都寫得不怎麼好的趙天恩而言，「本色化」一詞是一種政治修辭，其目的是要割斷與普世教協的神學聯繫，如果說「本色

17 趙天恩，〈西國差會與中國神學教育—臺灣的個案研究〉（1973），309。

18 趙天恩，〈中國神學界荒蕪的原因〉（1969），收入於《扶我前行》，294。



化」是一種在地化政治，他則是明確地反對黃彰輝的在地化神學，那麼也就意味著，其隱匿的神學議程即是護教反共的政治現實，並將之政治現實轉化成基要派語言，以神學教育來實現護教反共的基底。

趙天恩的早熟是歷經逃避戰亂和臺灣政治意識形態推波助瀾的結果，在臺灣短暫的一年，回到美國即「訂閱多種臺灣教會報刊加以研究」，按他的說法「第一個異象的雛型就這樣形成了」，二十八歲的年輕神學生已經提出了如此宏大的神學遠見，把信仰的呼召重點放置於「重整神學教育」上。趙在美國究竟讀了什麼類的「臺灣教會報刊」，而做了什麼樣的「研究」呢？無疑的，他所閱讀的「多種」教會報刊，不就是「愛國愛主」的《福音報》、<sup>19</sup>被他點名糾正的《天橋週刊》，或者是 1965 年才發行的《基督教論壇報》，恐怕他讀不懂羅馬字閩南語發音的《臺灣教會公報》，或打從心裡就已將長老教會的報刊當作批判的對象吧。

無視於臺灣及香港已然存在的神學教育，趙天恩竟形容「中國神學界是一片荒蕪」，無疑地是在說明其他當時存在的神學教育均是有問題的。因此，他對本色神學的推動即是在神學教育上「收回教育權」，所謂中國人辦神學教育，並不是那類以中國文化或中國社會為主體的神學教育或思想，說明白些就是神學教育與政治認同結合起來，「護教與反共」成了趙天恩一生經營的思想路線和工作特性。

以美國基要派的鬥爭來環視臺灣，再將觸角深入中國教會，「新派」在趙天恩的眼中本質上即是一種帶有明確政治意味的神學。從外觀看來，他以正統或福音派自居，同時又批判中國大陸共產黨統治下的三自教會，他的努力不是一朝一夕的，他的神學啟蒙來自（反共）政治啟蒙，把傳福音的理想與打擊長老會的自由派神學、攻擊普世教協（宗派神學）這三項工作接合起來。

19 《福音報》於 1962 年創刊，發行人是黃約翰，此報的編輯宗旨為「愛國愛主，維護真理正義，立場永遠堅定」，從報導的消息和刊登的內容與社論，其黨國色彩是極為鮮明的。



## ■ 趙（中輝）氏父子

提到趙天恩，肯定要將他和趙中輝聯結起來，這一對父子對於臺灣基要派的形成和打造都有著不容忽視的地位。趙享恩回憶其父提到：

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趙中輝牧師認為，要救大陸百姓於水火，最有效的方法莫過於積極培養破解馬克思主義的中國神學家。他有感於中文神學著作的重要及迫切性，積極鼓勵二子天恩於 1965 年赴臺教書，觀察臺灣神學教育的環境。<sup>20</sup>

可見，1965 年趙天恩首度來臺是帶著父親指派的任務，他的一生都在執行父親交付之「起初的異象」。

趙天恩在臺短短的一年，不單娶了太太（基督書院的學生），更重要的即是完成將改革宗翻譯社從香港遷至臺北的工作。<sup>21</sup>直到 1968 年趙中輝才來到臺灣，將原來在美國的翻譯社正式全部地移置到臺灣來，這時的臺灣正處於政治正確的風頭浪尖，「正統」與政治正確自然聯繫了起來，「改革宗」（教條化的加爾文主義）之名不正是比長老教會這班「改革宗教派」更正宗嗎，所以對抗長老教會的神學教育之意味極濃。

我們不要忘記，趙天恩主張的神學教育是「去宗派的」，正好迎合了當時臺灣另一群透過護教反共而激起對立立場的教界人士的興趣，我們也知道，一間神學院的成立不可能沒有「神學立場」；或者，「去宗派」的真正用意是將留下來

20 趙享恩，〈趙中輝牧師生平事略〉，收入改革宗出版社編輯部《傳到地極—紀念趙中輝牧師》，臺北：改革宗出版社，2011，13-14。趙享恩曾在中原大學（時為中原理工學院）教書，他的太太是在同一個學校認識的。

21 我們從趙天恩的結婚證書上赫然見到一位在護教反共時期遊走於官方和教會兩界的重要人士，這位人士名叫「康峻璧」，是趙天恩的「證婚人」，原來他們同是遼寧人，恐怕也不會只是這一層的關係而已。



的空白，交給了「改革宗翻譯社」有了發揮思想之餘地，將基要派神學作為替臺灣補上反對普世教協神學留下的空白處，建造並滋養一個正在開始卻沒有神學的神學院，為基要派的神學立場找到了棲息地。<sup>22</sup>這也就是趙天恩所言的「中國式的教會」、「中國人的本色教會」等真正的意涵，華神即為此實踐之。

趙氏父子可真是心手所連，他們同樣就讀過韋斯敏斯德神學院，兩人都自認為是基要派泰斗范泰爾 (Cornelius Van Til) 的弟子；父親個性沉穩，藏身於背後譯書做出版提供思想素材，兒子活潑激烈，直接涉事於主導基要派神學教育的走向。趙中輝批判「中國本色神學」，認為它們根本是講不通的，所以本色神學實無必要；但是，趙天恩則力倡本色化神學教育，與其父親的主張並無差異，重點即在於一切的目標是要打擊新派神學。

趙中輝把打擊新派神學當作他的信仰事業來對待，因為很早他就留意到：

近代神學界的思潮不可忽視，否則，教會中的知識分子容易被誤引了去，在神學上有根底的信徒不致被異教之風飄來飄去。<sup>23</sup>

- 
- 22 華神創立之初的董事會之董事單位（以筆劃為序）及其代表：中國佈道會（譚約瑟）、中國信徒佈道會（姚國祥）、中華海外宣道協會（盛禮約）、地方教會（吳勇）、行道會（魏保羅）使者協會、拿撒勒人會（何思德）、校園福音團契（張明哲）、海外基督使團（許公遂）、浸信宣道會（明雅各）、循理會（范彼得）、貴格會（包立漢）、臺灣聖教會（王思恩）、遠東宣教會（何梅德）、學園傳道會（臺雅各）、歸主協會（謝福格）、環球佈道會（司美玉）、靈惠堂（許書楚）。董事（以筆劃為序）：毛克禮、連易宗、寇世遠、薛玉光、謝明山、戴伯福、韓偉。董事會職員：吳勇（主席）、張明哲（副主席）。由於董事會中主要都是一些「機構代表」，「超宗派」之意本身即是帶有去／再政治化的色彩，這意味著其神學底蘊是相當膚淺的（去政治化），本質上，由於主要是機構代表為主，與教會沒有太直接的關係，因此華神的功能主義和實用主義之傾向也就特別明顯（再政治化）。吳勇作為華神的董事長，正說明了華神的去宗派立場並不意味著去神學，他們的去宗派做法即是為基要派的神學找到了立足點；換言之，這個神學院也不真是要什麼樣的神學「教育」，而是「功能」編組擴大教會政治的資本。據說吳勇後來對於華神的「教育」走向表示失望，所以另起「基督門徒訓練中心」，此一中心基本的班底大多畢業於華神。
- 23 趙中輝，〈漫談「中國本色的基督教神學」〉（1963），收入改革宗出版社編輯部《傳到地極——紀念趙中輝牧師》，175。



老牧師一再地強調，基督教與其他文化或思想沒有任何可以溝通的地方，如他說的：

用本地文化來改造基督教，從前已經有人嘗試過了，但結果終歸失敗。  
希圖基督教中國化是人的想法，不是神的救法。<sup>24</sup>

趙中輝受到於中國傳教的傳教士包義森 (Samuel E. Boyle) 影響極深，包義森是他們的恩人，魏司道 (J. G. Vos) 和伯特納 (Loraine Boettner) 則是他的神學思想之哺育者。趙氏父子有這麼優異的英文功底以及基要派的思想傾向，都與包義森有關，尤其是在日本及在美國的良好英語教育環境，趙氏父子受到的思想哺育都比較快。趙中輝曾翻譯過美國基要派頭子梅欽的著作如《基督教與新神學》，以及針對中國情勢有關的兩本反共著作：《馬克思呢？還是耶穌基督？》、《共產主義對基督教會的試探》等，這些書對當時臺灣的政治情況，當然就特別有意義。<sup>25</sup>

趙中輝一生甘於寂寞，隱身於背後，以「改革宗翻譯社」之名，除了共主編出版180期的《信仰與生活》外，他默默地翻譯出版了85本書，22本護教小冊子，倡導教條化的「加爾文主義」哺育臺灣基要派的成長。

臺灣基要派的養成受趙中輝的翻譯影響至深，其思想態勢即是標榜自己與韋斯敏斯德立場一致，與韋斯敏斯德立場不容者均扣以「新派」之名，此帽子一旦扣上，難在教會圈子裡生存。但是，基於護教為前提，趙的譯作經常為護教之由衝過了頭，甚至違反譯者的倫理，為打擊他口中的新派，甚至可以「不負責任」地加油添醋，以為正統之名就可以任意妄為，只要能把「新派」打倒，就是正當的。我們可以一本譯作為例。

24 趙中輝，〈中國教會的可悲現象〉(1969)，收入《傳到地極—紀念趙中輝牧師》，163，173。

25 趙中輝，〈神奇妙的帶領〉，收入改革宗出版社編輯部《傳到地極—紀念趙中輝牧師》，臺北：改革宗出版社，2011，22-24。



1984年改革宗翻譯社出版趙中輝譯作伯克富(Louis Berkhof)的*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Doctrines*(1937)，中譯本名作《基督教教義史》，之後2000在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簡體字版，2008年再版臺北版次。<sup>26</sup>該書頁4首次出現施來爾馬赫和黎秋之名字，趙中輝在他們的名字出現前頭掛上「新派神學家」的稱號，中文與英文參照：

趙譯：由於新派神學家施來爾馬赫與黎秋等的影響，一種極端不同的對於教理起源的看法又產生了，而且逐漸地為許多抗羅宗派所接納。(頁4)

原書：Under the influence of Schleiermacher, Ritschl, Vinet, and others, a radically different conception of the origin of dogmas was developed, which found ready acceptance in many Protestant circles.

趙譯：……包耳的著作中就是用黑格爾的三步辯證法，因為如此，他的教理史，有許多地方是一種出於人的思考而來的觀念。(頁17)

原書：For a long time, however, it was a purely speculative idea of development, as embodied in the familiar Hegelian triad, that was superimposed on this study. This appears most clearly in the work of Baur. (P.31)

上述這兩段文字都是很致命的。「新派神學」之用語加在這些人身上，終身都洗脫不了罪名，基要派向來偏見又自以為是，加上他們總是打扮成「正統」之徒，更難察覺到在一些知識傳遞上所動的手腳。例如，趙中輝譯文無中生有的說這類神學是：「有許多地方是一種出於人的思考而來的觀念」，仔細想想，基要派盡都做這類「出於人的思考」的事，只要為正統之名，自己可以犯錯。基要派啊，你們實在「人性啊，太人性了」，以正統之名是可以不顧其翻譯倫理的。

26 伯克富，《基督教教義史》，臺北：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1984版，之後於2008年再版修訂。另外，中國大陸版見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最可怕的翻譯是將 Gnosticism 譯作「神哲主義」（頁 28 以降，頁 45 以下）。這樣我們就可以明白，何以在基要派的圈子裡，「哲學」一詞永遠都難洗脫其異端之嫌，說一個人是唸哲學的並不是恭維的話，相反的，那是一種「定罪」，教會就得要提防這類讀哲學的人，他們是危險的「異端」。難怪在老一派的教會領袖如此地排斥哲學，這不是什麼「反智主義」，在我看來，它更多是一種「瞞騙」之後果。伯克富原著中的 Protestant（中文多作抗議宗、更正教，或基督新教）則多處譯作「改革宗」（英文應作 Reformed），此舉若說是趙「誤譯」，實為是對他的外語能力的侮辱，我們寧可相信他是基於護教，理所當然的將一切有利於他正統性的，都收編作己用，這些例子非常的多。<sup>27</sup>

臺灣基督教界都還來不及認真理解所謂「新派」或「自由派」的主張時，「改革宗翻譯社」就宣佈它們有多毒或多邪，一切的思想來源都先經過這個翻譯社的審查，然後告訴讀者新派或自由派是如何地「異端錯謬」或「離經叛道」。經過了趙中輝和宋華忠的全面清算，標榜正統或純正，自然形成了一種有利的教會政治資本，用以打擊不同思想立場的對手也當然就變得義正詞嚴。<sup>28</sup>「改革宗翻譯社」成了美國韋斯敏斯德神學



▲趙中輝發行之《信仰與生活》雜誌。（作者翻攝）

27 其實，趙中輝恐怕連 Reform Church 和 Reformation 都沒有弄清楚，「改革宗」和宗教改革是不一樣的，他怎會將「改革宗翻譯社」的英文譯作 Reformation Translation Fellowship，這就使人更不明白他到底標榜「正統」究竟是什麼。同時趙中輝的「弟子」李春旺（東海大學前校牧，現為東海教會主任牧師），參加過他翻譯團契，近日被人揭發其多年來的講章都是「翻譯」美國一位牧師的講章，完全沒有交待，連講章中的舉例也都一樣，他竟然振振有詞的認為翻譯也算創作，所以版權是屬於自己的，沒有抄襲問題，結果教會也可以「容忍」他，只因為他是「正統」。不知道這類打作「正統」胡作非為之事到底還有多少，難道「正統」就可以亂來嗎？「正統」之名就這樣被這些傢伙敗光了。

28 趙中輝還培養了一批「想增進英文能力」的學生參與其翻譯工作，包括了王成勉、李春旺、



院在臺灣非長老宗教會、甚至普世華人教會中最忠實的代理人兼宣傳部。<sup>29</sup>

趙中輝一生的翻譯事業，其內容主要是以攻擊新派或自由派神學為旨，其神學出發點因受到經歷逃離大陸及部份宣教士的影響，仍然是以反共作為護教的目標與手段。趙中輝一生都隱身於出版或翻譯之工作中，沒有參與過那些護教反共的活動，保持了基要派某種令人尊敬的純潔性，但是他發行了近四十年的《信仰與生活》，從1953年至1991年，影響力不容低估，無疑的，這份刊物和相關書籍的出版，為基要派提供了大量的神學知識，當然也提供了不少扭曲自由派神學的錯誤信息與偏見，給臺灣的分離主義打造了堅實的堡壘。就這一點而言，他算得上是「憑本事」來推行基要派神學的，不像那些只有「黨」和「主義」的黨國基督徒，後者沒有什麼神學能力，也沒有讀過幾本神學書籍，卻對神學或聖經高談闊論、自以為是、「官大就屬靈」，成立類似「某某基督教研究所」或「某某神學院」並招生授課，搞起維護聖經無誤之大會活動等，這些黨國基督徒所做的，對教會和基督教信仰均造成隱性的傷害。

總之，在基要派那裡，很多惡劣的行為是可以被原諒的，誤譯又如何，偷渡又何妨，更惡劣的即是以重視生命之由來掩飾自己的學術可以降低標準，反過來即是控告任何認真從事學術的人都不及他，因為「生命」高於一切。尤其那些自認為捍衛正統或護教的黨國基督徒，他們也常標榜懂得神學，大概他們的「神學ABC」，不是從成文秀那裡學來的，就是從改革宗翻譯社的作品那裡來的。

---

謝娜敏等。

29 趙中輝最大的成就，即是供養了唐崇榮各種「基要派」（他稱之作「歸正」）的神學知識，尤其是在不須要認真讀過任何他所批評的新派或自由派的著作之下，主要是憑改革宗翻譯社的出版品和《信仰與生活》中的文章借題發揮，以為就此可以成為維護正統信仰者。唐崇榮具有計志文的口才與魅力，但神學知識卻是趙中輝提供給他的，他對趙的推崇和敬意，是很難表現於對另外一位前輩的身上的，包括計志文在內。目前，不少中國大陸家庭教會主張他們的神學路子是改革宗神學，流傳一本《中國改革宗教會工人手冊》（中華歸正團契出版，2011），除了改革宗信條和神學主張，還特別附上了對趙氏父子的介紹。



## 「聖經無誤」

基要主義最重要的本質即是分離主義，他們往往以最為簡便的方式即是訴諸於聖經為最高權威，藉此標榜自己可以立於不敗之地，其目的即是駁斥、打擊和他不同立場的人。

的確，神學歧見使教會無法合一，我們看看華神當時的戴紹曾院長是怎麼說的，他說了一句充滿矛盾又是高度政治現實的話：「教會合一是近幾年來比任何其他原因造成更多教會不合一的問題」。<sup>30</sup> 這是1971年戴紹曾在拒絕出席與天主教有關的「邁向合一研習會」後所發表的看法：

在歷史上教會將經文看為命題性的神對人的啟示，因此它本身是完整、客觀、無謬而具有權威的。然而，今天有人拒絕這種看法……除非對啟示的性質能達成一致的意見，基督徒沒辦法談同一的基督，而任何那一種所謂合一是不實在的。<sup>31</sup>

到華神之前，戴紹曾擔任聖光神學院院長一職十年之久，在未做滿第三屆就轉到臺北來，按理他本身也是具有宗派背景的，究竟是何種原因使這位夾著內地會創始人孫子光芒的外國人會另立神學院搞起去宗派的中國本色化式神學教育？至今尚未見有人嘗試去理解這個問題。在同一篇文章，他亦批評了教會組織上的合一：

神對世界的目的，乃使福音傳遍天下。為達成這目的，我們必須合一……但這指組織上的合一嗎？我想不然。五十年來的經驗告訴我們，不同的教會一旦合併，幾無例外的，合併後教會在人數上的增長的比例都降低了。組織上的統一還沒被證實為解決教會成長有效的解答。<sup>32</sup>

30 戴紹曾，〈教會合一的真義〉，載於《華神通訊》（1971年11月10日），2。

31 戴紹曾，〈教會合一的真義〉，2。

32 戴紹曾，〈教會合一的真義〉，2。



有趣的是，戴紹曾在稍後發表的文章中，卻在回憶當初華神籌備所面對的困難時，發出了這樣的感慨：「教會各福音派真的不能聯合嗎？」<sup>33</sup> 可見，他認為教會合一的前提是福音派對「聖經無誤」的一致觀點，而所謂合一的宗旨是為了「傳福音」。按照他的立場，就只有他所認定的「福音派」教會之間有聯合的必要性，除此之外，別無合一的可能。與此同時，他又否定了組織上的合一，其理由是認為這些都無助於教會的人數增長，所以真正的問題在於與「人數增長」有關，而且認為這兩者是有關的。

1970年中華福音神學院成立之初，基本的信條按理業已確定，但卻又在很短的時間內修改第一條和第五條信條之條文，《華神通訊》的創刊號就刊出此一消息，內容的焦點即是關於「聖經」之立場的表態上。<sup>34</sup>

原本的信條內容是這樣的：

第一條：「相信新舊約聖經是神的話，完全是神所默示的，亦是神賜給人的特殊啟示，是絕對可靠且是信仰與行為最高權威的準則」。

第五條：「相信人是照神的形像而造，因始祖墮落，故生而有罪，需要救主始克與神和好」。

董事會於1970年10月5日通過修正信條之提案，並經全體與會董事一致簽章認可。經修正通過的條文則為：

第一條：「我們相信新舊約聖經是神的道，完全出於神的默示，毫無錯誤，絕對可靠，是信仰與生活的最高準則。」

第五條：「我們相信人都是照神的形像造的，在亞當裡墮落成為罪人，都

33 戴紹曾，〈誠懇的剖白——向中國教會〉，載於《華神通訊》（1971年12月10日），3。

34 《華神通訊》的創刊號，1970/11/2。



需要神的救恩。」



▲護教反共時期的出版物：阮大年、林治平為本書寫序。（作者收藏）

上述列出的文句，底下劃線為本人所加。我們不確定此一突然修正信條的動作背後是否受到趙天恩的影響，但至少可以看得出來，這種修改的動作與當時的情勢有關（反對合一運動：從迫使長老教會退出普世教協，到反對與天主教聯合祈禱會）。因此可以更加確定的是，這段文字的修改背後是極具針對性的，即是要與「自由派」神學院別苗頭，中華福音神學院從一開始至今，始終把自己定位為是「聖經無誤論的維護者」。這是它原初的使命，其基要派的傾向昭然若揭。<sup>35</sup>

## ■ 聖經無誤的「（專制）政治」

基要派主張「聖經無誤論」實為一種姿態，主要將之作為攻擊那些主張「合一運動」相關的組織和議題，前提就在於如果無法在「聖經無誤論」上取得共識，其他一切免談。回顧當時，有什麼組織正積極推動教會合一運動呢？主要即是天主教（梵二會議）和普世教協兩大陣營。華神在這方面的態度基本上是表示反對

35 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後期的主要活動，漸漸地轉到了承擔起維護「聖經無誤」的功能和宣傳，1984年的「中華民國基督教聖經無錯誤會議」即是一例。2013年，華神教授聯合出版一本「溫故而未知新」的著作《聖經真的沒有錯嗎？：聖經底本無誤論的再思》，與1994年趙君影主編的《聖經無錯誤文集》共同的現象是，他們主要都是由一些「神學家」而非「聖經學者」挺身而出為聖經辯護，另一個共同的現象是，他們還真的不太用功，書讀得太少太少了。



和不妥協的。事實上，這兩者在自 1964 年出版並廣泛流傳的《真道手冊》中，早已被定義作離經叛道者，普世教協被指責是在「新派」神學思想影響下的「大背道」，天主教則是「大淫婦」（啟示錄十七章），兩者都屬於「異端」。<sup>36</sup>

因此我們不難明白，普世教協在當時被塑造的形象在信仰上即是「新派」、在政治上「親共」，故基督教若要信仰「純正」並政治「正確」，就非得與普世教協「不共戴天」不可，不然其宣教的内容就是「背離正統」的謬論。中華福音神學院的「神學走向」，與其創立時的政治氛圍，有種無法言喻的緊密關係。

趙君影在華神的一場演講中，回顧他十數年所從事的留美中國學生的福音工作，認為「大陸變色的這段期間」，「教會……的注意力仍未至留學生身上。以致共匪利用機會在美國藉辦夏令營的名義，做了許多對共匪宣傳上有利的勾當」，「1966 年以後，毛澤東的匪偽政權，下令關閉所有的禮拜堂和聚會場所。」<sup>37</sup>無疑的，這一再的政治提醒，其旨要臺灣教會將共產黨的政權視同盜賊，而且是逼迫教會的大敵：

中共偽政權成立於 1949 年 10 月 1 日。其偽憲章——甚至到今天——保證人民的宗教自由。但在實際上，除了無神論與馬克思的唯物論之外，人民不准有其他任何形態的宗教信仰……在赤色偽王朝統治之下的中國教會……遭受巨大的打擊……講壇不再是真道的出口，而成為共產主義的宣傳臺……文化大革命時期……具有破壞狂的紅衛兵採取野蠻的行動……牧師和公開的基督徒都被禽獸一樣的紅衛兵所迫害、羞辱，甚至殺害。<sup>38</sup>

從文章的強烈措辭可看出，當時的臺灣基督教深陷於徹底「反共」的政治意識形

36 按華神的「神學立場」看來，新派／自由派都屬異端，這比王明道形容作「不信派」更嚴重得多了，因此普世教協也就不例外，也是被當作「異端」來看待，見蔡麗貞，《主流與非主流——從教會歷史看臺灣教會現象》，臺北：基文社，1998，105-106。

37 〈趙君影牧師談美國留學生福音工作〉，《華神通訊》摘記演講，載於《華神通訊》（1971 年 3 月 4 日），2。

38 〈舉目看田〉，載於《華神通訊》（1974 年 7 月 5 日），5。



態中：中共令人髮指的惡行，教會應同仇敵愾。同見於《華神通訊》中，Chandu Ray 在談到傳福音的種種挑戰時，說道：「在亞洲方面，所發生的共同問題和彼此相關的問題是什麼呢？在印尼蘇卡諾當權時，共產黨徒曾猖獗一時，但神一下子就推翻了這個政體……」<sup>39</sup>

在當時的臺灣基督教眼中，惡貫滿盈的「共匪」與受人民愛戴的「基督徒」總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從《華神通訊》對蔣介石奉曆日的報導，我們可一窺基督徒們對他的尊崇：

來自臺北市各教會的兩千五百多位弟兄姐妹……恭送故總統……並唱詩對現場數萬同胞作見證……散發十三萬份單張……市民都爭先恐後索閱，至少有數位當天決志歸主。人心已預備好，等待工人們努力收割……本院全體同學與八百多位年輕弟兄姐妹在懷寧街浸信會情詞迫切地為國家禱告，並預練幾首蔣公愛唱的詩歌。<sup>40</sup>

這二千人的聯合詩班，由神學生張茂松帶領華神師生，結合了藝術團契的林治平，分頭邀請各教會詩班參加，可謂場面盛大。<sup>41</sup> 蔣介石的奉曆大典，竟然成為了教會傳福音、作見證的時刻，箇中聯繫，委實耐人尋味。

華神與長老會或「新派」神學的敵我分明，又與對蔣政權的擁護有著什麼樣的微妙關係呢？至少我們不能否認，華神與護教反共時期的基督教在政治立場上，其與黨國基督徒的反共神學思想和意識形態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他們從來都未懷疑過與黨國政治走得如此近有什麼問題。從 1965 年醞釀到 1970 年正式成立，華神在此反普世教協和基要派的分離主義氛圍中，骨子裡早已烙上了護教反共的政治使命，它成了在長老教會的兩間神學院之外的另一個選擇，而且是靠向

39 Chandu Ray, 〈恢復福音的真面目〉, 《華神通訊》摘記演講, 載於《華神通訊》(1971年12月10日), 2。

40 〈總統蔣公奉曆日, 二千人詩班作見證〉, 載於《華神通訊》(1975年5月5日), 1。

41 《福音報》第755期, 1975/5/11。



「正統」的選擇。

1973年，趙天恩曾在美國召集了滕近輝（中神院長）、王永信、戴紹曾（華神院長）、林道亮、張子華與馬鴻昌等人，嘗試將中華福音神學院和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合併起來，兩方的代表人士共同發表了一份〈合併之決議〉（Resolutions for China Evangelical Seminary and China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 Merger），結果，據說臺北的吳勇反對而最終此案胎死腹中。<sup>42</sup>這也許是一次的挫敗，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來，也許是一件好事，問題就在於「對誰而言？」。

1991年4月10日出版的《新使者雜誌》第三期，刊出了駱維仁一篇名為「耶穌有罪性嗎？」的文章，主要綜述他在翻譯現代聖經中文譯本時碰到一些困難與問題，這篇文章中最關鍵的一段即是解釋譯本針對羅馬書八章三節的翻譯。這篇文章引來了一場批鬥大會，尤以中華福音神學院系統的代表（黃子嘉、王長淦）對於該中文譯本的強烈不滿，終於在1991年11月14日下午，由聖經公會出面召開面對面的交流會，該會的出席者有：賴俊明、蔡仁理、駱維仁、周聯華、翁修恭、紀元芳、梁重



▲作者收藏。

42 這個事件近期被張曉風再次提及。吳勇阻止了中神與華神合併之事，張曉風把此事說成是她向吳勇所做的提議，張對她在當年可以擋下之事感到得意，以為是吳勇聽了她的勸。換言之，張認為華神可以保下來：「自家的地，自家的作物，自家的小孩」，沒有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併吞去，反過來嘲諷：「港方當年力主大兼併的那幾位準博士，後來絕大多數並沒有投身在華神教育中」。參見張曉風，〈謝謝你當年肯聽我這小豆子一寫給吳勇長老〉，刊於《基督教與華人文化社會研究中心通訊》第七期（2016），15。



光、夏忠堅、林意玲、李長安、王長淦、陳端傑、黃子嘉、王正中。交流會中，其中一位華神董事及國語禮拜堂代表王長淦長老的發言有幾段的言詞極為激烈，以下摘錄了部份：<sup>43</sup>

……同樣一個版本，你修了三次，我不知將來會不會再修，這本聖經我怎麼能夠信賴它？……

……因為你是叛道，因為你把這段聖經改了。……

……我想懂原文，不是你駱先生一個人懂原文，其他的不懂原文。我們這些草包被你唬過了，但是懂原文的，不會被你唬的。……

……我今天稱你駱先生，不能稱你弟兄。我今天稱你是哲學博士，我不能承認是神學博士。……

……聖經公會如果改變了，如果變質了，重組聖經公會！我想與我同樣感覺的人還是有。……還有一個感想，聖經公會權也太大了，幾個人可以掌握這一切，要改就改，要修就修，要換就換……痛心！痛心！……

……你（指周聯華牧師）跟他（指駱博士）走一路。

值得注意的是，最後一段話是指著周聯華說的：你跟他走一路。事實上，了解事實的人應該知道，不是只有最後一段話才是指著周聯華說的，事實上，所有斥罵駱維仁的話都是在斥罵周聯華，現代中文譯本和周聯華的關係最為密切。<sup>44</sup>

43 這是張德麟根據錄音帶整理的，見〈駱博士與新使者雜誌〉，收入《聖經、詮釋、實況——駱維仁博士榮退紀念文集》，臺北：永望文化出版事業，2001，450-454。

44 反對「重譯中文聖經」同樣是護教反共時期的一個重大的事件。1964年針對聖經公會主張重譯中文聖經這件事引起了巨大的反對風浪，同樣又是被扣以「新派」或「不信派」等罪名，甚至還說天主教正偷偷摸摸地以共譯聖經之方式來清滅基督教，居心叵測。中國平信徒傳道會和其下的《福音報》（第201期起）大肆批駁，視這些動作都是「別有用心」、「向魔鬼讓步」，各教派紛紛打著護教的旗號，用最強烈的口吻反對。



中華福音神學院的成立，極有可能是針對或反擊 1965 年百年大會教會合一運動的產物，當然，它以一種離間主義的方式成功地集結了基要派的力量，也是地方教會抵制宗派教會的成果，站到長老教會神學院的對立面，從此，在這些人眼中，長老教會神學院成了與之對立的新派神學院，華神肩負著抵消長老教會影響力的任務。

1973 年，中華福音神學院曾舉辦了一次別開生面的「神學有獎徵文比賽」，主題是「現代基督教神學之源流與發展趨勢」。<sup>45</sup> 令人好奇的是，這真的是徵文「比賽」嗎？現代神學不是新派神學嗎？究竟要比什麼？是要比誰能指出哪些神學是離經叛道嗎？……，基要派搞徵文比賽，還真是有趣啊。

---

45 《臺灣教會公報》第 1096 期，1973/2/18。



## 5.3 黨國化的基督教大學

### ■ 身兼東海大學和中原大學的董事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段複雜的歷史中，基督教界中某些關係緊張的相關人士，經常會同時出現在一些共同的組織或場合。事實上，基督教的圈子很小，各種重大的組織和活動，出現同樣一群人的機率非常地高，但是如果因為在神學或政治立場上存在著矛盾，這就有許多的故事可說的了。

其中，最特別的就是東海大學，領導著護教反共的張靜愚，<sup>1</sup>與他所反對並屬於普世教協一方的長老教會人士黃彰輝、黃武東、彌迪理等同在董事會的名單之中，其中也包括比較親近長老教會陣營的周聯華，這些人在反共的意識形態如火如荼地進行之際，正好形成了兩個陣營：黨國基督徒（無教派背景）vs. 自由派基督徒（具普世教協背景）。這樣的董事會，勢必擦出了一些火花來。

1949年後，基督教大學全面從中國撤退，在海外成立了一個由共同的基金所組成的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簡稱「聯董會」），其中，這個董事會又與普世教協是有關係的。根據黃彰輝和黃武東的說法，成立東海大學的案子主要



▲東海大學校徽。（截取自網路）

1 關於張靜愚的生平簡歷可參見：《民國人物小傳》第八冊，275-278；《中國國民黨九千將領》，412；任新舫，〈張靜愚先生行誼概觀〉，《山東文獻》十二卷四期（1987年3月），139-141；卓文義編撰《空軍軍官學校沿革史》，空軍軍官學校，1989年5月；《民國人物大辭典》，973-974等。



是由長老教會向國外有關方面提出來的，因為只有長老教會有普世教協的會員身份，所以由他們提出來是比較可行的，也因為這樣，相關的方面還曾提議將已有的臺南神學院併入東海大學的整體結構的規劃之中。<sup>2</sup>

《黃武東回憶錄》中詳細的述說了東海大學的由來，主要是由第二屆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通過決議，向聯董會提出申請。黃武東是與美方接觸的關鍵人士，1953年5月，他拿著總會的決議文到紐約做報告，表明長老教會全力協助促成於臺灣建設一所基督教大學之努力：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有絕大的關心與歡迎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所計劃將建設大學於臺灣之事，同時總會願表示絕大的協力來幫忙到這個目的達成。（第七十八條）

所以，東海大學的共同創辦人（Co-Founder）是聯董會和長老教會總會。<sup>3</sup>

1953年，基督教大學籌備委員會成立，在籌備過程中，協調由三組人馬組成：外國人士（聯董會代表）、教會人士（主要是長老教會為代表）、官方人士（以具有基督徒背景的黨政代表），其中，又以前任教育部次長杭立武為籌備組的主任。<sup>4</sup>這樣的安排恐怕與民國以來「收回教育權」的結果有關，畢竟這是一個具有「外國勢力」的教育機構，當然更與當時的政治和外交氛圍有關。雖然途中確實有些阻力，甚至可能胎死腹中，最後是請到了宋美齡來說情才獲准。<sup>5</sup>

在東海大學的歷任董事會名單上，上述兩派的關鍵人物擔任董事的時間分別為：<sup>6</sup>

2 《臺灣人的先覺—黃彰輝》，307。

3 《黃武東回憶錄》，216-218，221。

4 黃彰輝指出第三方面的董事人事，與國民黨的政治和外交考慮有關，張靜愚肯定是代表國民黨多過於代表基督徒，因為基督教的代表主要是長老會背景的人員，參見《臺灣人的先覺—黃彰輝》，306-307。

5 這也許可以說明何以東海大學的校地有一部份歸屬於中華婦女祈禱會之原因。

6 東海大學校史編纂委員會，《東海大學校史—民國44年至69年》，臺中：東海大學出版



張靜愚 1953-1967 (1957-1959 擔任董事長，1959 始擔任中原大學董事長)

黃彰輝 1953-1965 (成立東海大學籌備委員之一)

黃武東 1953-1957 (成立東海大學籌備委員之一)

周聯華 1958-1977 (1960-1961, 1970-1971 擔任董事長)

彌迪理 1953-1955 (Harry Daniel Beeby)<sup>7</sup>

林宗義 1955-1956, 1958-1963, 1965

宋泉盛 1966-1970 (接替黃彰輝)

黃彰輝、黃武東、彌迪理、林宗義和宋泉盛都是長老教會代表，屬於普世教協這一邊，周聯華也可以算作是靠向普世教協，但肯定不屬於黨國基督徒代表。其他代表有曾寶蓀、高天成、蔡一諤、蔡培火、張靜愚等，除了高天成任職臺大醫學院屬於學界背景，具有長老教會背景，其他的都是官派色彩極重的基督徒。<sup>8</sup>

其中，張靜愚的角色最為特別，因為他同時也是中原大學的董事（中原創立晚於東海一年），又是護教反共的帶頭人，所以在這種結構中形成了一個最為突

---

社，1981，505-508。另一個例子是：臺北市基督教青年會 (YMCA) 成立在 1945 年 10 月 10 日，從日據時代走過來，參與該組織的教會人士主要都是長老教會背景的，如創立發起人有李延旭、李超然、李順天、李達莊、李雅各、吳詠華、吳清鑑、林茂生、林合引、杜聰明、洪明輝、陳泗治、陳溪圳、張鴻圖、張崑遠、張逢昌、廖述演、潘文羅、鄭進丁、鄭蒼國、顏春和、藍蔭鼎等人。1949 年後，從大陸到臺灣的基督徒，慢慢地以不同的方式加入並參與了臺灣基督教青年會，從 1959 年始有盧祺沃、梅可望、張靜愚、韓時俊等加入，截至 1966 年成立的全國基督教青年會總會，擔任理事長的徐柏園是當時擔任中央銀行的總裁，執行委員會雷法章主任委員（總統府國策顧問）、公共關係委員會盧祺沃主任委員（佩帶聖經會亞洲幹事）、財務委員會吳幼林主任委員（中央信託局副局長）、活動委員會王則甫主任委員（貝民公司總經理）。總幹事：雷法章、副總幹事：張建邦、顧問幹事：美籍幹事麥克思 (Mr. Keith Meyers) 為顧問幹事等。從 1945 年到 1966 年，青年會從長老教會背景的人士到黨國基督徒的參與和主導，又一明顯的事例足以說明其中隱密的黨國系統如何成功地接手了這一個同樣與普世教協相關的組織，以防犯其落入長老教會的手中。可參見臺北市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歷年董事會名單之變化，鍾啟安，《臺北市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四十年史》，臺北：臺北市中華基督教青年會，1985，388 及以下。

7 彌迪理參與過 1970 年〈國是聲明〉的起草，他於 1972 年 3 月被國民黨政府驅逐出境。

8 蔡培火和高天成屬於北部長老教會，蔡培火與國民黨的關係非常的緊密。高天成於 1965 年逝世，倖免於捲入從該年起的護教反共之動員。



出的角色，因為事實上他並不具備任何基督教教派或組織相關的身份，從來他就是以一位忠誠的黨員及官員的身份出現在歷史舞臺上的，1965年之後，張靜愚更是在護教反共的立場上與黃彰輝等人形成對立的關係，因此張靜愚同時具有中原董事的身份又被安排在東海大學的董事會名單之中，其中的政治意義也就格外地顯著。

正是張靜愚擔任董事之際，兩年後即參與創立中原大學之事宜（時作「私立中原理工學院」，1980年升格作「中原大學」），同時毫不避嫌地身兼兩校的董事，還在東海當了兩年的董事長，因1959年中原也聘之作董事長，才退下董事長一職，但仍在董事會的名單之中，一直到1967年。1967年的東海大學董事會結構，長老教會的代表基本上已全面地撤退，宋泉盛是接替黃彰輝的，他也做到1970年，這一年長老教會退出了普世教協。1970年後，黨國基督徒已全面掌握了東海的董事會，這一年正是周聯華二度擔任董事長之際，之後我們留意到的是，查良鑑和梅可望的時代。

事實上，東海大學成立真正的推手是黃彰輝、黃武東、彌迪理，他們出力極多，所以長老教會可謂居功厥偉。<sup>9</sup>絕大部份具有長老教會背景的代表都止步於1965年，黃武東最早離開，高天成1965年逝世，黃彰輝和林宗義也只做到1965年。黃彰輝、黃武東和張靜愚在東海大學開始籌備之初就已名列於委員會之中，黃彰輝和張靜愚在董事會裡共事長達十二年之久，這兩個人正是護教反共時期站在對立面頭號人士，周聯華於1958年在張靜愚任董事長時才加入。

張靜愚於1957-1959年擔任東海董事長，他之所以卸下董事長一職，理由是他於1955年成立後，自1959年起擔任中原董事長。這兩校均標榜為「基督教大學」，但從東海的董事會名單結構可以看到「黨國基督徒」與「自由派基督徒」的政治（護教反共）分野，但在中原大學的情況則是清一色的「黨國基督徒」，再加上幾位天真的外國傳教士。

9 《黃武東回憶錄》，221。張瑞雄，《臺灣人的先覺—黃彰輝》，306-307。



## 第一任校長之爭



◀陳錫恩照片。(取自福建師範大學協和學院網頁)

東海大學的籌設，一開始就顯得極其地不平靜，其中充斥著一些意識形態的角力，主要就是與反共的問題有關。關於東海大學的黨國化，就出現在對於誰是第一任校長之爭的問題上，給了政府更多介入的機會。

根據聯董會的代表陳錫恩向聯董會提交的報告，特別指出籌辦東海大學的困難主要是來自於國民黨的政治監控。陳錫恩在籌組董事會、任命訓導長和校長時，建議以基督徒為首要考慮的條件，以保持該校基督教信仰的獨特性，免受政治影響。他還提出東海大學將會是一所反映獨特基督教和教育理念的大學，以通才教育為其辦學主張，著重實踐而非功利的目標，強調高學術水平，並指明自美國的辦學資金不是無限的，因而必須謹慎地運用。<sup>10</sup> 陳錫恩不但總結了建校的原則，也提出東海大學的發展方向。在《東海大學校史》也肯定了他對建校的貢獻：

陳錫恩博士上述工作的總結與未來建校原則的提示，決定了東海日後的發展方向。

可是，在陳錫恩妻子鍾文惠所著的《陳錫恩傳》裡，卻提及了一件敏感的事，談到關於東海大學創校校長一職的人事聘任案時，竟牽涉到當時的反共政治意識

10 Mary E. Ferguson, "Report on Tunghai University by Dr. Theodore H. E. Chen," in "Minutes of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Board of Trustees, September 17, 1954" in Board of Trustees, 1945-1956, Box 90, Folder 2248, UBCHEs Series III. 轉引自彭淑敏，〈臺灣基督教高等教育的創辦—以東海大學為個案〉，收入於東海大學主辦《典範的建構—東海校史暨人物傳記書寫論文集》，2014年3月28日，11。



形態。根據鍾文惠憶述，陳錫恩一直表示不會出任校長，可是仍被反對者以「反共不徹底」為由加以攻擊，然而聯董會沒有特別理會此事，繼續邀請陳氏出任創校校長。

鍾文惠指出「反共不徹底」實為一場不小的風波，主要就是有人想阻擋陳錫恩當校長，當然關鍵即在於此人對這個位子也感興趣。<sup>11</sup>

錫恩到臺後，一直表示他不要做校長。在臺灣，東海校長是個好職務，要做的人還不少，人家不相信錫恩是真的不做。董事中一人極表示要做校長，據我們看他是一個能幹的人，錫恩也支持他。三次選他做校長，他都堅辭。

那時欲做東海校長的人卻編造了個罪狀，加到錫恩頭上，說他「反共不徹底」，拿出錫恩寫的文章為證，從教育部向校董事會施加壓力。<sup>12</sup>

鍾文惠沒有指名道姓，但暗指此人後來擔任泰國大使。我們很容易可以比對出來，此人即是當時東海大學籌備處官派的召集人杭立武。

杭立武在轉任籌辦東海大學的工作前，其身份為「亞洲人民反共聯盟中華民國總會秘書長」。在《杭立武先生訪問記錄》，杭立武談到東海大學的成立，說得極其表面，就某個意義而言，這個回憶錄更多的突出杭立武是如何作為一位堅定的「反共份子」（擔任亞洲反共聯盟的秘書長一職）而被接受的。無疑的，他參與了東海大學的籌設工作，正是黨國基督徒一方的主要代表人物，而非僅僅因為他是教育部長為由，對比於陳錫恩妻子鍾文惠所著的《陳錫恩傳》，可以更了解東海大學的籌備過程如何充斥著來自黨國系統的權力與意識形態的介入。<sup>13</sup>

11 鍾文惠，《陳錫恩傳》，臺北：出版者不詳，1992，81。

12 鍾文惠，《陳錫恩傳》，81。

13 《杭立武先生訪問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另參見張振義撰，杭立武修訂，〈東海大學創校經過〉，33《傳記文學》第36卷第6期；李爾康，〈「東海大學創校經過」補遺〉，《傳記文學》第37卷第1期（1980），41。杭立武把東海大學的成立全都說成是他的功勞，見〈回顧與前瞻〉，收入《杭立武先生紀念集》，臺北：杭立武



經查證，鍾文惠所言確是屬實。確實有份一頁的打字報告寄交給了蔣介石，報告的內容即是指控陳錫恩在外國發表的文章中，稱對岸作「新中國」、沒有稱呼蔣為「總統」，還直呼毛澤東為「毛主席」等等，認為陳不僅因為具有雙重國籍不適合當校長，最主要是懷疑他的忠誠度，「反共不徹底」當然不宜當校長。然而，問題即在此，此份報告是隨著曾約農給蔣介石寫信附在信件內的，曾約農的信是親筆信，用的是東海大學的信紙和信封，內文談及要在東海大學內開設神學系並邀請蔣主持神學講座，那份一頁的打字稿是以隨信的方式附於後一併寄給蔣介石的。我們從檔案上沒有看到日期部份標明哪一年，且按理，若曾約農使用的是東海大學的信紙，且來信主要是邀請蔣來到東海主持講座，這些事應該是發生在東海成立之後，然而，正如鍾文惠所指控的事實是存在的，但時間和信件的附件形式，留下了難解之疑。<sup>14</sup> 當然我們知道，後來出任第一任東海大學校長的，就是董事會成員之一的曾寶蓀的胞弟曾約農。<sup>15</sup>

然而，東海大學的成立，一開始就是黨國基督徒與長老教會背景的基督徒之間的角力，加上「反共不徹底」之指控形成了校長位子之爭，當然也同樣可以作為「反共不徹底」的理由加諸在具有普世教協會員身份的長老教會代表上。

## ■ 大學裡的黨國基督徒小圈子

至於中原大學，它是美國傳教士賈嘉美 (James R. Graham) 於 1955 年所創立，

---

先生治喪委員會，1992，211。

14 國史館檔案，「總統副總統文物」，典藏號 002-080111-00003-010，卷名「學校教育與文化事業（三）」。

15 曾寶蓀是近代中國基督徒教育家，留英學人，其後影響曾約農接受基督信仰，二人備受蔣介石和宋美齡所推崇，在臺灣學術和文化界聲望甚高。回國後與曾約農創辦長沙藝芳女校，同為終身未婚，畢生從事教育事工。曾寶蓀：《曾寶蓀回憶錄》，臺北：龍文 1989，172-173。



當時亦是標榜以基督教作為其立校之精神，甚至還標榜它是中國唯一一所基督教大學。問題是，如果東海大學即是一所基督教大學，何以中原大學又要以基督教大學作為其成立的理由呢？<sup>16</sup> 之間是否存在著互別苗頭的意味，或者中原大學成立的目的就是要抵消東海這所具有外國勢力（WCC 會員長老會、基督教大學聯董會）的基督教大學的影響力，大概也只有那些人士才知道其中的原委。

關於中原大學的籌辦與創校過程，1963 年畢業紀念冊上清楚說明如下：

民國四十四年初美籍牧師賈嘉美 (Rev James R.Graham) 先生倡議於臺灣創設基督教大學邀集我國熱心教育之基督教友，鈕永建、張靜愚、瞿荊洲、郭克悌、吳從先、方子衛諸先生規畫籌度，縣市政府聞訊欣喜，爭相提供基地，以得本院敷設為榮，而中壢士紳吳鴻森、徐崇德諸先生競取尤力，遽割中壢鎮公所代管十三甲，益購私產七甲，復舉公所舊業之崇樓一棟為贈，資以賈嘉美牧師在美所募款項，於是度地發土，糾匠庀才，營治經時，乃訖其工，本院即於是年五月籌備成立，署曰：「私立中原理工學院」越



▲中原大學初始為中原理工學院。  
(作者翻攝自中原大學畢業紀念冊)

16 賈嘉美 (James R. Graham, 1898-1982) 與蔣介石的互動相當良好，1952 年他在美成立一個名為自由中國基督教大學協會 (Free China Christian College Association)，這個組織與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或就是對抗的關係。賈嘉美在臺協助設立中原理工學院 (即後作中原大學) 和基督書院主要的經費來源都與前者有關，我們甚至懷疑他同樣也是對亞聯董抱持不信任的態度的，因為亞聯董與普世教協是有關係的。見《中國心·宣教情—賈嘉美的一生》，臺北：美國基督教效力會基督書院出版，2001。在護教反共的立場上，賈嘉美曾撰寫過一本名為《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的基本衝突》的書 (譯者為陶希聖和黎世芬，1965)，是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的重要資料，賈雖然離開了中原另立書院，但在護教反共的立場和行動上，卻是與張靜愚站在一起，看不出他們之間曾在中原的校務問題上存在過一些人事上的芥蒂。



四閱年，教育部令准立案，招生開學，時為四十四年十月十五日，亦即本院院慶之日也。

董事會的結構從初期到後來之變化可以分作三方人士：

黨國基督徒：鈕永建<sup>17</sup>、張靜愚、郭克悌<sup>18</sup>、郭紫峻<sup>19</sup>、吳永華<sup>20</sup>、吳從先<sup>21</sup>、呂耀謙、黃啟得、陶海亭<sup>22</sup>、黎世芬<sup>23</sup>、白培英<sup>24</sup>

地方士紳：吳鴻森<sup>25</sup>、徐從德<sup>26</sup>、吳鴻麟<sup>27</sup>

- 
- 17 1870-1965，曾任南京臨時政府參謀次長、江蘇省政府主席、考試院副院長等。我們留意到鈕永建這位名副其實的黨國基督徒，曾在中原大學成立過程中發揮過影響力，他被冠以「創辦人之一」及「榮譽董事長」之名。
- 18 曾擔任中原理工學院第一任院長，一年後就辭去。曾擔任行政院光復大陸委員會委員。
- 19 1907-1986，共黨研究專家。原為CC份子，由陳果夫、陳立夫二人親自提拔起來的，曾出任陝西省國民黨黨委部書記長，兼中統特務組織在陝西的最高領導人，1938年至1941年擔任陝西省中統局專員，著有《容共問題之回顧與展望》（陝西：奮鬥出版社，1940），來臺後一直擔任立法委員，屬地方教會背景。
- 20 1955-1981，臺灣長老會牧師。
- 21 基督徒聚會處長老。
- 22 1976年加入，於張靜愚逝世後接任董事長（1985-1999）。關於陶海亭，我們對他了解非常有限，但重要的是，正是陶短暫接任董事長之時，前董事長的兒子（張光正）不久就接任校長，這種交捧的過程格外引人遐想，接著，張光正就擔任了九年的校長，十年之後，歷經兩任校長（熊慎幹，程萬里）兩屆都沒有做滿，張光正又回來了，外界把中原大學譏作「姓張的」，可謂其來有自。
- 23 1970-1982間擔任董事，1982年移居美國。
- 24 1983年加入董事會，2000年始擔任董事長，曾擔任財政部長，屬於國語禮拜堂系統之長老。
- 25 臺灣桃園人，地方客家士紳，生於1897年。畢業於臺北醫專，後行醫，抗日戰爭中被聘為第四屆國民參政會參議員。1948年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先後擔任臺灣省參議會參議員（1955-1985）、臺灣省政府委員、臺灣省改善環境督導團團長、臺灣土地銀行監察人、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桃園汽車客運有限公司董事長、彰化銀行常務監察人等。還曾任新竹茶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新竹縣醫師公會理事長、錦綸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中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臺灣第一商業銀行常務董事等職。1969年、1976年、1981年、1988年連續被聘為中國國民黨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屆中央評議委員。曾多次參加國民大會會議。
- 26 曾任第一屆及第二屆桃園縣縣長（1951-1957）。
- 27 1899出生，著名的桃園地方客家士紳，曾任第二屆桃園縣議會會長（1953-1955），第四屆桃園縣縣長（1960-1964），其子即是國民黨大老級人物吳伯雄，吳伯雄夫人仍擔任中原大學董



外籍傳教士：賈嘉美 (Rev James R. Graham)、賈培理 (John. T. Chappell)  
 柯理培 (Rev. C. L. Chappell)、孫雅各 (Rev James Dickson)  
 丁曉亮 (Dr. A. Donald)、莫爾 (Mr. I. A. Moore)  
 戴紹曾<sup>28</sup>、柯希能<sup>29</sup>

從董事會名單上看來，黨國基督徒的色彩是清晰的。結構上，一方面是與黨國關係緊密的基督徒和地方士紳，另一方面是在臺的外國傳教士。中原大學在創校初期的幾年間，第一任 (賈培理 John. T. Chappell)<sup>30</sup> 和第二任 (任福根, L. A. Lovegran)<sup>31</sup> 教務主任為外籍人士，這樣的安排可能意味著建校之初與國外教會確實存在著一種合作 (經費支持) 的關係，賈嘉美仍保有一定的主導性，關於這個問題可以另詳究之。<sup>32</sup>

---

事至今。

- 28 1972-1981 間擔任董事，戴紹曾在這期間是中華福音神學院院長，張靜愚也在這時被邀擔任該院董事，事實上，戴在聖光神學院當院長時，張也做過該院的董事，彼此的私交相當的深，張對戴德生的推崇是相當積極的。
- 29 原籍烏克蘭人，後逃到加拿大並入了該國國籍，之後因為傳教的關係來到臺灣。本名 N. Krushnisky (中譯作「克魯辛斯基」) 的他，一直是張靜愚最為忠實的支持者，包括擔任中國文化大學基督教研究所教授，以及中原大學董事一職，都深獲張的提拔與信賴，他曾擔任過世聯會副理事長一職，1982 加入董事會至今。令人感到好奇的是，他曾是世聯會第一屆大會白俄羅斯的代表，其中到了烏干達傳教，所從事的竟是宣傳國民黨的工作，有時他亦以加拿大籍為代表，但其本身又是靈恩派背景的牧師，這些變化多端的角色，不得不令人對這位「克魯辛斯基」感到好奇。其教會背景屬於靈恩派，從早期的喜信會到以琳，其對臺灣泛靈恩運動的影響相當深遠。
- 30 1890-1982，「賈培理」實為「查培理」，參與中原大學的創校，與賈嘉美關係密切，第一任教務長，1956 年隻身於中壢另創立聖德基督學院。同位於中壢市，聖德與中原有許多在淵源上的關係。
- 31 他是北美浸信宣道會於 1947 年派到西昌城傳教的牧師，據說是美國戰略情報局情報員。1950 年被中共捕獲，1956 年獲釋返美，1957 年來了臺灣，1958 年起接替查培理擔任教務長一職。
- 32 一間快六十年的大學，至今仍寫不出一本「中原大學校史」的著述，對這所曾自喻為專於中國基督教大學史研究的大學，無疑是一件令人覺得不可思議之處，尤其是被外界認為從事中國教會史研究的林治平，我們僅能發現任新舫編的《私立中原理工學院成立十年概況》，不過這本書是寫於成立十週年的一本小冊子，其中究竟是否存在著難以書寫的困難，更增添一些遐想的空間。另王成勉的〈臺灣基督教大學教育的檢討〉一文，只有幾行文字提及董事會的組成結構，見收入於《基督教與臺灣》，臺北：宇宙光出版社，1996，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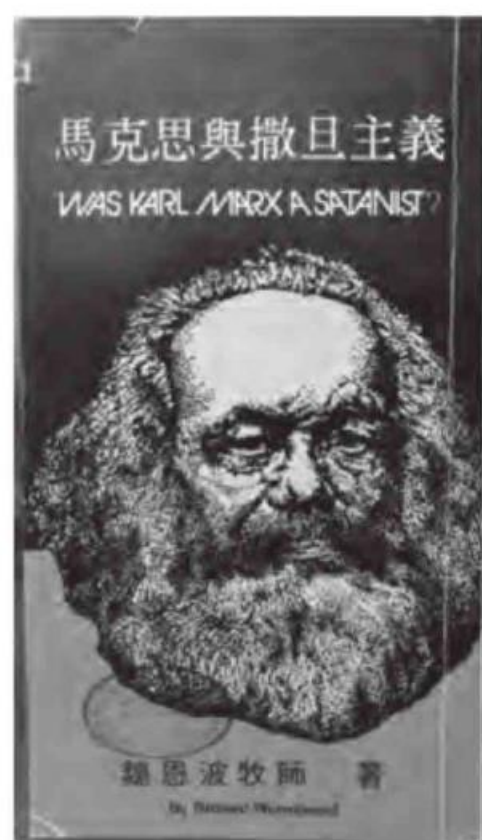


中原大學歷任董事，要不是張靜愚的基督徒友好圈子，就是具備了黨政背景的，經常這兩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張靜愚中風之後的董事會結構，更多像是他的後輩或家臣，張的勢力決定了中原大學的人事，當然，董事會一切的人事也都在他安排之下。著名的韓偉院長，即是張的摯友韓時俊的兒子，韓時俊亦是護教反共聯合會的主要成員之一，也曾是國際基甸會的會長，與張的經歷相當雷同，但韓時俊投入比較多的時間在信友堂。<sup>33</sup>

東海大學董事會的名單中，除了張靜愚，就沒有任何重疊之處，中原大學的校董名單，在賈嘉美走後，全部的決定權就在張靜愚個人身上。儘管張已離世多年，至今在校董名單上仍可看得見張的影響力，白培英、柯希能、史錫恩、邵遵瀾等，都算作是張生前關係密切的基督徒友人。<sup>34</sup>

我們也留意到，周聯華是當時基督教在學術地位上，還算得上有些名氣的人士，他曾擔任東海大學的董事，還差一點成了該校的校長，可是他從來沒有在中原大學的校董名單上，儘管 1962-64 年間曾短暫擔任兩年共同科的老師，教授宗教哲學一課。作為大家熟悉的基督教代表周聯華牧師，何以和中原大學只有短短兩年的互動機會呢？與他的「自由派」色彩和「可疑的政治身份」肯定是有關係的。<sup>35</sup>

當然，中原大學歷任校長與黨政的良好關係也是不爭的事實，他們卸任後都



▲護教反共時期的出版物：阮大年、林治平為本書寫序。（作者收藏）

33 韓時俊，1921年5月出生，江蘇江都縣人，東吳大學高級中學英語研究班。上海聖約翰大學醫學院秘書，民生實業銀行經理，中華民國全國射擊委員會，參與護教反共的組織和活動。信友堂和宇宙光傳播中心均設有以韓偉命名的紀念館。

34 參見張於身後友好的追思文可見一般，《一束思念—張靜愚先生追思紀念集》，1987。

35 周聯華曾經透露，他人生中幾次與職位失之交臂，都與基督教界裡被人認為是「自由派」或「新派」有關，見《我的一生》，臺北：臺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0，109-122。



到了中央政府行政單位任職，謝明山、阮大年在離開中原大學後就去當了教育部政務次長，<sup>36</sup> 這兩位校長前後亦到了東海大學擔任校長一職，尹士豪卸任後去了行政院青輔會任主任委員、監察院委員。<sup>37</sup> 張光正沒有擔任過政府公職，但在校期間極力拉攏曾任公職的人士到校擔任各種形式的職務，其黨政關係為坐享其父所經營的，包括明新科技大學和實踐大學都有這些黨國大老的淵源在內。<sup>38</sup>

## ■ 誰是創辦人？

中原大學創校之初的兩位關鍵人物張靜愚與賈嘉美，他們之間可能存在著些一些外界無法了解的矛盾。賈嘉美儘管一直是以創辦人的身份以及董事會成員之一保持與中原的關係，他的憤而離開另創基督書院，應該不僅僅是外籍人士無法擔任院長職位，或無法實現其教育目標這類表面的問題。賈嘉美另立基督書院，肯定有些



▲贈予賈嘉美的紀念品「中原之父」。  
(作者攝於基督書院校史室)

- 36 謝明山，南海路基督徒聚會處，1956-1969 任中原大學校長，1968 年轉任東海大學工學院院長，1971 年到教育部，1972-1978 回東海大學擔任校長，1978 年移居美國，1990 年逝世；阮大年，1975-1981 接掌中原大學校長（前任韓偉，1971-1975 任校長，後轉任陽明醫學院），1984 年到了教育部，1992-1995 到東海大學擔任校長，亦擔任過國民黨中委會委員。
- 37 尹士豪，1982-1991 任中原大學校長；熊慎幹，2000-2006 任中原大學校長，尹任職青輔會時，熊是尹的主任秘書。
- 38 曾九年擔任中原大學校長一職，據說，2000 年總統大選後若連戰勝選，傳張可能被邀入閣，步入如之前謝明山、阮大年的仕途。張曾競選香港浸會大學校長不果，也曾被明新科技大學控告洩露工程底價事案，2012 年又回到中原大學，先以代理校長身份接任辭職的程萬里，2013 年則正式重掌校長，因為董事會多為其父的家臣，張完全掌握董事會的權力是可想而知的，尤其刻意打造其父為創辦人，背後究竟是存在著什麼的構想，我們不難猜到。據說一切都得聽命於張，熊慎幹和程萬里均沒有做滿兩任就提早下臺都與他有關。



不愉快的事，關於此事，相關人士的說法都是避重就輕。<sup>39</sup> 賈嘉美對於他在中原大學的不愉快，似乎也是隻字不提，這與賈的性格不符，更令人產生好奇。

張靜愚與賈嘉美的交往，可以追溯到 1940 年由尹任先在重慶籌組聖光學校的合作事宜上。之前，尹在任河南財政廳長時，張即是擔任建設廳長；時在重慶，尹受命擔任財政部公債司司長，張則當國民黨政府的稅務署長。<sup>40</sup> 尹籌建聖光學校獲得賈嘉美的協助，張靜愚同時也被邀請作該校的董事長。<sup>41</sup> 尹與張兩人私交甚篤，尹沒有離開大陸，聖光學校之後遷至蘇州，之後在中共政權底下，其命運也就不言而喻了。

後來到了臺灣，張靜愚籌辦中原理工學院，不管是做法和理想，與尹當年所做的有許多相似之處，可見張受尹的影響非常的大，因為尹所創辦的聖光學校，也是邀請了不少黨國基督徒擔任該校的董事。<sup>42</sup>

近期，關於「誰才是中原大學的創辦人」起了爭議，事因中原大學的校史室突然改作「創辦人張靜愚紀念室」，到底過去所有關於中原大學創辦人是賈嘉美之說法，是對的還是錯的呢？這個問題的起源，當然與張靜愚的兒子張光正重掌校務所做的改變有關，自 2013 年開始就突然有了突出「創辦人」這樣的宣傳手法。

賈嘉美與張靜愚之間的關係，在中原大學的創校之初確實存在著許多的矛盾，兩人從開始合作到最後，彼此的關係可以用「不歡而散」來形容。賈嘉美於

39 阮若荷，《中國心，宣教情—賈嘉美的一生》，臺北：基督書院出版，127-128。

40 劉峙，《我的回憶》，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臺北：1982，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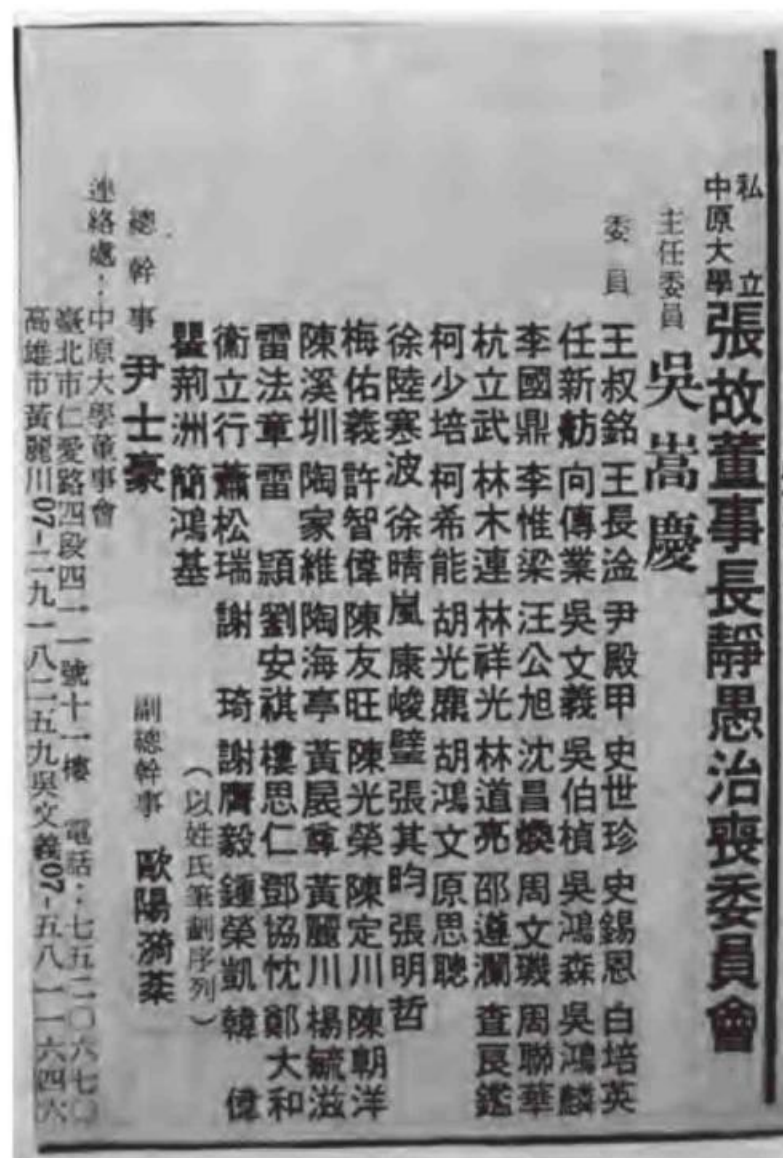
41 尹任先，《聖光指引—尹任先蒙恩三十年的見證》，香港：天道書樓，1998，35-39。尹任先的太太是著名佈道家丁立美的女兒，與內地會和黨政要員的關係也是相當深的。關於尹任先與賈嘉美、張靜愚、戴紹曾、趙君影之交往事蹟，可參見于力工著，《西方宣教運動與中國教會之興起》，臺北：橄欖出版社，2006，280-285，以及《夜盡天明》，臺北：橄欖出版社，2012，204-213，224-231。

42 1964 年，尹逝世，第二年張靜愚與邵遵瀾（聖光學校第一屆學生）在臺北為他們夫婦辦了一場「尹故校長任先暨夫人追思感恩會」。邵遵瀾於 1985 年後亦加入中原大學董事會名單中。



1982年逝世，張於1984年離世，從基督書院主編出版的《賈牧師嘉美博士紀念集》一書可以看出端倪，內文未見有任何一篇來自具中原大學背景或代表的紀念文，沒有中原大學的相關人士出席其追思禮拜，更重要的是，賈嘉美在中原大學擔任創辦人和董事長一職多年，全書沒有收錄任何與中原大學有關的照片。更令人稱奇的是，賈個人的自述文（〈賈嘉美自述〉），以未完成遺稿的形式刊出來，內容竟然就停在：「事實上，在本文中提及，我最後創辦了兩所學院，……」，留下了不少想像的空間。<sup>43</sup>

為了將「創辦人」身份轉移，近期發出了一些對賈嘉美的攻擊，刻意模糊焦點、轉移視聽。一篇題為〈張靜愚日記中有關中原大學創校史料的探討〉的研討會論文，其目的是想臭化賈嘉美，作者李宜涯藉此文有意地將「創辦人」之名偷渡到張靜愚的名下。按一般基督教界的保守做法，教內的醜聞往往是掩蓋起來的，而且又是一所教育單位，重提這些陳年往事並不是真的要做什麼校史研究之類的計劃。我們仔細閱讀該文，並就其所引述的資料看來，主要是在談論中原大學創校時的艱辛，特別是聚焦在董事長賈嘉美和第一任院長郭克悌的矛盾來展開。但是，不管從那些未曾公



▲中原大學「董事長」張靜愚訃文。  
(作者翻攝)

43 據傳聞，賈嘉美曾指控他人為「匪諜」，引起不少的騷動，可能從此賈的聲譽就受損，姿態也放低了，最後還將中原大學拱手讓人。這似乎很像是賈一貫的行事風格，畢竟他是一名與蔣介石關係極為良好的外國人士，退到基督書院不再過問中原事務可能與此風波有關，但賈幾乎未提及過這一段往事，或者他的緘默是帶些無奈吧。也許賈真的是想當院長，這樣才能讓他施展長才，只是迫於現實法規而失之交臂，與郭克悌的矛盾肯定也與此事有關。



開的日記與校務會議記錄之史料，或是對這些資料的解釋，只能說賈嘉美人格有問題，或者讚揚張靜愚如何從中扮演一位援救此人事鬥爭困局的關鍵人物，並為中原未來的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但是與張靜愚是創辦人此事完全無關。<sup>44</sup>

我們並不否認張靜愚的貢獻，而且，從上述文章的所謂史料之使用，也間接的看出來，面對賈嘉美與郭克悌的矛盾，張本人也是無可奈何的，因為此事，他曾表示心灰意冷。這表示夾在他們兩人之間，張並沒有一個絕對的高度來化解彼此的僵局，而且，從他曾考慮求去就可以知道箇中的無奈。雖然張在化解僵局方面還是做出了貢獻，只能說賈在 1959 年後退出到基督書院擔任院長，並交給了張去主持中原這所學校以及由他來安排院長人事一職，張算是成功的守住中原的發展。儘管如此，賈嘉美「創辦人」的事實從來就沒有在張靜愚在任董事長一職二十六年之久中予以否認過，歷屆的畢業紀念冊上，賈嘉美仍被冠以「創辦人」的尊稱，董事會的名單上一直都保留著他的名字。作為這個學校的「創辦人」事實，與喜不喜歡賈嘉美或他幹過什麼不太名譽的事，顯然沒有必然的關係，正如父親殺人偷竊，也只能說羞於公開承認他，但說他不是父親而另有其人，絕對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

標榜著基督教精神的中原大學，向來做事風格都是隱惡揚善，為何要特別公開這一段，顯然不會是純粹為了學術研究或撰寫校史為意圖。理由很明顯，為了將張靜愚打造成「創辦人」的身份，刻意將這一段過去甚久，也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權力鬥爭，甚至張靜愚與賈嘉美之後也不再提及的事，如今將之重新搬到檯面，確實是與張靜愚的兒子重掌校務有關，張光正將其父親公開定調為「創辦人」之舉動，有冒了公然造假之嫌。

44 李宜涯，〈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張靜愚日記中有關中原大學創校史料的探討〉，收入王成勉主編《臺灣教會史料論集》，264-289。作為一篇歷史論述的文章，作者把一句詩詞來要讀者「動之以情」實無必要，或許，這也是一篇報恩之作。況且，張靜愚的日記中都是詳述是他「陪同」賈嘉美拜會相關的人士，既然是「陪同」，誰是主、誰是客，其意還不夠明確嗎？難道此舉有別的意圖嗎？



我們從各種資料以及作者自己引用的資料都可以清楚地看出，張靜愚自始至終仍尊賈嘉美為創辦人，即便 1959 年後賈嘉美另外成立了基督書院，但他們兩人仍在不少的公開團體中並肩合作，1965 年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的組成即是一例，再加上多年的畢業紀念冊的校史以及董事會名單上，張靜愚同樣是尊賈嘉美為「創辦人」，而他自己則一直是以「董事長」為名。換言之，張靜愚在中原創校之初的艱辛確實做了不少貢獻，但並沒有因此就可以輕易地否定賈嘉美是「創辦人」的事實，近日的種種解釋和扭曲已對張靜愚本人構成了嚴重名義上的污蔑，其子及相關的學者之舉，實為不智之行為，形同於陷老董事長於不義，令外界更感困惑。

無論如何評價賈嘉美，或者不同意他的行事為人或風格，但他對中原大學的貢獻恐怕不能就此抹殺。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原創建之初，明顯獲得來自賈嘉美個人在經費籌措上的支持，他在美國設立「自由中國基督教大學協會」（簡稱「效力會」）作為基礎，他能一直掛以「創辦人」之名義絕非意外，張的經援來自他，基本上是無異議的；另外則是初期幾任的教務長任用也與賈有關，可見，賈的地位不容懷疑。<sup>45</sup>

早期數屆畢業紀念冊上除了把鈕永建尊稱作「榮譽創辦人」，賈嘉美的照片底下一直都是冠以「創辦人」之名，至少我們可以承認，張靜愚與賈嘉美的關係雖然有不愉快，但在他生前也並未自立作「創辦人」，即便賈到了基督書院，中原的教職員和學生都相當懷念他，還特別自製了感念獎座，以「中原之父」稱許賈嘉美，這類的讚譽說得出來且刻在獎座上，在當事人還在的時候，能任意或隨便嗎？

從現有中原大學的董事會名單，以及早期所有曾到中原大學任教的基督教人士，都與張靜愚形成一種微妙的「小圈子」關係。這些人後來都是中原大學董事

---

45 參見李靜怡〈基督書院創辦人賈嘉美博士小傳〉，收入《賈牧師嘉美博士紀念集》，基督書院出版，出版時間不詳，33-36。另見董顯光，《基督教在臺灣的發展》，臺北：出版社不詳，1970，130。



會裡的主要成員，他的兒子當了九年的校長又回來當校長，僅僅是為了自證其正當性，或是有其原因，外人也許可以看出一點端倪。總之，張靜愚不過是擔任「董事長」在位最長的一位，其子恐怕也是擔任校長最久的一位（還不包含其上回校長卸任後隱身於董事會的顧問名單之中的時間），歷史翻案或糾正歷史的錯誤是應該的，但要說張靜愚是「創辦人」，恐怕確實很難說服人，也許張靜愚一生的人格還是受人愛戴和尊敬的，卻亦可能就毀於「創辦人」之名下，有此必要嗎？<sup>46</sup>

---

46 從來，不管是各種文獻上的記載，或是自創校以來畢業紀念冊上所述，美籍傳教士賈嘉美才是中原大學真正的創辦人，張靜愚充其量不過是董事會的成員中最努力的一位，因為除了前兩屆，他一直擔任董事長一職到逝世，算是「永遠的董事長」。中原大學標榜為一所基督教大學，而今成了「張家」的大學，基督徒辦學到此地步，已嚴重損害了此教之名，實為可悲啊。







內文所提及的「宣傳小冊」即是《教會合一性：正告主內兄弟姐妹們》，為了反駁外界對百年大會以及長老教會參與普世教協的不實指控。

由於中華民國政府積極關注百年大會的籌辦，特別針對即將召開的百年大會，外交部特別召開一個跨部會的「宗教聯繫輔導小組會議」，全面關注 1965 年從聯合記者會到百年大會的一舉一動。此一小組第三十九次會議（1965 年 5 月 5 日）中，提到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的召開，其旨是「轉移基督教在臺宣教百週年紀念大會可能發生之不良影響」，特別請警備總部成立的「天聲小組」報告監控百年大會發展之情形，會議的內容中特別提到了四大教派《教會合一性：正告主內兄弟姐妹們》中把「共匪」稱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指出他們違反了出版法。接著，第四十次會議中，還特別指明康峻壁作為基督教臺灣福音聯誼的總幹事，應積極辦好「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之各項工作。

同年 10 月 8 日，由張靜愚領導的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ACACA）正式成立，蔣介石特別發表了書面的開幕詞，也就正式宣佈對普世教協展開一系列的批判工作，黨國基督徒承擔了思想性和組織性地任務，經費方面則獲得了外交部和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五組的支助。<sup>2</sup>

被列入與普世教協相關的十六個基督教會團體受到偵監，包括了臺灣聖公會、衛理公會、加拿大長老會、美國歸正教會、美國浸信會、中華基督教女子青年會、臺灣基督教福利會、臺灣服務聯誼會、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美國聯合高等教育基金董事會、臺灣聖經公會、英國長老會、美國長老會、臺灣信義會、美國聯會長老會、德國婦女祈禱會，特定人士方面則是鎖定了黃彰輝、周聯華、金仲庵等人。周聯華身陷於與普世教協的關係中，加上與具有普世教協會員身份的長老教會交往甚密，臺灣省警務處成立「七二〇專案」，以獨立卷宗的方式羅列周的罪狀，成了情治單位的「政治黑名單」之首。

---

2 國史館檔案「亞洲基督教反共聯合會案」專案卷宗。編號 020000017841A。



奉總統指示「此協進會應設法取締」<sup>3</sup>，此指示應始自 1966 年。換言之，對於普世教協一案，蔣介石是介入的，把七二〇專案定位為「反滲透之國家安全工作」，並指示取締之。<sup>4</sup>從宗教聯繫輔導小組於 1966 年 12 月的會議中，由臺灣省警務處所提交的「取締普世教會協進會 (WCC) 在臺組織與活動之作業程序」<sup>5</sup>，到外交部情報司於 1969 年 12 月 31 日之報告中，舉證說明了普世教協有「媚匪事實」。<sup>6</sup>

事實上，警備總部早已盯上周聯華，懷疑他的種種行徑，並檢查他的郵件和竊聽他的電話，甚至還調查他過去曾在大陸做過什麼。根據 1964 年 6 月 19 日省警務處至警備總部文提及這些事：

……至於周聯華其人，本處有其涉嫌資料，在對普案處理的意見……經常以代表身分申請出境，赴國外各地參加普世教會協進會各種會議者，處列為核心份子偵監，並開始檢查其郵電。

渠曾表示，寧願脫離浸信會，而不願脫離普世教會協進會。

周在就讀滬江大學，……曾參加演出左傾作者巴金之《家》。

周聯華透過陳紀彝（蔣夫人之同學）之關係，而得以經常參加總統官邸凱歌堂之禮拜。對於此等 WCC 核心份子鑽營掩蔽之活動能力，頗為識者殷憂。<sup>7</sup>

情治單位把周的底細挖得非常地清楚，他在大學時期參加過的活動，包括表演話

3 國史館檔案，卷名「教會活動」，入藏號 02000017840A。

4 國史館檔案，卷名「教會活動」，入藏號 02000017907A。事實上，七二〇專案沒有因為 1970 年迫使長老教會退出普世教協就結案，這個專案接下來延伸到處理 1971 年的〈國是聲明〉之發表，當 1973 年長老會又萌起重新加入普世教協的念頭，使得政府對付長老會的手段越來激烈，直到美麗島事件引爆至最高點。

5 國史館檔案，卷名「宗教案件」，入藏號 02000017839A。

6 國史館檔案，卷名「教會活動」，入藏號 02000017840A。

7 「省警務處至警備總部文」，1964/6/19，見「普世教會協進會」專案卷宗。



劇劇本的「左傾」，以及他參加過反飢餓的活動，都推斷他與「共匪」有過接觸。<sup>8</sup> 他們羅列了周參加普世教協的活動記錄：1962年日內瓦普世教協總部演講、1963年3月出席由普世教協在東京召開的國際事務委員會、1963年7月於加拿大蒙特利爾舉行的「信仰與教制委員會」並於會中進行報告，甚至，周師母阮郇瑤女士出席於美國邁阿密的「第十一屆浸信會世界聯盟大會」，都有人跟監回報警備總部。<sup>9</sup>

普世教協由於被認為是「非法」組織，情治單位的報告中還提到蔣介石指示：「此協進會應設法取締」，特別我們發現了一張「總統府用箋」的小紙條，成文秀直指由於周聯華與「親共」、「容共」的普世教協有所往來，所以其身份和思想均可疑，因而周聯華等人在島內表面上是從事教會的活動，實質上是進行政治的活動，因此，周與黃彰輝、金仲庵等這班與普世教協有關係的人士一併被列為監控的對象，一個包括國民黨中央和政府警備跨部會系統組織起來，視周聯華為普世教協在臺的代表和首腦。

黨和政系統以「普世教會協進會專案」作討論，1964年7月20日於臺北市中正路1705號警務處貴賓室會議做了基本的定調：

對於普世教會國內核心份子之發掘——一面由警察機關就原有重點線索（如周聯華，黃彰輝，陳紀彝，金仲庵等）深入偵察，一面請警備總部，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及中五組協調偵查。<sup>10</sup>

百年大會過後，周聯華的國內外行動仍持續被監控。1966年6月周聯華赴美，

8 「七二〇專案第三次會議」，1966/10/6報告：司法行政部調查局指示，本案對周聯華之偵查，應蒐集其在大陸時之情況資料，以助瞭解。見「普世教會協進會」專案卷宗。

9 「七二〇專案」1965/7/14報告：第十一屆浸信會世界聯盟大會，於美國邁阿密舉行。中華民國有三人前往，一是王載，一是劉珍珠，另一人為周聯華之配偶名周阮郇瑤。見「普世教會協進會」專案卷宗。

10 普世教會協進會專案討論，1964/7/20，中正路1705號警務處貴賓室會議。見「普世教會協進會」專案卷宗。



臺灣省警務處致外交部信函中提及：

本省 WCC 首要份子周聯華已出境赴美。周某申請出境之理由，不論其如何冠冕堂皇，均屬謊言，渠實際上係前往美國參加 WCC 信仰與教制委員會之集會。

1963 年該委員會在加拿大蒙特利爾城集會時，周聯華曾發表統戰性質之演說，渠明白表示我對 WCC 一般的宗旨和它的立場是非常同情的。

周聯華為 WCC 遠東區負責人，渠此次赴美出席信仰與教制會議，除表面可供公開的掩飾活動外，必將另有一番秘密接觸。

查周聯華係 WCC 信仰與教制委員會之委員。此次申請出國赴美，似未提及將出席該 WCC 組織所召集之會議，具見其有存心矇蔽之意。<sup>11</sup>

周聯華曾四次與教界重要的位置失之交臂，都與他在政治上的敏感身份有關，他形容自己為「恆久的候選人」。<sup>12</sup> 外界都以為，貴為總統牧師，其在教界的地位應是一帆風順的，至少浸信會神學院院長一職應不成問題。原來董事會已經通過確定由周接任院長之職，卻忽然發生變卦，神學院內部有人醞釀起「倒周運動」，表面上是信仰的不正確，事實上，更關鍵的是政治不正確。老院長柯理培把周叫到辦公室，要他寫「信仰告白」，以解外界之惑，周不從，認為「信仰告白」只對上帝而非對人說的，柯退讓一步，好言相勸要周不要與長老教會、天主教往來，周回以：

你們可以決定我不當院長，但不能決定我與誰交朋友，況且，長老教會和

---

11 「七二〇專案周某赴美事」，1966/6/10，省警務處致外交部信函，見「普世教會協進會」專案卷宗。

12 周聯華，《我的一生》，臺北：臺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0，109-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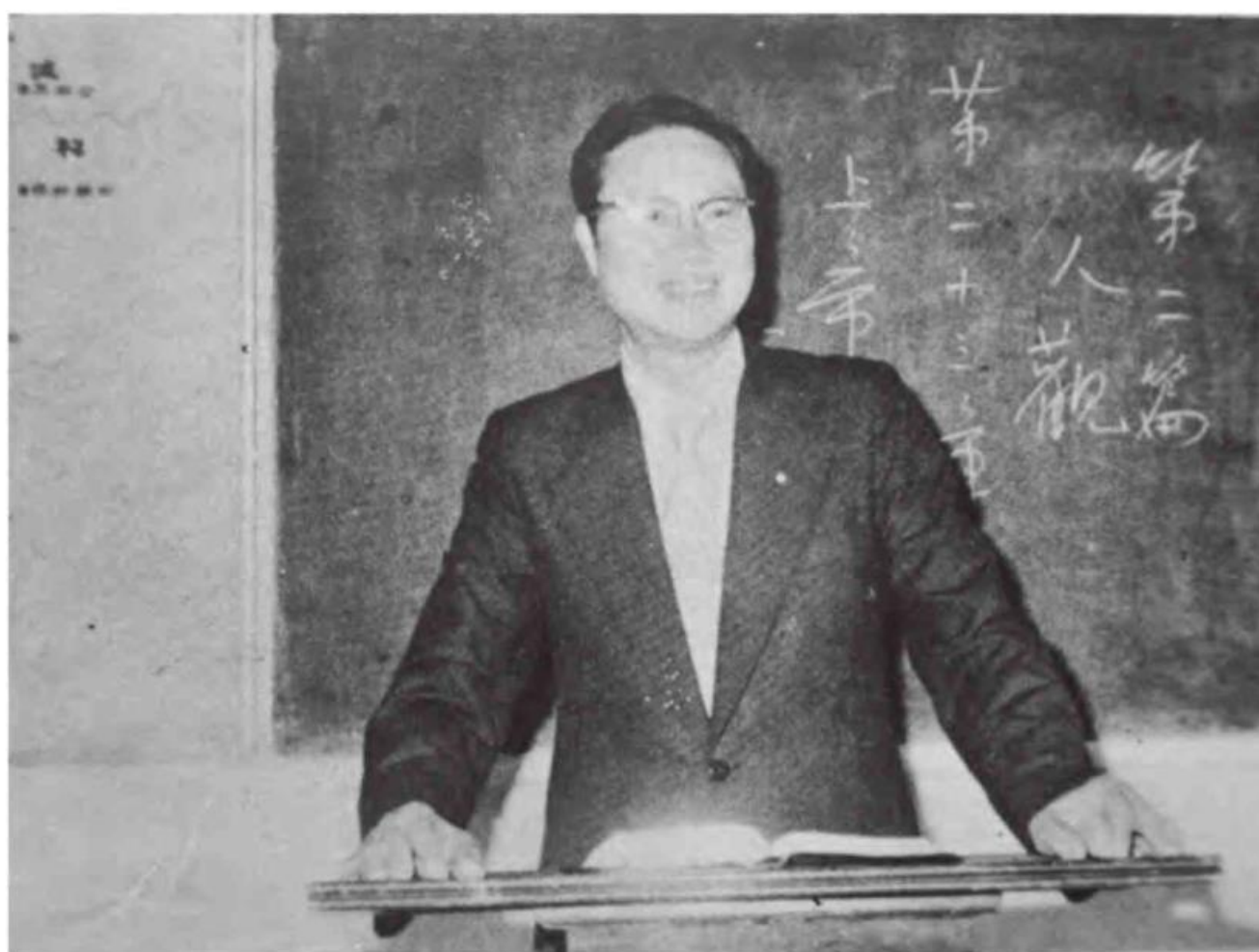


天主教都是我的弟兄弟姐妹。

說完這番話就氣沖沖地走出院長室，正好巧遇張光真的小女兒，這位小朋友一如往常見到周時那表現出童稚般的話說：

老朋友啊，給我講一個故事吧。

頓時，使他的怒氣全消。



▲周聯華牧師因與長老會、天主教來往甚密而被否絕了其已通過擔任浸信會神學院院長的職位。  
(作者翻攝自臺灣浸信會神學院年刊)

## ■ 與「大背道」為友、與「大淫婦」往來

因為與普世教協的關係，與「大背道」（長老教會）為友；因為從事聖經翻譯和主張合一，與「大淫婦」（天主教）往來甚切。這些都成了周聯華的罪名。籌備百年大會的工作得與黃彰輝和黃武東一起共事，對這兩位長老教會的精英分



子表示欣賞，甚至還為黃彰輝出境受到刁難一事挺身相助，私下找位階高的黨政要員說情，包括後來發生美麗島事件時，也曾努力勸說政府勿捉高俊明牧師。為了使百年大會得以順利舉行，周聯華還曾親筆寫信給當時的內政部次長（1965年3月25日信函），希望可以獲得理解，此次大會有外賓來訪，實為一次國民外交之好機會，請政府相關單位放心。

提到長老教會的政治參與和行動，周對他們的稱許多過於咎責。周聯華非常清楚長老教會何以走上政治反抗這條路，因為他本身即涉足其中，他這樣評價長老教會，形容他們作「先知和祭司的角色」：

他們真是像我對本文所下的題目，想扮演先知和祭司的角色。作為長老會型的教會，這種思考是絕對準確的。

為了本地人民的生存和安全，發出先知型的聲音。先知向來是不畏艱難和前途的。包括犧牲性命。他們看到同胞的苦難，願意一同受苦，除了為他們禱告以外，願意採取一些實際行動，以獲取若干「人的基本權利」，做祭司的根本行為。作為一個旁觀者，我認為這群弟兄姐妹就是那麼單純和天真。

無論美麗島開始之初，整個長老教會有多少參與，但是為了爭取人權的基本信念是千真萬確，他們認為這是長老會型的教會職責。至於在這大前提下，其他教會的批評，人們的中傷，甚至被政府的定罪，可以置之不顧。而以爭取人權為前提的態度是可敬可佩的。<sup>13</sup>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在以吳勇為首的國語禮拜堂和中華福音神學院為主的教派系統眼中，是離經叛道、政教關係混淆的「新派」，但周聯華卻以極其感性地口

---

13 周聯華，〈先知和祭司的角色—憶我弟兄和姊妹〉，收入《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與美麗島事件》，臺北：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1999，41-42。



吻稱他們是「濃於水來的『家人』」：

他們是我的弟兄姊妹，至少要有一個「外人」來向他們致敬，了解他們的立場。至於我是否完全同意他們的所作所為，這不是問題，你不必完全同意才發表意見。我再說，他們是我的弟兄姊妹，正像許多反對他們立場的人，也是我的弟兄姊妹。中國人以「血」濃於水來說明「家人」的團結，我的信念是「基督的血比一般的血更濃」。我以這態度來看所有主內的弟兄姊妹！<sup>14</sup>

據說，臺灣教會圈子曾長期被一些重量級的黨國基督徒所把持，存在著所謂的「五虎將」。這些黨國基督徒都自認為可以代表教會，幾乎任何教會的活動或組織，都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這「五虎將」分別是指吳嵩慶<sup>15</sup>、雷法章<sup>16</sup>、黎世

14 周聯華，〈先知和祭司的角色—憶我弟兄和姊妹〉，46。

15 浙江鎮海人，1902年生。上海浙江大學、法國巴黎大學畢業。曾任北伐軍總司令部秘書、航空委員會經理處長、軍需署糧秣司長、湖北省財政廳長、軍需署署長、財務署署長、聯勤總部副總司令等職。去臺後初從事軍中財務管理工作。1964年調任省營事業唐榮鐵工廠公司董事長，歷時12載。後創建中國鋼鐵貿易公司，拓展臺灣鋼品外銷市場。1991年病逝。據說吳即是負責「運黃金到臺灣」的人，見《黃金檔案》一書。

16 湖北漢川人。生於1902年10月8日，武昌文華大學畢業。1923年在天津南開中學任教職。1932年1月12日至1937年任青島教育局局長。1938年9月9日任山東省政府委員。1940年4月13日兼任山東省政府秘書長，1940年8月24日兼任民政廳廳長。1942年9月12日任農林部政務次長，並兼任該部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1945年1月19日任內政部常務次長。1946年5月7日任浙江省政府委員兼秘書長。1948年7月5日特任考試院秘書長。到臺灣後仍任考試院秘書長。1952年5月23日至1963年7月1日任銓敘部部長。1963年任總統府國策顧問、並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會委員。1967年至1973年任中華民國基督教青年會理事長。1980年前後兼任臺北市政訴原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1981年3月後被聘為中國國民黨第十二、十三屆中央評議委員。1988年8月28日逝世。



芬<sup>17</sup>、陳溪圳<sup>18</sup>、梅可望<sup>19</sup>。這些人處處表現為他們就是代表教會，周聯華對他們相當地不以為然，他毫不客氣地批評這些人

他們是披了教會外衣的其他機構。

在那個反共壓倒一切的意識形態掛帥的年代，絕大部份的教會被以「護教」之名加入了由張靜愚主持的基督教護教反共的會議組織，絕大部份黨國基督徒都以此自我標榜，以進一步取得了在教會界的領導地位。<sup>20</sup>周聯華提及自己在護教反共浪頭上的處境，大部份人都畏懼組織背後的勢力，因此也就不得不參加，但他只參加過一次，即1965年第一屆的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之後就不再參加了，他對這班人的作為和表現都表示反感，即便要面對別人扣以新派、與親

- 
- 17 宜春市南廟鄉中村人，1914年6月出生於萍鄉市南門石灰巷耶穌堂。因其父黎榮光1910年由袁州耶穌堂派去萍鄉開辦教會，從此全家定居萍鄉。1938年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新聞系、國防研究院第六期畢業，中國國民黨第十、十一屆中央委員。1939年，在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宣傳科工作。1945年，擔任《中央日報》總編輯、總經理等職。1948年，去臺灣創辦《中央日報》，1965年起擔任中央廣播電視公司總經理。1983年退休，去美國洛杉磯定居。1983年5月16日在洛杉磯病逝，終年六十九歲。
- 18 生於臺灣基隆市基督教家庭。1910年入淡水牛津學堂，1916年於臺北神學校畢業後即赴日入同志社大學神學部，次年轉入東京神學校，1919年畢業回臺。1921年二十六歲派駐雙連教會任傳道師，1936年四十一歲時正式封牧。曾擔任過北部教會北部中會議長（1937），北部大會第一、第二、第四、第五、第六、第七議長（1940至1954年間），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第一屆副議長（1951）、第九屆議長（1962），臺灣神學院、玉山神學院、聖經公會董事長，臺灣福音聯誼會、基督教協會理事長、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理事、《聖經與信仰》旬刊發行人、籌建中正紀念教堂負責人之一等職。1990年逝世，享年九十五歲。
- 19 湖南臨湘人。1918年2月4日出生於今臨湘市桃林鎮鐘梅村一基督教牧師家庭。1937年肄業於長沙湘雅醫學院。1938年考入國民黨中央警官學校正科第五期。後以公費先後兩次赴美國深造，獲華盛頓州立大學警政碩士學位及密西根州立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此前，曾參加全國高等文官考試，獲優等第一名。回國後，歷任中央警官學校教官、秘書、教授，首都警察廳專員、副處長，內政部警察總署督導，內政部科長、專門委員、行政資料室主任等職。1952年4月後，調任臺灣省警察學校教育長兼中央警官學校臺灣警官訓練班副主任、臺灣省警察幹部講習班教育長。1966年任國防部法規司司長，期間亦任中央警官學校校長七年。1978年任東海私立大學校長共十六年之久，費正清曾公開批評蔣經國委任「情報頭子」擔任大學校長，是為民主自由社會的一大諷刺。
- 20 參見拙作〈臺灣基要派的愛國愛教—張靜愚與護教反共時期的基督教〉，收入國史館出版《近代中國的宗教發展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15，93-122。學術會議，2014/9/26。



共的 WCC 走在一起等罪名，他都堅決拒絕與這些人為伍。

事實上，這些人曾來找過他擔任主席之類的職務，但周聯華巧妙地拒絕了，可見他的處境一直都是非常險峻的，甚至有人還拿他是黑名單來威脅他。周聯華對當時的政治是有自己的主見的，於是，有人要他表示自己的立場或加入國民黨參與國民大會代表選舉之類的，最終都被周技巧地拒絕了，前提是要周答應，如果不願出來領導就不要多說話。<sup>21</sup>

作為「基督教在臺宣教百週年紀念大會」籌備會的主席，周聯華參與了與黃武東、黃彰輝等長老教會背景的人士一同推行的合一運動，由於這個運動與護教反共陣營人士打著反對普世教協的旗幟形成了公開化的衝突，周聯華的處境可想而知。<sup>22</sup> 曾有一位浸信會的牧師如此調侃周與 WCC 的關係，這句話是可以上升為政治指控的：

譚畏民牧師代表浸信會，表示該會堅決反對之立場，並附帶提及周聯華個人的行動與浸信會的立場無關。周氏曾在浸信會神院校友會上，答覆譚氏及其他校友問詢謂：他參加 WCC 完全是他私人的行為。

譚氏曾大膽指出，周氏的行為是違背真理的，譚氏說：周氏這一種答辯，是和一個牧師參加不正當娛樂，是屬於他的私事，同樣的荒謬絕倫。<sup>23</sup>

的確，周聯華曾於 1963 年到普世教協做過專題報告，並參與主張加入 WCC 的 (1965) 合一運動，也與 WCC 會員、親共、容共的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往來互動緊密。1966 年又鼓吹參加於臺南舉行的「與天主教聯合祈禱會」，周的一連串行動不容於教內的基要派分子，這些基要派分子又打著護教反共的旗號，在這個意

21 周聯華，《時代的呼聲》，臺北：臺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6，42-43。

22 參見拙作〈割斷與普世教協的關係—護教反共時期的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2013 現代中國本土基督教神學之發展研討會」，2013/12/6-7。

23 標題為「反對所謂聯禱，浸會立場堅定」，見《福音報》第 285 期，1966/2/6。



義上，周已經深陷於政治囹圄，在信仰正統和政治正確方面都累累犯規。周聯華經常說他視長老教會牧師、天主教神父是他的「弟兄」，但根據王永信《真道手冊》的標準，他等於是支持「大背道」(WCC)分子、與「大淫婦」(天主教)往來，成了名副其實的頭號敵人。

當 1965 年百年大會召開前夕，四大教派與《角聲週刊》之間的文字戰爭開打之際，周聯華在 WCC 演講的內容被萬國基督教聯合會 (ICCC) 的臺灣代理人成文秀公開刊出並譯作中文，在他的攻擊性的文宣《駁復「正告主內兄弟姐妹們教會合一性」書》有一段影射性極高的文字：

幕後主持人：這是一幕傀儡劇，完全操在一個人手上，有所謂牧師者，於大陸讀書時，已被共黨利用，曾為學校反飢餓的領導人，後由大陸至美，轉入宗教。來臺後，於某差會身任要職，千方百計，各方鑽營，並利用職位，接近機關首長，巧言令色，左右逢迎，遇有難處，即奔走求援。某女中校長，亦受愚弄，凡事代為說項。尤其對美來臺之宗教領袖，更處處討好，口操流利英語，頗易接近，這些旅臺外籍人士，無形墮入圈套，亦受利用，現 WCC 行將好戲開場，此幕後主持人，一手拉著我國內對宗教不慎理解的人士，一手拉著外籍宗教領袖，正在密鑿緊鼓，言之令人毛骨悚然。

工作進行過程：數年前該牧師藉休假之名，遠渡重洋，與 WCC 負責人接洽（有說受訓），返臺後，積極活動。一面對中壢附近之某大學，及臺中附近之某大學，採取思想上無形的影響，以宗教名義，大講愛裏合一，使大眾消除國家及民族的心理，另建立臺灣與大陸之別。一面努力宣傳，主張各教會聯合，為容共之 WCC 做預備人心的工作。

雖然上述的文字並沒有指名道姓，但從這兩段文字的前提及有關「聖經翻譯」的爭執，我們完全可以確證，此人即是「周聯華」：

自去年有人倡言修改聖經，主要將聖經中瑪麗亞童貞女，改為少婦。有意



擾亂正道，當時引起空前的糾紛，終幸經過許多忠心愛主者力爭，已成過去。……

去年更從事修改聖經，配合匪區重定聖經工作，但因熱心愛主者，嚴加打擊，在福音報投函指責，如雪片飛來。該牧師，受盡困擾，未得如願。<sup>24</sup>

周聯華確實曾於 1963 年去過普世教協做專題報告，成文秀神通廣大地擁有這份報告，並還特別將全文翻譯出來予以撻伐，甚至，也附錄了改革宗長老會為背景、改革宗翻譯社的宋華忠批評周聯華的發言稿。<sup>25</sup> 長老教會的合一運動、與天主教的聯合祈禱會、倡議重譯中文聖經等，這一連串的指控都是槍槍射向周聯華，成文秀甚至公開指控周聯華在大陸時期的學潮中已被「共黨利用」（參加過青年會／左翼青年的「反飢餓運動」），認為他背景非常可疑，而今且處處表現出領導的位子（1965 年百年大會的主席），都一概被成文秀說成是居心叵測。

不僅如此，據說成文秀還特別跑到浸信會神學院去找柯理培院長，要他開除周聯華，理由即是他參加了普世教協的活動，表示他的信仰已不純正。周聯華回憶說，這種事情恐怕不是僅僅在教會裡，種種上述的事蹟早已成為他在情治單位手中諸多的罪狀之一。

因此可以了解，周聯華一直都是國安局或警備總部所監控的一號人物，1988 年公佈的「黑名單」，見到了周聯華的名字，目前內政部仍然有許多未消解的黑檔案，可見今天周牧師仍坐在此，可以比作臺灣基督教政教關係的「拉撒路事件」。<sup>26</sup> 事實上，周對此事早已知悉，並曾為此事向蔣夫人宋美齡女士發出抱怨，儘管未能成功除去其「黑底」，但因為在凱歌堂負責講道和主持以官夫人為主的中華婦女祈禱會，並獲得這些靈性好的「姐妹們」的愛護，使其在「最危險的地

24 《駁復「教會合一性：正告主內兄弟姊妹們」書》，110-112。

25 《駁復「教會合一性：正告主內兄弟姊妹們」書》，30-40、115-119。

26 原見《民進周刊》第 89 期，14-17，參見轉載刊登於《臺灣教會公報》第 1917 號，1988 年 11 月 27 日。



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成功地躲過了可能遭遇的恐怖命運。

在這一股強大、無人可擋的護教反共的浪潮之下，被外界稱之作「總統牧師」的周聯華，卻又深陷於另一個危機，即是有人要周出來主持並領導護教反共會議的組織和活動，如果拒絕，恐怕即是間接地暗示了其容共及背道的罪狀，罪加一等。確實，周聯華透露了一段意義重大的對話，這次的對話差不多可以說是周決意將自己豁出去了。

就在一個夜晚，內政部民政司的康峻璧，曾隻身摸黑夜訪神學院，要周聯華出來領導護教反共的組織，結果被他拒絕了，甚至還決定不參加這類活動。<sup>27</sup> 是次的談話可謂驚心動魄，周對此關鍵時刻的回憶是：

這次談話對我非常重要，也使我決定絕對不參加這一組織。我們在月光底下，坐在神學院的欄杆上，按說情調和背景都是很好的，應該談話融洽，結果卻不甚理想。我現在把扼要簡錄之於下：

康（康峻璧先生，下同）：「按說，你應該當這個會的主席才對。」

周：「為什麼？」

康：「因為你是總統的牧師。」

周：「這跟總統有什麼關係？」

康：「你是明知故問。」

周：「難道這個會與總統有關係嗎？」

康：（他大概是怕我真是傻傻地去問總統）「你是明知故問。」

周：「既然如此，我就不參加了。」

27 康峻璧，一位在護教反共時代不斷製造矛盾並為自己創造巨大影響力的太監型人物，人格相當複雜，儘管只是內政部民政司的一位專員，小得不能再小的官員，卻經常穿梭於黨政與教會之間，仗勢欺人，教會界人士對他的態度可謂必恭必敬。他一方面經常出現在政府的重要會議中，同時又全面介入長老教會在退出 WCC 的議事方面，非長老教會代表竟然是長老教會總會下「反共推動委員會」的委員之一。



康：（語重心長地說）「我看你還是參加的好！」

最後一句話他倒是很夠朋友的勸導，可惜我志已決，不參加就是不參加；我已經考慮過一切後果，莫說我早已在他們的黑名單中，就算再加一個罪名也無所謂，參加了也不能幫我洗刷他們給我按的罪名。

當然，這個拒絕肯定是要冒極大的風險的。尤其在他們的對話中，康不斷地暗示周「應該」出來領導，也以總統之名「施壓」他，但周卻敢說出連這個活動都不願參加的想法，康帶有威脅地提醒道：你還是參加的好，這是一句多麼「顫慄的善意」的話啊。

當然，儘管考慮了可能的後果，周聯華還是不參加，因為他認為，即便自己參加了，也不會幫助自己在黑名單中除名，就算是再加上一條，也沒有太大的差別，所以就干脆堅持到底，不願多少糾纏。確實，我們從第一屆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議的手冊名單上，見到周聯華的名字，但以後，凡是這類以護教反共的名義召開的會議，周不僅沒有出席，名字也不見於其中。<sup>28</sup> 當然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不管從何種角度看來，周已然是一位政教關係中「問題人物」之一，他與「大背道」分子做朋友、與「大淫婦」往來，在「護教與反共」的標準下，都給自己加諸了難以洗脫的罪名。

由於外界對周聯華的指責尤其地多，他生平四次坐在「永遠的候選人」位子上，可謂不無遺憾。但是，這些擦身而過的事，都可以說明背後存在著種種政治和信仰上對他的懷疑的或不信任。正如成文秀曾撰文指他是普世教協在臺灣的幕後代理人，對他的「親共」行為指證歷歷，我們不要忘了教會界人士也經常基於「維護純正信仰」和「維護聖經權威」的立場上暗指周的神學或信仰（天主教，普世教協）、甚至是對待聖經的態度都是有問題的，這些人大都是護教反共的主

---

28 除了無法迴避必須出席「蔣介石華誕」外，周基本上是與護教反共沒有任何聯繫的，見周聯華，〈臺灣教會史中之一頁悲慘史〉（未刊稿，2012/2/3，見本書第219頁）。



要幹部，當周捲入了基要派對他的聖經翻譯扣以「新派」的罪名時，這絕對不會只是一個信仰問題，它同時也是政治問題。

因為負責凱歌堂的工作，外界都把周聯華說成是「總統牧師」或「蔣家三代的牧師」，但諷刺的是，警備總部有一大批關於他的「黑檔案」卻是難以消除掉的。據說，那批檔案連蔣介石和宋美齡都知道，曾經有人想對他下手，許多與他互動的國民黨高層都知道這些事，只是沒有人可以做出改變。

周聯華公開且得意地提到，〈國是聲明〉他有分於起草，特別是第一段文字，全是他的意思。<sup>29</sup> 他也曾為幫助黃彰輝取得出國簽證而暗訪黨政高層，他甚至為高俊明被捕之事做過努力，也協助過宋泉盛回臺，這些都是他認為在那關鍵的時刻該做的事。當然，這都總不免成為有心人士做文章的好機會，隨時都可能「下落不明」。<sup>30</sup> 據說，還有一位浸信會的神學生差一點就被收買，要給周加上一些罪名，結果並未成功。

周聯華不僅是在政治正確上，尤其是在信仰正確上，經常是成為眾矢之的，基要派對他的攻擊從未少過，護教反共以來的諸多爭議性的事件，都看到他的身影在其中。周聯華與長老教會互動密切人盡皆知，但因他在凱歌堂與蔣介石、宋美齡的近距離關係，又使反對他的人不易下手。所以在黨國基督徒的眼中，周在反共上不夠用力，在護教的問題上多次違反純正信仰的立場，周多次被人質疑他的信仰是「有問題」的，包括參加普世教協的活動、接受天主教為教內份子、聖經翻譯的神學錯誤、本色化神學主張的謬誤等，每一項的罪狀都足以讓他在「政治正確」被控告，所幸，他總是可以安全地走過來，箇中的複雜因素肯定無人能解。毫無疑問地，周聯華就不屬於黨國基督徒那種偏狹神學立場的人，再加上他

---

29 見《時代的呼聲》，30。

30 周聯華，《時代的呼聲》，40-41。黃彰輝說這些人都不是宗派的基督徒而是國民黨的基督徒，事實上，更準確地說是「軍人基督徒」，因為他們對基督教的理解與接受與他們的統戰行為是相一致的，在基督教內部進行一種打擊共匪的心理安慰，以表達自己不僅反共也護教，愛國也愛教。



的政治立場更是在他的神學底色中難以迴避其政治上的「自由派」傾向，而且，所幸他安全地活過了那個護教反共的浪頭並在回憶錄中重現了這一段歷史。



▲《周聯華回憶錄》和《時代的呼聲》封面。（作者翻攝）

蔣介石與宋美齡雖然口頭上說對他被列於黑名單上是了解的，但在那種年代裡，尤其是貴為總統身邊的牧師，且與長老教會及與蔣有芥蒂的人士（何應欽、張學良）互動過密，很難不成為被看管的對象之一，留在凱歌堂，當然也不失為有「就近看管」的好處。真相永遠就不是我們肉眼所看到的、耳朵所聽見的那樣，在一個政治對生命充滿著威脅的年代更是如此，若不是上帝的保守，周不可能全身而退，他的存活可以堪稱得上是奇蹟，要不然，恐怕連他的屍骨都找不到。正是這樣一句話：在最危險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就發生在周聯華一生的際遇中。



## 與基要派化解不了的矛盾

在學術上，周聯華尤其偏愛存在主義神學，早在 1958 年就已在東海大學講授存在主義，甚至，他的本色神學還看得到田立克神學方法論的痕跡，曾在曠野社主辦的讀書會中讀田立克的著作。在那個年代裡，他可是冒著政治不正確和信仰不正確的兩大風險，「偷偷」地翻譯了田立克的一本著作《信仰的能力》。<sup>31</sup> 他對此事記得非常地深刻並回憶說：

這是唯一用筆名的書，因為當年我個人的環境，田立克教授對獨裁式的政治和對「個人式的英雄崇拜」頗不贊同，他偶然會在字裡行間表露出來。為了保護我自己，用了「羅鶴年」的筆名。我又怕銷售書的時候會有困難，用真名註解，並且寫了一個序。現在想來這麼做無疑是「此地無銀三百兩」，有些可笑。但也說明了我那時候的恐懼感。<sup>32</sup>



▲以筆名「羅鶴年」為筆名翻譯出版田立克《信仰的能力》一書。（作者翻攝）

對基要派而言，田立克是「新派」。以趙中輝為首的改革宗翻譯無不把批判的矛頭指向這些「新派神學」，連巴特也不放過。問題當然不僅僅是「新派」，對黨國基督徒而言，「新派」的背後不僅僅是違反正統教義，更嚴重的是它與政治意

31 《信仰的能力》第一版於 1964 年出版。與存在主義神學相關的，周聯華另譯有由 George L. Hunt 主編的《當代基督教十大思想家》，第一版於 1972 年由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出版；1973 年出版《存在與信仰》一書，由道聲出版社出版，全書絕大部份的內容即是他於 1958 年在東海大學宗教哲學講座文稿，內中即收錄了他在譯作《信仰的能力》前言中所撰寫並發表在《文星雜誌》上的〈生之勇氣—田立克〉一文。

32 《周聯華回憶錄》，311。



識形態是矛盾的，「護教」與「反共」是一而二、二而一。周聯華尤其指出了其中的政治風險，他敏感地感受到，黨國基督徒對「新派」的批判會無限上綱到政治清算，他將自己隱身於「羅鶴年」(Hollington Low)的筆名底下，若無其事地在譯者前言中介紹「周聯華」在《文星》雜誌上對田立克的引荐。

事實上，我們留意到，田立克這本譯作是屬於由周聯華、黃彰輝、<sup>33</sup> 金仲庵三人共同以東南亞神學教育協會名義推行出版的「基督教神學教育叢書」系列之一，這幾位人物都可以說是 1965 年百年大會和合一運動的關鍵代表，金仲庵和黃彰輝因政治的追殺而離開了臺灣，這套叢書在反對 1965 年合一運動的黨國基督徒那裡當然是思想可疑的「新派」著作，再加上「基督教神學教育叢書」的經費來自於普世教協，依當時的政治氛圍而言，肯定是危險的。

周聯華感到隱身自己是有必要的，以避免給黨國基督徒做文章或告密的機會，因為正如他自己所推斷的那樣，田立克在信仰上不正確，尤其在政治不正確上，很有可能被人說是「反獨裁政治」的影射，所以他這樣形容田立克的觀點，前一個是針對政治不正確的問題，後一個是信仰正確與否的問題：

- (一) 他的政治思想是遭納粹逼迫的反應，讀者隨時都能看到他對希特勒式極權政治的反叛。周聯華博士在〈生之勇氣—當代宗教哲學家田立克〉，……。
- (二) 他對其他宗教的尊重和寬容，這一點不是他的「不信」，而是他神學思想著重「相互關聯 (Correlation)，重視現狀與文化；因此，他注意基督信仰與當地文化的關聯。」<sup>34</sup>

這兩方面的說詞，更突出了「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辯解是必要的。因為周聯華的政治嗅覺是對的，如果正如他特別強調的那樣：田立克教授對獨裁式的政治和對

33 我們留意到周聯華以「羅鶴年」的筆名撰寫「譯者前言」中提到：「感激 CH 兄的校對原稿，和編者周博士的註解」，此處所提及的「CH 兄」可能是黃彰輝，加上好一個「編者周博士的註解」，嘗試做到滴水不漏，可謂「挖空心思」躲避政治檢查。

34 〈譯者前言〉，見《信仰的能力》，1964。



「個人式的英雄崇拜」頗不贊同，這不正是意味著翻譯田立克的著作最大的風險是政治，當然，也許更為險惡的是，那些一知半解的「護教擁蔣」者很可能會就此大作文章，給周按上「反蔣」的罪名。但從反面看來，周的言詞正好也說明了，在他的認知裡，當時臺灣的現實環境存在著獨裁式的政治和對「個人式的英雄崇拜」的現象，儘管他並未指明，但敏感的政治神經做出了心裡的投射和反應，的確饒富趣味。

1991年4月10日出版的《新使者雜誌》第三期，刊出了駱維仁一篇名為「耶穌有罪性嗎？」的文章，主要綜述他在翻譯現代聖經中文譯本時碰到一些困難與問題，這篇文章中最關鍵的一段即是解釋譯本針對羅馬書八章三節的翻譯。這篇文章引來了一場批鬥大會，尤以中華福音神學院系統的代表（黃子嘉、王長淦）對於該中文譯本的強烈不滿，終於在1991年11月14日下午，由聖經公會出面召開面對面的交流會，該會的出席者有：賴俊明、蔡仁理、駱維仁、周聯華、翁修恭、紀元芳、梁重光、夏忠堅、林意玲、李長安、王長淦、陳端傑、黃子嘉、王正中。會中其中一位華神董事及國語禮拜堂代表王長淦長老的發言有幾段的言詞極為激烈，以下摘錄了部份：<sup>35</sup>

……聖經公會如果改變了，如果變質了，重組聖經公會！我想與我同樣感覺的人還是有。……還有一個感想，聖經公會權也太大了，幾個人可以掌握這一切，要改就改，要修就修，要換就換……痛心！痛心！……

……你（指周聯華牧師）跟他（指駱博士）走一路。

值得注意的是，最後一段話是指著周聯華說的：你跟他走一路。然而，了解事實的人應該知道，不是最後這一句話才指向周聯華，所有斥罵駱維仁的話都是在斥

35 這是張德麟根據錄音帶整理的，見〈駱博士與新使者雜誌〉，收入《聖經、詮釋、實況——駱維仁博士榮退紀念文集》，臺北：永望文化出版事業，2001，450-454。



罵周聯華，因為現代中文譯本和周聯華的關係最為密切。<sup>36</sup>

周聯華說過，在基督教圈子裡，「對付一個不喜歡的人，只要冠以『新派』的標籤，他就翻不了身了」，包括只要肯定天主教或與長老會人士接觸，很快就被這些人懷疑，稍惡劣些，就成了鬥爭的工具。<sup>37</sup> 這是基要派鬥爭的一貫技倆。

周聯華與國語禮拜堂為首的華神系統，甚或是以王永信為首的華福會，彼此之間明顯存在著神學立場或路線的歧異，吳勇對周聯華做過幾次攻擊，基本都反映出了其中的原委。吳勇在他的回憶錄裡津津樂道他是如何地「衛道」，其中最為明確的即是與天主教劃清界限，所以，對於任何與天主教「聯合」之舉，甚至只是同臺出席，都極其地敏感，比對待「不同宗教」的人還更加地抗拒。這種態度幾乎是護教反共的問題上最為尖銳的課題之一，因為普世教協即是從事合一運動的基督教團體，天主教當然是合一工作上最為重要的伙伴，但在這些未經過神學教育的「地方教會」背景的人眼裡，一旦碰上與天主教的合作，都是表現激烈反對的，基本上他們都視天主教為離經叛道者。針對這種小題大作的事件還真不少，吳勇對周聯華諸多的批評，從對接納天主教的態度到聖經的翻譯，發生過好幾個案例，連在蔣介石的追思大會上的說詞，也可以成為吳勇的把柄，可見周聯華與臺灣基要派之間，存在著相當嚴重的「神學矛盾」。<sup>38</sup>

36 反對「重譯中文聖經」同樣是護教反共時期的一個重大的事件。1964年針對聖經公會主張重譯中文聖經這件事引起了巨大的反對風浪，同樣又是被扣以「新派」或「不信派」等罪名，甚至還說天主教正偷偷摸摸地以共譯聖經之方式來清滅基督教，居心叵測。中國平信徒傳道會和其下的《福音報》(第201期起)大肆批駁，視這些動作都是「別有用心」、「向魔鬼讓步」，各教派紛紛打著護教的旗號，用最強烈的口吻反對。

37 周聯華，《我的一生》，臺北：臺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0，110。

38 《不滅的燈火—吳勇長老回憶錄》(上)，臺北：宇宙光出版社，1991，203-213。吳勇批評天主教的問題不是根據教義，竟是根據歐洲教堂中有許多耶穌、馬利亞、聖徒等人的雕像就說成是「偶像崇拜」的證據，加上看到天主教徒向著聖像合手祈禱，更是認為天主教拜偶像。然而，這些理解都是有問題的，問題即在於不熟悉教會歷史也就罷了，而且還有時空錯亂之感，完全不了解早期基督教在文盲占多數及印刷術還未普及時，這些聖像都是作為傳福音的媒介。這樣的偏見出於一位「教會領袖」上，可謂「誤人子弟」，教門不幸也，因為正是這樣成了攻擊那些視天主教為「主內弟兄」的基督徒之罪狀。也許這正是「非正規神學教育」出來的典型例子，基要主義的心態認為，只要虔敬，似乎他說的任何話就都



周聯華一生飽受基要派分子的攻擊，都與他主張的合一運動有關：與 WCC 的友善關係、1965 年百年大會、1966 年與天主教聯合祈禱會、1970 年倡議與天主教出版共同譯本（2015 年終於推出了《四福音書》「共同譯本」，超過半個世紀的等待），……，都被扣以「新派」（背道）之名。<sup>39</sup> 所幸，周都能全身而退，實為不幸中的大幸，多少人在此之中深陷囹圄，像臺灣信義會的金仲庵那樣的可怕遭遇，至今想起都會令人感到不寒而慄。<sup>40</sup>

外界都以「總統牧師」的名號來稱呼周聯華，這些印象都是源於他主持了形同國喪的蔣介石逝世追思會和葬禮，因此就以為周聯華是「凱歌堂」的牧師，蔣在凱歌堂做禮拜，所以周就是蔣的「御用牧師」或「宮廷牧師」。事實上，周到凱歌堂去講道，而非駐任該堂的牧師，因宋美齡之邀，一個月內大概有兩次到凱歌堂講道，其間寇世遠、盧祺沃等人前往，他本人正職是「懷恩堂主任牧師」。蔣真下令取締普世教協，而周聯華在所有警備調查系統中都列為普世教協在臺的頭號份子，總統府的信箋條子上明明寫著周是「親共份子」，所以周可以保命，還得要多謝中華婦女祈禱會這些熱心的姐妹們為他的代禱，沒有宋美齡的機警，恐怕周的下場是連屍骨都找不到。

---

是正確的，典型的「儒家式的泛道德主義」。

- 39 以王永信為主的中國信徒佈道會發出了公開的嚴正啟事：近年來，有些聖經公會因逐漸受新派信仰的影響而漸漸走入違反聖經的「普世教會合一運動」的路。有的聖經公會正在計劃與天主教聯合翻譯中文聖經，並可能將「次經」也列入中文聖經之內。（次經，又稱偽經，是聖經以外的一些書信，為天主教所承認而成為天主教聖經的一部份，但純正信仰的基督教否認這些書信與聖經有同等價值。）這些聖經公會日漸在信仰立場上之妥協，是一件嚴重的事，將直接影響每一中國信徒及整個中國教會。見「特別啟事」，《中國信徒月刊》第 13 卷第 1 期，1974/1，3。
- 40 相關機密檔案顯示，鬥爭並誣告金仲庵會督案件中，基隆信義會福音堂丘國棟牧師為政府相關單位所策動。



## 《基督教論壇報》的由來

《基督教論壇報》是基督教來臺百年大會號召合一運動下之產物，從其經費來源，以及第一屆的董事成員組成就可以證實。然而，《基督教論壇報》事實上也是護教反共時期的一份產物，它的出現，是為了平衡極右（《福音報》）和極左（《臺灣教會公報》）的兩份報紙，採中間路線，所以仍然是以合一運作為其標誌而發行的。因為從某個角度而言，上述兩份基督教報紙顯然是表現為一種分裂而非合一，而且，我們可以從李嘉嵩的以下這段話嗅到因為語言背景的不同所帶來的政治緊張：

但是時代的巨輪旋轉，三代之間國語歷經三變，再能幹的人也無法經常站在時代的尖峰。我這個經歷特別在參與《基督教論壇報》的籌備顯得更尖

銳。當時臺灣各教派聯合發起出刊教會週報。長老會以我素有志於文字工作，而中文在一般本省籍牧師中又為最佳，因此委我參與工作。但一旦參加其籌備，就發現就是長老會所可找到最好的編輯人才都為自幼受中文教育的人所難接受。所謂「時代的錯誤」莫此為甚。幾經考慮，我終於決定離開「論壇報」的工作，尋覓自小就嚮往的神學教育崗位。一九六七年適逢馬來西亞砂拉越神學院招募教員，我遂應徵前去擔任教席。於是結束了



▲《基督教論壇報》發行。  
（作者翻攝）



十四年的文字傳道工作，展開了生命的新頁。<sup>41</sup>

不管是李嘉嵩或黃武東，他們的「國文」都可以算得上是優異的，一句「時代的錯誤」透露了多少政治現實的尖銳和矛盾，黃武東和李嘉嵩轉到參與《基督教論壇報》，等於是把長老教會最好的人才都送去作「合一運動」，可謂誠意十足。但是問題仍然存在，連憑著一股熱情從香港過來到臺灣的許牧世也隨時都可能被扣以「共匪」的帽子，李嘉嵩所言的「時代的錯誤」不正是指政治現實的可怕嗎？關於《基督教論壇報》，我們必然留意一位最為關鍵的人物，即創辦人兼主編—許牧世。

根據許牧世的夫人譚天鈞的回憶，1965年普世教協為紀念臺灣宣教一百週年，特別奉獻一筆款項給臺灣的教會，正不知要拿來做什麼的時候，許牧世建議要辦基督教報紙，而後，他也聯絡當時的四大教派參與經營。這裡說明了許多關鍵的元素，一是百年大會，二是普世教協的奉獻，三是四大教派合作，四是辦報，五是由許牧世來負責。

的確，幾位當時參與開創《基督教論壇報》關鍵的人物都提到了普世教協，而且，還留意到美國基督教協會，注意，這兩個協會都是護教反共團體指控「親共」的外國教會團體。許牧世即是通過這兩個重要的團體的支持而開始《基督教論壇報》的，其中必然產生繪聲繪影之詞。黎世芬提到：

一九五三年當時美國基督教協會（NCC）所屬之基督教文字事工促進會主持人波文克博士（Dr. H. Bovenkerk）卻看重了他學新聞的背景，使他回到亞洲，更賦予在臺灣紀念基督教傳入臺灣百年，結合長老會、聖公會、信義和衛理四大宗派，創辦「基督教論壇報」的任務。<sup>42</sup>

41 李嘉嵩，《100年來》，臺南：人光出版社，1979，100。

42 黎世芬，〈標兵許牧世〉，收入許譚天鈞等編，《基督的謙和勇士—許牧世教授 1914-2002》，臺北：天恩出版社，2003，58。《基督的謙和勇士》在編列許牧世的生平年譜時，竟然停在 1972，可是許活到 2002 啊，這是這本書的一大敗筆，無疑的，對一位從事文字工作的老兵而言，是一件極為諷刺的事。



周聯華的提法也是相同的：

許牧世負責對外聯絡，由我奔走於四大教派之間成立籌備委員會。那四個教派是長老教會、衛理公會、信義會和聖公會。籌備委員會第一次聚會，牧世帶來了好消息：如果四大教派聯合組織，美國基督教協進會（NCC）的文字和文學委員會（Lit&Lit/NCC, USA）願在開辦之初給予經濟協助。<sup>43</sup>

所謂的四大教派，正是回應了百年大會的合一運動的共同參與者，包括了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聖公會、臺灣信義會和中華衛理公會。在許牧世的領導下，《基督教論壇報》的首屆董事會有黃武東、李嘉嵩、宋泉盛（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王長齡、雷法章（中華聖公會），許可頌、顧敦柔（中華衛理公會）及金仲庵、殷穎（臺灣信義會），推舉黃武東擔任社長，李嘉嵩擔任經理。

許牧世擔任了幾年《基督教論壇報》的主編，他曾多次被人說成「匪諜」。<sup>44</sup>理由是，當時處在護教反共最激烈的時期，基督教界內對普世教協的人尤其抱持懷疑與警戒的態度，根據天聲小組於宗教聯繫輔導小組第四十一次會議（1965年7月23日）的報告，已將《基督教論壇報》列為普世教協的外圍組織，並建議對之進行限制。<sup>45</sup>可見，許牧世的處境有多危險。

而且，許牧世又是一位從國外來的人士，加上他來往港、臺、美，《基督教論壇報》的經費來源又與普世教協有關，自然就受到特別的注意。我們也留意到了，許牧世當時還兼職任教於臺南神學院，他在臺短暫的兩年多時間，之後又匆匆回到香港去了，可見其處境是危險的：

43 周聯華，〈許牧世—論壇的創辦人〉，收入《基督的謙和勇士—許牧世教授 1914-2002》，81。

44 許譚天鈞等編，《基督的謙和勇士—許牧世教授 1914-2002》。

45 國史館檔案，卷名「宗教文物展覽」，入藏號 02000016691A。許牧世與高俊明會晤之事，也列入跟監中。



但這也是讓他承擔的一項艱巨的工程，因為他當時面臨的有兩大難題。第一是在言論上如何去克服那些不同宗派、在神學觀點上的本位主義。記得創刊時社論都由他親自執筆，不過在某些論點上，也確實費了不少唇舌來說服，以徵得大家同意。在言論的政治立場上更要不觸及當時臺灣當局的一些敏感問題。

許牧世回到了香港出任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總編輯，結束了他在臺灣的工作，也躲過了之後可能有的政治風險。



## 5.5 牧師的政治與政治牧師

### ■ 反共神學的最後一位思想家：趙君影



▲趙君影（右一）與《福音報》發行人黃約翰：「護教反共，愛主愛國」。（作者翻攝自《福音報》）

臺灣黨國基督徒主要都是一些黨政要員為代表，他們主要是搞一些活動，搖旗吶喊一番。然而，真正有思想論述出版的，是旅美的中華歸主神學院院長趙君影牧師，他的一篇名為〈反共的屬靈性〉最具代表性，是作為反駁那些把反共說成是政治而非信仰問題的主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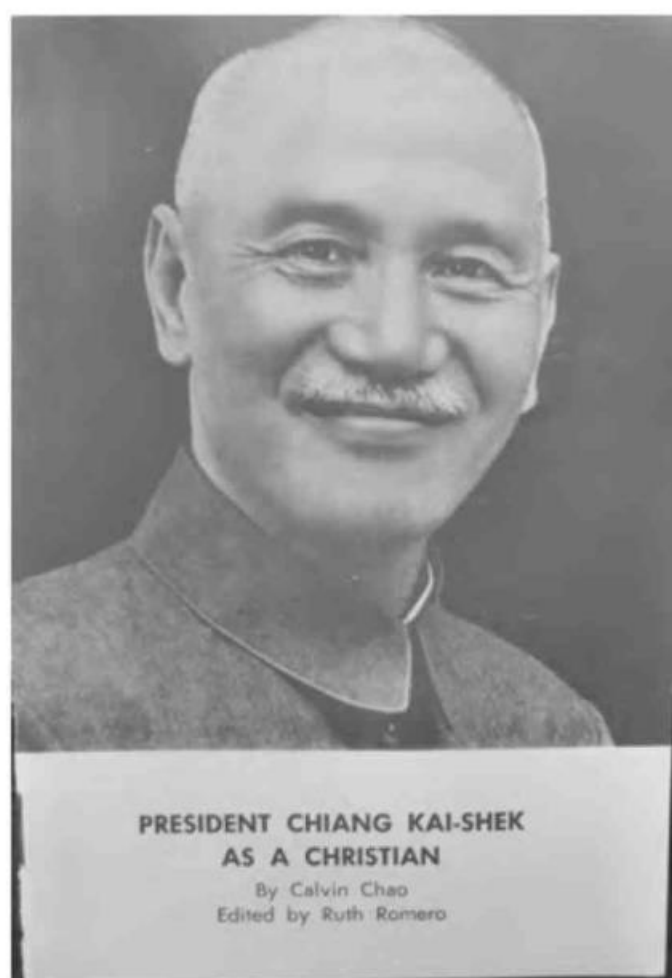
護教反共聯合會的活動到了後期，主要的活躍性人物就屬趙君影一人。他經常來臺，除了應黎世芬之邀於中央廣播電臺上主持一個思想性的節目，他更是自掏腰包來臺出席相關的會議並發表論點，後期護教反共的主調轉向於維護聖經無



誤論，趙君影成了最為注目的焦點，臺灣基要派的思想在他那裡成了個典範，將「合一問題、聖經無誤、打擊新派」三者結合起來，形成了一種護教反共論述的轉移。漸漸的，這也反映了臺灣經過護教反共期間，並邁向一個後反共時期基督教的類型，即是以基要派的色彩或立場鞏固了愛國愛教的意識形態，其中的關注焦點即是為聖經的無錯誤做辯護。

1978年，第四屆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於臺北召開，趙君影是大會主要講員之一，他的發言與〈反共的屬靈性〉沒有太大的差別，但其中強調了要向中國大陸以及共產黨傳福音，以此作為表現反共的積極態度和行動。<sup>1</sup>

1980年，趙君影在美國出版發行了一本英文小冊子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As A Christian*。此一小冊子篇幅很小，主要是將蔣介石的一些關於基督教的言論編輯翻譯過去。由於該小冊言簡意賅，且目的是將蔣介石的形象定調作一位偉大的基督徒，特別標榜其反共產主義、反無神論，有著清楚的基督教思想和信念，是中華民族四千年以來第一位基督徒的國家領袖。無意外的，反共神學的基本思想架框，即是「反共—護教—擁蔣」，三者形成不可分離的關係。



◀趙君影撰寫介紹蔣介石之英文小冊。（作者收藏）

1 《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第四屆代表大會代表紀要》，1978，32-36。



〈反共的屬靈性〉寫於 1971 年，事實上，此時趙君影尚未與臺灣基督教界的護教反共走得那麼的緊密，但是，自蔣中正逝世之後就有了一些改變。1975 年 7 月 12 日，由中華民國基督教主辦的「追思蔣總統安息百日紀念會」於臺北雙連長老教會舉行，趙君影受邀致詞，他讚揚蔣介石的基督徒信仰，激動地表示：

過去他身在美國，但仍普遍閱讀國內的書報雜誌，深知蔣總統在國人心目中的地位。今晚，在蔣公安息百日紀念之時，他要思想蔣公在上帝面前的靈性狀況，也就是蔣公在上帝面前的地位。

並呼籲：

蔣總統身為一國的元首，但他篤信真理，以基督的真理博愛，為反抗共產暴政的根據，因為共產黨是否定上帝的魔鬼。基督徒相信人性可以因着信仰而改善，所以反共戰爭就是要摧毀共產政權，拯救被奴役的同胞。因此我們也深信，蔣總統是站在上帝這一邊的，相信上帝的元首，就不容許否定上帝—敵基督者的存在。

……所以今天在追思蔣公安息百日的禮拜中，我們要認清共產黨是魔鬼的工具，是敵擋耶和華上帝的。尤其要認定蔣總統是站在上帝一邊的元首，是自由世界最偉大的反共元首，我們作基督徒的，自當繼承蔣公總統的遺志，持守真理，反共到底。<sup>2</sup>

趙君影對臺灣教會的觀察和分析，基本上都與臺灣內部護教反共的黨國基督徒分子看法是一致的，特別他還批評了長老教會的神學教育、「臺獨」運動，以及與普世教協的關係等。<sup>3</sup> 趙始終主張要回到基要派的立場，他對臺灣教會的批

2 〈全國基督徒聚會紀念總統蔣公安息百日〉，收入重提（本名：施卓人）編著，《雲彩》，臺北：中國平信徒傳道會發行，1976，130-131。

3 趙君影，《漫談五十年來中國的教會與政治》，臺北：中華歸主協會，1981，40-44，103-110，318-332，338-344。



評以及對美國一些神學思想的批評，全出於他對基要派的認同的支持，這方面的態度，即是表現在他把所有的神學論戰之焦點即是聚焦於聖經無誤的維護上，正如他所說的那樣

我在臺灣發起了基要信仰聯誼會（按：1978年發起，1981年成立），其用意是要基要主義以新的面目出現在中國教會，一方面注重聖經的研究和神學與哲學的根基；一方面要加強靈命的追求，在合作與合一上，以基要信仰為基礎。<sup>4</sup>

趙君影對美國基要派的頭號人物梅欽（John Gresham Machen, 1881-1937）做過介紹，並極力地推崇他在基督教思想史上的地位。基本上，趙對於梅欽的理解，是置於合一的前提以及反共（反自由派）立場上來解釋的，因此可以看得出來，他的想法與臺灣內部黨國基督徒的思想意識形態是一致的，按他的主張，他憂心於中國教會走向福音派，理由是福音派往往會因為傳福音之需要和合作上，很輕易地放棄了「分離主義」的教義，結果接受了一些與信仰立場相衝突的神學。他認為，尤其是福音派對待聖經的態度上，越來越傾向於一種開放的做法，接受那些不相信聖經的研究，當然也就使福音的基要信仰受到了扭曲。趙認為，臺灣的基督教都應該走向「梅欽型的基要派」，維護聖經的立場並積極傳福音，尤其要小心那些「披著羊皮的狼」（自由派）混入教會。<sup>5</sup>

中華民國基督教聖經無錯誤會議於1984年於臺北召開，之後，趙君影還特別編著出版了一本《聖經無錯誤文集》，文中翻譯刊出了著名的〈芝加哥宣言〉，並全面地針對各種對於聖經權威構成威脅的神學主張給予駁斥，其中最為重要的，無疑的即是關於「合一運動」的問題：

無聖經標準的「合一」，是將政治上「聯俄容共」滲透教會裡面，可不慎乎？

4 《漫談五十年來中國的教會與政治》，196。

5 《漫談五十年來中國的教會與政治》，344。



諸位請看提倡「合一」最力的，是親共的普世教協哩！

合一的先決條件，是對信仰加以清楚的界說。<sup>6</sup>

趙君影把自己的一生定義作堅定的反共分子，認為自己是受賈嘉美影響。賈嘉美是江蘇淮美中學的校長，趙君影即是從該校畢業的，趙宣稱從賈那裡繼承了兩樣東西，一是基要主義的信仰，一是反共。趙回憶賈嘉美時說到：<sup>7</sup>

他的反共出於對基督信仰的深切。除了有神無神的分別外，他進一步從末世論來暴露共黨與基督教的矛盾。他也是位預言學者，對啟示錄、但以理書極有研究。他相信基督與撒旦在歷史裏鬥爭，各自在建設一個統一世界的國家，而各居其首。他時常說：共黨就是紅龍，是敵基督者的前身。他具有這種信仰，當然就是徹底反共，不與他們絲毫妥協！

我個人數十年來反共的堅決從不動搖，有時被一般教會批評冷落，好像是在中國教會裏，沒有同心的人了。但每次與賈牧師交通，他給我的總有安慰與鼓勵。

這也可以解釋，趙君影在臺灣參與護教反共的活動，主要是與賈嘉美取得聯繫的，加上他與黎世芬的交情，反而與張靜愚沒有太大的關係。趙君影大概沒有國民黨黨員的身份，但他的反共立場使其獲得臺灣黨國大老的賞識，他的榮譽博士

6 趙君影編著，《聖經無錯誤文集》，臺北：中華歸主神學院，1994，342，部份文章已刊載於趙君影主編的《基督教遠景雜誌》「聖經無錯誤專號」中。中華福音神學院教師於2013年底出版《聖經真的沒有錯嗎？聖經底本無誤論的再思》，屬於老調重彈（黃穎航的文章早已見於趙君影的選文中，可見基要派之學術懶惰，更令人瞧不起），多了的是學術的包裝，有些文章可以形容作「荒腔走板」，重點在於，這又是一次臺灣基要派「分離主義」的宣示。關於對《聖經真的沒有錯嗎？》一書的逐章批評，可參見網路系列文章「蔡昇達的神學園地」。

7 趙君影，〈我是賈嘉美牧師的一封信〉，收入《賈牧師嘉美博士紀念集》，臺北：基督書院出版，出版時間不詳，49。另可參見趙君影，《我的宗教經驗》，臺北：中華歸主協會，1982，20-24。



學位即是中國文化大學張其昀以中華學術院的名義頒贈的，這方面無疑地是表示他獲得了黨國的認同。當然重點即在於，趙君影的基要派與反共、反普世教協的合一運動、聖經無錯誤論等種種的主張，竟是如此緊密相聯，所以他的神學實際上和臺灣黨國基督徒的基要派理念是相吻合的，而且，它也是政治意識形態的產物，從大陸學聯時期到海外中華歸主時期，趙君影對自由派的批判和抵制，始終如一。

## ■ 北部教會的「七星中將」：陳溪圳

陳溪圳，這位被教界人士稱之為北部教會霸主的「七星中將」，1895年生於臺灣基隆市基督教家庭。1910年入淡水牛津學堂，1916年赴日入同志社大學神學部，次年轉入東京神學校，1919年畢業回臺。1921年二十六歲派駐雙連教會任傳道師，1936年四十一歲時正式封牧。曾擔任過北部教會北部中會議長（1937），北部大會第一、第二、第四、第五、第六、第七議長（1940年至1954年間），臺灣基督長老總會第一屆副議長（1951）、第九屆議長（1962），臺灣神學院、玉山神學院、聖經公會董事長，臺灣福音聯誼會、基督教協會理事長、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理事、世界宗教徒聯誼會副理事長、《聖經與信仰》旬刊發行人、籌建「中正紀念教堂」負責人之一等職。1990年逝世。



► 陳溪圳牧師。  
（作者翻攝聖經與信仰旬刊）



陳溪圳歷經日據時代和國民政府遷臺的政教關係變化，是北部教會大老級人物（北部大會名下有臺灣神學院、玉山神學院、新竹聖經學院、淡水工商專校、馬偕醫院、北部女宣道會等），幾近重要的教會領導層面都佔有一席之地，雙連教會於臺北教會（屬於七星中會，是北部教會最有勢力的中會）的政、經、教的地位都是龍頭，故陳穿梭於其間均扮演重要的角色，其在黨國基督徒中是以長老會及臺灣省籍為主要的代表人物。由於其特殊的地緣政治，雙連教會可以說是北部長老教會的大老，其中七星中會幾近是北部大會的「總會」，陳溪圳被喻為北部教會的「七星中將」由此而來，重點在於他的權力地位，成了黨國基督徒極力拉攏的長老教會人士。但是，友好們為陳溪圳出版的記念集《常綠在人間》，對他的複雜政教關係完全不提，著實令人玩味。



▲聖經與信仰（作者翻攝自《聖經與信仰旬刊》）

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的南北兩大系統表面上於 1951 年合一，聯合共組了長老教會總會，然而，南部大會解散了，但實際上卻仍存在著一個所謂的「北大」（即「北部大會」）。南北長老教會向來就存在著一些難以克服的矛盾，北部大會中，尤其雙連教會是北部教會的領頭羊，其中擔任雙連教會牧職快一甲子的陳溪圳牧師可謂大老級的人物，每次北部大會的會議討論內容，大都是與處理「教產」（如馬偕醫院、北神、淡水工專等）有關，換言之，任何掌握了北部大會而且又以七星中會為主的，無疑的，都將是一方的霸主。<sup>8</sup>

8 可參見黃六點主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北部教會大觀—北部設教百週年紀念刊》，臺北，1994。





◀陳溪圳樂於參加這類的組織活動。（作者翻攝）



◀基督教參與各界慶祝蔣介石百年誕辰之記念活動。（作者翻攝）

基督徒向來標榜為要榮耀上帝的名，因此總是報喜不報憂、說好不說壞，但這種情況的反面即是粉飾太平、避重就輕，甚至掩蓋「事實」與真相。對於陳溪圳這樣一位涉入政治極深的重量級人物，後人對他的傳述的內容近乎空洞。<sup>9</sup> 目前見到的文獻資料，大多是憑著一些人的主觀感受來表達「懷念」之意，特別這些講述者與他有密切的關係，對於這樣一位在北部教會呼風喚雨的人物，我們尚未有過認真且深入的研究。<sup>10</sup>

9 參見《常綠在人間—陳溪圳牧師百年懷念集》，臺北：聖經公會出版，1994。

10 目前只見蘇蕙亞，〈陳溪圳牧師—政教張力下的悲劇人物〉，刊於《方向》第三卷第六期，



陳溪圳對於政治的參與頗為積極，他擔任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推行委員會的委員，名字與何應欽、陳立夫、谷正綱、李煥、蔣彥士、許水德等黨國政要並列，詳查名單上的人物背景，只有陳具牧師身分。基本上，陳溪圳涉及政教關係約有三段：一、日據時代與日本帝國宗教政策的關係（日本基督教臺灣教團與皇民化教育問題），二、國民黨政權反共意識形態之下參與了相關的愛國主義活動（身兼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要職），三、與同樣是長老會背景的牧者推動反對鼓吹臺獨思想（與黃六點、吳清鎰共同發行《聖經與信仰》旬刊）。要全盤了解陳溪圳的政教關係，應從這三方面著手，才能恰如其分理解到「七星中將」的地位。

根據流傳的紀念文集《常綠在人間》，完全沒有談論到這三個極為關鍵的內容，對於在日據時代的表現，黃六點巧妙地形容陳的做法是「用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的態度，來帶領北部教會度過這個危機」，更有人形容陳的所為是一種「補完改革者」，甚至，他還被形容作一位具有開放且參與多元化神學思想、社會福音運動者。當然，最令人費解的是，莫過提及陳最崇拜的基督徒人物是賀川豐彥。<sup>11</sup>

南北教會的矛盾，可以說是陳溪圳與黃武東之間的矛盾，陳一直都坐不上總會的最高位子，對於他在其他地方所取得的位子相較而言，確實是相當令他感到挫折的。《常綠在人間》收入黃武東的紀念文，可以看出此文完全是為了「應付了事」，閱畢其文〈總會成立時〉，不如看其書《黃武東回憶錄》對陳的批評。

最值得留意的，莫過於是所有的紀念文中，還特別收錄了一篇與雙連教會或長老教會無直接關係的人士之作，此君稱呼陳作「理事長」，內文提及與陳共事

1990/10, 14-15, 和梁唯真的〈北部長老教會宣教團隊之建立—以吳威廉與陳溪圳為例〉，收入《世紀宣教，釘根臺灣—雙連教會設教百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3)，梁唯真的文章主要提及的是陳在雙連教會的活動，對其複雜的政教關係，完全是空白的。

11 綜觀陳一生的政教關係，他說自己的一生都是向賀川學習，這種話說出來是無知還是無恥，讓讀者判斷。



於中華民國基督教協會的記述。實際上，康峻璧與陳的合作和互動非常地早，也非常地深，尤其在護教反共的組織方面最為密切（全書只有吳清鑑提及此事）。而且，正是康與陳共同聯手，在七星中會中提案迫使長老教會退出普世教協，以及攻擊長老會的臺獨思想，應該都是關鍵，但康峻璧也非常巧妙地不談及這一些，但對於陳的形容是：

**反共復國，擁護政府，效忠領袖**

作為康的親密戰友，這樣的形容是最為中肯、適切的，為這位「政治牧師」做了絕佳的註腳。<sup>12</sup>

《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人運動」之研究》這本碩士論文，對於理解陳溪圳有非常高的價值。廖安惠在論文中透露了北部長老教會於1932年至1939年的日據時代「新舊兩派」權力鬥爭的內在本質，其中，最為關鍵的即是「新派」的代表人物中尤以陳溪圳為核心，還包括陳芳本、鄭蒼國、蕭樂善、郭和烈、吳清鑑等。這幾位從日本留學回臺的青年傳道師，表面上是為了改造體制，目的是為了要從陳清義等當權派或稱「舊派」之手中奪得教會的領導權，聚結並推動「新人運動」，以告密方式借助了日本政府之力，指控舊派仇日，並成功地奪取了實質的權力，這種權力結構一直延續到戰後。<sup>13</sup>

根據資料的顯示以及相關人士的回憶，主要是發生了一件相當令人注目的「神學生聯名退學事件」。「舊派」人士遭到密告，結果被日本當局拘捕，「新派」人士卻都倖免於難。廖安惠的論文附有一篇當事人張慶義的訪問記錄，透露出這些新派人士的投機和兩面性格，直截了當地說，這些人在戰時，實為親日派，利用美日的矛盾，趕走外國教士，這些「新人運動」份子也被形容作「愛國派」，暗指為皇民化運動的支持者。張慶義甚至說：

12 《常綠在人間—陳溪圳牧師百年懷念集》，132，143，253。

13 可參見廖安惠《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人運動」之研究》，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這些人與戰後捧國民黨的人都是同一批，他們是賣教會、害別人，自己得利益的人。

這批人，日本統治時喊日本萬歲，中國統治時喊中國萬歲。

可見周聯華、黃武東對陳溪圳的評價，絕非空穴來風。<sup>14</sup>

## 黨國基督徒飲恨之作：「中正紀念教堂」

黨國基督徒最偉大的事業，當然不僅僅是搞護教反共活動，或是辦基督教研究所或大學。黨國基督徒最偉大的事業，就是要打造一間「黨國教會」，這間教堂的名稱是「中正紀念教堂」(CKS Memorial Church)，儘管這計劃後來胎死腹中，但從他們動用黨國機器精心設計地要將它落實為「反共，反臺獨，促進全國教會團結與合作的我們教會總部」的企圖看來，黨國基督徒念念不忘的仍是想打造一個伏在政治底下的基督教，以及對蔣介石近乎神化的崇拜。



▲這左右兩張的牌子，一邊是「濟南基督長老教會」，一邊是「(中山南路)國語禮拜堂」(即後來的信友堂)，述說著一段微妙的關係。(作者拍攝)

14 第一階段涉及到皇民化的問題，黃武東和周聯華的回憶都曾公開點名批評陳溪圳。據說，1945年太平洋戰爭結束，也同樣是這班人，向重慶的國民政府發「表忠文」，以示效忠。



黨國基督徒崇拜蔣介石並主張興建「中正教堂」一案，時來已久。1975年4月26日召開的中華民國基督教追思故總統蔣公籌備會議中，通過了臺灣信義會靈光堂張力長老的主張，推動全國教會共同興建「聖介石堂」之提案，此案議決同意並交由中華民國基督教會協會常務理事會研辦。<sup>15</sup> 基於諸多的歷史情感，黨國基督徒倡議在濟南長老教會現址上建「中正紀念教堂」，據說也獲得了宋美齡的同意。

此一計劃的落實，由翁節敦、黃約翰（翁節敦之甥，基督教協理事，《福音報》創辦人）、康峻璧（基督教福音聯誼會總幹事，基督教救世服務總會會長）、陳溪圳（基督教協理理事長、雙連教會牧師）、林攻芸（濟南教會國語禮拜堂董事長）、侯天民（國語禮拜堂牧師，基督教救世服務總會榮譽會長，資深監察委員）、<sup>16</sup> 雷法章（中華基督教協會理事，司法行政部部長）、吳嵩慶（聯勤中將副總司令，中華基督教協會理事）、韓時俊（信友堂長老）等人以「中華民國基督教會協會」、「基督教徒救世服務總會」及「國語禮拜堂」等聯合名義，在濟南教堂現址上興建「中正紀念禮拜堂暨經國活動中心」之計劃為由，其中還特別向國民黨中央黨部馬樹



▲中華民國基督教會協會公文封袋，此一組織依然存在。（作者翻攝）

15 見《福音報》第754期，1975/5/4。

16 遼寧北鎮（今北寧）人。生於1900年3月7日（清光緒二十六年二月初七）。日本三育大學畢業，革命實踐研究院十五期結業。1923年加入中國國民黨，後擔任遼北省縣黨部常務委員、遼北省黨部委員。1931年後組織義勇軍。1944年在北平被日軍逮捕，抗日戰爭勝利後獲釋。1946年10月任遼北省政府社會處處長，同年11月當選制憲國民大會代表。1947年3月增補為國民參政會第四屆參政員。1948年當選行憲第一屆監察院監察委員，並任監察院社會衛生委員會委員。到臺灣後仍為監察院監察委員。1969年3月被聘任中國國民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黨務顧問。後又任中國國民黨監察委員黨部書記長。1990年5月12日逝世。



禮秘書長及社工會請求協調各主管機關撥地，欲取得地上權。<sup>17</sup>

根據他們的說法，此一計劃有三方面的意義：

- 一、紀念並效法蔣介石總統之虔誠信仰；
- 二、增進世界各國教會與我國之聯繫及合作；
- 三、團結全國教會協會政府復國建國之大業。

1989年，黨國基督徒已成功向日本日米基金會申請經費協助籌建，總經費計十億臺幣，並已成功籌募得五億的金額。「中正紀念禮拜堂暨經國活動中心」的建築圖，主要是委託中國興業建築師事務所設計，興建內容包括中正紀念教堂、經國活動中心、國父及蔣公圖書館、傳教士靈修院、基督教招待所、各種會議場展廳、各教派聯合辦公室及青年體育運動場，基地面積約八百二十坪，十五層，每層六百坪。<sup>18</sup>



▲中正紀念教堂圖。（作者翻攝自蘇南洲論文）

17 以下的內容，主要是根據蘇南洲的研究成果，見《教堂空間之社會分析—以臺灣長老會濟南教堂為例》，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年。

18 中國興業建築師事務所的負責人是彭蔭宣，「彭蔭宣」是何許人也？彭蔭宣有一位胞弟名為彭蔭剛，後者是娶了香港船王之女，成了董健華的妹夫。提到彭氏兄弟，更為注目的還是他父親—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此君被外界稱為「高雄屠夫」，是在二二八事件以及之後的「澎湖七一三事件」、「師大四六事件」、「清鄉」中鎮壓民眾的關鍵人士。我們留意到，陳溪圳的妹妹嫁給了彭清靠，此君當時任高雄市市參議會議長，參加了高雄市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共有七人找彭孟緝談判，結果有些被殺或被捕，只有彭清靠平安回來。提及彭清靠，他即是彭明敏的父親，母親陳金嬰，了解到這一點，就知道陳溪圳與彭明敏的關係是如何地特殊。



然而，為什麼會選在濟南教會的原址上蓋「中正紀念教堂」呢？

對許多黨國基督徒而言，他們對濟南教會有著諸多特殊的情感與記憶，而且加上緊鄰總統府和中正紀念堂，選取濟南教會，可以打造一個國家教會的象徵，並作為一種新的象徵來取代舊的象徵。

濟南教會原名作「幸町教會」，原是日據時代日本基督教臺灣教團推動皇民化教育的總部，當時負責人是上與二郎牧師，負責了全臺基督教七大宗派的教務，包括任免牧師職務都由他處理。由於日本教會離開得過於倉促，未明確交待教產，自國民黨政府遷臺後，產權之爭一直都是一個焦點，正是這個不確定性，黨國基督徒精心規劃並企圖藉以在這座古老教堂上打造一座以擁蔣、崇蔣為要的「國家教會」。<sup>19</sup> 蘇南洲做了極為精彩的評述：

這個計劃很明顯的就是要興建基督教部門國家機器，當然其背後的目的相當複雜，而且並未正式知會濟南教堂，但由於當初使用權是陳溪圳具名的，現在又由陳溪圳具名申請，似乎是使用者都同意的（長老教會與國語禮拜），但在興建組織及未來管理組織上又未列長老會或濟南教會，顯然有以政治力量奪取該教產及基地之意涵，且陳溪圳早已自長老會退休多年、既非長老會議長，亦非濟南教會牧師，且該案又未在長老會總議會提出過或得到授權，陳溪圳實在毫無長老會或濟南教會之代表性，而且「至中央

19 濟南教堂原是 1915 年日據時代所設立，名為日本基督教臺灣教團臺北幸町教會，光復後才改名作濟南街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1952 年正式經由地方法院登記由北部長老教會承接過來，當時負責人為北部大會的議長陳溪圳。另外一間原為日本基督教臺灣教團臺北聖公會（又名大正町教會），光復後則改名為中山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此間教堂的移交人為大橋麟太郎，接管者為黃六點，時間是 1946 年 3 月 26 日，同樣的，之後這間教堂也歸屬為北部大會的產權。現在我們還可以在濟南教會的門口看到「臺灣長老會國語禮拜堂」的牌子，1949 年流落到臺的難民，基督徒大多在許昌街的青年會聚會，有些就到濟南教會，當時教會普遍使用的不是日語就是閩南語，最終爭取到早上十一點有一堂以國語為媒介語的禮拜，所謂「國語禮拜堂」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形成的。「國語禮拜堂」可謂是這個時代的產物，當然最終其表現與黨國主義的親緣性也變得可以理解。



「社工會文」中竟說「濟南街長老教會亦表示贊成」頗有魚目混珠之嫌。<sup>20</sup>

可見，「熱心」的黨國基督徒如此充當國家機器的工具，真可謂是「奉上帝之名」盡一切所能。

「中正紀念教堂」的籌建極為隱密，為何最終告吹了呢？故事的發展是這樣的。1988年，在臺灣大學攻讀碩士學位的蘇南洲正著手於撰寫其碩士論文，把研究對象設定為對濟南教會建築空間的探討，結果意外地從濟南教會國語禮拜堂長老林攻芸那裡獲得了一份資料，這份資料即是詳細的說明了「中正紀念教堂」建築的計劃內容。當時蘇南洲將資料轉給了翁修恭牧師，翁驚覺事態嚴重，於是立即去找已上任作總統的李登輝，1990年李登輝指示臺北市政府將這座古老的歷史性教堂列為古蹟，黨國基督徒的「中正紀念禮拜堂」大計也就此告吹，同時象徵著臺灣基督教「護教反共時期」的結束。<sup>21</sup>

殷海光，這一位臨終受洗成為基督徒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剖析國民黨時指出，國民黨是打著自由主義幌子的次級極權主義政權。<sup>22</sup>也有人稱之作類似於列寧主義體制 (quasi-Leninist regime)，其特徵包括：1. 成立跟國家官僚體制並行，且予以控制的黨機構；2. 由黨透過獨特的政工系統與軍中黨部來控制軍隊；3. 予以外圍化、無力化的友黨；4. 透過黨分會（如青工會、婦工會等）控制社會團體（即建立國家統合主義式的構造，以防止此構造之下之階級團體的脫動員化，並排除由下而上的自主性動員）；5. 黨政策決定採民主集中制。這種列寧主義式的構造正是通過了反共論述的全面執行，亦進一步地鞏固蔣個人的全能領導性格，從而

20 這本論文奇蹟般地扭轉了一個歷史發展的轉折，見於《教堂空間之社會分析—以臺灣長老會濟南教堂為例》論文。

21 整個故事的發展可詳見蘇南洲的論文。這本論文可謂誤打誤撞，結束了黨國基督徒的護教反共的幻想，也為爾後臺灣基督教的發展除去了一道可怕並充斥著恥辱的墓碑—「中正教堂」。

22 〈剖析國民黨〉，收入盧蒼主編，《殷海光書信集》，321。〈剖析國民黨〉是一篇對在臺灣的國民黨所做的「精神分析」，截至目前為止，尚未見有其他的文章如此之精闢的。



在由上而下的決策過程中，配合黨政軍一體的社會控制。<sup>23</sup>

護教反共的基督徒也是打著護教的幌子，以作為掩飾其對蔣及其國民黨政權無條件的服從及從中為自己創造教會資本。國民黨從大陸敗退到臺灣，其對島內的控制，名義上稱為民主，但實質上卻是進行監護，在一切以反共復國為號召下，任何與它稍有不同想法的都視為是潛在的親共分子。這種通過強化敵人的威脅作為手段的做法，從黨務到政務的一體化，而且一直延伸至對基督教的控制。那些出現在教會重大場合的「基督徒領袖」都是具有堅定的黨政背景的，說得簡單些，他們更多是關心黨國甚於教會，服務蔣介石多於服務信徒，最為惡劣的莫過於以此勢力來打擊異己、分裂教會，以及任意扭曲或壟斷對基督教的解釋，定別人為新派或異端。

在威權體制與恐共的心理壓力之下，黨國基督徒和政治牧師越是變得疑心病重，加上不確定感和離開家鄉的痛苦，更是加深了他們對信仰的依賴，無形地將這種強烈的依賴解釋為一種虔誠，也就是基督教意義下的「末世情結」。但是，這樣的虔敬越發地誘導他們在政治上變得更為狂熱、非理性，他們的狂熱更多是對政治勢力的崇拜，而並不全是來自於基督教信仰，越是表現出反共，越自認為是在護教。

所以，黨國基督徒對權力的掌握，同時也變成了對聖經與信仰武斷的解釋，他們處處表現得自以為比誰都懂得聖經，懂得何謂基督教的真理，其他不同於他們的，都一概視作是新派或自由派，在教內以打擊異端為名，在教外則是忠於黨國。這種信念通過了海外華人和美國基要派份子的支持與附和，變本加厲，甚至越是膽大妄為，自己解釋聖經的結果才是最純正的，自辦「神學院」或「基督教研究所」，開班、講課、授學位，以表面的信仰虔誠來掩飾其政治忠誠，將聖經或基督教工具化充當政治統治的正當性。

---

23 參見蕭淑惠，《遷臺後蔣介石的反共論述（1949-197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由於任何與合一運動或普世教協有著密切關聯的，都一概被視為是「信仰不純正」，因為普世教協之宣教主張經常地與地區性的社會正義或民族解放問題互相呼應，在反共的前提之下，當然同樣地遭到反對。華人教會普遍對「解放神學」(liberation theology) 有所保留，亦對「解放」、「革命」、「社會福音」等字存有芥蒂，於〈洛桑信約〉之翻譯中可以看出華人教會領袖們面對社會責任時所持的保留態度。於〈洛桑信約〉的譯文中，「解放」一字 (liberation, liberating) 沒有翻譯出來 (第四段中關乎佈道的本質)，或者在翻譯時採取輕描淡寫或較易接受的辭藻，如「自由」和「政治行動」(第五段關乎基督徒的社會責任) 等，這種方式與過去護教反共的意識形態內化或潛意識化，恐怕有相當的關係。<sup>24</sup>

儘管臺灣長老會宣稱他們關懷社會公義，但在神學上始終不敢往解放神學上展開，結果卻是走向國族神學的建構，喪失了其應有的批判性，這方面最明顯的表現即在民進黨執政後，熱衷於政治的長老會牧師竟無條件地接受民進黨在政績和操守上的嚴重缺失，確實是令人感到失望的。

或許，對這些曾經在大陸被「共匪」打得落荒而逃的敗將之軍而言，聽到「解放神學」與聽到「解放軍」一樣的刺耳，這種情況正如他們聽到「突破」一詞就想到「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法語詞一樣，把它說成是一種共產主義使用的邏輯思維，很難不讓他們聯想起共產黨的語言。<sup>25</sup> 可見，這種能挑起敗將之軍的恐懼的語詞，怎麼可能不予以還擊呢？這些具軍人背景的基督徒如此熱心地護教，更多是因為心理或靈性的創傷所致，這些人在臺灣仍在反共復國的口號和恐懼之中，尚未好好地為在大陸受創的靈魂接受信仰的治療，受創的靈魂沒有獲得醫治又轉而傷害他人。這就是約瑟和他們的兄弟們的一段悲慘史。

或許我們可以總結出，黨國基督徒所領導的護教與反共對臺灣基要派的形成所造成深遠且重大的影響，有如下的情形：

---

24 參見《大使命》雙月刊第44期，2003年6月。另參見馬志星，〈從宣教神學看政治族群紛爭〉，收入許宏度主編《二二八的省思》，臺北：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2006，227。

25 《聖經與信仰》第198期，1987/4/10。



1. 以國民黨背景的基督徒經驗作為對基督教的基本認知
2. 動員基督教加入反共之思想和行動行列，捲入一起對抗無神論的政治漩渦中
3. 批判國內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聯繫或各地支持左派革命的團體
4. 脅迫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退出普世教協
5. 否定任何具有社會實踐的神學，指控他們作「新派」或宗教干預政治
6. 促成對共黨宗教政策和宗教迫害（史）的關注
7. 為基要派在臺灣教會或神學界中的成長提供了豐饒的土壤

無疑的，「中正紀念教堂」像一座沒有完成的巴別塔，黨國基督徒沒有從在大陸的失敗中學到教訓，他們對基督教任意妄為的解釋，已根深蒂固地形成臺灣基督教的基要派本色：迷信權力和思想封閉。這些元素都深刻地決定著未來臺灣基督教的發展及其命運，今日泛靈恩的成功神學與自以為義的表現，是反共神學的產物，換言之，臺灣的教會神學尚未走出「蔣介石時代」。

從 1965 年的百年大會，到 1989 年黨國基督徒的「中正紀念教堂」計劃被終結，臺灣基督教走過了護教反共時期。臺灣教會經過這一階段，分裂的型態就此定調。長老教會被分化出去，獨自走一條反抗的路；臺灣基要派發芽成長，成為臺灣教會的另一種型態。臺灣的長老教會和基要派在此政治氛圍下滋長起來。

面對當前的教會現況，這是一個極其嚴肅的屬靈問題，是臺灣教會所有問題的癥結所在。救恩史與創傷史並行，沒有認罪，不會有真正的「合一」，臺灣基督教的屬靈光景的問題在於政治的創傷所致，約瑟和他的兄弟們尚未相認，雅各家的孩子們還在一種屬靈的無知和自我欺騙之中，「復興」之詞終究是一個自欺欺神的法利賽式之口號。或許我們沒有必要把教會立即帶到合一，但若沒有真正面對過往的歷史，臺灣基督教的未來注定無法走出一條健康的屬靈道路。



附錄：

臺灣基督教會政教關係史大事記  
(1949 年後)



## 臺灣基督教會政教關係史大事記（1949 年後）

- 1949 年 蔣介石與國民軍政退守臺灣  
黃彰輝接任臺南神學院院長
- 1950 年 韓時俊借用濟南教會成立中華基督教長老會濟南路國語禮拜堂
- 1951 年 3 月 7 日長老會南北大會合一，成立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交涉加入普世教協（WCC）
- 1953 年 東海大學創立
- 1954 年 黃彰輝正式代表臺灣參加普世教協  
成立自由中國基督教協進會（1966 年更名作中華民國基督教協會）
- 1955 年 賈嘉美等人創立中原理工學院（中原大學前身）  
教會倍加運動（PKU）  
聖光聖經學院成立（聖光神學院前身）
- 1956 年 王永信入臺南神學院
- 1957 年 12 月 6 日《福音報》創刊（黃約翰，中國平信徒傳道會）  
濟南路國語禮拜堂加入臺灣長老教會
- 1959 年 王永信赴美入神召會中央聖經學院  
賈嘉美另創立基督書院
- 1960 年 蔣介石審訂「革命精神修養日課」《荒漠甘泉》出版  
戴紹曾接任聖光神學院院長  
《天橋新聞》周刊發行（楊石林）



- 1961年 萬國基督教聯合會 (ICCC) 中華民國分會成立 (成文秀)  
王永信於美國底特律成立中國信徒佈道會，設臺灣分會  
4月13日麥堅泰赴總統府拜訪蔣介石  
8月《角聲週刊》創刊 (成文秀)
- 1963年 濟南路國語禮拜堂遷入新堂，名為「信友堂」  
7月18日周聯華於普世教協信仰與教制會議演講
- 1964年 2月《真道手冊》(王永信)初版，發行七千本  
7月24日萬國基督教聯合會在臺北召開「遠東基督教大會」
- 1965年 2月黃彰輝辭臺南神學院院長，宋泉盛8月接任  
2月13日發表《教會合一性：正告主內兄弟姊妹們》  
4月改革宗翻譯社從香港遷至臺北，趙天恩短暫在臺一年  
5月《真道手冊》第四版，修訂增加批駁WCC為異端的文章  
6月16日印行《駁復「正告主內兄弟姊妹們教會合一性」書》  
6月16日「基督教在臺宣教百週年紀念大會」  
8月《天橋新聞》因聯合祈禱會事件停刊  
10月於臺北成立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  
10月31日《基督教論壇報》發刊 (主編：許牧世)  
11月黃彰輝流亡海外 (倫敦)，1987年才返臺
- 1966年 1月30日「天主教和基督教聯合祈禱會」  
2月3日俞汝良、吳勇、盧祺沃、寇世遠等發表〈告同道書〉公開反對「聯合祈禱會」  
8月18日護教反共特別崇拜大會，發表〈聲明〉  
10月第二屆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代表大會 (臺北)  
4月中國文化大學基督教研究所成立 (1976年成立神學研究班)



- 1967年 第三屆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韓國）  
「信友堂」脫離臺灣長老教會
- 1968年 10月27日第四屆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東京）
- 1969年 10月中信發行魏恩波《為主受苦》  
10月14日長老教會總會設立「反共推行委員會」  
11月24日第五屆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臺北，同時成立為「世聯會」，第一屆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  
政府禁止以羅馬字印行，12月《臺灣教會公報》改以漢字出版
- 1970年 1月2日美副總統訪蔣介石說明美國將與中國接觸  
3月30日長老教會第十七屆總會會議流會  
6月17日長老教會總會議長謝緯醫生車禍身亡  
7月30日長老教會總會通過脫離普世基督教會協會乙案  
8月中華福音神學院創立，戴紹曾擔任院長，趙天恩任教務長
- 1971年 10月25日中華民國政府退出聯合國  
12月29日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對國是的聲明與建議》
- 1972年 2月21日尼克森訪問中國並發表上海公報  
3月臺南神學院院長彌迪理申請簽證不果，被迫離臺  
10月4日第二屆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臺北）
- 1973年 3月19日黃彰輝等發表《臺灣人民自決運動宣言》  
9月宇宙光雜誌創刊，以繼續《燈塔》之作，發行人韓時俊  
10月18日「臺南市基督徒慶祝總統華誕暨護教反共大會」  
12月17日中國信徒佈道會發表「特別啟事」反對聖經公會與天主教聯合翻譯聖經  
10月30日在臺北舉辦華誕大會



- 1974 年 警察進入和平鄉泰雅族博愛教會，沒收泰雅語聖經和聖詩
- 1975 年 1 月 15 日政府查禁臺語及泰雅族語聖經（井上教會）
- 4 月 5 日蔣介石逝世
- 4 月 26 日中華民國基督教追思故總統蔣公籌備會議通過籌建「聖介石堂」之提案
- 7 月中國信徒佈道會《總統 蔣公證道詞專輯》初版一萬冊
- 7 月第三屆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韓國，原定於美國）
- 10 月張曉風《黑紗》初版發行五千本
-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2 日葛理翰臺北佈道大會
- 11 月 18 日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我們的呼籲》
- 1976 年 4 月周聯華《另一位見證人》初版發行
- 1977 年 6 月 30 日美國發表一個中國政策論
- 8 月 16 日臺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
- 1978 年 12 月 15 日臺美斷交
- 第四屆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臺北，原定於日本）
- 1979 年 1 月美國正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鄧小平訪美，卡特接見
- 12 月 10 日爆發美麗島事件
- 1980 年 4 月 24 日高俊明牧師被捕入獄，1984 年 8 月獲釋
- 1981 年 在日本第五屆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
- 吳嵩慶、陳溪圳領導召開「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七十週年基督徒感恩大會」
- 10 月 10 日《聖經與信仰》（旬刊）創刊（黃六點）
- 1982 年 成文秀逝世
- 1984 年 張靜愚逝世
- 第六屆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香港）



- 1986年 第三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臺灣）  
10月26日中華民國基督教紀念先總統蔣公百年誕辰感恩禮拜
- 1987年 解嚴、開放大陸探親  
黃彰輝首次返臺  
第七屆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美國）  
「曠野社」成立
- 1988年 1月13日蔣經國逝世，李登輝繼任總統  
黃彰輝逝世  
9月15日《黃武東回憶錄》出版  
11月國安局公佈「長老教會黑名單」
- 1989年 11月萬國基督教聯合會在臺召開第十二屆「遠東基督教大會」  
「中正紀念教堂」籌建因宣佈濟南教會為古蹟而告終
- 1990年 12月8日周聯華與翁修恭共同主持「二二八平安禮拜」  
陳溪圳逝世
- 1991年 吳嵩慶逝世
- 1994年 7月《周聯華回憶錄》出版  
黃武東逝世
- 2006年 9月周聯華出版《時代的呼聲》
- 2015年 2月《四福音書（共同譯本）》出版  
臺灣宣教一百五十周年紀念
- 2015年 第一個在華人地區以基督徒名義正式成立的政黨「信心希望聯盟」，  
參與2016年的國會選舉
- 2016年 周聯華逝世





# 徵引文獻



## 檔案

〈七二〇專案〉，國史館外交部檔案 105067 號檔案，編號 020-990-600-2701。

〈亞洲基督教反共聯會案〉，國史館檔案，入藏號 02000017841A。

〈宗教文物展覽〉，國史館檔案，入藏號 02000016691A。

〈宗教案件〉，國史館檔案，入藏號 02000017839A。

〈亞洲基督教反共聯會案〉，國史館檔案，編號 020000017841A。

〈普世教會協進會〉，國史館檔案，編號 020000017888A。

〈教會活動〉，國史館檔案，入藏號 02000017840A。

臺(41)改秘室字第 0082 號張其昀、谷正綱呈。民國 41 年 02 月 20 日。臺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檔案編號 ntul-kmt-zp41-0067。

臺(50)央秘字第 058 號唐縱，張寶樹呈。民國 50 年 04 月 05 日。臺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檔案編號 ntul-kmt-zp50-0044。

## 史料彙編、文集、回憶錄

〈二十世紀的十字軍—為美國基督十字軍雜誌特頒短文〉(1957/5/30)，收入張其昀主編。《先總統蔣公全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耶穌復活節證道詞〉(1963/4/14)，收入中華民國基督教紀念先總統蔣公百年誕辰籌備會編印。《蔣公的信仰與見證》。臺北市：天生行印刷，民 75 年。

〈民國二十六年耶穌受難節證道詞〉，收入中華民國基督教紀念先總統蔣公百年誕辰籌備會編印。《蔣公的信仰與見證》。臺北市：天生行印刷，民 75 年。

〈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開幕致詞〉(1965/10/7)，收入張其昀主編。《先總統蔣公全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



- 〈為什麼要信耶穌？〉。《先總統蔣公全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
- 〈耶穌為救人救世救國救民而犧牲的精神—先總統蔣公於耶穌受難節證道詞〉（1950/4/7），收入中華民國基督教紀念先總統蔣公百年誕辰籌備會編印。《蔣公的信仰與見證》。臺北市：天生行印刷，民75年。
- 〈張公靜愚先生行述〉，《一束思念—張靜愚先生追思紀念冊》，家人自印，1987。
- 〈第一屆全球中國基督徒大會頌詞〉（1972/10/5）。《先總統蔣公全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
- 〈第三屆全球中國基督徒大會頌詞〉（1974/10/5）。《先總統蔣公全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
- 〈對遠東基督教大會揭幕致詞〉（1964/7/24），收入張其昀主編。《先總統蔣公全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
- 《中文神學教育研討會報告書》。香港：證道出版社，1973。
- 《中華民國葛理翰佈道大會紀要》，中華民國基督教會協會編印，1975。
-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中華民國五十年（一月至四月）》，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編輯。臺北：國史館，1980。
- 《如雲集：中華福音神學院師生見證專集》（一），1972。
- 《永遠的懷念：姚國祥牧師紀念集》。臺北：中國信徒佈道會臺灣分會，1993。
- 《謝明山博士逝世一週年紀念特刊》，1991。
- 《世界反共聯盟第一屆會議實錄》。出版不詳，1967。
- 《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第一屆代表大會紀錄》。臺北：1969。
- 《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第二屆代表大會紀錄》。臺北：1972。
- 《出頭天—臺灣人民自決運動史料》，宋泉盛編著。臺南：人光出版社，1988。
- 《臺灣省通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編。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1。



- 《先知自導—先總統蔣公駁斥共匪統戰陰謀之指示》，秦孝儀主編。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0。
- 《先總統蔣公百年誕辰紀念實錄》，先總統蔣公百年誕辰紀念實錄編輯小組。臺北：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先總統蔣公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1987。
- 《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會議手冊》，1965年10月8-9日。
- 《為人類自由而奮鬥（下）：世盟榮譽主席谷正綱博士言論選集》。臺北：世界反共聯盟中華民國分會印行。
- 《恩光普照中華：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七十年全國基督徒感恩大會文獻》。臺北：大會文獻審查委員會編，臺北，1982。
- 《異象與人生—王永信牧師六十選集》。九龍：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1986。
- 《柯希能牧師來臺宣教四十週年紀念見證集》。臺北：以琳基督徒中心發行，1998。
- 《認識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臺南：人光出版社，1981。
- 《神學教育與教會增長》。香港：中文神學教育促進會，1975。
- 《臺灣省通志》第12冊卷二，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1。
-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第十二屆議事錄》，1965。
-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第十三屆議事錄》，1966。
-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第十四屆通常議會議事錄》，1967。
-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第十五屆通常議會議事錄》，1968。
-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第十七屆通常議會手冊》，1970。
-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第十七屆議事手冊》，1970。
-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與美麗島事件》。臺北：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1999。
- 《總統蔣公證道詞專輯》。臺北：中國信徒佈道會出版，1975。
- 《常綠在人間—陳溪圳牧師百年懷念集》。臺北：聖經公會出版，1994。
- 《賈牧師嘉美博士紀念集》。臺北：基督書院出版，出版時間不詳。



《東海大學五十年校史》。臺中，2006。

《聖經、詮釋、實況—駱維仁博士榮退紀念文集》。臺北：永望文化出版事業，2001。

《傳到地極—紀念趙中輝牧師》。臺北：改革宗出版社，2011。

《故謝緯牧師醫生紀念精選集》。臺南：人光出版社，1993。

《護教反共特別崇拜大會專刊》，1966年8月18日。

中華民國基督教聖經無錯誤會議委員會編印，《聖經無錯誤會議實錄》，1986。

宋美齡，〈總統的信仰〉。《蔣公的信仰與見證》。臺北市：天生行印刷，民75年。

阮若荷，《中國心·宣教情—賈嘉美的一生》。臺北：美國基督教效力會基督書院出版，2001。

尹任先，《聖光指引—尹任先蒙恩三十年的見證》。香港：天道書樓，1998。

任新舫編，《私立中原理工學院成立十年概況》，1966。

吳勇，《不滅的燈火—吳勇長老回憶錄》（上）。臺北：宇宙光出版社，1991。

周景周，《周景周牧師回憶錄》。臺北：私人出版，2003。

周聯華，《另一位見證人》。臺北：道聲出版社，1975。

周聯華，《周聯華回憶錄》。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84。

周聯華，《時代的呼聲》。臺北：臺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6。

周聯華，《我的一生》。臺北：臺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0。

高俊明，《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師回憶錄》。臺北：望春風文化事業，2001。

孫耀光，《在祂手中—新加坡教會史（1819-1992）》。新加坡：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出版，2001。

馮玉祥，《馮玉祥日記》。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 黃六點主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北部教會大觀—北部設教百週年紀念刊》。臺北，1994。
- 黃武東，《黃武東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1989。
- 唐培禮，賴秀如譯，《撲火飛蛾：一個美國傳教士親歷的臺灣白色恐怖》。臺北：允晨文化，2011。
- 董顯光，《基督教在臺灣的發展》。臺北：作者自印，1961。
- 鍾文惠，《陳錫恩傳》。臺北：出版者不詳，1992。
- 蔣介石，〈本黨現階段制度主張〉，收入張其昀主編。《先總統蔣公全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
- 蔣經國，《我的父親》。臺北：黎明文化事業，1975。
- 鄭仰恩主編，《臺灣教會人物檔案（一）》。臺南：人光出版社，2001。

## 雜誌、報紙

- 〈中華民國基督教牧師長老座談會會議記錄〉。《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中國總會會訊》。臺北，1972。
- 〈為什麼基督徒要反共？〉、〈亞聯會中華民國分會護教反共特別崇拜大會的聲明〉。《護教反共特別崇拜大會專刊》。臺北，1966。
- 《中國信徒月刊》。臺北，1966、1976。
- 《臺灣教會公報》。臺南，1969-1970、1972-1973、1978。
- 《宇宙光》。臺北，1975。
- 《民進周刊》，第89期。
- 《真光季刊》，第270期。
- 《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中國總會會訊》。臺北，1972。



《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會訊》。臺北，1972。

《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會訊》。臺北，1965、1972-1975。

《華神通訊》。臺北，1970，1971，1992。

《華夏導報》。臺北，1968，1978。

《基督教論壇報》。臺北，1966-1969、1973、1977-1978。

《聖經與信仰》。臺北，1981、1984-1985、1987、1989。

《福音報》。臺北，1961-1963、1965-1966、1958-1970。

《瀛光月刊》。臺南，1965、1967-1968。

林美娜，〈周聯華談從教會牧師到社會牧師的自我期許〉，《自立晚報》1991年10月28日。

汪士淳，〈從李震元遺留文件一窺張學良在臺灣監管生涯真相〉，《歷史月刊》第168期，2002年1月。

吳錦勳，〈鋼索上的牧師—周聯華〉，《壹週刊》2003年2月。

李國鼎，〈讀《荒漠甘泉》悼念總統蔣公〉，《宇宙光》第13期，臺北，1975年5月出版。同時也刊載於《中央日報》，並收入於重提編《飛向慈湖的心》。臺北：中國主日學協會，1976。

查良鑑，〈敬悼總統 蔣公〉，《東海大學校刊》。臺中，1975。

任新舫，〈張靜愚先生行誼概觀〉，《山東文獻》十二卷四期，1987年3月。

戴紹曾，〈中華福音神學院簡介〉，《同工月刊》第58期，1971/2。

練馬可，〈南神與我〉，《神學與教會》21卷2期，1996。

## 專書

〈人性的吶喊—記「殉道者之聲」奮興佈道會〉，重提（本名：施卓人）編著。  
《雲彩》。臺北：中國平信徒傳道會發行，1976。



- 〈紀念蔣公安息週年〉，重提（本名：施卓人）編著。《雲彩》。臺北：中國平信徒傳道會發行，1976。
- 〈總統蔣公安息禮拜〉，重提（本名：施卓人）編著。《雲彩》。臺北：中國平信徒傳道會發行，1976。
- 《中國改革宗教會工人手冊》，中華歸正團契出版，2011。
- 《正告主內兄弟姊妹們教會合一性》。臺北：1965。
- 《馬丁路德為何要作改教運動》，徐萬黎編著。臺灣：宣道社出版，1962。
- 《現代社會轉型中的天皇制和基督教》，鈴木正三主編。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
- 《新德里之聲—普世教會協會第三次大會報告書》（*New Delhi Speaks*），何輔德（W. A. Visser't Hooft）編，陳舉譯。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64。
- 《補上一頁欠缺的歷史：蔣介石夫婦的基督教信仰》，王成勉主編。臺北：宇宙光，2013。
- 《風雨中的彩虹—基督徒百年足跡》。臺北：宇宙光出版社，2011。
- 《謝緯日記》，謝大立編。臺南：人光出版社，2001。
- 《國際共黨與左派運用基督教會從事活動》，吳東河譯。臺北：協林印書館有限公司，1983。
- 《從阿姆斯特丹到乃洛比—普世教會協進會與第三世界》。臺北：協林印書館有限公司，1982。
- 于力工著，《西方宣教運動與中國教會之興起》。臺北：橄欖出版社，2006。
- 于力工著，《夜盡天明》。臺北：橄欖出版社，2012。
- 王永信，〈再版序〉，魏恩波著。《為主受苦》。臺北：中國信徒佈道會，1969。
- 王永信，《真道手冊》。香港：大使命中心，1964。
- 王永信、鮑會園，《明白真道》。加州：美國中信出版社，2000。
- 王漢中、王軼群，《外籍人士對蔣總統之推崇》。臺北：國防研究所，1959/1966。



主的使女底波拉，《以法蓮是我的長子—獻給羅馬天主教徒》，出版社不詳，1961。

主的使女底波拉，《與羅馬天主教徒檢討主日彌撒經典》，出版社不詳，1961。

李宜涯，〈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張靜愚日記中有關中原大學創校史料的探討〉，收入王成勉主編《臺灣教會史料論集》。臺北：遠流出版社，2013。

成文秀，《不要同負一轡》。臺北：萬國教聯中華民國分會，1969。

成文秀，《基督教與國際共黨》。出版地不詳，1967。

成文秀，《創世記釋義》。臺北：基督教福音貴格會，1979。

成文秀，《聖經要旨》。臺北：基督教福音貴格會，1967。

成文秀，《駁復「正告主內兄弟姊妹們教會合一性」書》。臺北：萬國基督教聯合會中華民國分會發行，1965。

成文秀，《護教反共叢談》。臺北：協林印書館有限公司，1982。

考門夫人，《荒漠甘泉》。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3。

吳勇，〈光復大陸〉（1969/1/13），張靜愚主編。《陽明山靈修集》。臺北：出版社不詳，1969。

吳嵩慶，〈弁言〉。《何謂解放神學》。臺北：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中華民國總會編印，1989。

黎世芬，〈標兵許牧世〉，收入許譚天鈞等編，《基督的謙和勇士—許牧世教授 1914-2002》。臺北：天恩出版社，2003。

宋泉盛，《認同與合一》。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78。

李嘉嵩，《100年來》。臺南：人光出版社，1979。

林本炫，《臺灣的政教衝突》。新北市：稻鄉出版社，1990。

侯天民，〈耶穌降世與我們護教反共〉（1969/2/24），張靜愚主編。《陽明山靈修集》。臺北：出版社不詳，1969。



- 洪善繼，《馨香之氣—當代傑出中國基督徒素描》。臺北：中國主日學協會，1966。
- 胡鴻文，〈序〉。《共產黨就是共產黨》，方清卿譯。臺北：（私人）方曾東湖出版發行，1983。
- 趙中輝，《神恩浩大》。臺北：：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1983。
- 趙天恩，《扶我前行》。臺北：：中國與福音出版社，1993。
- 殷海光，〈剖析國民黨〉，收入盧蒼主編《殷海光書信集》。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88。
- 張瑞雄，《臺灣人的先覺—黃彰輝》。臺北：望春風，2004。
- 張鳳歧，〈藍天騎士〉。《張鳳歧自選集》。臺北：黎明文化事業，1979。
- 張曉風，《黑紗》。臺北：宇宙光出版社，1975。
- 張靜愚，〈聖經是世界文化的源流〉（1968/12/21）張靜愚主編。《陽明山靈修集》。臺北：出版社不詳，1969。
- 陳金興，《臺灣另類牧師醫師—謝緯》。臺北：草根出版事業，2010。
- 陳南州，《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社會、政治倫理》。臺北：永望文化事業，1991。
- 陳勝政，《臺灣教會宣教的剖視》。臺南：公報社，1972。
- 陳師孟等合著，《解構黨國資本主義》。臺北：：自立晚報社，1991。
- 麥克伯尼（Rev. W. S. Mc Birnie）、葛蘭德（Rev. R. Grant），《基督徒應否與共產主義爭戰？》（*Should Christians Fight Communism?*），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會譯，出版年不詳。
- 曾慶豹，〈上帝的宣教、自決與認同—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國族想像」〉。《什麼是漢語神學？》。新北市：臺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5。
- 曾慶豹，〈漢語「中國基督（新）教史」之書寫及其問題意識—以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一書展開之論域〉。《什麼是漢語神學？》。新北市：臺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5。



曾慶豹，〈十字架上的黨徽—蔣介石的基督教護教反共論述〉，《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第十期，2015。

重提編著，《雲彩》。臺北：中國平信徒傳道會發行，1976。

雷學明，〈蔣公向軍中傳福音〉。《補上一頁欠缺的歷史：蔣介石夫婦的基督教信仰》，王成勉主編。臺北：宇宙光，2013。

赫大衛 (Daniel C. Head) 著，成文秀譯，《共產黨征服世界的藍圖》 (*Communist Blueprint for World Conquest: Wars of National Liberation*)。臺北：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印行，1970。

趙君影，《漫談五十年來中國的教會與政治》。臺北：中華歸主協會，1981。

趙君影編著，《聖經無錯誤文集》。臺北：中華歸主神學院，1994。

劉真光，《宗教統戰論叢》。臺北市：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中華民國總會，1982。

蔣中正，《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3年。

Karen Armstrong 著，《為神而戰—基本教義派的起源與發展》，王國璋譯，臺北：究竟出版社，2003。

伯克富，《基督教教義史》。臺北：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1984版。

卓文義編撰《空軍軍官學校沿革史》。臺北：空軍軍官學校，1989年5月。

涂怡超，《美國基督教福音派及其對國際關係的影響—以葛理翰為中心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劉峙，《我的回憶》，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臺北：1982。

賈嘉美著，陶希聖和黎世芬合譯，《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的基本衝突》，出版社不詳，1965。

鄭仰恩，《定根本土的臺灣基督教》。臺南：人光出版社，2005。

鄧肇明，《滄桑與窘境：四十多年來的三自愛國運動》。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與文化社，1997。

總裁 (蔣介石)，《反共抗俄基本論》。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六十八年。



- 薛化元，《王南傑牧師—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口述歷史》。新北市：稻鄉出版社，2011。
- 謝大立，《謝緯和他的時代》。臺南：人光出版社，2001。
- 額奈斯特·萊福法，《從阿姆斯特丹到乃洛比—普世教會協進會與第三世界》。臺北：協林印書館有限公司，1982。
- 魏外揚，《牆上的名字：宣教士與臺灣》。臺北：中國信徒佈道會出版，2000。
- 魏恩波，《為主受苦》。臺北：中國信徒佈道會，1969。
- 魏恩波，《馬克思與撒旦主義》。真理之聲，1982。
- 蘇恩佩，〈我們應有的政治意識〉。《這一代先知在哪裡？》。香港：突破出版社，2013。
- 鄒建中，《榮神見證詩》。臺北，永和中興錫安堂，1978。
- Hanfried Krüger, "The Life and Activities of 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in Harold E. Fey eds., *A History of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2, 1948-1968*,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70.
-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Ecumenical Bearings of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 in Ruth Rouse and Stephen Charles Neill eds., *A History of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1517-1948*,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67.
- George M. Marsden 著，《解構基要主義與福音主義》，宋繼杰譯。香港：天道出版社，2004。
- Alister McGrath 著，董江陽譯，《福音派與基督教的未來》。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 Nils Karlström, "Movement for 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and Life and Work," in *A History of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1517-1948*,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67.
- Thomas E. FitzGerald,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An Introductory History*, Westport, Conn.: Praeger Conn., 2004.



Tissington Tatlow, "The World Conference on Faith and Order," in *A History of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1517-1948*,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67.

려용덕 (呂惠惠), 그리스도교사 (基督教史)。서울 (首爾): 문화출판 한강 (文化出版, 漢江), 1958。

## 論文

李靖波, 《蔣夫人 (宋美齡女士) 與中華基督教婦女祈禱會之研究》。中華福音神學院碩士論文, 2004。

蕭淑惠, 《遷臺後蔣介石的反共論述 (1949-197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2006。

廖安惠, 《北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新人運動」之研究》。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7。

蘇南洲, 《教堂空間的社會分析—以臺灣基督長老濟南教會為例》。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0。

## 會議論文

王嗣岳, 〈趙天恩在當代中國基督教的歷史意義〉, 發表於「第一屆趙天恩學術研討會」(2014), 臺北。

彭淑敏, 〈臺灣基督教高等教育的創辦—以東海大學為個案〉, 收入於東海大學主辦《典範的建構—東海校史暨人物傳記書寫論文集》, 2014年3月28日, 臺中。



梁唯真，〈北部長老教會宣教團隊之建立—以吳威廉與陳溪圳為例〉，收入《世紀宣教，釘根臺灣—雙連教會設教百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3，臺北。

曾慶豹，〈臺灣基要派的愛國愛教—張靜愚與護教反共時期的基督教〉，國史館主辦「近代中國宗教發展」學術會議，2014/9/26，臺北。

曾慶豹，〈割斷與普世教協的關係—護教反共時期的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主辦，「2013 現代中國本土基督教神學之發展研討會」。2013/12/6-7，臺北。

曾慶豹，〈黑名單上的總統牧師—周聯華與臺灣基督教的政教關係〉，浸會大學歷史系主辦「第九屆近代中國基督教史國際學術研討會：1949 年後的中國基督教」，2015/6/12-13。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約瑟和他的兄弟們：護教反共、黨國基督徒與臺灣基  
要派的形成／曾慶豹著. --初版. --臺南市：臺灣  
教會公報社, 2016.12  
384面；17x23公分  
ISBN 978-986-5637-37-8(精裝)

1.基督教 2.信仰 3.護教

242.42

105021454

## 約瑟和他的兄弟們

護教反共、黨國基督徒與臺灣基要派的形成

作者／曾慶豹

出版／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臺灣教會公報社  
<http://www.pctpress.org>

E-mail:publish@pctpress.org

發行／財團法人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臺灣教會公報社  
地址：臺南市701青年路334號

電話：06-235-6277#122 傳真：06-235-6287

執行編輯／林雯茜

美術編輯／蔡怡甄

2016年12月 初版

ISBN 978-986-5637-37-8 (精裝)

產品編號／04090353

尊重智慧財產權，請勿翻印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